〔美〕迈克尔·H·亨特

意识形态与
美国外交政策

●世界知识出版社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美〕迈克尔·H·亨特 著
Michael H. Hunt

褚律元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美）亨特（Hunt，M. H.）著；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书名原文：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ISBN 7-5012-1065-9

Ⅰ．意…　Ⅱ．①亨…②褚…　Ⅲ．①意识形态-影响-外交政策-美国②外交政策-研究-美国　Ⅳ．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113 号

图字：01－98－2383

根据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米小平

封面设计：姚少春

责任出版：尧　阳

责任校对：雨　遐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9.5　字数：240000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15.00 元

前　言

这本小书讲的是一个难以把握的大题目：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它大胆涉足一个充斥着混乱概念的复杂领域。同帝国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经常在严肃的历史与政治文献中交替使用且变化不定的概念一样，意识形态一词很难有固定的含义。因此，一开头我必须申明：通过我自己对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的研究，我确信应该给意识形态下一个广义的、常识性的、可行的定义，这种定义在我看来是一组互相关联的认定与假设，可以把某一特定现实的复杂性化解为易被理解的名词，并提出处理那一特定现实的适当办法。

读者对于什么是意识形态，它与政策又有什么关系，当然各自都有各种各样的、有时是表述相当明确的观点。我从写书伊始就意识到这个题目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读者各种不同的先入之见，将带来种种困难。直到写成此书，我仍然没有丝毫的轻松之感。我十分信服戈登·克雷格十多年前所说的话："把理念同外交政策联系起来，往往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此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少之又少也就不足为奇了。"[1]但是，这个题目太重要了，不容受到忽视，就好像有一个病魔缠身、郁郁寡欢的亲戚，理所应当地要求我们给以关注，而我们过去对他的要求给予的满足太少，甚至是敷衍了事。

构筑这幅美国对外关系从发端至今日的广阔图画，在很大程度上是把一些片断的史实和诠释——其中有些无疑是读者所熟悉的——组装成新的模式。这一实践的宗旨在于提供一种洞察过去的新的眼光，并启发人们对现实重新思索。希望读者从这一角度来阅读并批判本书。本书无论有多少缺点，希望它至少能唤起读

者认真看待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因素，甚至亲自参与此项研究。

本书第一章谈意识形态问题，尤其是它同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要阐述意识形态所提出的概念性问题，并提出一个答案，就得越界进入美国外交政策本身这一易生混乱的领域。一旦进入这个领域，读者就应在接下来的三章中循序前进。这几章将追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的根源，说明它如何在18世纪与19世纪逐步获得连贯性和号召力，意识形态的诸因素又如何在20世纪初结合成为一个相互增援、威力强大的思想主体，支配着那些与外交政策问题有关的人物的思想。最后两章意在阐明20世纪的美国人直到今日仍在承袭先辈们的观点，其程度超过了人们通常所认识到的程度。这一观点，一经阐明，便可顺理成章地就这种意识形态对实际政策的一贯影响进行结论性的反思。本书的最后一章将论及有关的历史文献。

读者如果知道撰写本书以及它最后成型的初衷，也许能对本书有更好的理解。从某种角度说，写这本书就像在进行一种治疗的实验。作为历史学家，作者对美国人特有的忽视历史的倾向，早已难以容忍，写这本书给了他宣泄这种情绪的机会。我们的对外政策基本思想的显著的连续性没有受到充分认识。即使是公众中最熟悉政策的那部分人，也认为我们面临的国际问题是史无前例的，并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在他们看来，对当前外交问题的理解，以及设计出适当解决办法都同过去无关。关于过去的外交政策，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国领导人已把早期的自我限制的过时原则扔在一边，而采取了与世界性强国的地位更相适应的成熟的实用主义。从这种流行的概念出发，就无法想象从前的思想方法会促进（而不是阻碍）我们的国际地位的转变，并且在完成转变很久之后，这种方法对于决策者的思想来说仍然很重要，甚至成为一种最基本的思想方法。

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的学者们往往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现实问题上来而忽视了文化价值的作用，这样，他们不知不觉间成了延

续这种关于我国外交政策的神话的同谋。学者们日益专注于20世纪风云(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与一场冷战)的研究,也就支持并加强了那种把当代政策与过去的外交经验割裂开来的流行观点。为了解释美国取得所谓的新地位的原由,历史学家在那些研究方向狭窄的作品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于下列的问题,如:战略思想的变化,经济体系的需要,精英利益及其影响,总统的作用,官僚政治的运作,以及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的互动。现在,应该是意识形态——广泛的历史意义的意识形态——受到应有重视的时候了。

撰写本书使我得以阐述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最初出现在我研究美中关系的著作中,但受范围所限难以进一步发挥。在研究美中关系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所谓国家使命感、对"东方人"的成见,以及对一种特定的政治与经济发展道路的献身精神结合在一起,对于构成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所谓"门户开放"的观念,"既来自美国人的赎罪与自治的梦想,反过来又助长了这些梦想"。[2]写到这里,我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对更大范围内的政策思想尚未适当地探究,因此无法给以充分解释。我逐渐认识到:建筑起一个总的思想构架的想法还是值得一试的。

最后,写这本书使我得以把近十年来的研究心得写到纸上,这些心得是我从耶鲁大学、科尔盖特大学与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学生们的质疑中获得的。这些学生,同大多数对外交政策有兴趣的美国人一样,对于世界各地对美国的关注焦点及美国的资源所提出的要求,感到既兴奋又困惑,他们渴望了解美国是怎样应付这些要求的,但是,他们却不能静下来好好看一看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如何影响着我们对这些要求的理解,并如何作出回应。我试着向学生们提供某种解释,这对我自己也是真正的教育。

这部书述及的问题广泛,论点也往往是独辟蹊径的,因此很有必要也特别需要他人的帮助、宽容与鼓励。想把这个题目写成一本

书的念头一进入我的头脑，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查尔斯·格伦希就给予热心的支持。此后，许多朋友与同事给我种种帮助。我感谢罗伯特·拜斯纳，多萝西·博格，约翰·库根，威廉·多尔比，詹姆斯·费策尔，哈里·哈丁，托马斯·希泰拉，唐·希金博特姆，史蒂文·莱文，唐纳德·马修斯，利昂娜·西蒙与埃利斯·西蒙，以及玛里琳·杨，他们在我写书期间给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与批评。我还要感谢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琳达·卡尔与沃伦·诺德，哥伦比亚大学的卡洛尔·格卢克，普林斯顿大学的阿瑟·沃尔德隆，是他们提供了机会，让我在他们那里试讲我的某些观点。最后，我要感谢玛丽·伍德尔始终耐心地替我誊清稿件，提供了无价的帮助；感谢琳达·史蒂文森，劳拉·爱德华兹与约翰·比姆在成书最后阶段的帮助；感谢奥托·博尔曼在编辑方面的杰出指导。我希望所有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有过贡献的人士，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些新的、有说服力的、或至少是能引起思考的东西，感到部分地得到了补偿。

我还要对许多学者表示感谢，我曾摘引他们的著作。鉴于这里不可能一一注明，我只有让本书的注解与历史文献目录作为部分的、不够充分的感谢方式。其中一种必须在此提及，即已故的阿瑟·赖特有关中国佛教的一本书。赖特的著作言简意赅，表现出广博的学识和优雅的文风，几年前曾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在本书动笔时，它立即作为写作范例映入我的脑际。教师们播下的种子如今已结出喜人的果实。

从某些角度来说，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全家合作的成果。葆拉·亨特的敏锐判断一再促使我将某些论点阐述得更加清楚。几个女儿有时替我校稿。她们自己从未意识到，她们本人就是对我的提醒，使我想到对于她们所继承的这个世界应尽的义务。因此也可以说，本书是奉献给她们的。如果我的努力使美国人对国际事务的观点有更多的自觉，在运用权力的时候较谨慎一些、较聪明一些，那么，我就部分地完成这项义务了。

目　录

一　正确理解意识形态

只要我们在朝前看的时候朝后看一看，就能够把表面现象同真实情况，把暂时的因素同永久的因素，把插曲同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很好地区别开来。何以如此？也没有什么大的奥秘，……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总要遇到重复出现的老问题，而回应的办法也或多或少都是以前习惯的做法。

——沃尔特·李普曼（1943年）

领导人登上高位前形成的观念，是一笔智力财富，他们在整个任职期间会经常用到。

——亨利·基辛格（1979年）

过去十年或更长时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闹得沸沸扬扬。无休止的越南冲突使美国人深感不安，特别是那些从年龄来说，政治意识的成熟同战争高潮同时来到的一代人。越南战争使慕尼黑与珍珠港所孕育的冷战规则的束缚有所松动，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上一代人对圣战的信仰。70年代早期，一位观察家宣称，“年轻的美国”如今想在外交政策上“冷静下来”；另一位则在几年后宣称已出现了“世代交替的范例”。[1]尽管里根政府企图以重新抬出典型的冷战模式来结束外交政策的争论，但学术界、新闻界、政界、军界仍在继续辩论越南战争的教训及其对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影响。

对越南战争与里根政府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比例大大上升。许多批评者都是有过实际外交工作经验的外交政策分析家，

他们的兴趣多种多样，包括：战略策划、国际经济、决策过程，以及所谓“第三世界”。他们的工作合在一起，对于那种基于虚妄的假设、倾向于盲动、代价惨重的政策构成了准确的、有时是摧毁性的打击。批评者告诉我们，近几十年来，世界已有很大变化，冷战政策已经不再适用。有些人坚信，甚至在冷战高峰时期，美国领导人对世界也有许多误解，这极不利于他们自己的人民以及他们想去影响其命运的别国人民。批评者已形成一个群体，他们认为改变美国外交政策已是当务之急，而要使这种改变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必须对制定政策的前提进行根本性的、彻底的反思。

任何人听到这些批评都不会怀疑，从冷战早期遗留下来的传统思想如今已大成问题。过去曾经帮助制定政策的人现在也在大事宣扬这些政策的过火之处与不足。理查德·巴尼特曾把这些政策形容为：冷战勇士为抵制革命的爱国主义所进行的一贯的、主动的、最终事与愿违的敌对行动。[2]梅尔文·格托夫与理查德·范伯格进一步发展了巴尼特的论断，罗伯特·帕肯厄姆又予以补充，他阐述了美国政府50年代与60年代以种族中心论的态度对待发展问题的一系列失败做法。[3]厄尔·拉夫纳尔与戴维·卡里奥则揭示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可悲倾向——他们总是超出可论证的美国利益与现有的美国资源去承担海外义务。[4]拉夫纳尔呼吁采取一种更为节制的美国外交政策，他的说法似可被看作是对批评派的论点的总结。

> 在一个可塑性不再那么大的世界上，我们必须重新树立外交政策作用有限这样的意识。不应把外交政策看作是矛，而应看作是盾。外交政策不是宣传我们价值观的工具或表现我们的妄想的托词，而是保存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国内制度的最低条件。……我们首要的事情是运作我们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实践和加强我们的经济活动，并修补和完善我们的社会。[5]

如果说这类呼吁实行更多的克制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缺陷的话，那就是对意识形态近年来在政策中的地位注意不够。他们承认，美国领导人陷在意识形态的罗网中，其结果是支持了错误的政策。但是，他们没有系统地思考那种意识形态的涵盖范围、支撑它并促使它拒绝改变的根源、以及它同政策的准确关系。批评派难以从概念上把握这一系列问题，说明他们自己也陷入了意识形态的纠缠之中。

在近年来洞察力较强的评论家中，有两位说明了这个问题。[6]拉夫纳尔呼吁改变“我们基本的战略‘类型’——我们的决策系统孕育出来的认识事物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模式”。他认识到，要改革政策，必须对这样一种假设直接提出异议，即“凡美国正当地关心的现实问题，都有普遍意义”。改革还须打破“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与一支力量，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神话，当然，这样也许会使人感到“痛苦”。拉夫纳尔顺便地但颇有见识地指出，这类神话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掩盖国内的分歧而把社会捆成一个整体”。再者，美国人“习惯于听人家讲美国人的特点在于他们对世界秩序所承担的特殊责任”，如果转向谨慎、克制的政策，他们便会感到自己降低了身份。他们也许不希望“被告知他们应当放弃神气十足的抱负而像其他国家那样过平常的生活”。[7]

同拉夫纳尔一样，范伯格也紧紧抓住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同国民士气的联系。他认为，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一种健康力量激发文化自豪感和社会凝聚力，并增强民主价值观。但是，他又指出，对于一个大国，民族主义也“有它黑暗的、危险的一面”，会释放出“骄傲自大与恣意妄为的洪水，泛滥成为僵硬严峻、沙文主义的外交政策”。政策制定者将发现他们面对着难以驾驭的“感情冲动的公众，他们吵吵嚷嚷，要把他们的自我意识推广到全世界”。范伯格似乎把意识形态譬喻为烈性酒——少喝几口无害，多喝了就有危险——力劝我们把“意识形态热情”置于控制之下。“美国政府

被意识形态蒙蔽了自己对各种事物和对外国政府的洞察力，这样既无必要，其效果也往往适得其反”。我们必须放弃那些浮夸的观念，认为我们能“改变历史的进程”；相反，我们应当“学会满足于我们自己的制度与价值观而不应认为别人必须仿效”。范伯格总结说，塑造出这种“新的自我认同”，是“我们最困难的任务”。[8]

批评派认识到了美国的民族主义与美国的自我伸张的(assertive)外交政策①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紧密联系。他们未能更加充分地把握意识形态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满脑子当代外交问题，同他们对之讲话的公众一样，缺乏历史的透视，因此跛足难行。尽管说可以理解，然而，外交政策批评者的这一缺陷是严重的，因为他们小看了在探索新政策道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假设意识形态对于制定政策来说占据着核心地位，不是偶然起作用的，那么，难道真有可能把二者隔离或分离开来吗？再假设，外交政策的某些核心观念是同国内的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安排紧密相关的，是受它们支持的，那么，那些观念能根除吗？与一项自我克制的政策相适应的新的灵感源泉与指导思想能找到思想基础吗？最后，再假设，对那些观念的攻击证明是正当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并触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谩骂式的辩论，那么，这样的后果有多大的危险？我们的处境能比今天更好些吗？

这些假设与提出的问题不能使鼓吹改变政策的人欢欣鼓舞，但是弄清楚以下这个问题总是明智的（且不说老老实实地治学也需要这样做）：即批评派的攻击的目标究竟是不堪一击的帐篷城市，还是巨大的城堡？他们的对手究竟是一伙蹒跚而行、垂头丧气的人呢？还是决心捍卫老信念、并且受到大众支持的难对付的强手？尽管这种战斗情绪开头也许因为抑制了新生力量的热情而显得不识相，但要获得战役的胜利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今后的斗

① “assertive”一词在本书中屡次提及，包括自以为是、自信自大的意思，现据某学者的译法，沿用“自我伸张”这一有创意性的词汇。——译者

争，或是一场不可抗拒的冲刺，或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艰苦攻坚战，如果批评派不肯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考，不仅会减少成功的希望，而且只要头一次试冲达不到目的，便将在队伍中惹起困惑、灰心甚至失败主义的情绪。

大量证据证明，这不是一个虚设的前景。批评派的第一次袭击已经无功而返。近来的政策制定者已被证明出乎意料地难以触动，他们还在歌颂冷战精神，拒不承认在越南承担义务是一项根本性的大错。新保守主义分子还在鼓吹美国应不惜任何代价在世界各地捍卫自由。选民们似乎喜欢听到嘹亮的号角声：召唤国民将疑虑置于一旁，当仁不让地担当起世界领导人的角色；他们甚至比政策制定者更加不愿意受到一项谨慎、克制的政策的束缚，其实这样的政策对于一个情况复杂、政见分歧的世界来说是比较适当的。尽管许多美国人承认近年来冷战政策代价过高，有时也并不奏效，但他们仍不愿接受这种政策的前提本来就是有缺陷的批评。

* * *

显然，忽略了意识形态，想重新调整美国外交政策就可能遗漏关键性的一步。满脑子当前政策的评论家对此问题只是扫了一眼，但未深究。致力于从长远观点研究美国政策的历史学家是否做得稍好一些呢？回答是一个肯定的“是”。事实上，只要试图对美国如何进入国际政治的密林，或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进行深入的探讨，意识形态都占据着显著地位。对近三十五年来的历史进行诠释，有两个重要派别（对此分类也有不同意见）：一派与乔治·凯南相联系，另一派与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相联系。在这两派观点中，意识形态肯定都占据中心地位。

然而，这两种有价值的、思虑周到的看法，在处理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时都无助于评论界摆脱混乱的概念纠缠，也没有提供我们所期盼的研究美国外交政策问题的新的洞察力。看来，历史学家也受到意识形态的纠缠——凯南困扰于一种肤浅的、甚至是苍白无力的概念，威廉斯则受困于狭窄的、有时是机械的概念。不

过，他们的著作还是值得我们去翻一翻，因为它们可能有助于推动我们以一种十分需要的新视角去透视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

乔治·凯南被公认为某一派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带头人，这里，意识形态应冠以“贬义的”三字。他在这方面的经典表述，出现在他刚结束20年的公务生涯之际；他最终以“遏制理论之父”闻名于世。1950年，他在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工作期间，应邀在芝加哥大学作了一系列演讲，这使他几乎立即便得到了一个机会，把自己的经验整理出来，用于美国外交政策史的研究。这一系列演讲是凯南作为历史学家的起步之作，极为成功。一本薄薄的《美国外交1900～1950》[9]成为“冷战”一代的圣经。该书重印多次，至今仍受到广泛的阅读与尊重，它产生了巨大影响，构成了近几十年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

这本书的问题在于用不适当的、错误的道德主义与法治主义来界定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态度。关于道德主义，凯南意指献身于美德却缺乏必要的力量与意志来维护它的做法。道德主义介入政策制定，或是直接的——通过政策制定者本身的态度；或是间接的——通过公众舆论的压力，而这种舆论是由喜爱喧嚷的少数民族、群众性的歇斯底里、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政治上的投机分子和装腔作势者造成的。妨碍制定健全政策的另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是法治主义，这反映在把国内有关维护和平、调整和契约关系的概念套用到并不适用的国际事务中去。它也可以通过政策制定者的观念直接反映出来，因为他们本身往往就是法律专业的毕业生；或者间接地通过由律师所统治、并围绕着制定与解释法律而组织起来的政治体制反映出来。

凯南指责这种根深蒂固、无所不在的道德主义与法治主义的观念曾一再阻碍了对国家利益的明确界定与有效追求。为阐明他的看法，他首先举出了麦金莱政府作为一个最明显的例证。他抱怨麦金莱政府进行“美西战争”完全是出于“主观的、感情的原

因”，虽然获得了殖民地，但名声并不好。他批评海约翰 1899 年～1900 年所维护的“意向崇高的、理想主义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一种公开做姿态的典型例子。凯南认为，这一政策建立在对中国的情感眷恋的可悲基础上，显示出对东亚的战略现实的无知，最终导致了不该发生的对日战争。凯南认为，这一政策建立在对中国的情感眷恋的可悲基础上，显示出对东亚的战略现实的无知，最终导致了不该发生的对日战争。凯南认为，还可以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例，说明义愤填膺的公众会加入到一场讨伐世间罪恶的十字军战争中去，然后又因他们的情感能量在难以对付的现实势力面前消耗殆尽而陷于幻灭。美国一再成为幻想的俘虏：要么把战争看作是可以带来全面胜利的政策工具；要么认为可以通过全球裁减军备、仲裁条约、宣告战争非法、国际组织的行动以及其他绕过“国际事务真正实质”的方法去取得和平。[10]

在 20 世纪之初还自认为是“一个中立小国”的美国，要迎接凯南写书时心目中的苏联的挑战，就必须找到新的政策基础。政策制定者要改进其工作表现需要采用更理性、更深思熟虑的国际政治观点。答案应从“现实主义”中去找。“现实主义”一词在凯南的文集中到处可见，后来成为大学本科生、安乐椅中的战略家以及真正的政策制定者都喜爱使用的“口头禅”。这个词精确地表明了凯南的历史分析所揭示出的美国的需要：以恰当地界定国家目标为基础，更加有序地、清醒地制定政策，有力地把握住国家形势，从而动员起足够的力量去克服预料中的障碍，实现期望的目标。美国的政策目标总是出自“基本上正派”的源头。如果行之有效，也许还能推进“全世界的和平与进步”。[11]

凯南及其他“现实主义者”对于意识形态对政策的影响怀着深刻的厌恶，而把自己想象成“实用主义者”。他们大声疾呼，指出用各种“主义”来看世界的危险。意识形态使人眼花，使人盲目，还以崇高事业的名义为极端非人道与肆意毁灭的行为辩护。凯南及其同时代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所目睹过的恐怖——苏联的野

蛮情况，使大半个世界卷入其中的一场战争，以及吞没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的大屠杀——看来正是意识形态狂热的苦果。他们曾为消灭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而作战，但他们尽管获得了胜利，地球仍笼罩在意识形态之中，形式上变成了苏维埃与中国共产主义。凯南厌恶意识形态的思想形成于更早的时期，即他于 20 年代与 30 年代在中欧与苏联任初级外交官时期。他从这些职务退下来时，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认为马克思主义歪曲了世界的面貌，倡导布尔什维主义的人都是些能做出“许许多多残忍暴行”的精神病患者。[12]

凯南显然不愿意说明，美国对世界的看法也被意识形态的影响扭曲了。他从未明确指出道德主义与法治主义本身也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或是某个更大的意识形态系统的一部分。他认为美国人会犯错误，也许他们幼稚、自相矛盾或容易受骗，但他们决不热衷于意识形态。他争辩说，他所说的“主义”，应被理解为“那些大喊大叫的少数派：政客、时事评论员以及各种各样想出风头的人”，从自私的目的出发用来操纵公众的工具。这样，他实际上已把批评从可以明确指认的、强有力的、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转移开去，指向一种鼓励政策制定者及其他人公开作姿态的定义模糊的民主精神。正如他在《美国外交》一书中所说的，世纪之交的美国政治体制“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一个强国去处理对外事务”，而此种状况迄未改变。[13]

凯南的解决办法是使外交政策同民主进程绝缘，从而尽量缩小道德主义与法治主义的影响。人民只应在偶然的公民投票的情况下表达他们的意见。日常的政策应当保留为专家的特权，这些专家既熟悉国际事务、忠诚于祖国利益，又不随着公众情绪和“受纵容的过度行为”以及统治美国政治的集团利益而摇摆不定。作为亲近的、可信赖的顾问，那些专家终将把一项“与一个大国相称的成熟有效的外交政策”交于当选的国家领导人的手中。[14]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一书中被如此一笔带过，也许可以

看作是出自一位前冷战官员沾沾自喜的白日梦。凯南及其他一些现实主义者具有一个深刻的信念，认为在五角大楼、国务院和白宫中围坐在委员会圆桌四周的是一群超然的、冷静的分析专家，他们可以通过集体智慧把握住国际事务的“现实”。凯南在他的《回忆录》中争辩说，只有“眼光高于一般群众、果断、冷酷的少数人”才能为“一个茫然无所适从的孩子”提供所需的指导。[15]

这种诱人的、精英论的观点，在《美国外交》一书中成为中心思想，其所根据的假设是值得怀疑的。它假定道德主义与法治主义都是肤浅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一种更为宽广、深入的文化的价值观与需要的表现。它假定那些专家们都是没有思想包袱（或至少包袱很轻）的超人，基本上不受种族优越感、民族偏见或文化成见的污染，而且经过思考后在基本原则上彼此间能大体上意见一致。最后，它还假定，专家们和他们为之提供咨询的政策制定者们可以在美国政治体制内部操作而无需屈从于该体制的基本要求。他们也许多多少少能创立并支撑住一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政策，名义上是美国的政策，实质上不代表美国人的基本愿望。把这些假定归并到一起，便出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对意识形态进行口诛笔伐的乔治·凯南，却把现实主义作为他的意识形态，并且，为了调和矛盾，更不遗余力地想劝导别人也这样做。

凯南对外交政策意识形态问题的处理，说明他没有能力把当前的外交政策批评者带出他们如今已深陷其中的辩论困境。他们和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要去理解意识形态，而不是表面上谴责并抹掉意识形态的某一种表现形式，而暗地里又接受另一种表现形式。一位有眼光的研究意识形态的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而他针对的似乎就是凯南：“在讨论某种社会政治思想时，从一开始就用命名这些思想的词语来判定它，认为它是畸形的，或比这更坏，这种讨论只不过是先验的强词夺理。”[16]

《美国外交的悲剧》显然是另一本可以与《美国外交》相提并论的著作。这是一部从经济利益角度对外交政策意识形态作历史

分析的卓越作品。它的作者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是大萧条时期在美国中西部成长起来的，后来进了海军学院，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服役。1947年，威廉斯离开海军，进威斯康星大学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他从1950年起开始其学术生涯，正好与凯南进普林斯顿同时。他对美国外交政策很不满意，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之后，终于在1959年出版了《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这是他的成名之作。[17]

威廉斯的著作同凯南的著作在侧重点方面截然不同。凯南斥责为天真、缺乏连贯性、种族中心与执行不当的政策，在威廉斯看来恰好相反，他认为这些政策是精明、老练的，战略上前后一致的，并且策略允当。凯南看到的是感情错位与不称职的律师与政客在指导美国，而威廉斯则发现发挥主导作用的是经济利益与企业界政界精英的结合体，并认为他们具有洞察力和娴熟的技巧。这里主要要说明的是，凯南对于用明确的意识形态词汇来描述美国外交政策持谨慎态度，而威廉斯则相反，他始终强调意识形态是事情的核心。威廉斯的论点可归类为"利益驱动"论。在这里，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功能、一种工具，被美国资本主义的大亨们用来维持他们的经济实力，并借此实力去巩固他们对社会政治的控制。

威廉斯认为，19世纪90年代是转型期（确实如此，但凯南另有所指）。在精明而有远见的麦金莱总统领导下，美国结束了领土扩张的老模式，采取了一种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新模式。到那时，制定外交政策的精英们，包括一批对于一个正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很敏感的评论家与战略家，已就后一种模式达成共识。为防止国内"经济停滞的威胁与对社会动荡的恐惧"，他们开始在海外寻找能吸收过剩的工农业产品并为美国工业提供所需原材料的市场。[18]他们喜爱的方法是促进自由贸易和间接控制关键性的市场，而不是去建立代价高昂的殖民地统治。

世纪之交的中国提供了试验这种新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场所。威廉斯形容这一政策是"英明的战略性的一着"，而远非凯南所说

的笨拙的失误。威廉斯认为这一政策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认定美国压倒优势的经济实力将把较弱的、不发达国家的政治与经济铸成对美国有利的模式”，在中国行之有效的“门户开放”被迅速运用于全球，以致早在本世纪20年代，“美国按照‘门户开放照会’的原则与程序进行扩张的模式已趋于成熟”。[19]

门户开放的观念，对于理解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在世界事务中采取的路线极为重要。这一意识形态使美国对那些革命政权极为反感，最初如墨西哥与俄国，后来是中国，这些政权以名副其实的自决原则及“均衡与公平发展”名义，对主张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发起挑战。[20]在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期间，这一意识形态使罗斯福政府同日本与德国相敌对，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实行海外经济扩张的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意识形态再次被证明是引起冲突的源泉，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仍坚信国内民主与繁荣的维持有赖于继续海外经济扩张，并试着迫使苏联按美国的规则行事，从而加速了“冷战”的到来。

威廉斯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部分来自美国的进步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曾一度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而在威廉斯从事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时已在衰退。他同历来的进步主义者一样，“对金钱利益的驱动以及卷入外国事务的必要性不以为然，而是倾向于找出躲藏在肮脏政治背后的自私自利的社会上层之手”。[21]

威廉斯还随心所欲地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确实帮助他提炼了那些进步主义先辈们的见解。马克思主义帮助他详尽发挥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因生产过剩而引起社会动荡的危机迫使美国去寻找海外市场。马克思主义有助于解释经济的需要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如何使社会上层各不相同的集团达成共识并融入他们的思想（这样就使威廉斯不必求助于早期进步主义者常用的阴谋说）；它还有助于突出美国对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有害影响。

同凯南一样，威廉斯剖析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也是为了找出治病的处方。美国应当学会“维护民主与繁荣而无需实行帝国主

义的扩张”。要避免美国同强大的革命力量之间不断发生的、代价高昂的冲突，就必须实行根本性的改革。为此，威廉斯在《悲剧》一书的结论中提出了他的建议：结束冷战，通过联合国的渠道提供发展援助，重新调整美国国内生活的秩序。他知道得很清楚，最后一点是关键性的，因为美国国内经济如果不改变，外交政策就只能沿着既定的路线走下去。[22]

威廉斯的大胆论断尽管对许多人很有吸引力，但又惹出了批评。有些人指责威廉斯的著作是先验论，文中往往忽略甚至歪曲历史的例证。还有些人避开脚注的纠葛而着重批评威廉斯往往缺乏对外交政策思想范围的界定，批评他把外交政策思想限制在某个特殊集团的特定需要上了。这种立场便使人难以理解人们通常会发生的思想混乱、犹豫不决、认识错误以及其他一些一时的失误。

威廉斯用一种概念混淆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虽然他宣称门户开放的观念是客观经济力量的产物，但《悲剧》一书极少阐明经济需求同当时政策制定者所关心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他有时似乎抛弃了明白无误的经济决定论。他在 1966 年的一篇论文中说，有些思想也许“最初是特殊利益的工具”，只是在一定时候才“挣脱狭窄的界限，成为世上广泛、通用的概念”。这样，他就承认了门户开放的思想可能从它原来停靠的经济港口游离开去，甚至可以同与经济制度关联甚少的思想，如家长式统治、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掺合在一起。[23]

与凯南的《美国外交》相比，威廉斯的《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在从意识角度剖析美国外交政策方面更为深刻、更为自觉。即使如此，《悲剧》一书的分析仍有含混不清之处，需引起读者注意，因为这表明了把意识形态的概念同经济本身的利益紧紧联系起来的局限性。《悲剧》强调了这一联系的中心地位，但威廉斯也坦诚地承认，由经济制度所滋生的观念也会自我存续下去，或至少受到非经济力量的支持．在作了这样的让步之后，他让读者自己去琢磨：经济本身的利益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中心地位？一味坚持

它的中心地位会不会使我们看不清既非产生于经济力量及经济考虑、也不是靠它支撑的那些因素的重要性。政策制定者在某些(甚至是多数)情况下,很可能并非从经济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的。

产生这种混乱,是由于威廉斯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过于狭窄,以及他对历史复杂性的敏锐意识有抵触,这就使人们对他改变政策的诊断处方产生了合理的怀疑。国内经济体制的剧烈变动也许并不会诱发外交政策的剧烈变动,尤其当指导政策者是从多种角度(包括非经济因素)考虑问题时更是如此。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一个结论(同威廉斯的观念直接冲突):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所执行的外交政策,其剥削性与霸道可能丝毫不逊于旧的资本主义的美国。

* * *

在对意识形态下定义时,如果只是一笔带过,或者简化处理,都无法帮助我们将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家们已开始的分析工作向前推进。凯南或是威廉斯的例子都说明,对意识形态如果解释不当或不完整,再加上对于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诊断错误,就会导致问题的根源解释不当,从而提出方向错误的解决方案。

为了更好地把握意识形态,不妨考虑一下第三种角度,即从与文化体系相关联的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倡导这种观点的,有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以及一批政治学家(如: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悉尼·维巴),他们对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有极大兴趣。他们强调意识形态是无法逃脱的(即使是制定政策的专业人士也概莫能外),他们认为它远不止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与工于计算的资本家出于一己利益所操纵的工具。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是象征符号、价值观同信仰相结合的完整体系。它们来自“为社会所公认的观念的架构”,这是格尔茨对文化的说法。[24]文化不仅产生意识形态,而且可以支撑或抑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思维是对历史环境进行有益反思的源泉;是在极端复杂而令人迷茫的现实中必不可少的指导性因素;也是创造一个较好未来的道德行为

的基础。

从文化入手的研究方法（以下称文化分析法——译者），其核心首先是不以一个单一的、简单的原因来论断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起源与发展。那样一种方法可能造成概念混淆、解释混乱。但是，如果我们同意社会的结构与运作确实十分复杂，难以作出一揽子的“科学的”概括，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那些机械地确定集团利益与集团信仰之间的关系的规律，或者是那些声称存在着一个能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基础”的说法。用开放的态度去探究意识形态的根源，就必须给非经济因素的动力留出余地，尤其要注意那些来源于民族认同、种族认同、强烈的民族意识、宗教信仰与地区观念等方面的动力。这些推动在美国的作用是很显著的，下面的材料可以说明。

尽管文化分析法反对把成功的意识形态归结于单一的层面，但也不难与强调社会阶级重要性的分析法相适应。当然，人们有许多理由以经济权力在社会内部的分配状况来说明意识形态何以占据突出地位或说（借用目前最时新的安东尼奥·格拉姆斯奇的语言）“独霸地位”。以美国而论，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分子”通常是生来就拥有一定财富的白种男子。特权不仅使他们能比较顺利地取得显赫的政治地位，而且在他们的世界观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思想一旦诞生，便获得了——用一个含意模糊而引人联想的常用词句来说——“自己的生命”。文化分析法的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它坚持寻找维系意识形态的手段的多样性。一种意识形态之所以能持续存在，可能要归功于某种文化的推动力，而这种文化起初并无显著作用。一种意识形态也许会吸引新的赞助者的支持，他们之所以推崇它或许是出于自己的特殊原因，或许是由于模糊地感到这些意识形态有利于社会的持续与稳定。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足以说明意识形态的起源与持续可能是不连贯的，那便是原来适用于一代人的教派主义的神定宿命论，被后来的几代人转

变为世俗的国家命定论，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不同处境，达到他们不同的目的。而且，经过一段时间，意识形态可能变得制度化，甚至在已经不再具有明显的功能作用或者不再有利于任何能明确指认的阶级与集团利益的情况下仍具有强劲势头。例如，使父辈控制黑奴合理化的那些观点，即使在黑奴的解放已消除了这种观点的经济基础之后，仍继续影响着子辈孙辈对黑人的观念。换言之，由于家庭、学校、俱乐部、教堂和工作场所等文化载体的作用，某种意识形态便可能成为某种“大众智慧”。

进一步思考意识形态何以会长久滞存，必然遇到另外两个问题，它们同本书的主题美国外交政策直接相关。一是在政治文化稳定的国家中，意识形态有一种执着的倾向。美国从未受过社会革命的大震动，也未受到过外国的入侵或占领，同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她享受到很大程度的政治社会稳定。所以，毫不奇怪，伴随着体制结构以及社会与政治的价值观的延续而来的是外交政策领域中意识形态的长期延续，这在近代世界性大国中是绝无仅有的。

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这种延续性的必然结果就是对意识形态的存在缺乏自觉。由于社会文化十分稳定，美国人并没有迫切地感到应将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挑出来加以彻底改造或替换掉。相反，他们一直把它视为天经地义而怡然自得。正因为美国人自己把意识形态看做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所以，他们把别人用了明确的、正式的、甚至是公式化的名词来表达的意识形态，诸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强烈的民族主义等，看做是反常，甚或是误入歧途。这些精心制作、包装整齐、得到广泛宣传并随时可以拿出来使用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并不一定更加符合实际、更有影响力。事实上，可以说，那些意识形态之所以要采用正式的、明确的、系统的形式，正是因为其自身的文化存在着对它们的抗拒；而像美国那种非正式的意识形态，因有着共识的基础，反倒威力更大（也许更微妙）。

用文化分析法去研究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促使我们

去探索一组相对连贯、带有感情色彩、在概念上互相交织的思想。这些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应当反映出其倡导者的自我形象，并须界定同这一自我形象相符合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些思想十之八九来自各种不同的国内政策与措施，并赖以持续。这些思想在全民的经历中应当是占据着核心地位的，才足以说明关键性的事态发展，并且应当有足够的威力，才能在世世代代的美国人中起到如此至关重要的作用——给他们想象中的世界带来秩序，并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中定位。就是说，这些思想应当像任何意识形态一样，能提供“一种有足够说服力的世界性的形象，来支持个人的与集体的归属感”。[25]

文化分析法除了促使我们给外交政策意识形态下一个既灵活又宽泛的定义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警告我们避免短期的历史观点，即使是像凯南与威廉斯那样追溯到 19 世纪 90 年代也嫌太短。他们同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认为那十年是现代美国外交政策发端的年代。虽然他们在其他方面很少意见相同，他们却都认为，美西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与属地的获得，标志着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已深入国际政治事务，其后的一些继任者都是亦步亦趋。他们两人认为，美西战争以来的重大变化，反映了或者说是启动了一场政策前提观念的重大转换。这种说法似有道理，但可能最终将证明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或至少是被夸大了。如果说文化传统具有执着的倾向，重要的制度变化通常是逐渐被吸收的，那么，我们需要在思想领域里寻找出一种相应的持久性与连续性。同威廉斯的看法相反，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在 19 世纪晚期在财团的秩序形成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它无需重大转变就能适应后来的需要。也同凯南的看法相反，我们可以指出：20 世纪的这场变化与其说是新旧观念的斗争，不如说是确立了长期形成的对世界看法的里程碑。

看来，要找到这种意识，须从尽可能长远的角度去研究外交决策精英产生于其中的人群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这些精英在美国

密切关心外交政策的人中只占极小的比例（也许只占1%）。这个精英集团不仅包括地位显赫的政策制定者，而且还包括其他参与重大政策讨论与辩论的人们。自18世纪以来，他们留下了有关他们的观点的丰富的证据。虽然这些思想并未经过正式的、系统的整理，但仍有可能辨认出它们的主要内容并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要做到这一点，人们不仅应研究这个精英集团私下表达的思想，并且更重要的是，研究他们为自己的行动的辩护、彼此间进行交流以及向全国宣传时所公开表达的思想。

从字面上去理解公开讲话的词藻并以此作为证据，其价值是大可怀疑的。愤世嫉俗的人会坚决认为，经过仔细筹划的公开讲话不能坦率地、而只是在有分寸地表达意见，它是巧妙地愚弄爱轻信的人、掩盖原始意图的好机会。有人也许会争辩说，公开讲话是一种说服别人的方式，如果把它当做是吐露心声，那是极大的错误。

这样一种什么都怀疑的观点也许是由于聪明过了头。公开宣传并不仅仅是一张帷幕、一种工具或一种装饰。也许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交流的形式，富于象征性的手法，也许还掺杂着神话，但受到一定规则的严格限制。为取得效果，公开宣传必须以公众广泛认同和易于理解的价值观为基础。公开宣传所用的语言如果无视或避开在当前的中心问题上通用的语言，必然吸引不了广大听众，其效果将大受限制。如果公开宣传在基本问题上不能反映出讲话者的真正观点，时间长了就有使公众产生失望的危险，并可能导致出现政治上的误解。如果演讲人沉溺于夸夸其谈，东拉西扯，他将最终付出丧失信誉的代价。对于正在寻找可被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家来说，只有当演讲人违反了上述规则，讲一些没有说服力的话时，这些讲话才是不足为凭的。如果把决策精英们的公开讲话同他们的私下谈话做一个比较（这是怀疑派可能正当地坚持要做的敏感的试验），就会发现他们确实认识到了违反这些规则的代价，因此一般来说，他们是遵守规则的。认真对

待公开宣传没有什么坏处，而不去仔细谛听那些公开讲话中一再重复出现的主题与价值观倒是一种失策。

在美国，外交政策演讲充斥着大家都能理解的专有名词。演讲词，学校教科书，报纸社论以及歌曲中所说的自由、上天祝福、天命与造福人类等等词语，充满着演讲者与听众都能理解的意义。正因为其解释性的威力及打动公众的力量，这些简单而响亮的提法对于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操作至关重要。政策制定者沉溺于这些提法中，用它们来使复杂问题简化到可对付的程度，或去设计出一种能唤起人们响应的技巧，或动员国内民众支持他们已做出的选择。如果在一份历史文献中见到的“只是宣传词藻”，那么也应当把它看做是一种应付某些紧迫问题或陌生环境的方法，也必须予以十分认真的研究，因为其中必然透露出某种根基深厚的态度并预示着要采取的行动。

我们说宣传性词藻也能说明问题，并不是说这些词藻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必须同那些炮制并使用这些词藻的精英们的需要与利益分开来考虑。相反，包含在公开宣传中的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具有极强的功能性。本书的中心思想正是要说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命题系植根于建国的历史之中，植根于大家都理解的国内社会秩序，以及种族差异与阶级差异之中。这些命题就是那些既支配国内事务又支配外交事务的精英们的产物。

说到这里，必须提出一些重要的说明。理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不一定就能洞察这个国家的行为。意识形态很重要，因为它们构成一个框架，政策制定者在这个框架内处理特定的问题，公众也在这个框架里去理解这些问题。对这两群人来说，意识形态可以用来说清楚复杂的现实，把它们简化到可理解、可操作的程度。但是，鉴于人的心理和政府的决策过程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分析法应注意生硬解释的危险而加以适当地调和。重要的是，一开头就应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并非那么严格。一种政策一开始所依据的思想毫无例外地必须给各种非意

识形态的考虑留有余地，如增加出口市场与原料市场的需要、保卫重大的国家安全利益、注意选民的倾向、甚至要考虑个人政治野心的影响。在分析问题时应谨慎从事，这要求我们接受这样的观念：由于政策执行者的人事变动，意识形态可能发生变化。组成外交政策的思想远不是固定的、静止的，不同的领导人，不同的时代，会用不同的方法来重新组合这些概念。尽管所有的政策制定人都是“知识资本”的贷入者（借用亨利·基辛格的一句话），但是，每个人从中借贷的经验库可以是极不相同的。

以上的概述澄清了场地，现在可以开始探讨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的兴起了。它将把我们带回到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当时美国的政治精英对国际事务根本问题的看法逐步趋向一致。那个共识是同精英们的文化价值观以及他们信奉的更广义的国家观念相契合的。国家将会怎样？在国际活动中怎样才能反映出国家的个性？

对于美国人设法界定自己并界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过程，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很贴切：这是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意识形态活动”，这在民族主义运动上升时期是常见的。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者因早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而形成了共同的观点与利益，并在此基础上着力于澄清国家的观念，并用制造历史神话、传播价值观以及建立机构来给它以具体的表现。这些努力意味着打破派别竞争（如地方主义之类），建立起“一个有巨大威力的意识形态和体制化的结构，它将在可以商量的限度内决定政治活动与政治信仰可能采取的形式”。[26]

以下紧接着的几章主要是讲同政策有关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历史，但是，这些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与政策结合在一起的。在建国头一个百年期间，意识形态对决策的影响有限。当时，政府比较小心谨慎，因为资源相对有限，有时了解情况的公众还有尖锐的政见分歧。尽管这些篇章并没有系统地研究政策制定过程，但

政策仍占重要位置，它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助于阐明意识形态的形成。在关键性的问题上，政策辩论成为解决全国性的观念分歧的论坛。再者，18 世纪与 19 世纪的政策制定者有时也在意识形态因素的推动下行事，从而提高了意识形态的地位。

20 世纪早期，出现了三种同外交事务有关的核心思想，它们结合在一起，开始对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是确定了美国未来的主导思想就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应当追求什么，这种思想又与促进自由紧密相连的。这一思想在 18 世纪 90 年代、19 世纪 40 年代和 90 年代三次遭到过坚决抵制，到了 20 世纪便站稳了位置。意识形态中的第二个要素是按照种族等级观念行事，它决定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态度。这种种族观念来自美国白人在各地区不同的条件下为取得并保持其优越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它在几种意识形态核心思想中是最先突出出来的。第三个要素决定了美国人对海外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接受限度，它也符合美国人的一贯信念，即：革命，尽管可能是向善的力量，却很容易发展到危险的方向。对待革命的态度，也同对待种族的态度一样，在头一个百年的成长期中是相当一贯的，不过与种族观念不同的是，当时革命的问题只是偶尔碰到。直到 20 世纪头一个十年，为了回应海外爆发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上述第三个要素才在意识形态结构中确立起来。

这些核心的思想如今紧密相连并相互增强，为国家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连贯的、对于世界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的看法。换言之，到了 20 世纪初期，这些思想已获得一种非正式的但是潜力很大的意识形态的地位，为以后的外交政策指出了方向，同时，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为美国式生活的实质定了调子。但在我们描述（更不必说评价）那种意识形态对近期政策的影响之前，我们还是应当先去考察它的根源。下面三章主要致力于这一目标，每一章将着重讲其中的一个核心思想。

二　对国家强大的不同看法

我们有力量去重新安排世界。

——托马斯·潘恩《常识》(1776 年 1 月)

1776 年，托马斯·潘恩看到了美国人从一个暗淡的、精疲力竭的世界恢复元气的可能性，他用明确的语言把它表达了出来。但他当时心目中未必是指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潘恩是个绳索匠的儿子，跟着父亲学徒。他对此不感兴趣，漫不经心，16 岁时即从家中出走，到处游荡，什么工作也干不长久。他两次结婚，干过六种不同职业，均告失败，最后决定去海外殖民地。当时，他 37 岁，经济极其窘迫，惟一值得一提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给他去过几封信，再就是，他已是一个崭露头角的语言流畅、善于捕捉热门话题的小册子作者。他于 1774 年 11 月来到费城，当时正值英国的政治威信一落千丈。消息传来：英国国王宣称殖民地发生了叛乱。潘恩立即站在美洲立场上拿起笔来投入战斗。

《常识》一书发表于 1776 年 1 月，强烈鼓吹惟有独立一途方能把英国人据为己有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常识》的主要目标是唤醒那些仍在盼望妥协、在"认命与懦弱"中沉睡不醒的人们。他使用的武器是两个半球这一概念：英国属于欧洲体系，美洲属于单独的体系。这也许是由于他结识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富兰克林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殖民地与宗主国由于各自的利益很容易发生冲突。潘恩如今公开地、明确地、有力地宣传了这个观点。伦敦控制和限制着美洲的贸易。相距遥远、消息失灵的伦敦不可能很好地统治美洲人。而且伦敦还把美洲拖进

了代价高昂的帝国战争。

为了堵住妥协的路子，潘恩加上一个政治因素——信仰自由，进一步区别开那两个不同的半球。“新世界”成了“热爱人身自由与宗教自由的受迫害的人们的避难所”；英国的那个“腐败、无信的朝廷”则在侵犯人们的自由；“旧世界”的其他地方，自由也受到根本忽视。因此，高擎自由的火花便是美洲人的标志。潘恩的小册子的激动人心的结论部分，正是在这一点上向美洲人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独立机会。他宣布说，美洲人“有力量去重新安排世界”。“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唾手可得，不消数月，人们将蜂拥而起（也许所有的欧洲人都在其内），获得自己应得的自由。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由此看来，在世界大事面前，少数懦弱的人或商界人士便显得可鄙、可笑、太微不足道了。”

《常识》立即引起了重大反响，读者范围之广，在殖民地是前所未有的。小册子叙事直截了当的有力风格使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各个种族的读者都易于接受。潘恩呼吁人们接下去再走一小步，从抵抗走向独立，这一小步将使“大陆在全世界获得光荣”。潘恩旁征博引，给人们以更宽广的启发。他从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库里挑选出一种理论，说一个共和国要长久存在下去，效能是至关重要的，但这种效能将无可避免地逐渐削弱下去。从一个地方被驱赶出来，便应逃亡到别的地方去。潘恩就把美洲看做是逃亡地。他还引用清教徒关于至福千年的理想，说只有受到上天祝福的上帝的选民才能在全球精神再生中起到特殊的领导作用。美洲人正是这种上帝的选民。他把约翰·洛克的理论具体化，说政治进步与经济进步是每个个人行为的产物，指导个人行为的准则是功利与自身利益，而并非受传统和至高权威的支配。美洲人在为自己尽责的时候，也就为世界尽了责任。最后，《常识》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精神，提出一种世界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应当有利于人类生活的改善，而不是有利于强权政治或扩充王侯们的财富。美洲人应当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理顺国家之间的关系。

《常识》发表 30 年后，潘恩欣然看到他的这本小册子有助于人们“得到自由”。[1]非常明显，这将导致结束英国专横的世袭王室统治——这一明确的目标受到广泛的理解与采纳，并很快实现。然而，这个年轻的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方能实现潘恩“重新安排世界”的目标，还是一件极难断定之事。在这种新的体制下，政府负责的事务是多些好还是少些好?政府应当为什么样的经济、种族和宗教利益服务？应当把政府托付给什么样的人来监督？给这些爆炸性的、潜藏着歧见的问题寻找答案，恰好与同样麻烦的对外关系问题纠缠在一起——一个其人民已获得自由的国家同世界上仍由君主和专制政体统治的国家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国家应当采取何种外交政策？他们在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

这些问题是不容易很快解决的。解决办法之所以特别麻烦，还因为美国人在一个敏感问题上看法各异：国内的自由体制的精神能否运用于外交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很快出现了两种重大冲突的倾向。足足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经过三次大辩论，美国人才确立了在对外事务中确保国家强盛这一概念。

对美国人来说，在两种外交政策中选定其中的一种还是以后的事。在这以前，首先遇到一场对英国的战争。到 1783 年，美国在法国的帮助下打赢了这场战争。即使如此，这个 300 万人口的蕞尔小国所享受到的独立，仍然是名义多于实际；弱小的联邦政府受到各种难办问题的困扰。没有征税的权力，无法让陆军开上战场，更无法建立海军。国家的债务年年高升。交易活动紊乱无序，在公海上得不到保护，在主要的国外市场上也得不到保护。英国人继续驻扎在部分美国领土上，暂时维持着和平；美洲土著人在伦敦和马德里的怂恿下，在边疆地区威胁着居民。再者，西班牙控制下的新奥尔良阻断了美国人沿密西西比河运输出口货物；西班牙还在心怀不满的美国边疆居民中煽动起一种脱离主义情绪。直到 1789 年，联邦宪法经过修订，才使中央政府有权解决这

些问题。美国人最终同意适当修改英国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新制度。其他一些根本性的选择还未涉及。他们很快发现，要界定外交政策必须首先界定国家的性质。

治理这个国家头一个最关键的八年的乔治·华盛顿，上任伊始便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托马斯·杰斐逊两人召来供职。一个任财政部长，一个任国务卿，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以及在1793年爆发的欧洲战争所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上，都负责向华盛顿提供咨询。在此过程中，在美国应在世界上起何种作用的问题上，两人对华盛顿、对国家施加了两种对立的影响。他们知道，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成为长久发挥影响的先例，这使他们之间的争执越来越苦涩，几乎造成华盛顿政府的分裂，造成政治派别活动，它至少已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人们感情冲动，恶语伤人，甚至出现歇斯底里，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杰斐逊于1790年进入华盛顿政府，他崇信自由，他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具有国家使命感、具有适当外交政策的好社会。他于1784年至1789年在欧洲担任外交使节，深感"在肉体与精神两方面受到压迫的情况下，人性是极可悲的"。但在美国，享受福利与富裕是人们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充足的土地，不仅能保证维持生活，而且享受到独立及其孪生兄弟——自由的权利。杰斐逊多次强调：农民是"最正直、最独立的公民"。他的理想是一个由自耕农主宰的社会，而城市、工业、中央集权、财富不均与特权，则都是这一理想的敌人。[2]

在对外事务方面，"少管闲事"的政策被认为是保持美国人已获得的自由并允许他们进一步发展自由的最佳办法。巧取豪夺、动乱不已的欧洲同美国远隔重洋，何况欧洲已许诺媾和。如果美国人自己"放弃大洋……让别人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带进来，把我们多余的东西送出去"，那项许诺就会兑现。当然，杰斐逊也认识到，美国人（其中农民不在少数）不能放弃对外贸易。鉴于农业的繁荣与重要产品的买卖都离不开国外市场，杰斐逊打算同外国

商订通商条约，以保护本国利益。为此，国家需要相当数量的外交官和一支小小的海军。“要想建立欧洲大国那种规模的海军将是愚蠢的，将大大浪费我国国民的精力。”[3]

成为国务卿后，杰斐逊在国会领导人詹姆斯·麦迪逊的帮助下，致力于改进有助于国内自由繁荣发展的条件。从广义来说，这意味着获得邻近的土地以及海外市场，后者对于保持农业社会的繁荣和共和国的活力十分重要。他认为英国人丧失了北美殖民地是不会甘心的，因此英国仍是实现他的目标的主要威胁。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不能对英国人低声下气，否则，将损害美国的扩张、商业与骄傲。尽管英国海军主宰着公海，杰斐逊仍准备坚持海洋是“大家的共同财产，向所有的经济活动开放”。美国必须对霸占贸易特权的英国实行商业报复。“这同谦和与公正无关，我们只要求我们的产品能公道、平等地进入市场，在交易中得到我们应得的一份；我们依靠的是我们自己的独立的力量，以及使用这些力量的坚定决心。”法国同英国对立，因此美国可以通过法国实现战略平衡。1789 年法国实行共和制后，更成了美国的同盟伙伴，这不仅出于外交策略，而且也因为双方具有相同的政治本质。至于国内，杰斐逊需要得到西班牙的保证，使美国能通过新奥尔良出口，以便美国牢固地掌握密西西比流域。最后，美国需要向西开拓，以便拓展自由“帝国”。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希望用这样的办法来实现他所朝思暮想的美国这个农业社会的繁荣。[4]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国家的强盛，其中，自由并不占据显著地位。他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约翰·亚当斯贬损他是“苏格兰货郎生下的小野种”），后来到纽约求学，参加了革命，在战争期间成了华盛顿将军的副官。[5]此后的政治生涯显示出他才华出众但也有瑕疵。他精力充沛，学识渊博，政治敏感，但他有个人野心，有时动机不纯。他于通过新宪法有贡献（新宪法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不大，此点不合他的心意），后任财政部长及联邦党领导人，发挥了巨大影响。政府从 1789 年至 1795

年间实行的政策，是同汉密尔顿的观点与行政才干分不开的。

18世纪90年代汉密尔顿对国家强盛的概念，实际上形成于此前十年。革命斗争使他懂得了战争的代价，然而他对人性的看法——"人是有野心的，有报复性的，贪得无厌的"——使他得出悲观主义的结论，认为生活的法则就是冲突。国家也同人一样，注定要为财富和光荣这些亘古不变的野心而猛烈撞击。即使是共和制的国家也难逃这一可憎的规律，斯巴达、雅典、罗马、迦太基的历史教训都可证明。汉密尔顿警告说，美国人必须认识到，他们也生活在一个"远非至善至美的快乐帝国之中"。[6]

残酷的事实使美国人不得不认识到，在国际事务中，力量、自我利益与感情是起决定作用的。还很脆弱的新生国家必须谨慎从事，直到她拥有能够确保利益与影响的力量。第一步须建立一个在精英（汉密尔顿对此的描述是"极少数精选的人物，他们比一般民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指挥下的"富有生气的国民政府"。这个政府将保证在稳定的政治秩序下领导发展经济。在这一步之后，须立即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保护商业活动不受怀有嫉妒心的欧洲列强的欺侮。假以时日，美国便会强大起来，不再委屈地充当"欧洲列强的工具"，并最终达到自己的强盛。作为一个自主的力量，美国将"在美洲事务的体系中占支配地位……并能在同新世界的周旋时左右局面"！汉密尔顿的外交思想是一个伟大的宏图，看来同杰斐逊的观点相左，杰斐逊所要制定的外交政策是为美国的自由事业服务的。[7]

1789年后，汉密尔顿所追求的政策是同他的上述观点相吻合的。至关紧要的是建立起一个健全的财政制度以及与英国人媾和，他在这两个方面紧抓不放。没有稳定的税收，政府只能同从前一样软弱，既不能治理好国内的事，也保护不了海外的利益。鉴于90%的财源来自英国货品的进口税，该项贸易稍有挫折便会影响联邦政府的财力。然而，麦迪逊与国会中其他一些急性子议员，愤怒于英国在商业活动中的专横霸道，要求对其实行报复，他们没

有考虑可能产生的有害后果。他们也未考虑到双方激怒起来可能开启战端的可怕前景，而这个新建立的国家对此还毫无准备。一旦发生战事，英国舰队将把美国的商业活动从海洋上一扫而光，还将炮轰大西洋沿岸的重要港口，从加拿大或美国东部沿岸登陆，入侵美国。这样一来，国家的强盛将被一笔勾销。

美国无法让英国人按美国的规则行事，那么，美国只有按英国的规则行事，并且——如有可能——还要假装是英国的盟友。为了先发出一个信号，并缓和国内的激烈反对，汉密尔顿安排了一个以约翰·杰伊为首的外交使团前往伦敦。为确保成功，汉密尔顿还以个人名义写信将杰伊此行目的以及他本人的和解愿望秘密通知英国代办。

1795 年，杰伊签订条约回国不久，国内对汉密尔顿此举不满的议论声逐渐发展成为一场大争吵。一些共和党领导人自 1792 年年中以来就一直在指责汉密尔顿把权力集中到政府手上，把财富集中到少数人身上，认为这是在侵犯人民的自由。杰伊签订条约之前，这些人已在担心美国政治的英国化将败坏共和国国民的美德；他们认为，沉湎于奢侈与浮华，只适于皇室宫廷而不适合一个以农立国的共和国。有些人受着噩梦的惊扰，以为已被出卖给英国，君主制行将复辟。新签订的一边倒的条约极其明显地说明，汉密尔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接受了英国对美国贸易的控制，以换取他的商业利益、盟友关系及财政制度的保全。条约还证实他屈服于伦敦及其腐败的王朝风格。共和党人担心经济上的从属和政治上的模仿最终将破坏美国人的自由。早些时候，麦迪逊曾警告，要反对“国家凭借它的资金、它在金融机构中的巨大份额来指导我们的贸易活动，以致把此种影响传入各种官方会议，其结果将最终影响到我们的倾向，我们的态度，以及我们政府本身的形式”。[8]

麦迪逊与杰斐逊都指责签订这项条约是一种姑息行为，不啻邀请英国人来继续践踏美国。条约还进一步确定了一种危险的结

构性依赖（下一代新独立的各州领导人也应当以此为戒）。依杰斐逊看来，“这项条约只不过是英国人同这个国家中的英裔美国人结成同盟……反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民”。公众反对的呼声日高，杰伊被斥责为匍匐于英国朝廷脚下的大叛徒（潘恩把他形容为：像个“妓女收容所大臣”）。在火炬通明的公众集会上，杰伊的模拟像被高高吊起。这项条约受到广泛的耻笑。有一首打油诗，说它是“只值一个屁……”[9]

被杰斐逊相当不客气地称之为“一个反对共和党的真正巨人”的汉密尔顿奋起捍卫他亲手炮制的外交作品。汉密尔顿的一些辩护理由听起来很有道理。这个国家——“一个伟大帝国的胚胎”，至少需要十年和平来发展壮大。以现有的弱势来同英国较量，“将有可能把我们抛回到衰弱与贫穷的境地，再想恢复还要若干年月”。汉密尔顿不倦地指出：“韬晦”是我们的根本动机。他指责某些至今仍不向新政府靠拢的政客意在利用这一条约来打垮政府。他还怀疑有些则是“向民众讨好、蛊惑人心的政客”，在玩弄民众的情绪，以发展他们自己的“非同寻常的野心”。还有一些人，“深受可怖的雅各宾主义*理论的影响，“正在跟着法国人的调子跳舞，企图把美国拉过去，同英国开战。[10]

多亏了华盛顿，汉密尔顿最终赢得了这场争论。华盛顿在公开签署杰伊条约后所受到的强烈指责使他大感震惊，但他保持沉默，直到1796年9月他离职时发表“告别演说”，才有机会来作出回答。[11]这篇演说，除了不少老生常谈的话（如“诚实是最好的政策”）之外，历来被认为是一份极诚恳的原则性文件，只是在反对“永久的同盟”这一点上多少有点下命令的口吻。尽管华盛顿是以一个“顾问和老朋友”的身份向同胞们善意地提出他的看法，事实上，他的确是在利用这一机会向批评政府的人们开火，这些人“仇恨秩序、仇恨好政府”，昏头昏脑地迷恋着法国。汉密尔顿

---

* 雅各宾党系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现的激进派。——译者

自然曾为筹备这次爆炸性演讲出了力，几乎可以说是他炮制了这篇演说，正如他炮制了杰伊所签的条约那样。

演说词提到了那种认为权力集中就会损害自由的谬论。还提到：没完没了的辩论可能导致分裂的危险，并将动摇政治权威，激起派别倾轧，种下不和的种子，从而将自由置于危险的境地。在政见分歧的背后，隐藏着政党的影响，演说词把它描绘为“潜在的发动机，一些狡猾的、无原则的、有野心的人将利用它们来推翻人民的力量，在政府倒台后由他们来篡权”。这些人将分裂国家，把“外国的影响与腐败”引进来。华盛顿保证，摆脱了党派感情与外国（应读作“法国”）干预，美国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正如汉密尔顿所预言的那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不仅在本半球立稳脚跟，而且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去同欧洲打交道。

汉密尔顿傲然屹立。1793 年年底，杰斐逊灰心丧气地辞职后，汉密尔顿主宰了政府。他保全了条约，1795 年 7 月，条约在参议院通过。他凭借华盛顿的威望打击他的政敌。由于他出生在外国，因此在华盛顿去职后他未能继任总统职位，但他继续在约翰·亚当斯政府中施加重大影响，甚至在他放弃公职后仍有影响。法国海军攻击美国海上运输，并侮辱美国使者（著名的 XYZ 事件）*，存在着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汉密尔顿抓住这个机会，呼吁扩大海军，实现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光荣。在华盛顿统一指挥的名义下，他集合了一支军队去对付法国人。他认为，以这支武装为后盾，他还可以威慑倾向法国的共和党人，甚至可以期望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以及西班牙在南美洲的属地。

约翰·亚当斯是个倔强的、刚愎自用的人，不愿受汉密尔顿

---

* 美法交恶，华盛顿总统派遣特使平克尼赴法协商，法国政府竟拒不接见。亚当斯接任总统后，1797 年又派马歇尔与格里二人赴法协助平克尼。三人通过答应贷款并用行贿手段同法方取得联系。法方派遣两名瑞士人与一名居住在汉堡的美国银行家赴美协商，此三人的代号为：X、Y、Z。此后，即以“XYZ 事件”闻名于美欧社会。
——译者

干预的拘束，他曾私下里把汉密尔顿贬作“全美国（如果不说是全世界的话）最冷酷、最急躁、最狡猾、死皮赖脸、不讲原则、诡计多端的家伙”。[12]亚当斯终于加怒于汉密尔顿，限制他的计划，把他的友人逐出政府（其结果是联邦党出现裂缝，使杰斐逊有了当选总统的可能）。阿伦·伯尔彻底击倒了汉密尔顿，1804 年两人决斗，汉密尔顿受了致命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死汉密尔顿比活杰斐逊的影响力还大。杰斐逊有关自由与外交政策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在 18 世纪 90 年代曾争论得热火朝天，杰斐逊坚持他的立场。他仍坚持除了国家商业活动的需要外，应避免卷入欧洲事务。“虽然我衷心希望所有国家都得到自由，并将永远以此作为我们关心的重点，然而，他们不会不受到他们自己的别的坏原则的污染。”杰斐逊在 1801 年 3 月的就职演说中以华丽的词藻重申他赞成共和制政府的政治信念，并说天意是要让美国人远离欧洲的“灭绝人性的大浩劫”，[13]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快乐、富有的人民”。

一个打着汉密尔顿模式印记的政府体系基本上保留未变，杰斐逊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指导原则与其说是由于害怕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危及自由，还不如说是出于权宜之计以及他自己对国家强大的观点——以农立国的观点。政府运作的结果是把杰斐逊同汉密尔顿拉得更近。杰斐逊对法国占有路易斯安那区域作出强有力的反应。没有新奥尔良，西部农民将在生死攸关的海上贸易中受到损害，而购买路易斯安那及随之而来的领土大扩张，将使数代人维持前景大好的农业生活。为抵制法国，并得到那块土地，杰斐逊以同英国结盟相威胁，并且超越宪法权力的限制（汉密尔顿也会这样做）去获得领土，不经该地人民（也许有 10 万人）的同

---

* 阿伦·伯尔（1756～1836 年），共和党领袖，曾任参议员、副总统，同汉密尔顿长期不和。他在决斗中使汉密尔顿受了重伤，此事件也导致了伯尔政治生涯的终结。——译者

意或参与，径自实行统治。[14]一举扩大领土一倍还不满足，他还想从孱弱的西班牙手中拿到佛罗里达，后来在离开白宫后，他还曾表示想得到加拿大和古巴。

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只要不是掌握在“英裔美国人”手中，看来便不那么吓人。同样，如果整个大陆都实行共和制，不再依赖英国的海军和经济发达的沿海数州，那么，国家强大便会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杰斐逊原先希望人口的自然增长将导致“一片一片地”（他在18世纪80年代讲过此话）吸收新领土，如今他放弃了这种想法，表现出了急躁情绪。现在，他把联邦政府看做是可依靠的代理人，决意要从别的列强手中强求或夺取邻近的领土，并入他的共和国体系。[15]

1803年，欧洲再启战端，美国的贸易再次受到损害，杰斐逊又一次不知不觉地去膜拜汉密尔顿的亡灵。杰斐逊同英国打交道小心谨慎，听任政府部门放弃了商业报复行动，而他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早些时候曾一再催迫汉密尔顿采取报复行动。商人们甚为不满，联邦党占优势的新英格兰地区高喊要脱离联邦，而与此同时，相互间猛烈争斗的欧洲列强一直在损害着美国的商业。共和党人与国际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内迅速增长的农产品比以前更加依赖外国消费者，看来他们只能求助于战争，以及州政府权力的进一步扩大了。

杰斐逊与之打交道的世界，确实如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是由自身利益和国家的实力主宰一切的。为此，他作出了让步，完全违反了他自己早先关于一个好社会与最低纲领外交政策的质朴观点。这些变化引发了一些耐人思索的问题。杰斐逊以前认为国家的最高追求是自由、平等，但在一个争斗不休的世界上，这是不是一种不现实的乌托邦思想？这种观点之所以被压倒，是不是因为他的同胞对于繁荣与力量另有不同的口味，并感到在狭窄的边界中无法施展他们的才能？或者，对于国家实力的看法，即使对杰斐逊这样一位自由主义者来说，是否还具有一些不可思议的诱惑力？

杰斐逊的两位继承人（进入白宫的最后一批弗吉尼亚王朝人士）詹姆斯·麦迪逊与詹姆斯·门罗，继续把自由的观念同扩张性的外交政策结合在一起。他们在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大力支持下，为着本国利益，用类似帝国主义的手段去对付西班牙。他们实现了杰斐逊有关佛罗里达的愿望，把购买来的路易斯安那的南部边界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并凭借以门罗为名的理论，公开对南北美洲这个半球提出了自命不凡的政治监督的要求。

在弗吉尼亚人士离开后，三名田纳西人士——安德鲁·杰克逊，萨姆·休斯敦，詹姆斯·K·波尔克——继续贯彻杰斐逊的宗旨。杰克逊牢固地掌握着东南地区。他在十几岁时就是个边疆战士与外交家，他像遏制西班牙人那样遏制了英国人，并征服了印第安人。后来，作为总统，他基本上清除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著人，并慈祥地看着休斯敦引导得克萨斯摆脱了墨西哥的控制。波尔克是杰克逊的民主党的一匹黑马，他依靠 1844 年制订的扩张主义政纲当选为总统，并促使陷入僵局的国会在他就职典礼的前夕投票赞成得克萨斯的并入（1845 年初）。此后，这位顽强不屈、猛打猛冲的波尔克忠实于他的竞选诺言，刚同英国人作了和平解决，又在 1846 年 5 月同墨西哥开了战。这场战争是在得克萨斯边界上打起来的，战争结果是半个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两块领土——以及 10 万人民，永久落入美国之手。

接二连三的领土扩张过程，开始于 1803 年购买路易斯安那，* 完成于 1853 年购得加兹登，** 成就辉煌。非常明显，国家疆土增加了两倍，靠的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壮大，使得俄国、英国、法国、西班牙与墨西哥各自在北美洲的领土都显得不安全了。美国

---

* 美国以 1500 万美元的代价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这片土地东起密西西比河流域、西到落基山脉、南起墨西哥湾、北到英属北美，面积共 2144500 平方公里（后来划成十来个州），使美国领土增加了一倍。——译者

** 加兹登面积为 77700 平方公里，系以 1000 万美元从墨西哥购得。——译者

也花了钱，大约4800万美元。人口大增是另一个重要收获。1860年，美国人口达到了3200万，逐步往西发展。这种“不可抗拒的盎格鲁—撒克森移民大军”(一位扩张主义者曾如此说)建立了民族统一主义的若干飞地，打破了外国势力的控制，激起了对抗，而这类冲突的结果，都有利于美国的领土扩张。[16]

容易忽略的是，在扩张行动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附加因素——具有指导性的观念。自由的命运同美国的使命纠缠在一起，潘恩也曾坚持认为理应如此。“上天对这块受宠爱的土地给以无数的赐福，并选择你们来做自由的卫士，为人类的利益永保自由。”这是杰克逊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说的话。[17]表面上，似乎他仅仅是用被动的语气重申了大家所熟知的意思。而实际上，逐渐地，美国领导人采用了维护自由同主动推进国家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策，并越来越多地用领土扩张的形式来为此作出诠释。

19世纪早期的杰斐逊，对促进这一倾向起了关键作用。他自己早年关于自由的观念，同汉密尔顿关于国家强大的观念，看起来是冲突的，如今他超越了不同观念间的冲突。日后，杰斐逊观点的传人仍拒绝汉密尔顿对于国家力量的狭隘理解，他们不同意他有关美国应寻求何种强盛的最本质的概念。但他们颇同意汉密尔顿需要一种自我伸张的外交政策的观点。要求更多的农业土地，对维持一个保证个人机会、自治、道德高尚的共和制政治经济体系，是至关重要的。不扩大领土，一个领土有限、人口日繁的共和国是要衰落的。城市需要发展，商业与手工业需要取代农业的主导地位，否则，居民将屈服于奢侈、堕落、贪污、腐败的诱惑力。因此，自甘局限、无所作为将得到报应，而扩张才是拯救之策，才是所有真诚的共和国国民的当务之急。

日后的杰斐逊派发现，由于中枢无力，国家的雄心无法实现，他们的共和主义理想也黯淡无光。这种状况驱使他们接受了伴随领土扩大而来的又一种可能性——购买路易斯安那已反映出这一可能性，即新领土的获得要求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执行机构来作为

体现管理国家事务本领的传统工具，这些本领包括：强制的力量，决策的权力，处理危机时便宜行事的权力……总而言之，包括政策制订者认为合适的、恰当行动的范围。这样，他们已经不再理会早年杰斐逊派所担心的建立集中的权力机构可能损害国内自由同时也会损害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的问题。

这一有关美国使命的概念的重大转变，反映在一个被经常用来描述美国的知名的夸张词汇：流动的共和国，她的人民对自由情有独钟，但又常常在移动之中。约翰·L·奥沙列文就是这一乐观的、精神饱满的新信念的倡导者，他曾讲到这种“明白无误的命运”，宣称：“我们是通人情的进步国家，谁能，什么东西能限制我们前进的步伐”？这些话，还有其他类似的一些话，似乎为最早由潘恩提出来的命题——美国人一旦掌握了机会便将“重新安排世界”——作了最精彩的发挥。国会因得克萨斯、奥勒冈以及墨西哥战争所展开的辩论，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与晚期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都强调了“这个强大的国家发展迅速，注定要超过任何欧洲强国”，超过任何帝国，甚至在人口上超过中国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18]

批评派指责说，扩张对自由是有害的。但这类指责只引起一些感情上的反响。相反，1848 年 2 月在参议院辩论墨西哥战争时，一位参议员说：自由需要国家不断地发展与“几乎无限地扩张势力”。另一位参议员亦步亦趋地说：“必须依靠行动——依靠无休止的不断的行动”，美国才能维护自由。“让我们伸展到准确的、适当的范围，我们的自由才能永存；因为，在这一过程，力量将得到加强，火焰将更加明艳，它将照亮一个更加广阔的田野。”如果不这样，而是试图“限制我们高贵民族的不可限量的能力，……那将是对人类自由事业的叛逆”。一个被动的美国将停滞不前，最终沦为欧洲的盘中餐、砧上肉，而欧洲早已是人口密集、社会弊病丛生、不堪重负了。[19]

鼓吹流动的共和国的那些人用多种互相支持的观点来支撑他

们的理论。也许最有效的理论是（其实早已有之）：美国站立在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上。文明的中心历来都是朝西转移的。早先人类文明发源于亚洲，穿过地中海，到了近代便驻足于英国。英帝国衰退了，美国站到了这一进程的边缘。美国人已经开始了穿越大陆向西进军的进程。到时候，他们将把他们生气勃勃的影响延伸到亚洲，那里是人类文明初见曙光的发源地。

流动的共和国的概念还受到 19 世纪 40 年代以前发展起来的一种物理学理论的支持。约翰·昆西·亚当斯特别精于琢磨出最重要的法则，他说：美国，"一个伟大的、强有力的、有进取心的、迅速壮大的国家"，对邻国具有最强大的吸引力。1823 年，他把这一法则用于古巴。说这个国家同西班牙不存在"天然的联系"，"只能受北美联盟的重心的吸引，而北美联盟也受同一自然法则的作用，无法拒绝古巴投入她的怀抱"。有时，亚当斯及其他新物理学法则的鼓吹者，还把邻近的别国领土比作已熟透的果子，政治重心将把它们置于早在等待着的美国人已伸出来的双手之中。例如，麦迪逊在 1805 年讲到加拿大时说："梨子熟了的时候，自己就会掉下来。"如果果子自己成熟得太慢，不肯掉下来，那么不耐烦的美国人就会像华盛顿所说的那样，趁别人到手前，去"摇摇树"，或干脆"把果子摘下来"。[20]

最后，19 世纪 40 年代倡导"流动的共和国"的人们还争辩说，这一理论不同于给希腊、罗马带来灭亡的那个历史规律。美国是用与众不同的材料打扮起来的，她有"一种扩张的特殊能力，一种其他政府从未有过的天赋才能"，而她的命运得天独厚，那里没有出现暴君、卖国贼的危险，也不会有其他时代有过的使自由人民受害的无意义的战争。[21]美国用武力或欺骗手段获取新的领土给她的声誉造成的污点，被她的崇高目的——取得共和思想与共和体系的胜利——过多地抵销了，为此别人家的领土不得不作出贡献。

19 世纪上半叶美国领土扩张的惊人发展，在"流动的共和

国”的名义下合法化了，然而也产生了无法解决的问题。美国人一再提出领土要求、扩大他们的野心，直到损害自己的事业，还要走多远、多快？虐待美洲印第安人（尤其在杰克逊的民主党掌权下）的传言在新英格兰地区不胫而走。兼并得克萨斯固然会带来繁荣，但因此增加了一个蓄奴的州，这便激起了更广泛的反对。波尔克*对奥勒冈的处理被指责为厚颜无耻、做了蠢事。人们指责他的要求太过份了；认为他这种贪求帝国主义威力的行为不必要地带来了挑衅与刺激；而战争的代价将远远超过领土的价值。

不管怎么说，波尔克的政策在墨西哥战争期间从人们窃窃私语地表露不满逐渐发展到不同政见的大爆发。波尔克发动战争把得克萨斯的边界推到了里奥格兰德，说明他想把大片墨西哥领土——新墨西哥与加利福尼亚——占为己有，他甚至还饶有兴味地听取政府中某些人关于夺取整个墨西哥的谈论。

开始，对总统的大胆妄为公开提出批评的人还不多。民主党人尤其不愿反对本党的一位战时总统。辉格党人则对联邦党人因抵制 1812 年战争的不爱国行为而迅速垮台记忆犹新，踌躇不决。因此，他们在小心翼翼地贬低波尔克的同时，又表示支持正在战场上作战的军队，还称赞了由两名辉格党将军率领的部队的英勇牺牲精神。再者，两党内部都有派别对立，政治歧见难以调和，民主党内的头面人物如托马斯·哈特·本顿、马丁·范·伯伦、约翰·C·卡尔霍恩等，辉格党的著名人士丹尼尔、韦伯斯特、约翰·J·克里滕登等，都谨言慎行。两党都知道，采取明确立场反对获取新领土，对本党很不利。有关得克萨斯与奥勒冈的辩论已经在有关蓄奴制的前景与各州间的势力平衡问题上产生重大影响，地方与地方之间关系紧张，两党内部都产生了深刻分歧。为本党利益保持缄默或妥协，总比在辩论中恶语相加、自我毁灭要好些。

* 詹姆斯·波尔克，美国第 11 任总统（1845—1849 年）——译者

一小群所谓有良心的辉格党人坚决反对蓄奴制，他们担心蓄奴制将延伸到新领土上去，因此起来反对。俄亥俄州的乔舒亚·R·吉丁斯，以及该党马萨诸塞大本营的代表人物如查尔斯·萨姆纳、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等，也看出战争的背后有一只南方蓄奴主义的手。在他们看来，波尔克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力争在新领土上设立残忍的不人道的政府机构，并在努力扩大有害的南方的政治影响。但这些有良心的辉格党人反对波尔克战争计划的动议，在参议院只争得2票，在众议院只争得14票。

战争费用越来越大，而波尔克的战争目标还在日益膨胀。辉格党人以及少数原先表示默许或默默坐在一边的民主党人参加到不同意见的大合唱中来了。批评涉及的问题很广。他们批评波尔克的战争是侵略性的、不公正的，说他用欺骗来掩盖自己，他把一个既成事实摆在国会面前，是不符合宪法程序的。批评者说，战争为欧洲干预创造了机会，这将危及美国的安全。当合并得克萨斯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时，批评的人们提醒大家说，波尔克意在把一个与文明世界格格不入的劣等民族带进联邦。两派迎头相撞。战争支持者强调农业需要的理由。而俄亥俄州的辉格党领袖托马斯·科温则说美国几乎已不需要更多的土地。他于1847年2月在参议院所作的有争议的演讲中呼吁立即结束战争。"2000万人民已有约十亿英亩土地……每个人想占哪块地就占哪块地……"；"借口需要更多空间"是"从尼姆罗德*直到今天所有强盗头子的托词"。[22]

最广泛、最尖锐的批评是：波尔克无论如何是在危害自由事业。民主党人的观点接近从前的杰斐逊派；辉格党人则找到了适当的修辞以表达他们不希望一场征服战争违反自由原则与共和制度。为了使原来住在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甚至可能包括整个墨西哥国的外国居民臣服于美国，波尔克威胁要一劳永逸地把美利

* 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一位强有力的猎人与统治者。——译者

坚合众国重建为一个帝国。辉格党的一位社论撰稿人贺拉斯·格里利敦促同胞们去读一读“希腊、罗马用剑去扩张帝国版图以至自由被毁灭的历史”。他认为，“只有白痴与恶魔”才会去寻求征服的荣耀，如此有害于国家。政治篱笆的另一边，约翰·C·卡尔霍恩则说：“历史上没有例子说明任何一个自由国家试图占领像墨西哥这么大的一片领土而不出现灾难性后果的。”他警告说，墨西哥是一颗“禁果”，吃下这颗禁果，将给美国政治体系带来致命打击。杰斐逊从前的副手艾伯特·加勒廷用一种仿佛来自遥远地方的声音警告说，波尔克的战争使政治美德沦丧，并叛变了天意所归、以“模范共和国”自诩的美国人所肩负的重任。[23]

批评派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倾向将不可避免地、或迟或早地扩张国内的政府权威。从波尔克处理这些冲突的过程已经可以看出不少扩张权力、滥用政府权力的危险迹象，直接威胁着共和制的原理与实践。总统挑起战争，操纵国会，建立秘密基金，由他本人控制着宠大的军事系统——都属于帝国制（或汉密尔顿）的传统。行政权力的集中，随之而来的沉重税赋负担，庞大的常备军队，以及帝国主义政策必然带来的种种难题，最终将导致分裂，自由被破坏，国家进入一个专制主义与一片混乱的时代。加尔霍恩希望一个共和制政府最好是“锋藏不露”。“如果我们不声不响……听凭命运去产生结果，我们可以为自由做更多的事情，不仅为我们自己，而且为世界树立榜样，这比一千次胜仗还好……”一位田纳西州的辉格党人表示同意说：“我们应是伟大的榜样。”美国人应通过树立美德与和平的榜样来推进“真正的共和主义”。[24]

波尔克立场顽固，对批评置之不理，但他本人及其党派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战争可能把蓄奴制带进新领土的问题毁掉了民主党的团结一致。同时，辉格党人也因同一问题向两极分化，但最终受到政治损害的是民主党（辉格党人于1847年12月控制了国会，次年赢得了总统选举）。波尔克顽固地继续坚持他的议和条件，

但墨西哥人也同样顽强，即使军队打散了，首都被占领了，仍拒绝低头。最后，1848年年初，波尔克派遣国务院官员尼古拉斯·特里斯特去墨西哥和谈，终于结束了战争。波尔克为日益增长的人口贮备了一大块土地，他的成就在这一年年底也最终获得了肯定。新领土对联邦的“权力集中与巩固”不感兴趣，倒对“维持自身的团结”作出了贡献。[25]波尔克兑现他1844年所作的保证，不谋求连任，退休了。数月后，因积劳成疾去世。

批评波尔克的人们应受到称赞，因为他们促使波尔克接受了不合他口味的和平条约。但他们也未能对波尔克政策产生的问题找出答案。维持国内自由与对外逞强能否统一起来？波尔克的经验证明在这方面是容易犯错误的，不是不会犯错误的。

然而，波尔克的政策为这个国家提供了一个领土消化不良的恶例。蓄奴制这个问题，开头只在政治地平线上升起一小块乌云，到了19世纪50年代便发展成为黑压压的雷雨云砧。正像批评派们警告的那样，蓄奴制使得新获得的领土上出现了政见分歧的危险状况。1848年出现的反蓄奴制思潮，使一些辉格党人与一些民主党人退出各自的政党，另组一个“土地自由党”。政党开始了改组过程。全国性的辉格党改名为以北方为基础的共和党；民主党则变为一个主要是南方各州的党。

尽管有这些麻烦事出现，流动的共和国这一理论在19世纪50年代未受到任何动摇。它对某些政客来说，仍有吸引力，这些政客拿它来同对抗联邦政府的地方主义作斗争。他们发现，号召一项鼓吹国家强大又用好听的语言来保证自由的对外政策，可以成为推进爱国主义的工具。例如，威廉·苏厄德，这位未来的共和党领导人、名声远扬的国务卿，1854年发起一场庆祝活动，庆祝国家已有的成就与预期的未来光荣。他很明白：这样一种激动人心的想象，有助于防止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的辉格党就要彻底垮台。他预言，美国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大陆帝国”，如果把美国的商业活动与共和国理念传播到夏威

夷、中国、日本、南美洲、欧洲甚至非洲去，美国将取得更加卓越的地位。这种宣传对每个人都有吸引力。苏厄德同其他鼓吹国家强盛的人们一样，用同样自信的语气指出，美国不会像从马其顿古国直到英国这些众多的帝国那样，受到某些力量的打击就垮台。[26]

但是，当政党因对蓄奴制的不同态度而分道扬镳之际，外交政策逐渐地只成了不同地区各自玩弄的手法。结果，在为流动的共和国的能量开路的某些特定计划的执行过程，形成平行的、冲突的局面。南方的许多人眼盯着墨西哥、尼加拉瓜与古巴，仍在梦想获取新的蓄奴州，保持他们在首都华盛顿的强大声音以及在全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北方与西部则对南方的计划极其反感，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加拿大、夏威夷以及经济方面的扩张。许多北方的民主党人喜爱扩张性的政策（不管朝哪个方向），因此在两个不同的扩张主义阵营中脚踩两只船。

1861 年，暴风雨终于爆发，美国人民处于剧烈震动之中达四年之久。在这四年中，恐怖的大屠杀场面不断重现，年复一年。内战停止后，迎来了重建时期，但即使这样，两种观点并行的地区性危机仍在继续。南方一片混乱。350 万改变身份的农奴需要关注。国家遭受到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政府的债务达到空前规模，几乎等于全年国民收入的 1/8。反对再搞对外冒险活动的人们坚持认为，剩下来的精力与资源最好都用于国内。“今后 50 年内，我们已有足够领土让人们去居住；即使再增加 800 万或 1000 万的白人与黑人，我们也能够承受。”1866 年一家关注国内未竟事业的报纸细心周到地说[27]在这种呼吁背后，在内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里，外交政策的制订出现了党派色彩。共和党控制的白宫或国务院制订出扩张性计划，而计划必然立即遭到持批评态度的民主党人的严厉诘难。

国家安定了 40 年之后，从前关于国家强大与自由的看法重新

在19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外交政策中找到支撑点。重建时期结束，南北和解，终于消除了国内争执与分歧的主要因素。同时，欧洲列强纷纷在太平洋、东亚与美洲扩张势力，引起了美国的警觉，也勾起了仿效的欲望。新技术用于武器、船只、交通通讯，世界突然显得小了，也更具威胁性了。由达尔文主义发展而来的强调竞争的伦理观念已成为社会时髦风尚，人们感到世界正在迅速出现紧迫感。美国人也发现自己需要精神方面与商业方面新的海外边疆，因为国内资源将要耗竭，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先是19世纪70年代，后来是80年代，最后最严重的是90年代）使国外市场成为（至少某些人认为）国家未来繁荣所不可少的东西。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内战结束后数十年中美国生活的剧烈转变，也许还为人们接受这一政策的回归作了心理上的准备。工业化，城市化，数以百万计的移民的到来，加重了国内压力（或至少精英们已有此担忧），最终的出路在于海外冒险。这些倾向反映在一系列冲突之中：国家分裂成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集团，伦理道德与地方性文化的分歧，也许反倒使合力制订出一个更加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美国开始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大力建立海军，其意图是在拉丁美洲与太平洋区域更主动地发挥作用。

召唤国人寻求国家强大的号角再次大声地、清晰地响了起来。福音传教士乔赛亚·斯特朗于1885年出版一本畅销书，在充满使命感的清教徒的心灵中灌输进扩张主义的气质。他向他的同胞们允诺说，上帝正在“准备要人类去接受我们的强征暴敛”。作为英国的继承者、文明西移的受益者，当代美国人将通过商务交易、传授福音与殖民活动来塑造“人类的命运”。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则在着手编写一本海军战略经典教科书，他认为美国人已无可挽回地陷入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到处都是一个国家被拉拢去进攻另一个国家；我们的处境也不比别人更强。”美国必须有一支强

大的海军，有一系列海外基地；为了确实保护贸易与战略的利益，还应该在中美洲开凿一条运河。著名的来自马萨诸塞的参议员、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亨利·卡伯特·洛奇竭力提醒国人注意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所应有的地位。带着“一个19世纪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的征服、殖民化、领土扩张的记录”，美国人如今不应再犹豫，应当合力参与角逐“地球上仍然荒芜的地方”。国家的荣耀、国家的力量、国家的利益，还有民族的优越与骄傲，都是那些评论员常用的口号。

建立在这些理论上的政策，驱使美国人第三次投入一场有关外交政策根本目的的大辩论。19世纪90年代，美国—西班牙战争把争论引向高潮；这场争论标志着流动的共和国的霸主理论的最后时期。在某些方面，这次争论比19世纪40年代那场争论还更激烈。

一位总统再一次抓住一场一边倒的战争带来的机会，引发了一场辩论。威廉·麦金莱，这位来自俄亥俄州的政治家，政治敏感，言语不多，曾极力为流动的共和国之说进行辩护。1898年同西班牙打了一仗，解放了古巴之后，他很快让国会批准了已拖延很久的合并夏威夷的计划，并批准命令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与菲律宾。1899年他又提出新的建议：通过了一个同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合并的法案，批准美国同德国分割萨摩亚。同年，他监督发出门户开放的照会以对列强分割中国的可怕局面做出反应，他还于1900年派遣军队去中国协同欧洲列强镇压了义和团。

这些政策似乎不属于某项重大计划，而只是实现某些目标所不断导致的措施，公众已把这些目标（商业繁荣、领土扩大、军事安全）同国家的强大联系起来。总统本人1898年9月曾用“我们无法忽视的责任”来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同年10月，他在中西部作竞选巡回旅行时，号召美国人忠于“文明置于我们肩上的重任”。同几年前的外交政策膜拜者相呼应，麦金莱提出：美国有权、

有责任去建立殖民地，去帮助“受压迫的人民”，美国应当向世界各地普遍地施加自己的力量与影响。美国人将由此受益，全人类也将因此受益。1899 年 2 月，他在波士顿演讲，把美国对菲律宾、古巴与波多黎各的控制，形容为美国的“一项重任”，“是按上帝的旨意，以人类进步与文明的名义承担下来的。”他要怀疑者放心，“我们那些宝贵的原则在热带阳光的照射下也不会改变。他们将跟着我们的旗帜前进”。[29]

总统的支持者们玩弄着同样的一套话题。美国人具有“这样一些特质：力量强大使他们英勇刚毅，体制完善使他们真理在握，天定的目标赋予他们神圣的权威”。这些就是印第安纳州年轻的共和党人艾伯特·J·贝弗里奇的观点，他在 1898 年 9 月所做的这篇很出名的、热情洋溢的演讲是为麦金莱到中西部竞选作准备的。美国“从今以后将领导世界的新生”。海外的占有使他和其他一些人获得了许多贸易与战略上的好处。尤其是菲律宾，被誉为一个推动“大”中国贸易并保护整个太平洋日益增长的利益的重要基地。在一个因有了电力与蒸气机而变小的世界上，那些岛屿并不算远，轻易越过海洋就同美国大陆很近、很近了。[30]

一个热中于搜集战利品的政府不可能不受到反对。美国的未来应当质朴与自我限制的观点再次兴起。持这类观点的人包括共和党内一些不同政见者，如马萨诸塞的参议员乔治·F·霍尔，前总统本杰明·哈里森，以及大多数属于老一代、在反对蓄奴制的十字军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分子。民主党人更是明显地持反对态度。参议院中，南方民主党员 27 人中有 17 人投票反对吞并菲律宾，正如他们以前曾在国会带头反对吞并夏威夷。民主党的著名人士，包括前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前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该党 1896 年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都攻击了麦金莱的外交政策。两党党内的知识分子、教育界人士，都加入到批评者行列中来，其中颇享盛名的有：斯坦福大学的戴维·斯塔尔·乔丹、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耶鲁大学的威廉·格拉厄姆·萨姆纳、

小说家马克·吐温与威廉·迪安·豪厄尔斯，以及幽默作家彼得·邓恩。在政治家与社会改革家中，著名的卡尔·舒尔茨与简·亚当斯也参加了进来。甚至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也运用他本人的名声与财富加入到反对者的行列。

这一不同政见集团开始在“反对帝国主义同盟”的旗帜下于1898年11月间联合起来，当时麦金莱的全面战争的目标已很明朗。他们反对吞并的呼声，他们在参议院所进行的辩论，全国为之注目。1899年初，菲律宾爆发了反对美国统治的运动，而在“平定过程”中又有严刑拷打与其他暴行的报道，使问题激化，有利于批评者一方。

批评派迅速击退了扩张主义者的争辩。扩张主义者辩称，世界形势变了，美国经济要求有一个新的外向的冲刺。批评派则说：为什么要拿坚不可摧的大陆地位去换取一些遥远的领地，而这些领地经不起突然袭击，需要代价昂贵的海军与军事设施去防卫？菲律宾距加利福尼亚有7000英里，而菲律宾距中国只有600英里。纠缠在列强争夺的旋涡之中，那些岛屿只能成为战略上的负担而不是财产。再者，它们将在经济上榨干美国——这是卡内基最强调的一个观点。这些岛屿管理起来十分费钱，对于求得中国的贸易又极少帮助。

争论的重点，仍在（同前几次的争论一样）一个以国家强大为目的的外交政策同自由是否相容。1898年6月，克利夫兰发出警告：国家看来正在准备“放弃老界标，……而追随君主政治的危险的灯光”。此后，9月，舒尔茨引证历史规律，说一个共和政府“如能坚守她立国所据的原则，便能保持下去，一旦放弃这些原则，便已在道义上衰亡”。萨姆纳在攻击兼并菲律宾的方案时，援引早先质朴的杰斐逊派观点，说这种观点（尽管在国内从未彻底实现过）仍是“一个光荣的梦”。信奉权限较小的政府、个人自由与经济接近平等诸原则，已使美国“在人类历史上处于某种独一无二的伟大境地”。萨姆纳呼应早些时候批评派的论点说：“征

服性的、有野心的、冒险的外交政策”将把这个特殊的“民主共和国”变为“另一个同老帝国亦步亦趋的新帝国”。同其他沉溺于“帝国的贪婪与贪欲”的共和国一样，美国也会试图把统治强加于他人身上。下一步就该同掠夺成性的殖民者对手动武较量了。这种外交冒险的效果将很快在国内反映出来——即形成一个以施惠者自居、同时控制着庞大军事组织的政府机构。各种派系将争夺这个集中的权力，这一过程将不可抗拒地败坏共和制的美德，并最终废弃自由。[31]

但是这一次，批评派仍未能动摇扩张主义的纲领。80 年代的批评派还不如他们的 40 年代的先行者，甚至未能使扩张派的政治权力受到削弱。扩张主义派如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他们指出，批评派的立场所反映的杰斐逊质朴的自由观念，其实早已折衷、妥协了——杰斐逊本人及其 19 世纪初期的门徒们自己已折衷、妥协了。罗斯福*与洛奇宣称，麦金莱仅仅是重走杰斐逊所标示的道路。“杰斐逊在路易斯安那问题上所做的，同如今在菲律宾问题上所做的，同出一辙，并行不悖。”贝弗里奇也用历史上的先例来为自己辩护，取得了极大效果。他指出，19 世纪 90 年代不是一个分水岭，而是杰斐逊这位“共和国的首位帝国主义者”开创的扩张过程的一部分。每过十年，美国人就把“自由的营帐扎到更西、更南的地方去”，而每一步都须挡开“来自不信奉自由真理”的阻力。自由的原则如今已不像从前那样普遍适用。早先获得的领土上的“野蛮人”与“异教徒”就不能实行自治，必须由华盛顿来“看护”。既然美国能从森密诺尔人手中取得佛罗里达，能从苏人手中取得北方平原，能从墨西哥人手中取得加利福尼亚，既然美国能把印第安人养起来，把他们的领土当作殖民地对待，那么，美国也可以把菲律宾拿到手，把菲律宾人民从“掠夺、勒索、野蛮与

---

* 指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第 26 任总统（1901～1909）。——译者

血腥的统治”下拯救出来。[32]

追求自由与追求强大，如今轻易地在国家使命的一个狭窄的、谨慎的、自我限制的概念下统一了起来。总统一次又一次坚定地提出要求，直到包括取得全部菲律宾领土的要求；他要求在条约中纳入这些条款，于1899年2月强使参议院通过。57票赞成，27票反对，刚够法定票数（超过2/3）。批评派在琢磨：1900年的总统选举也许可以成为对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一次庄严的公民投票。但是，这一希望很快烟消云散。一位强烈反对帝国主义行径的第三党总统候选人的努力也全部白费了。某些反对派勉强转向民主党及其旗手布赖恩（他主张白银自由流通的立场引起争议，他在条约辩论中支持麦金莱赞成合并的战略也说明他判断不当）。其他一些人坐在一旁抵制选举，或者捏着鼻子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由于敌人分散了，麦金莱这一次得票比1896年同布赖恩竞争那次还要多。帝国主义政策的问题甚至在竞选中未被提及。最坚定的批评派受到孤立，被忽视，以后又挣扎了几年，终于在公众的冷漠中销声匿迹了。

世纪之交，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拱顶石安然无恙地搁在原来的位置上。美国人民已屈从于扩张性的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的诱惑。最早将它拿在手里在众人眼前摇晃的是汉密尔顿，杰斐逊朝它顶礼膜拜，波尔克与麦金莱同它热情拥抱。逐步逐步地，主张采取有力的外交政策的人士占领了爱国主义的高地，打败了怀疑派，驳倒了批评派，他们的战绩甚至比以前更辉煌。主张采取有力政策的领导人抓住国家安全的广泛定义，鼓吹这种政策将使国家成为当今世界的强国。在这种努力之下，他们最终迫使美国人接受了殖民地、海军基地、势力范围、保护领地、强大的海军以及能够远征的陆军等事物。

许多人论证了寻求国际强国地位的正确性。同美国敌对的外国列强应予迎头痛击。海外十字军运动将提高国家的声望与骄傲，

加强国内的团结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美国有太大的能量与梦想，不应限制在固定的边界之内。但是，在所有这些代表着强大外交政策的观点中，惟有呼唤自由的观点在日后发挥的影响最具有决定性意义。

主张采取有力政策的人士争辩说，一种既致力于自由又致力于强大的政策，绝不是两种不相容的东西的危险与不稳定的结合。相反，海外的强大将使国内的自由更放异彩。当胜利一个接一个地来到，美国冒险事业的边界一扩再扩，自由民众对他们的特殊命运的自信心将更加稳定、更加深化。美国人确信自己有了自由，便可在世界各地怀着敬畏之心注视着他们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模样去塑造别人。

另一方面，自由还能使国家的强大神圣化。为上帝所选中的人民有权获得特殊的权利与义务，有了这些权利与义务，便使得卡桑德拉们*所说的帝国主义与共和制将相互易位的预言无足轻重。编年史中虽然充满着那些获得强大后便失去自由的例子，让懦夫们为此哭泣去吧。他们难道忘记了，同样的法则对外国人起作用而对美国人是不起作用的，因为美国人是具有特殊使命的特殊人民。占优势的民族主义者争辩说，美国人追求海外的巨大野心决不是要危害自由，而是要使自由在国内更显生气，并创造条件更有利于在国外土地上传播自由。换言之，可以改变世界而自己不会受到改变。

始终把自由同强大结合到一起的强有力政策的支持者，坚定地迎战批评派，这种辩论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像美国这样一个不断处于流动状态的民族，自建国以来就同自由与强盛两词密不可分。这个国家是在同专制的斗争中诞生出来的，至今仍坚守着建国者的信念，始终牢记着要"重新安排天下事"。因此，通过外交

* 卡桑德拉系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的女儿，能预言未来但不为人们相信。——译者

政策可以提供一种连续性的国民意识，即把美国人局限于本半球是远远不够的。

主张国家强大的人们早已挫败了批评派，批评派被冷落一旁，只得郁郁寡欢地咕哝什么小政府、低税收、共和制美德。杰斐逊不自觉地提供了一个例子：他当了总统后所推行的政策在实质上同他早先的信念相左。19 世纪 40 年代的民主党人又把这一进程朝前推进了一步。由于他们的根子还是杰斐逊的传统，所以他们还须设法把扩张主义的目标同自由的旧梦调和到一起。为此目的，他们曾全力以赴。他们的成功恰好为 90 年代的共和党人铺平了道路（他们有关力量、进步与稳定的梦想同汉密尔顿更接近），自由同强大的结合更牢固了。尽管批评派三次都失败了，他们至少成功地把不同政见的语汇从 18 世纪 90 年代接传到 19 世纪 90 年代。他们最有力的争辩理由继续传到了 20 世纪：一种定位为在国际间占据强大地位的外交政策，将证明是同共和制原则相对立的，将损害共和国的体制。

有关美国使命的两种不同看法惊人地持续下来，很值得仔细研究。占统治地位的看法是把自由这一目标同在国际事务中追求国家强大等同起来；与此不同的看法则是偏爱克制的外交政策，认为这对完善国内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在根本问题上政见不同的美国政治精英如何能保持坚定呢？双方的不同观念又如何各自绕开了标志着建国一百年来特征的那些重大转变呢？

追求国家强大也许很容易理解。鼓吹这一观念的人们希望利用这一政策来发挥商业化（后来是工业化）的经济所释放出来的威力。这种经济威力可以创造出一种潜力，它能够改革政策工具，而这对于在国际上拥有强大地位的梦想是必需的。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需要与问题，对鼓吹强大的人们的想法也同样重要。市场需要保护。国内的分歧需要遮盖起来。国家的稳定、富足、具有推行有力外交政策所依赖的实力，反过来都要求一个有充足税赋收入的强大国家，这是 18 世纪 90 年代与 19 世纪 90 年代的主

要政策制订者所本能地接受的结论，并始终得到坚定的继承。在这两个时期，英国提供了政治上权力集中、经济上繁荣发达的范例，可供企图强盛起来的美国效法。19 世纪 40 年代的民主党人无法接受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即使有好处也不能接受），但毫无疑问，他们像那些主张在中央集权下实行经济统制的人们一样，只要大陆的扩张有利于发展本国的农业经济，他们便能欣然接受。

政策批评派对于主张有力政策的主流派或多或少热忱关注的那些倾向，一概表示异议。批评派以自由为检验标准，凡是使中央政府危险地集中权力的倾向，凡是使老百姓被贬低、被剥削的经济倾向，凡是有可能使国家背离自由传统的任何发展倾向，他们都表示强烈反对。但是，面对着在政治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派，批评派在国家生活中只能在弱小的、规模很有限的集团中传播他们的观点，他们只能组成一些不稳定的、不牢固的联盟。南方民主党人——他们的重农观念先是受到汉密尔顿的摧残，后来又受到麦金莱的共和党的摧残——两次提供了形成政治反对派的基地。新英格兰地区，尤其是马萨诸塞的辉格党——共和党人，组成了另一个重要的反对派基地，开头是 19 世纪 40 年代由废奴主义者带的头，后来是 90 年代当地的知识界加上同从前反对蓄奴制运动有联系的上年纪的外交家（“穆格温普”）*，还有些集团，如非扬基少数民族公社，与 18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非国教教会的成员，联合成为反对派；但他们的活动与影响远不如新英格兰地区，也不如南方。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即使是这两个主要集团的不同政见者，其势力也已大为减弱，在参议院中征集不到足够票数，也征集不到公众的支持来制止主意坚决的麦金莱。

批评派经常忧虑自由的脆弱性，担心共和制的美德衰退为空洞无物的宗教经咒。不同政见者的功绩在于提出了——即使已迟

* 穆格温普 Mugwump 指 1884 年共和党的脱党者，亦泛指政党中闹独立的分子。——译者

至19世纪90年代——既广泛又实际的问题而不是狭隘、空幻的问题。不同政见者是无法一笔勾销的，他们与在条约中（先是同英国的条约，后是墨西哥，最后是西班牙）玩弄文字游戏的政治投机分子和耍笔杆子的人不同。不同政见者正确地认识到，海外冒险是国家优先目标的重要标志。他们从那些冒险活动中看出，从历史继承下来的观念，同主要由商业化与工业化引起的国内现实生活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宽。19世纪的新秩序开始露头，其特点是：进取心同不合群结合在一起的个人主义，地区间的流动性，大规模组织的等级制度，财富分配悬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过份集中。这些都是不安定因素，有害于个人的自信，使政治平等与社会和谐不能很好地实现，而批评派则强调要有一个好的社会。越俎代庖，控制了古巴与菲律宾的美国公民，难道真的比一百年前的先辈们更自由、更独立吗？努力在世界舞台上开辟自由，难道不正好把本该在国内争取自由的美国人的注意力吸引开了吗？[33]

批评派无力扭转有害自由的倾向、扭转不利于他们的经济制度。然而，他们在强调坚持固有的美德方面，的确为同胞们做了好事。他们大声疾呼，追求国际间的强大地位将转移对国内真正问题的注意与应变能力，在某些环境下甚至将加剧这些问题并使问题更趋复杂。对外的十字军征伐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国家的理想与福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批评派虽然被谴责为沉溺于古老的宗教经咒，却帮助我们认识到，鼓吹有力政策的主流派把自由同强大看作共生关系加以顶礼膜拜也如同举行宗教仪式，表面看来似乎是提倡爱国，实际上从大多数同胞的生活来衡量，并无什么真正的价值。批评派投票失利，辩论失利，操纵失利，还受到各种打击报复。问题仍在那里悬而未决，说20世纪的政策制订者不会再继承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只不过是一句骗人的鬼话。

三　种族等级观念

> 纯粹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很小。非洲人是黑种人或黄种人。亚洲主要是黄种人。美洲（新来者除外）也都是黄种人。在欧洲，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俄罗斯人与瑞典人通常被我们称作黑皮肤，德国人也是。只有萨克逊人例外，萨克逊人同英国人组成地球上的白人主体。但愿他们的数量见涨……也许我对我的民族的肤色有些偏爱，这种偏爱对人类来说也是很自然的。
>
> 本杰明·富兰克林（1751 年）

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启蒙运动中乐天的、多才多艺的、道德高尚的典范伟人，也是一个种族主义者。[1]他按照肤色来区分人类，分派给每种肤色以特殊的民族性。对印第安人，他曾公开谴责他们是“一打仗就高兴、杀了人就自豪的野蛮人”。他在私下的谈话里，还描绘他们是：无知、愚蠢、不懂礼貌、天生的懒惰。为了要他们排好队，有必要偶尔揍他们一下；他们如稍有一点不出力的迹象将招来一场麻烦。富兰克林本人就是一个奴隶主，他的印刷所因出卖奴隶而获利。在他的心目中，这些黑人懒惰，偷东西，不注意节约。他为严厉的黑人法规辩护，声称对于那种“黑皮肤、绷着脸、怀着恶意、爱好报复、密谋逃跑、极端残酷的民族”，这样的法规是恰当的。即使是在富兰克林的宾夕法尼亚定居的“黑皮肤”德国人，也被他贬损为“伯爵领地上的乡巴佬”，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这些德国人好搞小集团，其中甚至有些人还信仰罗马天主教。

富兰克林的种族主义是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刺激下的实实在在的反应。他梦寐以求的是说英语的自由民在美洲的人数越来越多，所占的土地越来越大，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强，他们的商业活动越来越繁荣。他的政治生涯中充满了这种梦想。这使他发展成为殖民地联合的鼓吹者，最后成为英国人手下独立出来的鼓吹者。这使他成为获取并开发新领土的支持者。他认为，作为政治家，这是值得称道的功绩。他在1751年写道：获得新领土（必要时甚至还须迁走“土著人”）的统治者“也许可以适当地称他们为开国之父，就像在婚礼上的祝辞，让他们子子孙孙代代永继”。[2]除获得新土地，增加白人人口，给公众带来好处之外，富兰克林还可以填满他自己的钱袋。早在1748年，他就做土地投机生意，在俄亥俄山谷与新斯科舍公司里有股票，15年后又在伦敦游说，要求向西扩张殖民。

印第安人正因为占有许多肥沃的土地，自然就违反了富兰克林想要今后养活许多代白人的愿望。印第安人因为阻碍了开发新土地，从而阻碍了白人成功、结婚、生子的机会，在富兰克林的书中被认为犯了大罪——“杀死了我们成千上万尚未出生的孩子”。富兰克林不愿见到利益相撞，但也不喜欢看到驯服、随和的印第安人遭受戕害——他们常常被贪婪与急躁的边疆民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然而，他仍禁不住要拿印第安人来作为他的攻击目标以抒发他的种族成见。他的观点反映了在他的同胞中十分盛行的种族偏见，他本人又加强了这种偏见。他深信，在同如此危险的民族打交道时，必须高度警惕、十分坚定。乖戾的、粗暴的印第安人，尤其是那些与法国人共谋反对英裔美国人的印第安人，必须即刻推到一边去，被他们占去的土地应当派更好的用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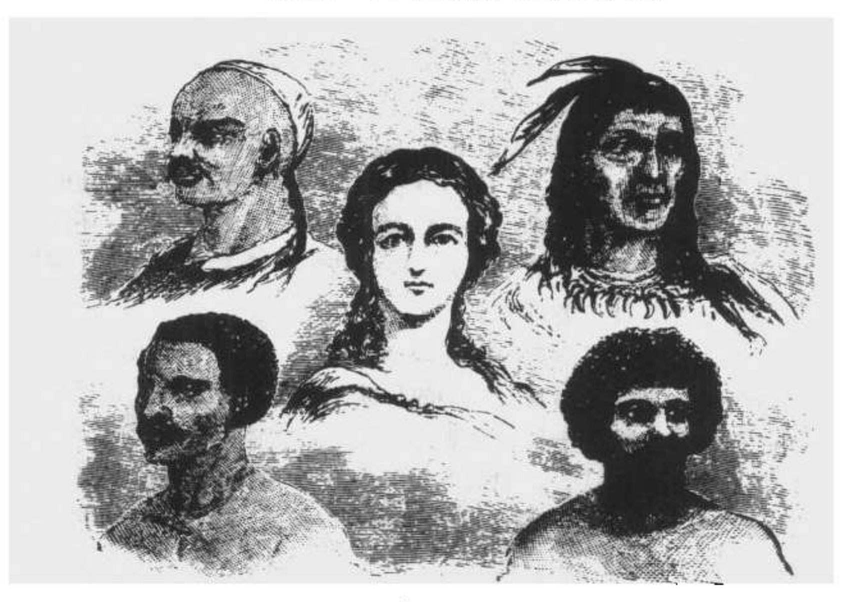
相比起来，黑人与日耳曼人不那么难对付，他们属于内部问题——当然在现有的定居格局上是一个污斑，但还不算是一个外来的根本威胁。他们也许可以被同化，或者让他们掺进些白人血统。富兰克林参与了费城的教育工作，黑人学生的成绩使他不再

相信他们天资鲁钝，因此，在18世纪70年代，他成了一名蓄奴制的反对者。但是由于具有维护白种移民纯洁性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他反对让更多的黑人来到殖民地，“因为他们到处阻碍白人的增长”。同时，他的白人优越感使他看到了这么多黑人在南方定居下来，又觉得不自在。他看待黑人同印第安人一样，认为他们是不安分的民族，很容易受到像法国那样的不友好势力的鼓动而起来造反。日耳曼人的忠诚也不可靠。那些已经来到北美大陆的人如有可能的话，应当在英国学校中接受英国文化的熏陶；还没有来美洲的英格兰人、威尔士人、信奉新教的爱尔兰人，为了保持血统的缘故，就不要再来了。

与富兰克林同时代的人都同他一样，对肤色十分敏感，一直影响到他们的几代后裔。他们的种族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比富兰克林更明显，完全是一种等级观念。他们以身体特征为依据来区分世界上的各种民族，其中最主要的是依据肤色，其次是头型（参见附图），用这些方面的区别来排列各种民族。肤色最亮的属于种族等级阶梯的最高级；肤色最黑的自然降到最低级。中间的，是黄皮肤的蒙古人与马来人，红皮肤的美洲印第安人，以及种族混杂的拉丁人。每一种肤色暗指一种身体的、心智的与道德的水平，而美洲的白人当之无愧地自封为衡量他人的标准。讲英语或接近英语的“优等民族”有责任去运用民主权利，接受新教日益高涨的影响，并因勤奋而得到丰富的物质享受。那些在种族阶梯底部的民族只能是令人遗憾地饮食不周了。

这种有关种族的流行看法在19世纪初期因“科学发现”反倒强化了。人种史学者、地理学家与历史学家在种族本质方面提供了复杂的、常常是对立的结论。种族特点究竟是固定的还是会改变的？种族有多重的、各不相同的根源，还是单一的、共同的根源？种族与文化、文明和国民特性有什么关联？如果说学者的发现是美国人有关种族看法的重要源泉，那么，他们的互相冲突的结论也许在种族概念的可靠性上投下了怀疑的阴影，而实际上，学

者对公众的影响是经验主义的。他们把不同种族有不同的天赋看作是根本的、客观的分类，这对公众有着很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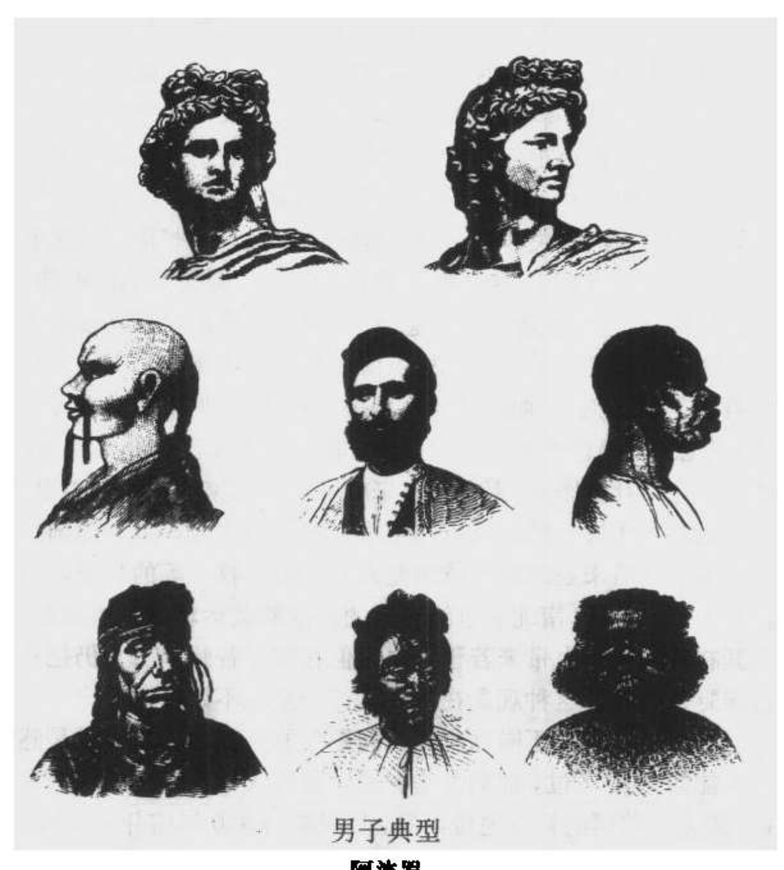
人类种族

蒙古人　　**高加索人**　　**美洲人**

埃塞俄比亚人　　**马来人**

附注：上图引自1877年一册教科书。此图无疑表现了白人的优越性。白人由一位高贵的妇女来代表，神态自若，正面像；其余深肤色的男子均目光斜视。

其中，尤其是黑人被选作铁砧，美国人在此铁砧上锤出了种族等级的理论以及伴随而来的以肤色划分世界的观点。殖民主义者带来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偏见，认为非洲的黑皮肤的人以及深色皮肤的人，都是下贱的、罪恶的。而白人在道德上、审美上，都是他们的对立面，是美德、美丽与纯洁的象征。1620年有一首英国人写的诗，就描绘了这样的对比，形容非洲人是“黑色的丑陋



男子典型

阿波罗

蒙古人	**白　人**	**非洲人**
美洲人	**马来人**	**澳洲人**

附注：此图系 1873 年出版。白人在相应的课文中被形容为“正常的”民族，由两尊古典模型以及一个普通人然而更英俊的头像来代表，也是正面像。其余民族显得粗野、无精打采，目光模糊地射向远方（蒙古人则略带狂躁表情）。④

的鬼怪”，而英国人则“像上帝本人”。[3]

18 世纪初，美国人显然是用种族歧视来对待黑人的。在南方，这种传统还与经济方面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最极端的厌恶黑人的风气。剥削黑人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南方的奴隶法规把黑人的地位贬得很低。后来，19 世纪，人们仍公然振振有词地以黑人天生低劣论来回应废奴主义者的鼓动，来回应南北战争后的重建运动中的有关政策。据民间流传的说法，有些地区把黑奴诬蔑为刚露头的造反者、快要孵出来的强奸犯。对付黑人的办法是：严密监视与控制，威胁给以严惩，包括阉割生殖器以及其他酷刑。

这些种族观点早在南北战争前已在南方各州形成对国外事务的看法。国内对人种混杂（尤其是白种人与非白种人的人种混杂）的恐惧，很自然地要转向国外，非难外国人容忍种族混杂，并产生了许多社会影响。南方人本来就怀疑自己家的黑人是否温顺，在听到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起来杀死他们的主人，或者英国的废奴主义者（后来是欧洲的革命党人）主张人权平等的学说，当然就要大吃一惊了。南北战争结束后的黑奴解放运动在种族关系上，尤其在种族隔离上带来若干变化，但在南方各州，白人仍把黑人当作野兽看待，这种观念在海外流行一点也不比国内差。

虽然白人常常不同意"黑人问题"的某些方面（有时是感情上不能同意），不过，他们几乎普遍同意白人比黑人优越。20 世纪初，黑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问题，其根源同 300 年前并无二致，仍是各种改头换面的"本质低劣说"以及他们的黑皮肤。这种异常顽固的看法甚至出现在学术领域与文学作品之中。以学校教科书为例，年复一年地传下来同一种教训：由白人主宰的种族等级表上，黑人属于最低级。黑人通通被说成是"愚昧无知"。1789 年一本地理书上堂而皇之地写道："他们是一个野蛮民族，外表是人，却无人道之心。"这些教科书上在最宽容的时候也至多说：黑人是奴隶制的受害者，凭自己的力量无法上进，也许靠白人帮助还能受点教育，但常常无可救药地退步。1900 年一则报道可能反映了当时白人态度的主流："尽管用了种种努力去教育他们……许多

（黑人）仍旧极其无知。”[5]

这种由白人与黑人分占两极的种族概念被带进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由于辩论者与政策制订者的思想一致，由于新闻媒体也深受影响，由于成为竞选中的一个重大立场问题，种族观念强烈地影响着国家的对外关系。它不仅涉及富兰克林时期以前的印第安人，而且还包括拉丁美洲人、东亚人与欧洲人。

种族等级观念之所以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是因为它提供了驾驭世界的一种最现成、最有用的方法。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上，惟独这种观念最牢固、最稳定。这种观念最容易被大众所理解，也最容易使人去愉快地运用。用不着花费许多时间（也许还徒劳无功）去弄清楚别种文化的精细模式，精英们仅凭种族等级就能稳操胜券，运用便于理解的熟悉词汇，把别的民族、别的国家贬低下去。不要求别的，只从人的表面性格与感情倾向去理解就可以了。各个种族就是不一样、不相等的！有些种族较文明些，较先进些，有些种族较野蛮些，较落后些。把纯血统的美国人作为最先进的民族，最能满足精英们的自高自大，并同另一个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柱——追求国家强大——十分契合。

依照那些被精选出来制订与执行政策的少数人看来，种族等级观念还有一种好处，即便于同公众的态度和谐一致。美国人无论属于高层或低层，无论在学校里、在家里或在工作场所，处处都受到影响，要他们注意种族的不同。作为文化背景中公认的中心点，种族可用于对外事务而无需害怕这种观念本身将引发出国内的意见分歧。

在美国追求本大陆与海外的强大地位的过程中，自然有一些民族身受其害；美国同这些民族进行接触后，又进一步加深了种族成见。首先是印第安人，这是一个包括数千种不同文化的美洲土著人的总称。300年来，美国人作为殖民者，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或同印第安人打过仗，或同他们结过盟，此时缔结和约，彼时又破坏和

约，直到欧洲来的移民在微不足道的挑战下取得统治地位。

在此过程中，印第安人丧失了大量生命。据当代学者估计，里奥格兰德以北地区的这部分美洲人，系从哥伦比亚过来的印第安人，自夸有1000万之众。从欧洲传过来的传染病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战争以及强迫迁居（带来饥饿并被迫露天住宿），造成进一步的损害。19世纪初到1930年间，生活在美国大陆上的印第安人，从原有的约六十万人减少了近一半。美国白人并不是继承一个没有人烟（传说如此）的大陆。相反，是他们的到来与他们的政策使大陆人烟稀少。

一代代人继承了富兰克林对印第安人的观念，把他们看作是取得廉价土地的障碍。正如南方各州的白人孕育出厌恶黑人的毒菌那样，边疆地区的白人是最粗暴、最强烈地仇恨黑人的源泉。尽管他们一般采用欺骗性的方法或与人道原则相抵触的粗暴方法以及合法协议（包括正式的条约）等办法，联邦政府，说得公平些，还有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或默许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或强制大迁移。佐治亚州（切罗基人认为“州”与“土地攫取”是同义词）总督曾于1830年解释道：“条约都是权宜之计，用不流血的办法诱使那些愚昧无知、难以管教的野蛮人把土地让出来，文明的民族才有权去占领……”[6]托马斯·杰斐逊略显迟钝，但他倾心于侵略性的政策丝毫不亚于他人，这种政策能为他宠爱的自耕农提供一片广袤的新土地。后几代人随着边疆往西推移，一直保留了这些早期美国人的主张——有条约也好，无条约也好，野蛮人必须走开。

然而，自身利益要求不能完全超越正义，因此，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包含着矛盾，这在殖民地时代已显示出来，后又带进了早期的共和国。托马斯·杰斐逊曾对此加以概括：教会人士与美国著名政界人士曾希望用促进印第安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合的办法来解决这一矛盾。实施教育，改信基督教，变狩猎为农耕，可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三大关键步骤。同化自然有很大好处，既可保

护国家的名声，又可保存一个质朴的民族，否则这个民族就会前途黯淡。当然，与此同时，印第安人大片大片的荒地便须派更好的用场了。印第安人将把一部分荒地改为农场自用，其余的卖给白人。

这些高尚的希望常常因失去耐心，或谈判激烈，或出现暴力（这在印第安政策的实际执行中最具代表性），以及白人一天天地全面逼近印第安人而落空。政府只肯拿出很有限的资金去促进同化，往往不能确保条约的施行，甚至不能保护印第安人已少得可怜的财产。那些受同化有长足进步的印第安人，如切罗基人，发现白人对土地的胃口太大，实在贪得无厌。一旦发生土地争执，官方总是偏袒白人。印第安人起而反抗，偶尔与同情他们的欧洲人结成同盟，在边疆展开恶战，其结果总是印第安人失败，白人获胜。于是，战胜者把战败者推向一旁。殖民地时代的新英格兰人与弗吉尼亚人树立了这种模式。他们把印第安人看作是危险的野蛮人，必须把他们隔离起来以便更好地监督，或者通通迁走，不与白人接触。为了让他们老老实实，有必要以武力相威胁，或随时采用强制（即使不算很野蛮）的办法。

安德鲁·杰克逊*是田纳西人，多年经营土地买卖，陶醉在暴烈的边疆民渴求土地、仇恨印第安人的酝酿之中，他把那些做法发展到了“完美”程度，从而成为灭绝克里克人、塞米诺尔人以及其他东南部印第安人的代理人。通过1810年～1820年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或强订条约，他粉碎了印第安势力，强迫开放印第安土地的投机买卖与定居活动，包括佛罗里达与阿拉巴马3/4的土地，田纳西1/3的土地，佐治亚与密西西比1/5的土地，以及肯塔基与北卡罗来纳的某些小块土地。后来，在30年代，当了总统的杰克逊又着手执行搬迁留下来的7万名印第安人的迁移政策——他形容这一政策“不仅宽容大量，而且慷慨大方”。[7]到了50年代，密西西比以东

* 美国第七任总统（1829～1837）。——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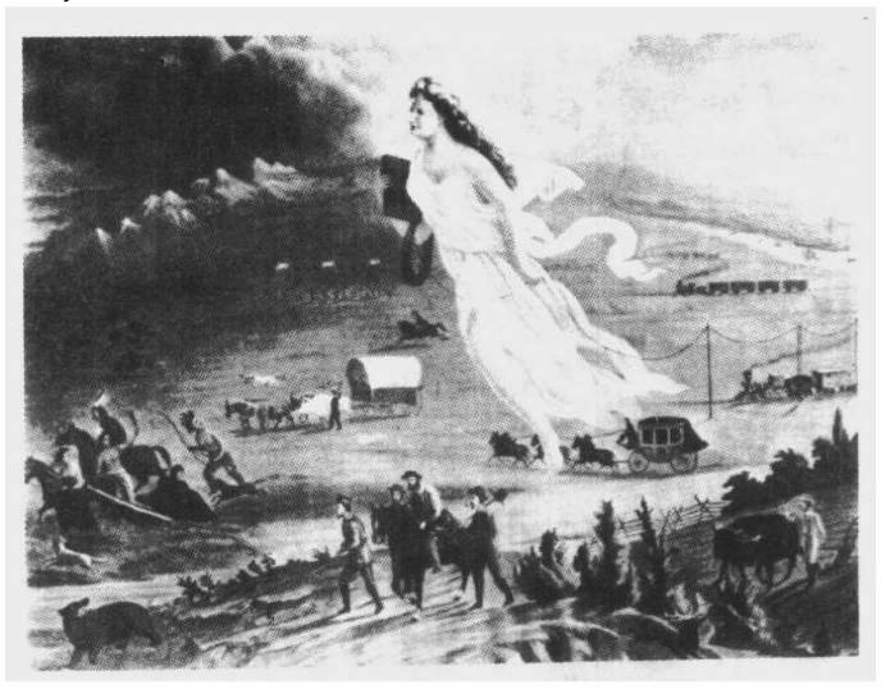
地区的印第安问题总算在白人满意的情况下“解决”了。

这种征服过程在19世纪后半叶的密西西比以西地区被如法炮制。得益于新技术，尤其是武器军火、铁路、电报，下一轮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摧残进行得更加顺利，可以说是摧枯拉朽。长期以来居住在西部的印第安部落，以及从东部驱赶到西部来的大约九万名印第安人，同联邦政府签订条约保证他们的土地“只要水还在流、草还在长”，就永远属于印第安人。但是，这些条约在当时就受到普遍地、系统地违反。再一次，地方性的侵占造成紧张局势，于是，又总是一成不变地，联邦军队征服印第安人。有些部落根本无力抵抗。如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1848年时有10万人，11年间因受野蛮虐待减少到3万人；到1900年只剩下1.5万人。其他一些部落小心谨慎，尽量退避，总算通过协议保全了一小部分已被一再缩小的祖传财物。有些部族，如苏人，进行了抵抗，但即使是很小的短暂的胜利也招来了严厉的惩罚。最后，联邦政府强迫大多数被打败的印第安人集中居住在保留地，这些保留地面积很小，印第安人生活在政府的保护与监督之下。印第安人企图抢救他们自主文化中的最后一些碎片，但监督他们的白人非要根除老的“野蛮的”游牧方式、让他们都过“文明的”基督徒生活不可。

负责确保西部的和平、监督管理印第安人的，是从杰克逊的民兵演变而来的军队。它按照“连坐”的原则来对待印第安人，最乐意看到印第安人中出现叛变与背信行为，期待着印第安人的最终灭绝。最早任西部军队司令官（后来负责在首都华盛顿监督战事）的威廉·T·舍曼将军于1868年写道：“今年我们杀死的多一点，明年我们被杀的人就少一点，我对这些印第安人看得越多，越使我相信这些人都该杀，不然我们就得豢养一大批乞丐。他们要想变文明些简直就是开玩笑。”[8]东北地区的人道主义者们抗议暴行也没有用，这类暴行并不比他们的祖先早年加于印第安人的暴行更坏。



附注： 这些插图反映了对印第安人的两种看法。插图3系引自1848年的一本地理教科书，把印第安人描画为凶残的杀人犯。



美国在前进

附注：此图系1872年约翰·加斯特的一幅画，题名：《美国在前进》，它表现的是，在文明力量面前，印第安人作为牺牲者，同其他野兽一道被赶进荒野。高贵的白种妇女在图中占着中心位置——作为慈爱的下一代人的保护者、不可抗拒的前进力量的主要体现者。⑩

到了19世纪70年代，早些时候产生的大陆扩张政策从涉及到印第安人的角度来说已经功德圆满。1871年，国会不再签订新约；至于旧的条约，最高法院于前一年裁定已无约束力。在联邦政府加强控制保留地之后，甚至印第安人的自治也成了一句空话。1887年的道斯法案完成了部族土地的分配，从而破除了部族的权力。除了星星点点的暴动外，印第安人如今已不再是一个外国人问题，而可以作为一个国内问题不予重视了。然而，印第安人同外交政策的联系并没有中断，而只是变了形。用来判断打败与剥

夺一个民族的行为是否公正的基本原理，将来也可用来作为认可的依据，衡量美国是否有权自以为比他人优越便可以支配他人。

印第安人在实际生活中被野蛮地踩到了地下，却在神话故事中成了受尊敬的人。在整个19世纪的年代里，白人既然已成为有特权的胜利者，便对昔日的对手显示出恢宏大度，把印第安人置于种族等级的上层，以讨好他们。失败后放出浪漫余辉的印第安人出现在等级的顶部，仅次于白人，远远高出最低等的黑人。印第安人总是以令人感伤的悲剧人物形象出现。印第安人也成为一个抽象概念“美国的进步”的牺牲品。他们的牺牲是必要的，正如1813年的一本教科书中所写的：“这是为了人类的增长，为了促进世界的光荣与快乐。”[9]他们是一群野孩子——单纯、勇敢、忍耐、自尊，但缺乏勤劳与自律，而这对于用文明力量来迅速改变一个世界的面貌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种族神话中的这位高贵的野蛮人只能消失踪影，从而证实了一条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两个民族相遇，劣等民族不可避免地要败于优等民族。

拉丁美洲人——美洲大陆讲西班牙语的民族，在种族等级中占着中间位置。之所以在这个位置是因为在美国人的想象中，他们属于“黑暗传说”，并具有该受谴责的西班牙性格。此种传说系由英国殖民者带到新大陆来，此后又被曾同19世纪初期独立的拉丁美洲各国直接打交道的美国商人与外交家加以夸大。对拉美文化的批判进入了学校教科书，在各种漫画中绘形绘色，在政治性的文章中累有提及，甚至掺合到政策制订者的观点中去，以至美国人在20世纪初普遍受到深刻影响，普遍歧视拉丁美洲人。

狭义地说，“黑暗传说”主要是指西班牙征服者用残酷手段对付美洲土著民。受到“屠杀与掠夺”（1794年一本教科书中的字句）的爱好的驱使，这些冒险家用野蛮与欺骗手段征服了印第安人，随后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剥削。[11]

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理解，“黑暗传说”反映了西班牙的不幸传统

所包含的不受新大陆欢迎的东西。1898 年的一则新闻报道为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辩护，它编出一套理论后来十分流行："西班牙曾受到历史的审判与定罪。他们的宗教是偏执的；他们用柴捆与刑具来装饰圣事。他们的政治家臭名昭著；他们的外交政策虚伪之至；他们的战争就是大屠杀；他们至高无上的目的就是摧残与祸害，决心要把大陆弄成不毛之地，把居民通通杀光。"亨利·卡伯特·洛奇是这场战争的著名支持者，他把敌人形容为："中世纪的、凶残的、快要灭亡的"以及"比世上其他国家落后 300 年。"1898 年 3 月，雷德菲尔德·普罗克特从古巴旅行回来，在参议院演讲，直截了当地谴责西班牙是"我所知道的最最不善于治理的国家"。[12]

根据这样的传说，美国人常用这样一些词句来形容拉丁美洲人——奴性、暴戾、懒散、偏执。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只会拙劣地模仿共和国制度。来自弗吉尼亚的国会议员约翰·伦道夫 1816 年去南美看了看，哀叹南美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将在"可恶的专制主义"中完蛋，"你不能指望从西班牙那里得到自由"。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对此深表同感。他在 1821 年说，拉丁美洲人"还没有自由政府，还得不到一点好处。专断的势力，军事与基督教教会的势力，深深地烙印在教育上，在生活习惯上，在所有的制度上"。那个地区的人，昏昏欲睡，一方面是传统使然，一方面是由于赤道气候，自然资源丰富但得不到利用，再加上天主教信条使得他们智识鲁钝。杰斐逊 1813 年就曾预言："受教士控制的民族"是无法"保持一个自由的文官政府的"。[13]

对肤色很敏感的美国人在对拉丁美洲人的看法中还掺合进去另一个因素：对大规模血统混杂的恐惧。这将使人更黑，外表更黑，内心更黑。西班牙白人被奴隶解放运动吓破了胆，便采用使黑奴与印第安土著人混杂血统的办法，让他们生下一批批智力退化的混血后代。一直在保卫着肤色阵线的美国人对这种种族间的性放纵甚感不安。拉丁美洲到处可见这种杂交的可悲后果。所有的拉美国家对种族属性马马虎虎，对于白人血统受污染后的社会

后果也从不关心。这类混血儿中，皮肤越黑的被认为攻击性越突出。例如海地，基本上是非洲黑奴的后裔，不断被人挑拣出来作为典型例子，说明如果把黑皮肤的民族丢在那里放任不管的话，会有什么后果——这些人总是先谋杀他们的主人，然后互相残杀。

对美国人来说，“黑暗传说”意味着一系列应予否定的陈旧模式。男性拉美人通常被说成是这个样子（不同环境下，依据观察者个人的偏见也有所不同）：迷信，固执，懒惰，爱虚荣，狂妄，不诚实，不干净，不实际，再就是堕落。然而，除了认为拉美人无能、低下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概念外，也有一种较积极的形象，把他们看作是可以改造的、甚至可以受到白人喜欢的形象。采用这种说法的时候，拉美人通常被描绘成一位肤色白皙、标致秀丽的小姐，虽然生活在一个混血的社会中却能避开种种退化的后果。这种十分有利于女性拉美人的描绘，出自早年掌握第一手材料的美国观察家之手，当然都是些男性观察家在作单身旅行。这样的形象印在国内人们的脑海里，一旦需要号召国人拯救拉美人民或支持他们反抗外来威胁时，便可拿出来使用。一个强壮勇敢的山姆大叔跑过来，把拉美女士一把抱起，救她逃出混血的丈夫或某个外来的罪恶的入侵者的魔掌，把她带到她该去的文明社会。

美国人可以这样根据环境的需要来选择哪一种拉美人形象。大陆扩张时期，男性拉美人的否定形象让位给较好的形象，方能最适合现实。例如，随着美国人对墨西哥土地的兴趣的迅速增长，对墨西哥人的贬低也就迅速加深。美国人来到墨西哥的第一次高潮是在 19 世纪 20 年代，当时报道说，美国人发现了一种黑肤色的、怯懦的、残酷的民族，他们热衷于赌博，道德沦丧。一个 20 年代初去过墨西哥城的旅行者说，大多数当地人“不要别的，只想长一条尾巴，比类人猿更像畜生”。早年在得克萨斯定居下来的盎格鲁人很快接受了这样的苛刻评价。民间传说中的“黑鬼”（“niggers”）、“红鬼”（“redskins”）有许多来自南部边疆，其实指的就是墨西哥人，因为墨西哥人妨碍了美国人朝前推进。在争

夺得克萨斯与西南领土时，南方人与其他美国人都利用了墨西哥人品质低劣这个题目，来证明美国人的领土要求是正当的。来自密西西比很有影响的参议员罗伯特·J·沃克于1836年坚称，这样一个"肤色混杂的民族"是不能掌握得克萨斯的。十年后，在有关得克萨斯并入美国的辩论中，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参议员詹姆斯·布坎南（后来很快成为波尔克总统的国务卿）号召把"这个低能的、懒惰的民族"推向一旁。[14]

一旦发生战争，詹姆斯·K·波尔克总统及其扩张主义的支持者们，就任意使用"愚昧，偏见，全然无信"等字眼形容敌人，以便证明自己的正确。一份纽约报纸以同样的精神宣称："墨西哥人就是当地的印第安人，他们理当接受本民族的命运。"这种否定性的论断流传如此广泛，以致那些即使反对征服的人也相信墨西哥人是"半开化"人，难以（即使不说不可能的话）进步或受同化。辉格党人批评波尔克的政策时，也把墨西哥人嘲笑为一种"杂交的"民族，"一种可悲的混含物"，"懒散，惰性，愚昧"，或简单地称之为"可悲"。

美国人喜欢同其他民族相比，自以为悲天悯人，喜欢把拉美人描绘为一位白种女人在焦急地期盼着拯救或勾引。墨西哥战争期间，支持合并的人们就沉湎于此类幻想之中。一位爱国诗人想象"眼内充满激情的西班牙少女"同美国佬结合到一起，"他们的血液更加纯洁；英勇的双臂更适于拥抱她含苞待放的艳丽"。早在杰斐逊时代已经引起美国人领土欲望的古巴，甚至更加令人注目地唤起这种把拉美人女子化的倾向。例如，19世纪50年代，人们经常听到获得这一岛屿的号召，一位热心人写了一首狂诗，把古巴写成是山姆大叔热恋的"安的列斯群岛的女王……呼吸着香喷喷的、热带的空气，张开她那玫瑰色的甜蜜似糖的双唇"。19世纪晚期，西班牙为压制古巴的独立运动犯下许多暴行，又重新复活了古巴的女子形象，但不是受蹂躏或绝望地等待西班牙主人来拯救的形象，而是怒气冲冲地准备格斗的形象，其中可以看出一些

“黑暗传说”的影响。[16]

世纪之交，美国人追求在本半球的优势，又推出了第三种形象：拉丁美洲成了黑种小孩。美国人已侵入古巴，赶走了西班牙人，把波多黎各占为己有，并鼓励巴拿马人脱离哥伦比亚的分裂活动，以便取得控制运河的权力。这些“仁慈行动”激起的意想不到的仇恨与怨怼使美国人大为困惑与愤怒。同时，美国人很快发现他们自己如继续把拉美人描述为伴侣的话，心理上难免疙疙瘩瘩。山姆大叔同一个女性的拉丁美洲相依相偎的图画给人以强烈的性的联想，并暗示有令人不安的种族混杂的可能性。美国人对这一前景感到不舒服，然而也不愿放弃支配的要求，于是找出一条出路，把拉丁美洲安排成一个黑种孩子。这一新的形象仍旧是一个混血儿的形象，是从前两个模型的主要特性引伸出来的，一方面是种族上退化的男性，一方面是依赖他人的女性。

可以再次拿古巴来作例子。古巴人最初被描绘为西班牙暴政与殖民压迫下不幸的牺牲品。有关西班牙司令官（“屠夫”韦勒）实行“集中政策”引起的古巴妇女暴动的漫画，以及“缅因”号沉没*的漫画，描绘了西班牙人残忍与背信弃义的性格。但是，对西班牙的批评并未改变古巴人民不受尊重的局面。古巴人仍被赋予低人一等的地位，这从战争开始前盎格鲁人政策制订者的反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克利夫兰与麦金莱两届政府都表示情愿让西班牙去统治一个混乱的古巴政府。战争开始后，麦金莱仍不承认古巴是交战的一方，并随后将古巴置于一个美国军政府的控制之下。接触增多后，美国人印象越来越深，认为许多古巴人是黑皮肤的，甚至就是黑人；认为古巴军队是毫不足道的乌合之众（“其中极大多数是黑人，只有部分开化”），军队领导人完

---

* 1898年2月15日，美国战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爆炸后沉没，死260人。当时古巴发生革命骚动，美国派战舰“缅因”号“保护侨民及其财产”。战舰被炸事件遂成为同年4月爆发的美西战争的触发点。——译者

全不称职，幸亏有美国的支援。古巴人也许希望独立，但如果让他们自己去干，肯定管理不好。[17]

这些“发现”很快把漫画上的古巴人变为一个使性子的孩子，他的黑色外貌与拖长腔像吟诗那样的语调决定了他在种族等级上的位置。这种把古巴当作婴儿看待的图像，便于美国人不理会一个明显不成熟的动荡不安的民族抵抗外来入侵与控制的抗议声，并提供了“理由”证明把古巴置于美国“保护”下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样，古巴作为情妇的形象让位给南方黑人的形象，1900 年一本教科书中迅速地采用了这一形象——“非常贫穷，愚昧无知”，但是“能在恰当的指导下获得进步”。[18]

这样，美国人带着三种拉丁美洲人形象进入 20 世纪，各有各的用处。其一，拉美人是半开化的野蛮人，由此可以证明对他们予以蔑视、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是正当的。其二，作为女性化的拉美人，允许美国人扮演热情的求婚者或侠义的拯救者的角色。其三，婴儿化的并且常常是黑人婴儿的形象，使得山姆大叔的耐心呵护与严格管教十分必要。无论哪种情况，美国人总是优胜者，拉美人总是低劣者。

这些形象有利于把西班牙逐出北美，把美墨边界朝南推，还支持了一种已趋向成熟的要求，即美国应在南北美洲各国中起到天然领袖与警察的作用。这一要求已经包含在门罗主义里边，是从 1823 年开始实施的，当时只是针对欧洲列强在西半球的扩张发出一个大胆的、带有强制性的声明。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它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甚至连英国也不能加以轻视。把欧洲挡开之后，美国的政策制订者带着继承过来的对拉丁美洲的优越感，带着有利于扩大这种优越感的日益增长的力量，朝着在本半球当家作主的目标稳步前进。古巴人、波多黎各人与哥伦比亚人都已认识到，实际上她们都是由具有黑暗传说的民族在统治着的。其他的拉美国家，也都打上同样的烙印，不久便都接受了同样严格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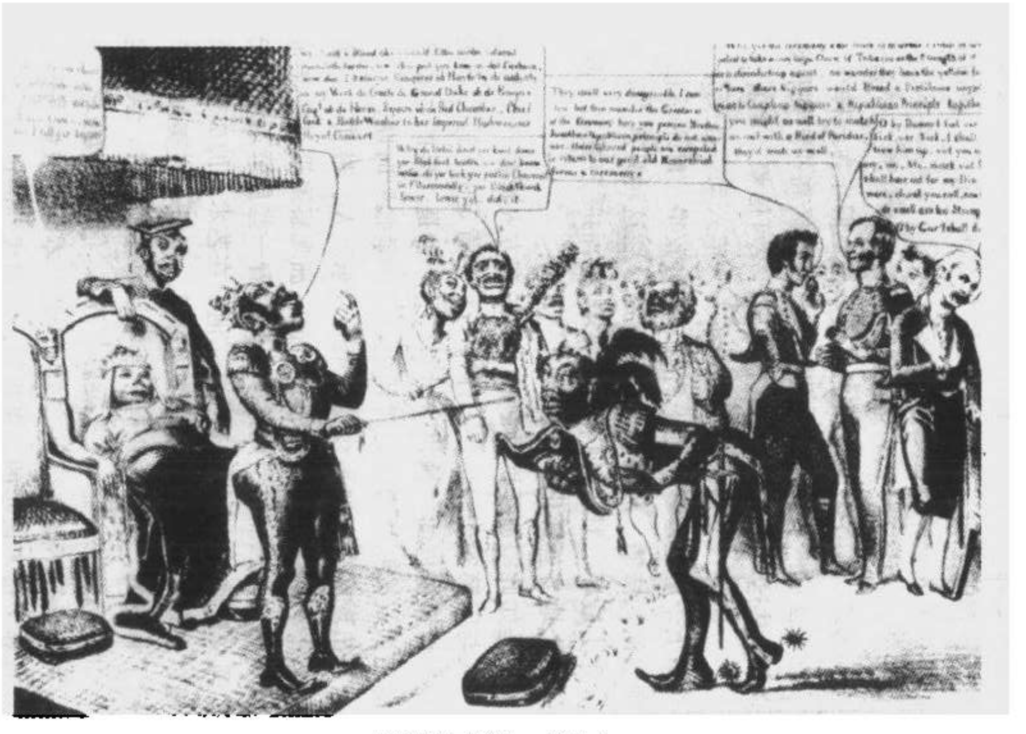
19世纪下半叶，美国人有时把东亚各民族称作“蒙古人种”，但更多的时候称之为“东方人”。在那个时期，东方人同拉美人一样，处于种族阶梯的中间。然而，他们的位置难以定位，因为他们的形象也同拉美人一样不稳定。

从广义来说，东方人被认为是深奥莫测、昏昏欲睡。一名观察者提出这种形象，似乎有意要抬高他们，把他们作为一种有指望的民族，正要摆脱一种停滞的文化传统，从而提高他们在种族等级上的位置。从这一角度看来，东方人显得较可信赖、干净，较勤劳些。另一方面，这一形象也可以让东方人陷入动荡甚至危险的境地，性格上矛盾重重——近乎禽兽又十分狡猾，麻木不仁却又内心怒潮汹涌，怯懦、颓废却又能征善战。在这种外观下，东方人身上包含了最坏的罪恶，他们对于要求自由的呼声置之不理，并且进入到哪个地方就毒化那个地方。

美国人正是如此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东方人形象（正如他们塑造拉美人与印第安人的形象一样）：一种是肯定的，适合于美国心怀慈爱去慷慨施恩的“愉快”时期；另一种是否定的，适合于美国恶语相加或扩张权力成为时代主调的“紧张”时期。

中国人是出现在美国地平线上的第一种东亚人。最初，美国人是通过第二手材料认识中国人的：一批欧洲观察家透过中华帝国所看到的中国人，虽然这些观察家不免带着一些启蒙运动的先入之见。中国文化悠久，人民文化深厚，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及其对人民施以仁政的专制政府，都值得称道。但是，在美国精英们眼中，除了肯定的一面外，还有一连串批评性的看法，认为他们不接受自由贸易，对外国人怀有疑虑与敌意，信奉异教仪式，还有溺婴、一夫多妻等不道德行为。1784年的一本地理教科书形容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诚实的、卑劣的、偷窃成性的民族”。[20]

19世纪早期，一个距离遥远的、文雅的、异乎寻常的中国形象让位于一个令人厌恶的、反动的、信仰多神教的中国，这种形



海地图王赐封一位大公

附注：这一组漫画丑化了拉美人——落后黑暗、虐待孩子、野蛮残忍、正在哀求的妇女。插图5像19世纪50年代出版的匿名海地政治漫画，图中一名倨傲的美国居民说了一堆蔑视“黑鬼”及共和国原则的话。



附注：这是 1891 年的一幅漫画，智利被描绘成一个年轻的惹祸者，得罪了离船上岸的美国水手，山姆大叔打算给以惩罚。

象是去过中国的美国人，尤其是成果累累却又固执己见的传教士们回国后传播开来的。这个国家是一个“道德的荒原”，人民愚昧无知，腐化堕落，并且肮脏异常——先驱的福音派传教士们如此报道。[21]不久，19 世纪 50 年代及其后，大批中国移民来到亟需劳动力的美国西部，使天秤倾斜到对中国人不利的一边。同在其他外国人身上发生过的事情一样，接触外来移民越多，关系越密切，美国人对他们的评价越多否定。到了 1880 年，在美国的中国人已超过 10 万人，美国西部的中国人聚居区关系紧张，排外活动时有发生。美国人要求把中国人全部赶出去，结果发生了暴力活动，各级政府则为了达此目的不断施加政治压力。

排外主义的宣传使许多美国人轻视、漠视中国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形象——从“一个半文明的帝国”里“爬”出来登上美



西班牙野人使人肢体残缺

附注：此图作于1898年，在"缅因"号于哈瓦那港内沉没不久。画中显示出早年有关"黑暗传说"的概念，强调西班牙人的非人道。

国海岸的天生低劣、无法容忍的异国东西。依据这个形象，中国人具有多重威胁。他们来到美国做奴性十足的"苦力"，将夺走白种工人的生计，使白人受辱。他们在瘟疫流行的贫民区"挤住在一起……简直像老鼠"，"中国城"危害白人社区的健康与财富。在这些看起来温和安静的东方人的背后，潜伏着性恶魔。"中国佬"



古巴情节剧

附注：此图約作于1898年，山姆大叔站在中央，把一名正在苦苦哀求的古巴妇女同一身黑衣的西班牙恶徒分开。

不仅驱使他们自己的妇女从事卖淫，而且还引诱意志不坚的白人妇女卖淫。最吓人的指责是这些中国移民是巨大黄潮的第一浪，这股黄祸将横扫整个美洲大陆。[22]

排外运动在西部取得了胜利，对中国人的谴责十分猛烈，因



古巴小姐收到一份请帖

图中的哥伦比亚小姐(对她的好邻居)说:你想不想加入我的星群,成为我的第46颗星?

附注:西班牙人战败后,古巴被美国国内的合并派视为"好邻居"(图9),而其他民族则被视为浪子、堕落者,他们的肤色、衣着以及举止同纯洁无瑕、行为端庄的年轻波多黎各恰成鲜明对照(图10)。⑬



附注：山姆大叔对波多黎各说："你想让那个坏孩子来做你的兄弟吗？"

此在许多地方被人们接受，其中包括白宫。1888 年，在位的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宣布中国人"对我们的和平生活与财富有危害"；他的共和党对手本杰明·哈里森也用同样的词句攻击中国人，说他们是"异己"的种族，接受白人的同化"既不可能也不受欢迎"。[23]在 1880 年到 1904 年间所制订的一系列法规与国会

议案中，排斥中国人的有关法令成为美国执行最严格的法令。这场运动产生了中国移民被完全否定的形象，在排外目的已经达到之后还久久地留在美国人的印象之中。

排外主义者即使在他们的全盛时期也不曾垄断对中国人的看法。因为，在中国居住的美国人越来越多，他们在19世纪中具有很大影响，这些人也曾不断强调中国人的消极品质——孱弱、落后、脆弱。这些评价显然又增强了美国本土排外主义者的声音。然而，这些美国人也越来越多地谈到中国有可能接受美国外交政策的庇护，接受美国财政、贸易与传教活动的影响。热心于改弦易辙的人们组织了一次辩论，认为中国有着进步的巨大潜力，对美国同胞有强大的吸引力，至少可以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竞技场的看台，让全世界看到美国的强大影响，在某种条件下，还可以看到那股向西去的文明潮流。亚洲应当前进；中国将是枢纽；美国可以提供最初的推动。这样，美国人既被告知，中国人是懒散动物，即使付出很大代价也要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同时，美国人又被告知，中国是一个有指望的地方，美国人具有特殊的责任去进行指导，保护中国人免遭危险，必要时对行为不端的人进行惩罚。

很自然，在这些不同观点影响下，美国的政策有一个时期也是奇怪地呈现分裂状态，即：针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门户开放政策同排华运动不协调地结合在一起。到了20世纪第二个十年，对华政策中这两种冲突的路线终于结束，反华的排外主义被作为一个政治问题予以消除，为提倡特殊的门户开放政策的人们扫清了道路。他们让美国人民把中国看作是站在自己一边的，让中国人分享他们的胜利，分担他们的失败。20世纪初，经过几近一百年之后，美国人开始用一种较为肯定的眼光去看待中国。

日本人是另一种主要的东方人，值得长期注意。同中国人一样，日本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是时而升高，时而下跌。日本于19世纪初开创局面时，对美国人来说还是很神秘的事情，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根本不涉及日本，比中国还彻底。那个世纪初发

生的日本对美国一艘沉船的船员处置不当的事件，使人感到日本是一群对人道主义与国际法律无动于衷的野蛮人。看来是佩里远征改变了一切。1854 年，佩里成功地打开了日本同外国更广泛的接触。尽管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适时的偶然事件，美国人却欢呼这是促使日本开始全面革新的必不可少的推动力。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明治维新大体完成，日本在美国人的观念中成为一个正在参与文明进步的国家。日本的成功，包括深刻的国内改革以及 1894 年打败中国，十年后打败俄国，在美国激起了称赞与钦佩，但也引起了潜在的担心。这个上升的亚洲强国将会走多远？对于美国实现她在太平洋的野心会有多大影响？

也同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情况一样，20 世纪日本移民到达美国，使美国舆论的钟摆又摆到另一边去了。日本人的情况与中国人的情况不仅近似，而且密切关联。反日的排外活动也在排华的地区展开，也都是由当地的劳工与加利福尼亚的民主党联合发起的，用的是同样方法——从星星点点的地方暴力活动直到国会游说活动；也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容忍，并在 20 年后达到了高峰，把日本人从种族话题中彻底排除出去了。

从前拿来反对一种东方人——中国人——的理由，可以轻易地用来反对另一种东方人——日本人。必须防止来自亚洲的竞争妨碍劳动自由，必须捍卫白种人的伦理道德来抵制一个正在腐化下去的种族。新一代的排外主义者受到警告要注意“加利福尼亚纯洁少女”在学校里同“成熟的日本人”并肩而坐的危险，据说日本人“心怀卑鄙，思想淫荡，他们人口既众，生活方式也有恶劣倾向”。不同种族间的通婚现象意味着“败坏文明的源泉”。人们被提醒注意太平洋上来自奸诈民族的攻击，尤其要警惕那个刚刚打败了一个欧洲大国——俄罗斯，又厚颜无耻地把英国称作盟国的那个民族。[25]

到了世纪之交，中国与日本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但是，他们或是这个升那个降，或是那个升这个降，从



给中国问题的头一拳

附注：这些漫画反映了美国人对"东方人"的不同想法。图11(1877年画)中的中国移民怪模怪样，且不管作者本意是否支持排外。图12(托马斯·纳斯特作于1869年)则批评了排外分子的过火行为。

来不是同时升同时降。似乎有一个补偿原则在起作用。当（19世纪晚期）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似乎古老得不可救药，作为一个民族也令人厌恶时，日本被美国人认为是亚洲文明中最有希望的民族。相反，当日本不受美国尊敬（20世纪初）时，中国便受到美国的称赞。于是，出现了同一种族不同分支之间彼此朝相反方向在种族阶梯上下变动的新鲜奇观。似乎美国人有意把这两个东方民族



太平洋轻骑兵

并列起来，想方设法地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某些东方恶棍被当做了美国人种族恐惧的避雷针，而另外一些较有价值的东方人即被召来保持住一个繁荣、稳定、民主的东亚的自由美梦。

盎格鲁—撒克逊主义——认为美国人与英国人是一个由不同品质与相同利益联合起来的同一民族——在美国种族观念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19 世纪上半叶，美国人已开始骄傲地宣扬自己在泛大西洋讲英语民族中的地位。南北战争兄弟相残的回忆正在淡化，国家意识正在逐渐加强，因此有利于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抬头。学校教科书开始赞美泛大西洋联结纽带。有一首赞美“亚美利加与不列颠”的诗歌在 19 世纪 30 年代与 40 年代被一再传诵，其中唱道：“血统比言词更响亮、更入耳——我们是一家人。”与此同时，在一些公开讲话中，自豪的美国人自认为自己的种族



附注:1900年的两幅漫画(图13与图14)显示出山姆大叔有两副基本的面孔:一是守在大门口保护一个正在蛰居的、满怀感激之情的年轻亚洲;一是同麦金莱总统一道气势汹汹地征伐反文明的暴行(这次是中国自己的排外主义者——义和团)。



这是帝国主义吗?

血统最标准、最高贵，处于最光荣的地位。“全世界的居民当中，……最优秀的种族是萨克逊，在这个不列颠家族中，最高贵的血统被挑选来组成我们的国家。”[26]

到了19世纪末，盎格鲁一撒克逊的魅力更加强了。传播得很广、使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种族观念，本来就是伪科学，如今又加上了似是而非的古老的盎格鲁人休戚与共保持优越性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理论。英国人与美国人的种族特性被认为是：特别勤奋、聪明、道德观念强、管理能力强。这两个民族共同领导着世界的事



在你的萨缪尔大叔身上跳吧

附注：此图是为回应中国1905年抗议美国排华、抵制同美贸易而作。图中的东方人被画成两个使性子的、讨厌的孩子，留着小辫子，穿着宽松衣服。另一个成年的“支那人”也被画家丑化。孩子本是救济的对象，但他们的面部都被画成因痛苦与愤怒而扭曲了。

务。英国人已取得很大成功：大英帝国拥有地球表面的1/5以及人口的1/4；他们的海军主宰着海洋。美国人分享着这些成就带来的荣耀，同时他们还明白，他们——大英帝国的后裔——将走出自己的路子，在财富与威力方面都要超过他们的父辈。美国注定要成为“一个命运更高贵、成就更伟大的英国”——一位民族主

义思想十分强烈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者艾伯特·J·贝弗里奇正是如此宣称的。[27]

大批忐忑不安的外国移民来到美国，使种族不同的敏感性在国内（甚至包括欧洲白人圈）尖锐起来。南北战争前的排外主义表现为英裔美国人防止新来的外国人（当时主要是爱尔兰人与德国人）破坏英国文化的统治地位。那一时期的表现还不十分突出，到了世纪末，更多的外国人尤其是大量南欧与东欧人的到来，排外主义的反应就突出起来了。文化上占统治地位的英裔美国人精英画出一个种族比较表（白种人也分了等级），从此产生一个清晰的、固定的找岔次序。

精英们还把白人中也分不同等级的偏见带进了对世界事务的纤细观察。盎格鲁—撒克逊显然主宰着国际舞台。德国人其次，他们是"表兄弟"，有着同样的品质，只除了一点——德国人已失去了对自由的热爱。这个仅有的严重缺陷，使德国人只好跟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面相形见绌，并使这个令人生畏的民族成为世界上有威胁性的竞争者，必须紧紧地看住。到了世纪之交，德国人将逐渐成为近代匈奴人，富于侵略，甚至行为野蛮，反映出一个黩武主义的独裁体系的特点。斯拉夫人，属于半欧洲、半亚洲人，也是国际舞台上令人生畏的竞争者。斯拉夫人组织精密，具有粗鲁朴实的农民气质，表现出巨大的毅力、耐性、强劲（不说聪明与发明技巧的话），他们缓慢地但却是不可阻挡地在欧亚大陆上扩展其控制力。

种族等级往下数，是欧洲的拉丁民族，包括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他们缺少活力，有些神经质，不守纪律，迷信，因此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只能充当小角色。再往下，不足道的几个等级中，有犹太人，常常遭到公然的反犹主义的侮辱。可以预知的是，再往下是非洲的各民族。19 世纪的民间文学中，"黑大陆"被想象为"野蛮的野兽与野兽般的野蛮人"的家。[28]非洲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迫切需要白人去统治。

非常时髦的达尔文主义使美国人更加倾向于从比较和竞争的角度把自己视为一个种族，是一个同盎格鲁—撒克逊利害相关的集团。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被曲解（从乐观主义的角度来曲解），被用来加强了先期存在的盎格鲁—撒克逊优越感。根据工业发达、军力雄厚、国际影响与控制力等标准，盎格鲁—撒克逊人无可匹敌地应处于种族阶梯的最高层。他们处于如此卓越的地位，为此将指出一条通向前所未有的世界和平和繁荣的道路。一些小民族，或出于敬畏或怀有感激，将追随盎格鲁—撒克逊的领导，否则就将坠落于阶梯的最低层，悲叹自己的命运不济，等待着最后的灭绝。

但是，达尔文主义也使某些当代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察家得出某些暗淡的结论。在种族间的国际竞争中，胜利也不一定都属于有教养的、爱好和平的民族，有时倒是归于不道德的、狡诈的、污秽的、贪权的民族。因此，英国人与美国人应当团结一致，通力合作，以便把也许能够“各个击破”的野蛮势力牢牢控制住。

这种基于深信美国人与英国人共享优越地位而来的世界观，清楚地反映在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与战略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观点之中。19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马汉不遗余力地鼓吹英国同美国合作，“既出于政治传统，又出于同一血统，只有我们才是亲戚，别的都是外人”。在他看来，“世界最好的希望”在于这同一种族两个分支的联合，并将他们的控制扩展到许许多多的民族头上，这些民族还在“种族发展的婴儿时期”，因此不适于自我治理。关于欧洲人，马汉认为德国人进步最明显，尽管 1897 年德国处理国际事务不当使人产生疑问。他确信斯拉夫人残酷、野蛮，其中俄罗斯人既有本民族的“残忍无情的能量”，又像“亚洲人那样不讲道德地耍手腕”，特别令他头疼。他感觉法国人喜怒无常、虚伪做作，拉丁人迟疑畏缩（迷人的女人除外）。他认为中国人一方面很可怜，一方面又有要蛮的危险，因此，对他们一方面应由传教士去关心，另一方面应把他们严格地排除在文明前哨基地（如夏威夷、美国西海岸）之外。他把菲律宾人归入孩子一类，

经过反复思考才同意他们并入美国。在所有的东方人当中，只有已西方化的日本赢得他的青睐：日本人正在“重复我们条顿祖先的经历”。黑人处于马汉的种族等级的最低层。从他小时候起，他们就是“黑鬼”，甚至到了废奴运动兴起后，他还坚信黑人是所有种族中最原始的种族。[29]

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及有关其他种族（尤其是有色人种）低劣的理论，在19世纪90年代越演越烈。国内南方各州力图建立等级体系把黑人置于永久低劣地位的活动加强了；国会通过若干新的法律抵制中国移民，并开始辩论对欧洲移民的类似法律；政府扑灭了印第安人抵抗活动最后的一点余烬。在国外，已如前述，处理同古巴、同中国的关系都受到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的影响。在夏威夷与菲律宾，干涉政策让位于直截了当的吞并，种族问题以更明显的形式出现。的确，从种族来考虑问题已是十分突出、十分广泛的倾向，以至美国在辩论军备问题时，双方都是种族观点。19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国会辩论时，种族问题既是采取谨慎有节制的政策的理由，也是证明大胆地进攻性政策必要性的理由。

以夏威夷为例，它的未来地位问题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国会断断续续地辩论过多次，从种族角度考虑已证明同从经济、战略、宪法等角度考虑同等重要。一方争辩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活力与优越性通过新英格兰的商人、船长、传教士在夏威夷群岛获得立足点已经得到证明，并从他们的子孙（尽管还很少）获得该处的经济与政治权力得到证明；种族低劣的当地土著人已经像印第安人一样让路了。而主张合并的一方则说，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应当是由美国来接受岛内白人希望联合的请求与土著人盼望得到文明的要求。批评的一方不愿见到同大量非白人共处的前景，要求警惕混血的危险——它将在群岛上产生一个孱弱的混血种族，为此强调土著民低劣品质的遗传因素，应防止他们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土著民仅仅应当留下来作为统治对象，不受同化，永远作为海外领土上的一个纪念物。在1893年因兼并夏威夷引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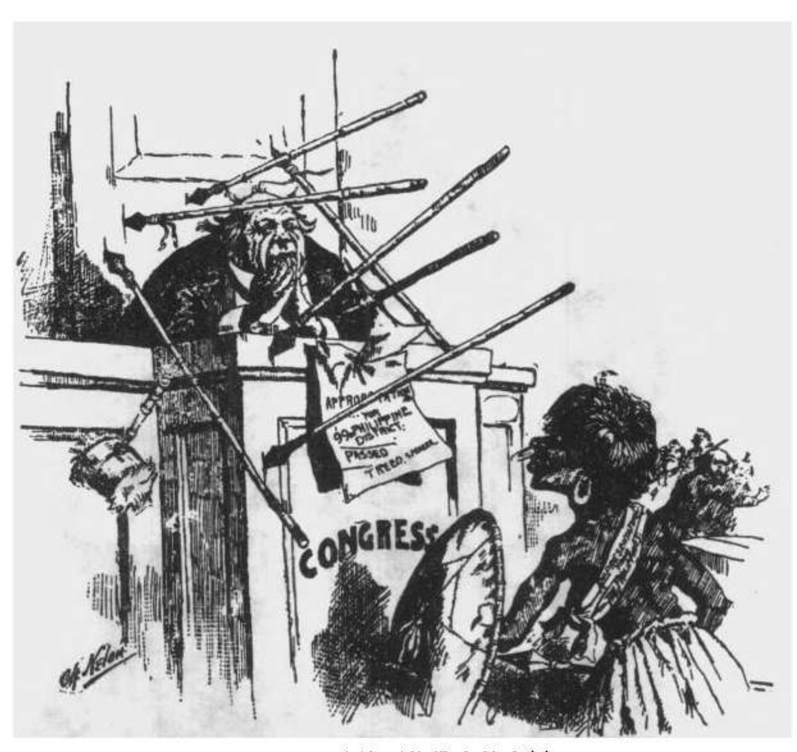
第一次大争论中，批评一方获胜，但在 1898 年夏天因同西班牙开战，种族帝国主义白热化，批评派终被轻易击败。

菲律宾问题是同年晚些时候提出来的，也有两种不同观点。辩论再次提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人地位及其治理与改善的能力。贝弗里奇在访问菲律宾归来后向参议院保证说，菲律宾人是"一个颓废的民族"，是一些"从西班牙最坏的种植园里教养出来的"孩子。麦金莱在辩论时说，美国具有明确的责任去把菲律宾人"从未开化的懒惰习性中"拯救出来，并"把他们置于世界上最文明的通道之中"。那意味着长达 100 年的管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头一次在他所说的"我们的棕色小兄弟"面前露面时，正是这么说的。合并的支持者们反复重申各种早已听熟了的种族议论。他们说菲律宾人居住在使人衰弱无力的热带气候之中，即使是白人也无法忍受下去不损害健康。再者，菲律宾人无法洗刷掉西班牙恶劣统治 300 年的印记。夏威夷至少还从半个世纪的美国影响中受过益。最后，菲律宾人还具有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传统，使其他民族不易与之相处。菲律宾人同黑人一样愚昧无知，奴性十足；同拉美人一样不懂实际、不会做事；像印第安人那样野蛮；像东方人那样缺乏热情。[30]

如果仅仅在种族议论的基础上解决合并问题，那么反对派将使麦金莱政府处于窘境。然而，美国军队奉麦金莱之命在群岛上大获全胜后，辩论的局势立即改观。合并论者可以更直截了当地谈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种族骄傲了。把菲律宾群岛交还给西班牙是懦弱的表现，是不人道的行为。听凭菲律宾人自理是不负责任的、不光荣的。既然种族优越便须承担义务，如果放弃义务就将使人怀疑种族本身是否优越。尽管早期历史上，美国对某些非白人种族履行过自命的义务并不都是光彩的记录，但如今记忆可以任意缩短，任意剪裁。于是，主张合并的一派再一次大行其道。

---

* 美国第 27 任总统（1909—1913）。——译者



帝国主义政策可能带来的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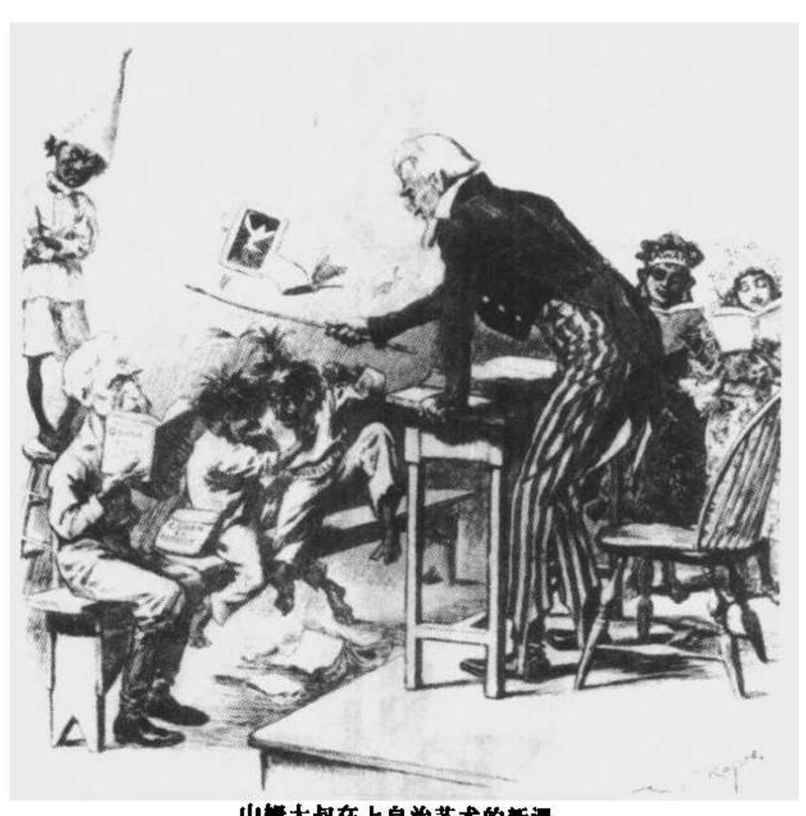
附注：菲律宾人与其他新独立的民族在当代漫画中被画成各种形象：地狱里钻出来的土著民，山姆大叔严格管教下的小学生，或在山姆大叔无微不至的关怀下的儿童。头两幅漫画把菲律宾人描绘成野蛮人。图16反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图中的国会议长受到菲律宾人的围攻；图17嘲讽反对帝国主义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领着他的两个同伙。

本杰明·富兰克林所信奉并传至他好几代同胞的种族观念并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从种族角度考虑问题也不是美国的专利。美国人对种族的经验，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奴隶制的经验，应当追溯到1000年前全世界各种文化杂色斑驳的信仰模式。然而，概括说出美国的演变或同其他民族的对比亦非易事。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美国人并非独出心裁。种族优越感似乎普遍存在，美国人利



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

用种族筑起围墙以抵御陌生民族的威胁，并使疆界合法化，使人群间相互接触的关系合法化。这同剥削的推动力也不无关系。美国人使用种族特性的手段来证明他们统治“劣等民族”（无论是黑奴、印第安人或是菲律宾人）的合法性。最后，美国人背弃了他们共同的人道主义观点，以收集到的种族主义理论为舞台，上演色情的以及其他想入非非的剧目，这种剧目通常受到严格的限制。



山姆大叔在上自治艺术的新课

附注:图 18 显示课堂场景。菲律宾抵抗运动的领袖埃米利奥·阿奎纳多站在教室角落里,两名前古巴游击队员在吵架。

美国人从他们欧洲近亲的先辈们那里继承了深厚的种族观念。15 世纪,西方人同“第三世界”各民族相接触便已开始萌发种族主义观念。远在英国人踏上北美大陆之前,英国人已饱经伊莉莎白时代对黑人看法的熏陶,很容易把这类看法转移到其他非



埃米利奥·阿奎纳多

附注：图 18 的漫画把阿奎纳多描绘成一个头发蓬松、绷着面孔、懒洋洋的人；对比图 19 阿奎纳多的肖像，真实的阿奎纳多镇静自若，笔直挺立，衣着入时。夏威夷与波多黎各未起来反抗，古巴将军马克西莫·戈梅斯还同美国官方合作，他们在图 18 中都被描绘成较成熟些并较白皙些，尽管他们也得驯顺地接受教育。



照管越来越大的家庭

附注：第三种形象是需要依赖旁人的黑人小孩，图20～22表现了麦金莱总统、古巴军事长官利奥纳德·伍德以及山姆大叔，或在那里不知所措，或在诚恳地服务，或慈爱地在照顾孩子们。

白人民族身上。当英裔美国人在新大陆接触到其他流放到国外的欧洲人与土著美洲人甚至亚洲人时，这些继承来的观念就变得激烈起来。对于雄心勃勃然而最初受孤立的英国殖民者来说，一幅画有浅肤色民族的世界各民族的图画，其固有的价值在于显而易见地引人注目。即使没有现成的伊莉莎白时代的种族理论，这些殖民者也会制造出这种理论。他们利用种族等级去追求他们想获得的土地，一旦稳稳占有，便可证明传播英国的文化价值与制度，以及驱逐小民族或从政治与经济方面压服小民族，具有完全正当的理由。为要达到白人（最主要的是英裔美国人）的霸主地位，无可避免地要使小民族受到欺骗、受到广泛剥削与非人道的对待，这些做法必然引起白人内心的痛苦，而种族理论正是一副有良效的



要是伍德将军不受古巴人欢迎，我们能猜出是什么原因

止痛药。

从国内事务中白人与黑人的关系，到介乎国内事务与对外事务之间的印第安人及其他移民问题所发展起来的种族观念，有点像一幅镶嵌画，由不同地区的碎块拼成。每个地区以各自的不同



古巴的解放不远了



白人的负担

附注：这些形象有时掺合在一起。图23显示一个土著民被一个美国士兵强行拖进学堂。

方式争得本民族的优越地位并获得与之相一致的经济好处；斗争方式不同，民族本性不同，双方力量的悬殊程度也不同。17 世纪 80 年代，在新英格兰地区占领印第安人的土地，不同于南北战争前的南方之控制黑奴，正如把墨西哥逐出西南地区，使当地的拉美人从属于美国，也不同于世纪之交已城市化的东部地区控制如潮的移民。

当然，镶嵌画的总模式是很清楚的。白皮肤的美国人（尤其英国后裔）属于最精华的种族，为其余各民族所公认，也是评判其余各民族的基础。换言之，他们自认为自己的种族处于中心地位，这是他们的世界观。一般意义的政府政策也好，特殊意义的外交政策也好，其出发点都是从种族角度考虑问题，这种自我中心的意识反映到国家经验中来。19 世纪最后十年，美国人接触到更广泛的外国人之后，种族观念仍在起作用。那些呼吁要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的人们乞灵于增强盎格鲁一撒克逊血统的种族活力，并鼓吹优胜民族照顾弱小民族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那些对海外十字军运动和建立海外殖民地持怀疑态度的人们，或者着力于击退认为他们是叛徒的指控，或者因看到弱小民族的自甘落后已无可救药而从原来的立场后退。种族观念在世纪之交被接受为一项可论证的成功外交政策的重要成分（一点也不比国内事务中的影响差些），并将作为一份唾手可得、无法抗拒的遗产代代相传。

四　革命的危险

通向自由的道路是狭窄的，只有很少数国家（如果有这样的国家的话）才能找到。

——约翰·亚当斯（1821 年）

欧洲社会能否容忍共和政体，我甚表怀疑……直到今日依然如此。

——托马斯·杰斐逊（1823 年）

美国自身就是革命风云的产物，美国人当中再也没有人比约翰·亚当斯与托马斯·杰斐逊这两位密友对这个动荡年代有更深刻的了解了。他们本身就是革命者，18 世纪 80 年代他们在伦敦、巴黎任外交官时，就亲眼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最初骚动。回到美洲大陆，他们又看到了法国革命的深化以及向整个欧洲大陆的传播。此后，他们相继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无论国内国际都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刮起来的大风。最后退休了，两位七八十岁的老人重叙友谊，就有关过去的与当代的革命交换了若干著名的通信。“你同我两人，在我们互相解释清楚自己的看法以前，不应当死去。”这是亚当斯于 1813 年年中写的，可看做是交换信件的开端。杰斐逊立即响应，但特别指出不想争论，“我们两人都太老了，改不了观点啦，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1]

从某种角度考虑，亚当斯与杰斐逊两人毕生对革命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革命使亚当斯近乎烦扰，他特别提防政治动荡，极不愿看到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他为防止革命作了无数的严格的

防范措施，实际上使普通的凡人已不可能掀起一场革命。他的加尔文教派传统，法治传统，固守先例与秩序的保守习惯，以及讲究程序完备等等结合到一起，更把他推向这种态度。从个人性格来说，亚当斯这位“美国历史上皮肤最薄、穿着最扎人的毛衣”的人，本质上是不信任普通人的，对与他同等地位的人也警惕三分，甚至对自己也不放心。[2]他总是以冷淡、挑剔和审视的眼光来看待因革命而造成的骚动、冲动和不安，即使它发生在极为遥远的地区。他一辈子从事政治活动，追随他的人总感到他心目中的标准高不可及，他对人类本性的看法是悲观的，他对政治动乱是过于焦虑了。

亚当斯于1790年、1791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充分阐明了他对革命的看法。[3]亚当斯认为，一场革命要取得成功，它的领导人必须认识到三个关键问题：凡人生而有瑕；人的差异无法消除；革命的政权必须重视上述两个条件。革命者不应追求某些理想的完美的理念。

> 冷水仍将结成冰，火焰永不会熄灭；疾病与罪恶继续肆虐，死亡仍在威胁着人类。竞争仅次于自我保存，二者永远是人类行为的两大伟大的源泉，而只有通过一个井然有序的政府的制衡作用才能防止政治的竞争蜕化为危险的野心与不正常的敌对行动，蜕化成为破坏性的因素、毫无意义的暴乱与血腥的内战。

人们都希望自己在追随者眼中与众不同，而实际上却使自己成为了社会的奴隶，这个社会正是按他的意见建立起来的，这个社会如今正在评判他自己的价值。由于人们在本质上与才能上的差异是如此广泛，他们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也不可避免地截然不同。亚当斯正是从这些基本考虑出发，习惯于用“治理的科学”来限制失误，把人们的情感导入有益于社会的正轨。

这只有通过政府内部的“权力平衡”方能做到。最初，立法机构应当如此建立起来，即把普通老百姓用作对抗社会上有财富的人或有贵族背景的人们的制衡手段。在庄重的会议室中，富人与穷人可以找到各自的荣誉以及不同的利益。同时，立法机构中的双方都需要一个就在身边的、独立的执行机构，可以起到“不偏袒的中介”与“抵制对方犯罪作恶”的作用。如此，社会内部的两大阶级的利益与感情也许可以找到出路，并同时受到限制，因此任何一个阶级都不会占有支配地位或“专断独裁”。

革命的最终任务便是为建立这样的政府铺平道路，为这样的自由提供保证。亚当斯根据历史以及他本人积累的经验宣称：几乎没有什么革命能取得即使是短暂的胜利。喜爱政治变动的人始终不懂得人的局限，他们不懂“治理的科学”。在欧洲国家中，只有英国产生了一部好宪法——“人类文明中最了不起的创造”。[4]美国人干得很好，已采用了一部类似的、利益均衡的好宪法，但即使这样也许还不能捍卫他们的政治美德。

按照亚当斯的看法，革命在发展到制定宪法阶段之前，总是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动乱。首先，之所以需要革命，只是为了“反对篡权与无法无天的暴力”，但革命本身常常无视“法律的权威”。革命要求人民及其领导者具有“美德与善行”，而他们的回答通常是道德上的放纵以及吵吵嚷嚷地煽动经济上拉平。为此，在那些头脑发热分子（这些人“一般更着力于激起自己与社会的感情”而不是去理解一部好宪法应有哪些原则）的领导下，革命便注定要蜕化为改组社会——把人们天生不平等的东西如才能、财富、名声，一律铲平。谨慎、节制、适中等政治美德都成为不合时宜的了；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对传统宗教与道德的攻击，破坏了社会秩序的堡垒。亚当斯忧郁地下结论说，参加一场革命要冒这么多、这么严重的风险，所以，只有在“自由与宪法的正当秩序”能迅速得到承认，长期混乱状态确实能够避免的情况下，反抗专制主义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他警告说，不按他的判断盲目

行动的人将很快发现："一千个暴君比一个暴君更坏。"[5]

拿托马斯·杰斐逊的观点来同亚当斯作对比，会令人感到有趣。一个视革命如仇寇，另一个却是热心的提倡者。杰斐逊看待他那个时代的革命运动充满着想象与希望。他深信自由的前进是不可抗拒的，并且深信人有"服从理智"的力量，因此，使亚当斯为之震慑的动乱，杰斐逊却毫不在乎。革命是工具、是手段，人们用它来粉碎阻碍他们发展的人为障碍。然而，人们不能希望"在一张有羽毛垫子的床上把专制变成自由"。[6]一旦挑起战端，盘踞多年的贵族统治集团必然要为保存自己的利益奋起应战。普通老百姓别无选择，只有作出必要的牺牲以克服抵抗，结束压迫。

因此，革命不应受诋毁，也无需害怕它的暴力；相反，它是慈祥的自然秩序无可避免的另一副面孔。杰斐逊喜欢把革命比作一场暴风雨，这场暴风雨将吹走长期积累起来的罪恶的政治乌云，使天空得以澄清。在另一个譬喻中，他还把革命比作保证自由之树健康成长的苦口良药。某些革命也许会失败，正像暴风雨有时也会造成一些破坏，但是，每次尝试总是在向自由这个最高奖赏前进了一步。"自由同专制之间的许多圆点的每一次跳动，获益的都是前者。人们知道的事情越多，统治者对他们越尊重。"杰斐逊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革命是历史进步的一个例证，其他各国也将注定要接受这份政治遗产。[7]

杰斐逊同亚当斯对革命显然有不同看法。他们之间鸿沟颇深。等到两人可以在退休闲暇之时再来琢磨革命之时，两人的观点惊人地迅速趋同了。当然，从前的不同看法还有它们的痕迹。亚当斯自视甚高，说他从一开头就看出法国大革命包含着危险，而杰斐逊则"酣睡于平静的哲学之中"，对"粗糙的、不实际的理论"情有独钟。[8]杰斐逊一如既往地、悠闲自在地吟诵他对自由的信念，赞美革命最终带来的有益效果。

然而，革命的反响迫使他们二人都须软化从前的立场。亚当斯见到美国的政治状况比他预期的大为好转时，从前对革命的焦

虑也就消失了，如今他已经以一位革命的鼓舞者而闻名于世，成为制定宪法运用“方法与手段”的典范。另一方面，对杰斐逊来说，美国自由的火花在大西洋跳跃，最后在一片血海中熄灭，这一景象也使他有所收敛。他认为自由之火焰总有一天要把“专制主义的脆弱发动机”吞没掉的乐观主义还在，但如今他已认识到，得到“光明与自由”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以及多么大的代价。“血流成河仍在流淌，荒芜之年年复一年”，以欧洲与拉丁美洲而论也许还要五代人以上的努力。[9]

时间，依然是时间的流逝，使这两位年高德劭的哲学家在人的潜在革命因素方面靠得更近。亚当斯把他有关人的堕落的黑暗图画搁置一旁，开始去寻找不同民族在性格方面的种种差异，也许从这些差异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这些民族在争取与维护自由的能力上的差别。与此同时，杰斐逊开始承认，由于看不见的国王与教士绑扎起来的桎梏损害了某些人的推理功能，从而损害了他们把一场革命导向满意结局的能力。杰斐逊与亚当斯迟迟才充分认识到，抽象的推理和情感并不存在，它们实际上是在差异巨大的民族背景下发挥作用的。

亚当斯与杰斐逊晚年有关革命的看法可以被提炼成一系列观点，说明他们都已有了较缓和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观点构成了本国同胞此后长时期内看待这一问题的基础。这些观点主要来自对美国革命的回忆。青年亚当斯与杰斐逊曾参与其事的独立运动日后在他们成熟后的思想中再现时，与它在民族的神话中再现时一样，已洗净曾玷污它的社会暴力与激进主义的污点，成为温和与智慧的革命的典范。所有的解放斗争都应以此典范来比较、判断，无论是针对外来的敌人或是国内的暴君。

按照杰斐逊与亚当斯定下的规则，开始策划革命时应十分慎重，只应反对那些以不合法手段不断侵犯个人人身与财产权利的统治当局，或者是蔑视和镇压大多数人意愿的统治当局。革命一旦起来，能否最终成功，取决于是否牢牢地坚持有节制的、适度

的手段。从广义来说，一个民族的品质——刚毅、正直、有文化修养、献身正义、勤奋精神——决定他们能否安全通过杰斐逊所说的“从一种政府转为另一种政府所产生的危险”。[10]欧洲人成功的机会最多；欧洲文明主流之外的民族，如拉丁美洲人或斯拉夫人，会有风险。但所有国家都必须依赖有才能的上层阶级自愿出来领导革命，否则，最初的革命行动就会演变为城市暴动，发展为可怕的恐怖统治，以后只有出现新的专制政体才能结束这种局面。

亚当斯与杰斐逊同意，任何愿意取得成功结局的革命运动都必须适当关注宪法问题。“一部揉和得很好的宪法”（借用杰斐逊1788年的话）对于平衡互相冲突的政治集团，遏制权力集中于一人或一个部门，是十分必要的；也因此才能防止滥用权力以致侵害了政府首先要保护的人身与财产。然而，正如亚当斯提醒杰斐逊时所说的，把这些正式的宪法机构拼凑到一起，也是“一项艺术甚或奇迹，很难学会，更难运用”。[11]恭恭敬敬的外国学生把美国宪法视为样本，如果有人试图建立一个同自由相敌对的体系，他们便可用此样本去作衡量对比。

最后，亚当斯同杰斐逊也都同意，革命的精神是有传染性的，无论是好是坏，都会传播到远离革命源头的地方去。虽然美国人已经有了一次成功的革命，但并不因此就能免疫，他们对国界外爆发的革命也不应该无动于衷。其他国家获得了有序的自由，说明美国在一个安全的自由世界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如果革命走上了邪路，美国人就会感到自己的经验被遗弃了，彼此间疏远了，因而焦虑不安。只要是什么地方发生了革命，即使相隔遥远，美国人也十分关注。

美国人对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早期所发生的革命浪潮第一波的态度是矛盾的，这从亚当斯与杰斐逊的思考中可以反映出来。正当美国人把自己的解放斗争带向成功的制宪结局时，法国开始了大革命。曾经帮助美国从英国人手中赢得胜利的法国人，会不

会追随美国的样板呢？不料，法国革命却走了一条异常的道路，美国人把最初的乐观情绪收了起来，开始焦虑革命产生的危险。法国革命开始不久，接踵而来的是拉丁美洲开始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解放斗争，这无疑加重了美国人的忧虑。

美国人认为，法国革命的经验是枢纽性的——而且是损伤性的。尽管美国人今后还会遇到其他革命运动，不断在希望与失望中兜圈子，但法国革命可是对美国式的革命信念的头一次测试，观察家们从此认识到革命结局的重要性同革命激烈程度的重要性再也不会相等了。从一开始，美国人就非常注意大西洋彼岸所发生的每一步，最初看来它是世界各国人民就要最终获得自由的好兆头。从 1789 年 7 月攻下巴士底狱，到 1793 年爆发欧洲战争，所有的兆头都是好的。流血不多就组织起国民会议，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接下来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击退了复辟势力。美国各大城市中的民主社团都举行庆祝活动，并号召美国人仿效法国人，进一步推广国内的自由。

杰斐逊和大家同样高兴。开始，他祈望法国革命成为合法行动去纠正数百年来的不公正。在杰斐逊看来，法国革命是欧洲解放的开始，这将加强美国国内的自由因素。“我非常相信人们的善良愿望，以及自我治理的品质，我从不担心出现无理性的行动。”这是 1789 年 8 月他在法国写的。他还欠谨慎地加了一句：“如果这个国家结局不佳，我就算是个伪先知，挨大家的石块好了。这个国家是不会有这种结局的。这里是欧洲解放历史的第一章。”1793 年他写道，我宁愿看到“半个世界沉寂”，也不愿看到法国革命失败。[12]

但有证据说明，即使在危机的最初阶段，杰斐逊已担心革命的目标有可能超出法国人民的政治才能。他注意到，尤其是农民，既无知，又习惯于政治上被动、服从。另外，自由对所有法国人来说是一件新事物，因此，他曾反复警告他的法国朋友，政治变动只有在采取温和手段的情况下，才能做到深谋远虑。建立美国

式的两院制立法机构，是当前最需要的。按杰斐逊的意思，最好早在 1789 年 3 月、还在攻下巴士底狱之前，就把革命进程冻结起来，以便让法国人得到更多的自我治理的经验，为今后某个时期实现充分自由做好准备。尽管他对 18 世纪 90 年代中期已开始露头的混乱现象仍表示认可的态度，但是显然被他隐藏起来的焦虑已经埋伏在他的评论的表层下面。

法国革命从 1793 年以后采取了更极端、更狂暴的行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这已经超出合法的界限。处死国王，雅各宾党人战胜温和派，以及达到顶点的“恐怖时期”，促使美国人的这些批评发展成为公开的抨击。联邦党人带头，迫使对手共和党人作出回答，联邦党并以这场远在法国的斗争为口实来打击共和党人。

联邦党人抓住法国革命走入邪道这个题目，企图削弱本国“雅各宾党人”——共和党人的政治影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谴责马拉与罗伯斯庇尔制造出来的“可怕的、令人厌恶的景象”——暗杀，内部造反，以及“解除所有的社会与道德的联系”。他宣称，在法国，“真正的自由深受伤害”。华盛顿最初把法国革命看做是美国革命的分支，并认为它是重塑欧洲命运的伟大力量，现在他也同汉密尔顿一样悲观，并说他自己早有警惕，从一开始就担心法国人“不那么冷静、温和”，不能在“专制压迫”与“无法无天”这对孪生危险当中找到出路。巴黎的“暴民”、“什么都不懂的顽民与心怀叵测者”控制了革命，破坏了革命。另一位联邦党人戈文纳·莫里斯被派遣去法国回来后所说的话对他国内的政治伙伴颇具影响，他说法国像“面临暴风雨的畜群”。人们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本该严格限制在宗教与道德的范围内，这才能保证政治上自我克制，保证确保私有财产。莫里斯的结论是，只有出来一个专制君主才能从“轻率胡闹的暴民”手中重建社会秩序。[13]

在联邦党阵营中，没有人能比约翰·亚当斯更快地指出法国革命的恶例及其对美国同胞的煽动性影响，他对美国人喜欢造反的性格早就了解得一清二楚。法国革命早期，他就曾谴责法国人

不该嘲笑宗教，不该追求人身平等与财产平等的幻象。法国人选择了一院制政府，愚蠢地忽视了他有关政府的理论，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政治与社会的灾难：无政府主义，放纵，专制，战争，瘟疫，灾荒。亚当斯于1790年就预言，缺少一个受制约的政府，法国就“没有人人平等的法律，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财产，没有生活”。数年过去，他的这种黯淡的判断没有丝毫改变。“法国的龙牙已经露了出来，就要变妖怪了”。[14]

联邦党人反对法国革命、反对美国对法国革命持同情态度的人，这种态度在18世纪90年代晚期为国人所广泛接受。1798年年中，联邦党人利用法国的一项大肆侵占公海的政策，以及侮辱美国外交官的XYZ事件，掀起了一场反法高潮。在接踵而来的战争恐慌期间，他们通过立法，限制美国国土上被怀疑为“雅各宾党”的人们的公民权利，压制他们搞颠覆的念头。法国的民主团体与其他“卫士”受到参与“煽动性”活动的责难，只得保持沉默。

一度乐观自信的杰斐逊如今哀叹法国政府的过火行为，婉惜法国政府为联邦党人制造了攻击共和党人（美国自由社会的真正朋友）的机会。拿破仑于1799年的崛起，从此解脱了杰斐逊捍卫法国革命的义务，法国革命显然已经完蛋。后来，他把那场革命及其后果称之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可悲的时期”，这一时期充满着“恐怖”“疯狂”“罪恶”“悲惨”与“致命的错误”。“毫无原则的、血腥的罗伯斯庇尔独裁专政，以及同样毫无原则的、狂乱的波拿巴独裁专政”最终粉碎了法国的自由。“谁会想到法国民族竟束手无策？”1802年他提出这个问题，直到后来他恢复同亚当斯的通信时才找到一个答案。

如果说法国革命最终树立了社会革命危险的样板，那么，在美洲发生的抵抗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造反活动则显示了反殖民斗争的局限性。受外国统治长期压迫的人民天生向往自由，但是那些使他们受压迫的条件也许仍让他们无法取胜，或者无法保持胜利。杰斐逊比亚当斯更强调殖民地的激情同殖民地的能力之

间的矛盾。

早在 1787 年，杰斐逊就相信拉丁美洲包含着“爆炸性的材料”，总要爆发出解放的火焰。1791 年圣多明各燃起了火，杰斐逊却吓得退缩了。在那里，“有色人种”，低级的黑奴与自由人，完全采纳了法国革命的理论，在暴动中屠杀法国主人。1793 年，白人逃亡者到达美国沿海，杰斐逊除了对他们表示同情外，还黯淡地想到：革命传染病已从法国传到了加勒比地区，自然还会传到美国南方，引出更多的“血景”。[16]

美国人再次不让革命靠近自己。南方政府当局限制从西印度群岛进口黑人，并制定了严格的奴隶法，牢牢地控制住当地的起义者。在南方，公开谈论圣多明各的种种恐怖事件成为禁忌，唯恐这些消息传到当地黑人耳中。年复一年，美国人目睹凶残暴行深受震惊。这一暴力革命的最后结局是于 1804 年由从前的黑奴建立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只能是“黑人的专制与篡夺”——一位宾夕法尼亚的国会议员如是说，他还说，所有的文明国家都应当把这些黑人视为贱民。50 年来，一位总统接一位总统都同样宣布，不予海地共和国以外交承认。[17]

在美国人看来，在 19 世纪第二个十年内，西班牙殖民地发生的革命情况要略微好些。1811 年，杰斐逊用满意的口吻头一次讲到这场革命是“人们起来挣脱压迫者的锁链的另一个例子”。西班牙裔美洲人不像法国人，他们善于寻找温和的政治变革方式；他们也不像海地人，他们避免了种族大屠杀。但是，美国的观察者如杰斐逊与亚当斯也从不怀疑，拉丁美洲人还没有做好解放的准备。天主教迷信，西班牙专制主义的传统，以及一个民族混杂的人口——“黑暗传说”中的关键因素——对他们发展自由思想几乎是严重的障碍。杰斐逊有个直截了当的说法，同亚当斯的说法惊人地相似：西班牙裔美国人是“从最黑暗的混沌中出来，又受顽固与迷信的作践”，因此“像孩童那样不会自我管理”。杰斐逊认为，只有用“军事独裁”来替代现存的西班牙暴君统治，别无

其他希望。需要几代人的教育，需要美国的帮助与榜样作用，也许在他们适应“有序的自由”之前还需要让西班牙来当一个时期保护国。[18]

19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国内态度是以新英格兰地区为基础的联邦党人保守主义同南方的种族敏感性相结合，并逐渐同杰斐逊的深刻的怀疑主义恰好吻合，都认为拉丁美洲不可能有自由。1821～1824年间，前西班牙殖民地以及巴西都获得了独立，并得到美国的外交承认。然而，门罗政府善待这些国家是在经过了辩论之后。在这场大辩论中，力主推进贸易、取代欧洲影响、讲究实际利益的势力占了上风。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为那些反叛地区的问题累次同西班牙协商，他坚持认为，不能把这些新成立的国家看做是同美国一样的共和国或者是自由国家的样板。波士顿的《北美评论》刊载过他对拉丁美洲的短处的批评。这份具有权威性的杂志于1821年问道：“对于一个种族不同、法律不同、体制不同、宗教不同的民族，美国能给以什么样的同情与关心呢?”“他们喜欢暴力，生性懒惰，是蜕化的自然结果——一个混杂的民族，长期受暴君统治，又受到热带气候条件的恶劣影响。”甚至在是否给以外交承认的大辩论中站在亚当斯对立面的亨利·克莱也承认拉丁美洲人无知、迷信，是长期生活在西班牙的“可憎的暴政”之下的结果。尽管克莱相信西班牙暴政结束后将会出现进步，但他偶尔也会失去耐心，如1821年他把独立后的墨西哥贬为“一个专制、奴役、迫害异教徒与迷信盛行的地方”。[19]

大多数美国观察者也同克莱一样缺乏耐心与乐观情绪。这些新国家的行动又进一步证实了前景的黯淡。他们讨好君主制国家（巴西如此，墨西哥一度也如此），仍同旧世界与罗马教皇保持联系，赞成废奴主义，沉溺于军事独裁的重压，公众则无知、好虚荣。应当肯定，拉美国家的生活比革命前已有改进，但毫无疑问，由于种种缺陷，他们不能像欧洲人那样把自由的实验发展到成功

的结局。

19世纪20年代早期标志着第一个革命时代的结束。自由在拉丁美洲流产了。法国同自由调戏了一阵，产下一头怪兽，只有波拿巴的巨掌才能把它杀死。反过来，波拿巴的最终失败，又使得恢复可恶的旧秩序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成为可能。只有北美洲的子孙后代存活了下来。美国人只能希望他们的成功足以鼓舞其他国家新一代的爱国者，这些爱国者到时候将把受到严格限制的自由拓展开去。但是，法国的流血与长期痛苦已经深深地铭刻在美国人的政治意识之中，经常提醒他们，通过革命的道路去争取自由将会有多少危险前来困扰。

美国人目睹的第二浪革命，开始于19世纪中间的几十年。顶峰是1848年欧洲发生的几次革命，悲剧的收场则在1871年的巴黎。美国人的反应几乎同上一轮革命的反应一样。美国的民族主义者毫无愧色地自诩本国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事件”，因此，他们便是“全世界政治再生”的天然代理人。为了继续推广自己如何从革命走向自由政府这个样板，美国“劝说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照我们所做的去做，方能享受我们所享受的自由与快乐”。这些话是参议员刘易斯·卡斯1852年说出来的，类似的声明曾在国会大厅里、在公众集会上回响过一千遍；赞同全世界为自由而斗争并提供美国样板的保证，也一再重复。对于真正搞革命的外国，美国人所提供的严格标准仍是从亚当斯与杰斐逊时代传下来的。尽管只是在标准的严格性方面存在差异，但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还像上一代人那样，多次表示他们对革命的结果即使不说是憎恶也是非常失望。[20]

希腊与波兰拉开了欧洲新一轮革命的序幕。希腊人反对奥斯曼封建领主的斗争最初开始于1821年，引起美国人的特别关注。这是一场基督教徒同异教徒的斗争，用爱德华·埃弗里特（著名的希腊自由战士之一）的话来说，是“一场新月对十字架的战

争”。再者，希腊人是古文明的传人，具有敏感的特殊性，“圣人与英雄多如璀璨群星”，使杰斐逊、亚当斯及其他受过古典文明熏陶的人，都有一种站在希腊人一边的使命感。1823～1924年的秋冬，后来又在1827年，纽约、费城、波士顿、奥尔巴尼、辛辛那提等地的报刊、公众集会与募集基金委员会会议突出地反映出公众的激情。然而，亲希腊的情绪在部分失望中结束了。1830年，俄罗斯、英国与法国联合行动，为希腊人争得了他们为之奋斗、美国人为之欢呼的独立。但是，希腊人没有去建立新的秩序与自由体制，而是在派别活动中纠缠不休，直到最后进来三股干预势力，以一位巴伐利亚王子为首组成君主国，才带来了平静。对美国人来说，希腊由一个外国统治改为另一个外国统治，状况只略微改善了一点。[21]

波兰人是另一个专制铁蹄下的英勇民族，重演了希腊的这场戏，而结局还不如希腊。波兰于1795年被分割。俄罗斯统治地区于1830年11月发生暴动。十个月后结束。势不可挡的军事力量在全国加紧了压迫。曾有一个短暂时期似乎可以学习美国的榜样获得自由了，美国人再次在一些大城市里开会庆祝，募集资金，沾沾自喜于本国革命传统的影响力。“要记住，在世界上最远的那个地方，没有一个自由人倒下，”1831年9月波兰革命进入死亡前的剧痛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还在那里嘱咐说，“不要失去任何一个已列入你们自己的高贵事业的行列中去的兄弟。”[22]

1848年与1849年把全欧洲都卷入其内的数起革命把美国人的希望激到了最高峰。一群年轻的共和国就要横扫欧洲各个衰老的帝国，或者看起来会是这样。法国人再次砍下了他们的国王的脑袋。意大利人、匈牙利人与捷克人起来反抗哈布斯堡王室；罗马人把教皇赶出了洞穴；日耳曼各个邦国的人民纷纷起来打击各自的独裁政权；甚至英国也一度受到革命企图的动摇。革命的浪潮大大提高了美国人坚定与自信的心态，就像新近从墨西哥与英国手中又获得若干领土时那样地兴奋。全欧洲的专制主义忽然被

摧垮，这令人鼓舞地（那些曾担心因蓄奴问题出现分裂的人也把注意力转移到这方面来）想起美国人的使命正是要做自由事业的代理人，要为全世界的革命事业提供范例。

在1848年的几次革命中，法国人与匈牙利人的斗争最吸引美国人。匈牙利共和国于1849年4月宣告成立，8月份倒台，成为奥俄联军的牺牲品。然而，由于匈牙利流亡领导人路易·科苏特的活动，匈牙利革命事业仍得以在美国传播影响。他于1851年12月抵达纽约，引起一个不曾料到的群情激昂的欢迎高潮。到1852年年中，群众的热情已经消退，科苏特已去英国长期流亡，宏伟的美国之行未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是，美国为匈牙利人做的梦，同早些时候为希腊人、波兰人做的梦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愉快的梦。

与之相反，法国人再次引起了政治梦魇。美国人还记得随着1789年革命而来的过火行动，出现了波拿巴的帝国以及后来的王位复辟。在这一系列灾难之后，1830年法国人又驱逐波旁王室，拥戴路易·菲立普登上王位，成立了一个君主立宪制政府，法国似乎又有了希望，革命转入了温和态势。明白事理的拉斐德的庄严保证使美国人大为宽慰，法国人遵守着良好的秩序，他们明智的安排使君主立宪制受到必要的限制。在一个公众庆祝集会上，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祝贺法国"用英勇的温和手段解除了革命的恐怖"。[23]

1848年的一系列事件：路易·菲立普政权垮台，共和国建立，令美国人惴惴不安，惟恐法国再次陷入无政府状态或再出现一个马背上的骑士。果然，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热月"起义把巴黎闹翻了天，引发暴力回应，使路易·拿破仑这颗星占了主位。1852年，他建立了帝国。美国人对法国人的政治才能的信心降到了最低点。《波士顿信使》报的语言同约翰·亚当斯如出一辙，1852年12月报上恼怒地评论说："法国人……花费了无数的鲜血与财宝，用无数的蠢事与罪恶涂黑了本国历史的这几页，可是他们还什么都没有学到。"[24]其他一些更接近杰斐逊观点的人承认这是又一

次倒行逆施，但仍不那么肯定地坚持说，到时候自由事业仍会无可避免地前进。

1871 年巴黎街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谨慎的乐观也难以保持，并加强了这样的结论：法国人太喜欢拳头政治的狂热了。败于普鲁士之手，拿破仑创立的威望如今荡然无存。一方面和平谈判准备就绪，一方面大后方政治骚乱，结果在当年 3 月发生了巴黎起义。公社政府及其武装力量迅速建立起来，并实行了一系列极端的政治举措，包括进攻天主教教堂，废除租金，没收财产。在 5 月下旬暴力镇压之前，巴黎公社已为美国观察者提供了一大堆恐怖活动供他们去思考与谴责。巴黎这个“无节制的、邪恶的城市”再次繁殖出大量暴民，“抑制不住起义暴动与构筑街垒的激情”。对“1789 年革命最坏景象”的回忆以及由“政治上不满的暴民”掀起来的 1848 年的“抢劫革命”，在美国报刊上广泛传播，这些报刊无一例外地敌视公社，在公社被抑制后便觉异常宽慰。由这种突然发作的革命产生的共和国，能最终接受政治上温和的美国人长期以来诲人不倦的教训吗？[25]

把美国人的强烈反应仅仅归因于他们对法国人政治上无能、学不到别国经验而感到沮丧，那是不正确的。巴黎所发生的事件敏感地触及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神经。《纽约时代报》的编辑在巴黎公社事件结束后很快承认，这些事件揭示了“所有现代社会都潜藏着深刻的爆炸力量”。[26]美国的许多城市充满着自己的“政治上不满的暴民”，其中许多是新近从欧洲来的移民，他们带来了同样牌子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正是这些东西鼓舞了巴黎公社社员及其支持者。这些外来移民使劳工队伍膨胀起来，毫不奇怪，他们要向财产私有权挑战，并煽动阶级冲突。保守分子与排外主义者惊呼：革命的种子就在美国国土上。为保证这些种子不会在本土发芽，他们便求助于限制移民，收缩劳工需求，并严密注视异端观念。

第二个时代的结束，使美国人比以前更确信革命潜伏着危险，

但还不应一概而论。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可以用个人哲学观点与性格气质不同来解释。杰斐逊就是个明显的例子。态度的不同与政治取向也有一定关系。联邦党人反对革命，更由于怀疑辉格党中的保守派别怂恿了激进的政治思想而更加警惕革命；而早期的共和党人的热诚后来在19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早期附到了土地自由党人身上，他们把欧洲的革命视作他们自己反对延续蓄奴制斗争的反映。美国人还因种族不同、阶级不同而态度各异。新来的移民，尤其是德国与爱尔兰来的移民，希望本国获得自由，不轻易受有关“财产神圣”的争论的动摇。另一方面，那些英国人后裔则对植根于海外革命的下层外国人所具有的危险因素非常警惕。

美国人当中这种分隔线还可以追溯到地区性。政治有序与社会保守的堡垒可在新英格兰地区与南方发现。例如，这两个地区对1848年法国动乱表现冷漠，南方后来对正在美国的科苏特明显表现出不欢迎的态度。重视社会秩序、对保护财产非常关心的南方人，曾因欧洲的革命者呼吁平等而同他们疏远。法国1848年颁布法令废除法属殖民地的蓄奴制，正好是美国南方人最害怕的激进学说的产物。中西部则相反，较倾向于欢迎革命。中西部人口中，移民占很大比例，它们在国会中的代言人如刘易斯·卡斯，斯蒂芬·道格拉斯，悉尼·布里斯，成为“青年美国”集团的核心，他们把欧洲1848年的一系列革命与从欧洲延伸出来的北美洲共和国看作是自由将横扫全球的信号。科苏特在中西部受到的欢迎，与在大都会纽约的状况相同。

这种地区性的差异在南北战争后依然存在，中西部不像南方与新英格兰地区那样害怕巴黎公社。正在蓬勃兴起的城市，尤其是中部大西洋沿岸各州，组成了一个中间地带，那里有一个庞大的原籍外国的工人阶级，生活得自由自在，具有激进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的观念，但他们面对的是地位牢固的精英，这些精英分子中英裔美国人占着优势，他们对于自己的传统地位日益受到挑战

的势头是决不会掉以轻心的。

美国人目睹的革命第三波，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达到了毁灭的高潮。动荡的景象从古老的欧洲转移到了四周，到了美国人最料不到会发生革命、会兴起解放运动的地方。美国人再次经历了由希望到沮丧的历史循环。现在，这方面的反应头一次同华盛顿部分政策制定者的倾向联系起来——即需要对各地的革命仔细研究，以便将它们置于安全的界限之内。美国不再是18世纪90年代的脆弱国家，不再需要对欧洲敬而远之，也不再像19世纪中叶时那样专心关注国内事务，对外国好的革命除了给以欢呼，给以外交承认，或在革命失败后准许战败的英雄政治避难之外，再也无所作为。19世纪晚期，美国人在拉丁美洲、东亚与欧洲开拓着官方的与私人的利益，革命动乱必然要冲击到这些利益，并无可避免地要废弃从前基本上是被动姿态的美国外交政策。无论什么地方，只要存在着由来已久的革命的孪生鬼怪——暴力与过激——的威胁，政策制定者就要使出浑身解数去对付它们。他们也许使用出售武器、财政资助、外交承认等手段。他们也许与其中赞同美国及其良好秩序的政治派别私通款曲。他们也许同其他大国联手行动。他们也许甚至派出美国军队。

从古巴与菲律宾传来的第一次震颤宣布了一个新的革命时代的到来。古巴争取自由的斗争赢得了美国的同情，最终美国进行了干预并于1898年占领该岛，不仅清除了西班牙的控制，而且还改变了华盛顿对态势的看法。政策制定者现在需要从美国的战略与经济利益去衡量古巴的斗争，先不从种族优劣去考虑拉美人民政治上的成熟程度。仔细研究了这些互相抵触的冲力之后，他们达成了妥协：古巴应当成为一个独立有限、幼弱、需要指导与保护的国家。菲律宾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革命大大超出美国人的预料，美国最终进行了军事干预并占了上风。但是，美国的利益、美国的保护责任，同“当地”对自由与独立的要求，并不能一致

起来。革命的矛头指向了来帮助解放的美国军队，革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贬值了。美国政府已经表示反对即使是名义上的独立，现在它宣布了一项官方决定，指出须等待镇压了“非法活动”并有证据证明已向政治有序迈进之后，再来对该群岛的最终命运作出决定。

十年内处置完了这两起突发事件，美国人又遇到了其他几次革命：先是中国与墨西哥，后是俄罗斯。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老秩序粉碎得如此迅速，结局如此辉煌，美国人被诱导着做起自由事业大发展的古老甜蜜的美梦。但时间不长，这些革命全都“误入歧途”，美国的老偏见又露了头。

在这三起革命中，中国的革命已被证明是最不稳固的。当1911年末、1912年初中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国时，美国的观察者曾为之雀跃欢呼，丝毫没有大惊小怪。在美国人心目中，旧中国停滞、孱弱，到处都是贫穷、无知、邪恶，看来需要沿袭美国人所经历过的道路。由传教士打头，支持中国的美国人预言中国将有一个经济发展、政治民主、一个最年轻的共和国同一个最年长的共和国密切合作的时代。“如今，中国人已醒来了”——一位传教团的发言人如此宣称。[27]他同其他一些人预期将有推进文明与基督教的机会，他们为此呼吁及时承认这个年轻共和国。但塔夫脱政府不顾公众与国会的压力，竟然拒绝采取行动，情愿维护同在远东活动的几个大国合作的政策。

两年僵局之后，伍德罗·威尔逊当选总统，终于把政策交到敏锐地感到“愿意帮助中国”的人士手中。威尔逊认为美国应是中国人的“朋友与榜样”，美国有责任去鼓励“他们去争取渴望了很久、准备了很久的自由”。1914年初，他发出外交信件承认中国革命，强调他的同情，谴责某国际财团撤销对中国的官方资助，在他看来，这是对新中国的不友好态度。[28]

当时各种各样的信息纷至沓来，反映出中国甚至还没有赢得最低限度的政治稳定，而美国的观察家认为这对美国传教团与美

国在华企业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越来越多的革命政权的友人开始寻找一位能把潜在的无政府势力遏制住的强人。袁世凯是帝国末年一位知名人物，如今是名义上的共和国总统，被认为正是这样的强人。袁及其继承者竭力设法把国家掌握在他们手中，同时殷勤地保卫外国人及其财产的安全。美国人如今对一场并未使中国改变多少的革命已不抱幻想，只求做到比较稳定，这就足够满足他们逐渐缩小的期望了。

墨西哥革命具有同美国更密切的利害关系，但很快证明比中国革命更麻烦。这场革命偏离良好革命的标准越来越远，因此要求干预的合唱声越来越响。紧接着，人们呼吁采取行动，尤其是当时有同德国开战的迹象，这使美国人逐渐把自家门口的稳定提高到战略上来关心。政治派别的互斗搞垮了墨西哥革命，解除了美国自封的美洲警察的角色。除了革命造成的混乱之外，还有革命派的一些激进做法，包括：反僧侣的政策，地下资源国有化的经济政策，控制外国人拥有的矿产，实行最低工资标准与土地改革等，混乱与激进危及庞大的美国人社区的生活（1910 年在墨西哥的美国人约有五万人），凌辱了天主教势力，并威胁着美国的投资者如赫斯特与古根海姆家族、美国钢铁公司、阿纳康达铜业公司、标准石油公司，这些集团联合在一起控制了墨西哥经济的很大部分。[29]

墨西哥革命开始时是一连串迅速的政治变动——1911 年 5 月推翻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兹，弗朗西斯科·马德罗被选为共和国总统，1913 年 2 月马德罗被维多利安诺·许尔特暗杀。许尔特是乘国家混乱之际掌权的。对于这些不稳定事件，塔夫脱政府反应颇为克制。虽然塔夫脱本人对迪亚兹被逐表示遗憾，他认为，对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来说，需要像迪亚兹那样的强人；但他仍承认了墨西哥新政府。与此同时，他拒绝考虑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干预。他担心这样一种严重措施不会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并将使在墨西哥的美国人及其投资蒙受风险。塔夫脱于 1911 年 3 月

陈兵墨西哥边界，希望获得威慑的效果。这种宽宏的中性措施，无论对安抚墨西哥的混乱也好，或安抚国内的批评也好，都起不到任何作用。他自己的共和党中有些人主张采取更有力的行动，而另一些人则指责他的战争叫嚣不仅反应过度，而且是为那些有钱的投资者的利益服务的。

威尔逊也发现墨西哥战争是个难题。也同在中国的做法一样，他在墨西哥自称是朋友与榜样。但他对中国的趋势是（至少开头是）乐观的，而墨西哥却从他到白宫的第一天起就使他头疼。他怀疑，既驯服又无知的墨西哥人民，以及那些自私、有野心、自封为领导人的"野蛮人"是否已经准备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建立一个自由政府，美国作为"本大陆的伟大国家"是否因此有责任去指导墨西哥人"回到平静与繁荣的道路上去"。或者，如他更直截了当地说过的那样，他预计"在需要援助的时候，他们是会要援助的"。墨西哥获得自由的关键是宪法被放在应有位置并切实得到尊重。有了这样的政治秩序，墨西哥人就可以处理他们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威尔逊认识到，这些问题正是发生革命的原因。[30]

威尔逊的家长作风很快使他走向干预，尽管他一再信誓旦旦地表示尊重墨西哥的主权，并表示对那些因自私利益而反对墨西哥革命的美国人的反感。他的决定本想引导革命沿着开明的路线进行，但却大大损害了墨西哥的主权。他的行动正好引起那些"自私的"美国投资者最痛恨的民族主义力量的反对。

作为恢复秩序的宪法程序的第一步，威尔逊决定驱逐许尔特的"屠夫政府"。为达此目的，他精心策划了若干步骤，高潮是1914年派军队登陆韦拉克鲁斯。威尔逊宣称他的"动机是非自私的"，并只限于"帮助（墨西哥）整顿她的混乱家务"，但仍未能使他免于在墨西哥与美国遭到广泛的公开批评。只有由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领导的一小群共和党干涉主义者赞同炫耀武力，这使威尔逊略感宽慰。[31]

许尔特于 1914 年 7 月逃出墨西哥，但威尔逊的问题并未了

结。获胜的立宪派如今又闹起了分裂，后来导致三年内战。最初，威尔逊以为立宪派有名无实的首领贝努斯蒂亚诺·卡拉萨是一个肯合作的、可教育的领导人。当威尔逊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时，便转向潘乔·比拉，这是一个墨西哥北方地区的军阀，性情残酷，反复无常，而美国人把他看作是罗宾汉一类人物。原来以为比拉将取代卡拉萨，恢复秩序，为制定宪法做好准备。可是，1916 年，比拉却在墨美边界发动了一系列令人不能容忍的袭击，于是，威尔逊第二次派出了军队。

威尔逊的决定显系受到比拉越界侵犯所刺激起来的干涉主义情绪的影响，也许还反映了民主党人希望提高 11 月份选举获胜机会的愿望。相当一大部分报界（赫斯特系统报纸带头）、罗马天主教会的发言人、著名的共和党人，以及素来健谈的西奥多·罗斯福，都指责墨西哥革命已成为毫无希望的一片混乱，而威尔逊相对克制的态度对形成这一局面也不无关系。比拉发动的袭击引起了义愤，“一个像墨西哥那样的小小的、可鄙的、为人不齿的强盗国家”居然敢于蔑视美国！[32]多达 12000 名美国军队深入墨西哥边境 300 英里，使两个国家走到了战争边缘。然而，威尔逊与卡拉萨都还较克制，最后，1917 年初，威尔逊取消了他的十字军运动，撤回了军队。消除全面冲突的前景减弱了公众的愤怒，而德美关系危机的上升，更吸引总统的注意，也吸引着公众的注意。

俄罗斯的革命动乱证明和墨西哥革命同样难以处理，最后结局更使人十分沮丧。俄罗斯不大像要搞“有序的自由”。美国人长期以来就认为沙皇统治是最后的政治反动势力。在欧洲，沙皇俄国已多次证明它是民族自决的敌人，它在国内则是独裁专制与镇压的典型。1852 年，一位美国部长从圣彼得堡发回来的报告称，俄国政府“从根本上同自由体制相敌对，毫不通融，毫不让步，毫不放松”。斯拉夫民族的特性又不利于政治进取。1833 年，詹姆斯·布坎南在写给安德鲁·杰克逊的信中说：俄罗斯民众是“愚昧迷信的野蛮人”，“永不适于政治自由”，这幅图画在他的同胞中

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样一个“顽固反对所有自由形式”的国家真有可能被拯救吗?[33]

1905年，美国人头一次见到俄国革命的潜在因素（麻烦的预兆）具有极端的倾向。1月22日——“血腥的星期天”，沙皇军队屠杀呼吁帝国统治自由化的示威群众。这一行动反倒加强了反政府势力，激起了反对旧秩序的运动。美国人士观察俄国革命的这一阶段所作出的评论颇有先见之明。尼古拉是一个残忍的独裁者，他的反动统治拒绝任何民意，革命便成了受压迫的俄国人民惟一的出路，这同1776年美国革命时的情形一模一样。在“独立公民”(商人、律师、教授）领导下，俄罗斯也在争取公民权利，争取宪法民主政治。“帕特里克·亨利的思想已经传到了海外——沙皇的土地上”。[34]

1905年晚些时候，早先对革命的热诚让位于幻灭，在某些方面甚至已成了彻底的敌对。美国报刊这年的1月还全力支持革命，到了10月“发现”这场革命是要争得社会主义而不是民主政治，它们的领导人不是善良的自由民而是“红色无政府主义者”，于是便戏剧性地改变了态度。尽管政府作了让步，危险分子仍在继续挑起工人骚动、农民起义与军队兵变，甚至采用恐怖手段。美国的报刊编辑与其他有识之士都改了口，认为一场革命已转变为一场混乱的暴力行动。

具有政治声望、在社会问题上较保守的美国人愿意见到这种舆论变化，也许拥护沙皇的宣传者也促进了这一变化。西奥多·罗斯福，海约翰，伊莱休·鲁特，以及驻圣彼得堡的大使乔治·冯·迈耶，都不信任这种暴力革命，他们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斯拉夫人懒惰、无知、落后，适于有限制的专制，不适于民主政治。罗斯福希望俄国人朝“自治与有序自由”前进，1905年的武装冲突使他担心“一种建立在腐败无能的官僚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专制主义”将堵塞上述道路。到了11月中，他的怀疑占了上风，温和革命的希望破灭了。“在社会与经济改革方面，同政治

改革一样，暴力革命的极端分子是自由的最坏朋友，正如傲慢、强劲的反动分子是秩序的最坏朋友"。次年，这些问题都暴露了出来。罗斯福把革命的最终失败归咎于太多的"气质歇斯底里"的领导人。俄罗斯的动荡使他想起另一场革命——马拉与罗伯斯庇尔曾把革命导入歧途，"借自由之名，行恐怖之实"。[35]

1905 年晚些时候，俄国政府野蛮地镇压了革命活动，恢复了秩序，使美国松了一口气。狂暴的示威者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而他们所造成的破坏倒成了发人深省的提醒物，提醒美国人要警惕像"世界工业工人联合会"与"社会党"这类同本国法律与秩序相敌对的敌人。著名俄国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因思想进步被沙皇监禁过，1906 年 4 月他抵达美国为俄国革命募集资金，发现公众意见的钟摆已偏得很远。高尔基不能同当年反对外国压迫者的革命代表科苏特相比。高尔基的目标是社会主义革命。一旦美国人发现了这一真相，他们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当高尔基公开对两名被监禁的"矿工联合会"成员表示同情时，他到处被斥责为干涉内政的外国极端分子。除了极端主义外，他还被指责不道德，因为大家发现他同一位旅伴非法结婚。报刊攻击他，赞助人抛弃他，纽约的旅馆甚至拒绝这样一位放荡的危险人物来住宿。

俄国 1917 年革命造成了同样的由希望到失望的怪圈。1917 年 3 月，沙皇政权垮台，代之以一个临时政府，唤起了人们的热诚。俄罗斯的广大群众忽然之间显得天生喜爱自由，竟然攻陷了"最后一个巨大的、令人生畏的、似乎坚不可摧的专制堡垒"，如今希望美国这个最自由的国家来帮助他们。[36]情绪激动的美国人的反应，由于战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危机气氛而更显凝重。俄罗斯人选择了献身自由，自然加强了民主国家阵营反对德国专制政权的十字军运动。但是，当俄罗斯军队出现崩溃迹象，企图夺权的布尔什维克打算退出战争时，美国人对 1917 年革命的信心便迅速瓦解了。1905 年已可看出布尔什维克是危险的激进分子，现在他们在美国人眼里不啻是叛徒。列宁及其同事在德国的保护下

从流亡地回到俄国，使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企图拆毁同盟国联合阵线的德国代理人。有一个强人出来绝对控制俄国，也比落到受德国人雇佣的极端分子手中去要好些。

布尔什维克于11月取得权力，产生的后果恰恰是美国人所最怕的。无政府状态盛行，列宁与托洛茨基不出所料于1918年3月同德国停战。有些人还在奢望布尔什维克人（发行量很大的《星期六晚报》形容他们是“渣滓的专制主义”）会创造一个合乎民意的强烈反响。人民也许会很快集合在某些温和又果敢、能止住“布尔什维克破坏之手”的领导人的旗帜之下，使国家回到宪政道路上来并与协约国和好。还有些人多少抱有一点希望，认为俄罗斯也许会要求外国干预来拯救自己。《纽约时报》1917年11月则宣称，布尔什维克是“我们凶恶的、无耻的敌人”。两个月后，这家报纸号召人们行动起来，强调说：“这不仅是挽救俄罗斯的问题，而且是在保卫文明。”[37]

伍德罗·威尔逊对他任总统期间遇上的第三场大规模革命的反应，同公众的反应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战时偏见的影响。他曾欢迎3月份的革命，认为这使俄国成为民主十字军运动的“合格的伙伴”。确实，他是承认俄国临时政府的第一位外国政府首脑。他公开称赞俄罗斯人民的“朴素的尊严”，称赞他们同德国恶势力作战。说他们“事实上心里是想着民主的”；说刚被推翻的专制政府“事实上不属于俄罗斯的本源、性格或意图”。[38]为鼓励俄国人继续同德国作战，威尔逊提供了贷款，并派遣老成的政治家伊莱休·鲁特出访俄国。布尔什维克把俄国带出战争后，威尔逊一段时期内仍拒绝采取反措施，尽管协约国坚持劝说他重振东线。1918年7月，他才最终同意提供军队增援协约国在俄罗斯的联合行动。最后有10000名美国人在俄国东部沿海省份服役，5000人在另一端：摩尔曼斯克。1920年初，对轴心国的战争获胜，和议达成，威尔逊把最后一批美国兵撤回本国，布尔什维克与其对手的内战仍在酣战不休。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威尔逊似乎在重操他在墨西哥革命期间的故伎，事实并非完全相同。可以肯定的是，在俄国革命中，也如同在墨西哥革命与中国革命中一样，他视自己为人民的朋友，他直觉地感到这些人民正在进步的觉醒之中。早些时候，他发现俄国革命领导人担当不起时代赋予他们的重任。但威尔逊也已从墨西哥革命中了解到指挥一场扫荡性的革命的难处。即使是规模有限的干预，也只会激起你想帮助的人民的怨恨，并在自己国内酿成对立。"我对俄国的政策同我的墨西哥政策很相似。我坚信应让他们自己去挽救自己，即使他们会一度陷于混乱。"[39]

虽然威尔逊在1918年作出的这个判断既未阐明他早先对墨西哥革命的处置是否适当，也未阐明当时对俄国革命的政策究竟为何，但是，它的确说出了什么是他自己愿意采取的行动，只有强大的压力才能使他改弦易辙。处理墨西哥问题的经验使他较清醒地顶住了那些压力，虽然这还不足以使他不受大量有关干预的辩论的影响。到了1918年7月，这类辩论达到了高潮，要他对俄罗斯采取断然行动。他的一些顾问以及报刊界支持干预的人替他出谋划策，摘了几条干预的理由，包括：防止战争物资落入德国人之手；便于利用西伯利亚铁路撤出捷克军队；防范日本——威尔逊在若干年前已发现日本有侵占亚洲大陆领土的野心。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协约国加给他的无情压力。威尔逊一旦派出了军队，就无法突然撤回，否则便要损害他同正在和谈的伙伴的关系，并授予日本可乘之机。而威尔逊的确是在悲叹俄罗斯人民的命运，他认为这些人民正在遭受内战的痛苦，遭受只有沙皇时代最坏的日子才能相比的"血腥恐怖"。群众渴望自由，结果却是混乱与破坏，权力从一些"旧的、杰出的、有才能的"独裁者传给了另一些"外行又残忍"的独裁者。[40]

同威尔逊的某些有影响力的同胞相比，威尔逊对俄国革命的反应还算是比较温和的；那些人士感到震惊的程度要深得多，最突出的是在1918年年末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布

尔什维克出卖盟国的行为已不重要，现在是俄国革命的极端行为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评论家对一个狂热的政权普遍感到厌恶，这个政权否定政治，否定宗教，否定财产权，提倡泛爱与无神论，促进阶级斗争，不仅是国内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包括国外的阶级斗争。威尔逊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在政府中属于最强硬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他把俄国新政权同“早年帝王统治的亚洲专制政权”相提并论，同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相提并论。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人类头脑中从未有过的最骇人听闻的、最可怕的东西”，已经使俄罗斯“道德沦丧，内战不休，经济崩溃”。一份参议院的调查报告走得更远，竟称：“布尔什维克的行为是对现代文明的彻底抛弃。”[41]

布尔什维克革命已显示出是对美国价值的直接挑战，并且来得最不是时候。美国人刚刚经历了一次民族自信危机，原有的繁荣与战时被夸大了的超爱国主义已让位给经济危机与劳工动乱。他们带着自身的不安定感，惊恐地看到“布尔什维克病”传播到德国、匈牙利，苏联人已在带头组织“第三国际”。这可能只是一个长时期的颠覆运动的开始，甚至美国也无法规避。曾在俄国红十字会服务的雷蒙德·罗宾斯向企业界发出警告说，布尔什维主义是一颗炸弹，“能把我们的制度——你们的制度——像波旁王室、像埃及法老那样彻底炸掉”。《纽约时报》进一步发挥罗宾斯的观点，在1919年1月提出一个触目惊心的问题：“我们就这样等待着布尔什维克征服全欧洲，然后把他们的专制主义带到别处去吗?”威尔逊已在1918年秋天提出过警告：“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正潜往各处。”一年以后他又启发大家说：某些革命“毒药”确实已渗透“进我们自由人民的血管之中”。[42]

再一次，排外主义者同保守分子结合起来，组织一个运动把国家从革命传染病中拯救出来。1919～1920年的“赤色恐怖”期间，威尔逊政府以及各州与各级地方政府，直截了当地禁止罢工，逮捕激进分子，并试图驱逐与“革命”活动有牵连的外国出生的

人。所有这些，法庭都默不作声。这一全国性的歇斯底里只是在1920年1月总检察长A·米切尔·帕尔默组织了数次大搜捕之后才有所收敛，这几次大搜捕在33个城市中网兜了4000名受怀疑的激进分子，并在搜捕过程中大大地践踏了公民权利。此时，明显的是欧洲顶住了赤潮袭击；而对美国的危害也证明是被大大夸张了。国内的左翼总的来说保持了沉默。合众国在1921年显然安全无损，但列宁的苏维埃政权也同样安全无损。称得上是雅各宾党人与巴黎公社继承人的布尔什维克的危险，将长久萦绕在"富裕阶级"的梦中。

到了20世纪早期，美国人已经目睹了三次革命浪潮，一再经历由希望到失望最后是某种情况下公开敌对这样一个圈子。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自作多情的根源，可以用美国人不熟悉外国情况来解释，更因革命动乱时期不易获得确切消息而增加了困难。再者，革命的原因—— 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种种问题，耗竭人力财力的连年战争，外国统治引起的怨恨——对美国人来说或者是完全陌生或者是已逐渐远去的印象。流亡集团的宣传，无论是新秩序的拥护者或是旧政权的捍卫者，进一步在美国人的视听上投下苦恼的阴影。无知与消息失灵的综合效果，经常可从通常颇严肃的《纽约时报》有关俄国革命的报道中明显反映出来。两年内，该报预言布尔什维克要垮台的消息共达9次之多，并宣称列宁与托洛茨基逃亡、死亡、辞职或被监禁不少于13次[43]。《纽约时报》自己受骗了，因而它的读者也受骗了。

然而，解释美国人对外国革命总是陷入幻灭模式的原因，除了不理解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用的是老早以前亚当斯与杰斐逊用来判断革命的那些严格标准：革命是神圣的事业，指导革命必须将混乱控制在最小程度，必须由受尊敬的公民来领导，树立起来的政治目标不能过高，愉快的结局只能是制订权力均衡的宪法，最主要是保证公民权利与财产权，各种事情都妥妥帖帖地放在应有的位置。换句话说，一场成功的革命，必须符合美国人头脑里

他们所熟悉的自己那场革命的目的、方法与他们自己的政治修养。

美国人解释一场革命自我毁灭的原因，有一个几乎不可改变的倾向，即归咎于外国领导人的个人缺陷以及外国民众不幸的特性。失败的革命的领导人往往被断定有专制的倾向，自私的野心，无能或性格懦弱等因素的不同组合；对于一个在革命与解放的考验中败退下来的民族，则经常从种族的遗传特点去找原因。同盎格鲁—撒克逊人相比，黑人被认为肩负最沉重的种族负担蹒跚前进。东方人与拉丁美洲人稍好些。菲律宾人被认为有没有自由没多大关系，因此美国军队粉碎了他们的革命；而中国人笨手笨脚地弄坏了建立共和国的意图。墨西哥人，就像在他们之前的古巴人，原来有希望建立一个宪法政府，但"黑暗传说"带来的民族特性使目标的实现遥遥无期，也许惟有在美国的教导之下才能实现。甚至欧洲民族的记录也很可怜。斯拉夫人是高加索人中最懒惰的一个民族，理所当然地革命较晚，并且悲惨地失败。法国人在种族特性上非常接近盎格鲁—撒克逊人，力争取得比他们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同样的成功，但即使是在民族性格上相对较小的差异，也会影响到政治上的成熟程度。

美国的观察者在评判这些失败的革命时，也注意到革命种类的不同。反对外国控制的革命，主要依靠民族意志以及可以动员起来反对外国压迫的民众力量。如果这种力量被野蛮镇压——像波兰与匈牙利的例子——失败立即到来。第二种类型：社会革命失去控制，或者是由于领导人的原因，或者由于民众不负责任，这类革命对美国人困扰最大。这类革命之所以令人恐惧是因为其中既有普遍的暴力，有专制手段，又有正面攻击个人自由与私有财产的激进理论。美国观察者认为，没有人身与财产的安全保证，不反对蛊惑人心的政客与平等主义者，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

美国人发现这第二类革命具有很规则的模式。当那些政治与社会的约束（通常受到法规、宗教、家庭与道德的保证）开始滑坡后，生命与财产便落入越来越大的危险之中。结局是革命的恐

怖，土地与财产重新分配，旧统治阶级受到无情打击。革命循环的这一阶段可以想象到的印象便是：任意的、残酷的、无意义的暴力，妇女被强暴，老人被杀害，儿童陷于绝望的境地，卓越的公民被低劣的人拉了下来。如此颠倒的社会迟早将落入一个强人，一个波拿巴之手，为了重建秩序。因此，这类革命结束时，能活下来已是幸运，还谈什么自由呢？法国在18世纪90年代提供了这种模式的第一个戏剧性的例子，然后，似乎为了要加深美国观察者的印象，1848年与1871年又来了短时间的重复表演。俄国人证明了这个模式不是法国一家所特有——的确，它可以在别处重复出现，无一不是可怕的结局。

大多数对外国事务有兴趣的美国人都持有上述观点，但在对革命动乱容忍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正像约翰·亚当斯与托马斯·杰斐逊那样，他们分道扬镳了。追随亚当斯的人，如兰辛，迅速得出结论：在太容易犯错误的人的指导下——何况是外国人！——革命的发展（除非很快遏制）极可能蜕化，社会支离破碎，自由彻底摧毁。兰辛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分析是："人类中愚蠢无知、粗暴残忍的分子，从智慧成功的人们手中夺走权力与财产，并把他们降到了奴隶的地位。"像威尔逊那样的深信自由将最终胜利的杰斐逊派，则倾向于容忍，因为他们相信全人类的解放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在迫近。所有的人都渴望自由，到时候他们就会得到自由。在这过程中，人们确实也会做得"过份"，但他们最后将学会"保存他们的自制能力，保持政府的有序活动"。因此，威尔逊不像杰斐逊曾打算放弃法国那样对俄国表示绝望。[45]

由于杰斐逊与威尔逊都坚信所有的人都有天生的能力求得自由，因此他们两人都倾向于进行干预，目的是去指导革命。亚当斯与兰辛则相反，他们也主张干预，为的是去把那些革命领导人通统抓起来。由于同样的原因，杰斐逊与威尔逊能容忍无序状态，承认自由的传播是缓慢的；而亚当斯与兰辛则盼望出现一个强人。对于前两个人来说，一个强人的出现，乃是革命剧痛的象征，只



五首怪——巴黎怪物

附注：从这些插图可以看出占统治地位的美国人对社会革命的反应是极其反感的。这场革命似乎直接威胁到道德制度与人身安全。图 24 作于 1798 年，当时三位美国代表在法国断然拒绝一位局长的索贿要求，这幅图把法国统治机构描绘为正在发出威胁、恐吓的五首怪，怪物手中拿着匕首与火炬。右边，一名雅各宾党人、一个魔鬼、一个黑人在享受一场革命的"市民宴会"，菜肴竟是青蛙！他们身后有一个放荡的、母夜叉似的自由女神，她坐在一个躺在断头台上、头颅已被砍去的受害者身旁。

有当这个强人把革命拉回到原来的轨道然后本人功成身退，他才能受到民众的欢迎。对于后两个人来说，出现一个受到欢迎的强人乃是因为他恢复了秩序，使社会走出了混乱。他们认为这是黯淡的革命循环的必然产物，最早在法国革命中出现，后来又在俄国革命中重现。最初的温和让位给恐怖，恐怖又让位（按兰辛的说法）给"反对新专制的暴动，并由专制的军事势力来恢复秩序"。[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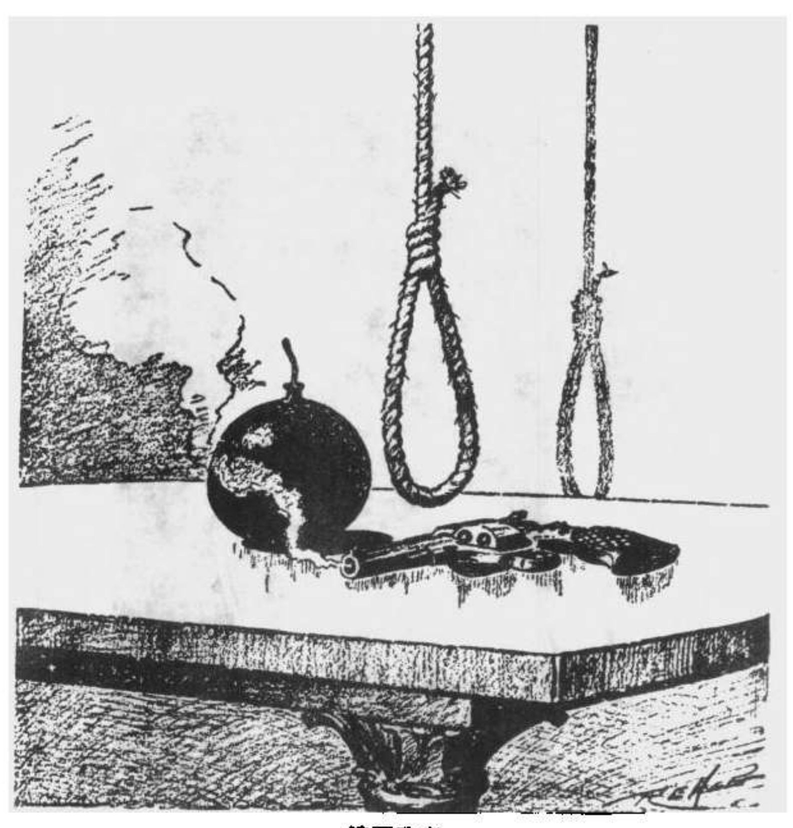
20 世纪第二个十年，就像早些时候一样，美国国内对革命的



劳工解放与诚实的工人

附注：1871年的巴黎公社与第一国际的活动产生了相似的烦人景象，托马斯·纳斯特1874年把共产主义画成鬼怪模样，勋章上注明"法国病"，正在引诱诚实的美国工人。

舆论的差异，不仅仅是由于个人性格与政治哲学的不同。在上述两边的广大群众与一小群主动关心对外事务的美国人中，社会经济水平（以及延伸出去的道德伦理背景）起到有力的（虽然并不



俄国政府

附注：1919 年与 1920 年出现了一批有关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漫画（图 26—28），继续把社会革命与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和破坏等同起来。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在国内依赖暴力工具维持权力，在国外则用“赤化”威胁人类文明与美国方式。在图 27 中，布尔什维主义被表现为一个粗野的、典型的斯拉夫人。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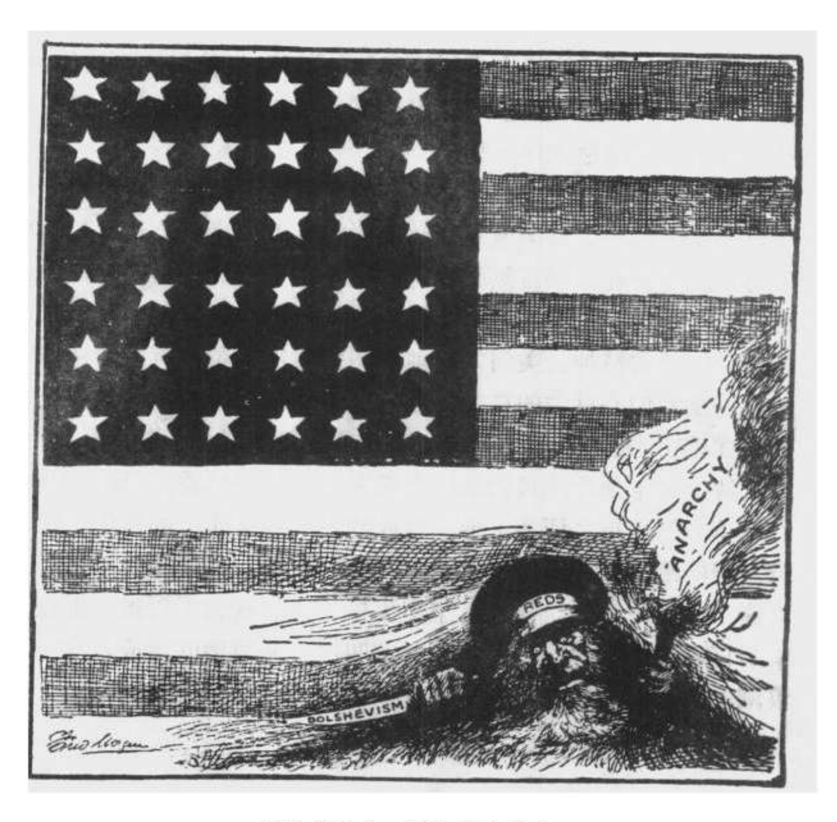
总是那么明显的）作用。在美国的下层阶级看来，伴随着革命与激进的政治理论而来的，总有些恐怖行为，这主要来自近来欧洲的影响。另一方面，拥有亚当斯派观点的人，往往是富裕的、认



在门槛上

同英国文化的社会上层。后者害怕所有革命潜在的极端性，害怕对他们的秩序原则的绝对挑战，甚至也许更重要的是，害怕对神圣的财产权的挑战。

这个享有特权的精英阶层，同排外主义者结成同盟，一再操纵人们注视动乱势力，带头动员公众反对任何紧迫的威胁。[47]鉴于他们在报界、公立学校、高等教育界及教会中具有巨大影响，因



赶他们出去，不许他们进来

此他们致力于培育一种不利于革命动乱、尤其是破坏财产权的动乱的政治环境，并使之永久化。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说得很确切："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热爱财产、更担心财产；没有别的地方会有那么多的人不喜欢那些威胁要改变财产权（无论何种方式）的理论。"[48]无论社会上存在着怎样的财产不平等现象，都是合乎自然的，对人类的进步是必要的，因此是生来值得赞美的。政治变动是可以的，但必须慢慢来，并且在现存体制内部进行。向这些原则挑战的人将使自己被隔离在政治尊荣的界桩以外。这个精英阶层不仅致力于自己的社会不受革命的传染，并

且还要设法去医治从根上患了疾病的外国革命。他们凭借地位、财富与空闲，向高层政治部门提出建议，对待那些革命应取何种政策，对于公开辩论应作何种安排。

革命危险的恼人偏见，在富有的精英中十分敏感，他们发展成为一套三部曲，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甚大。违反公认的政治标准的事件在海外激增自然因本身的重要性引起关注；同时，倒也正好使英裔美国人更加自信本民族超常的种族优越性以及追求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美国人对他们认为适当的革命行为的特殊理解，以及他们心目中的进步的政治观念，加到一起，更加强化了种族优越感，更加证实了美国人有理由去评判他人、指导他人，并且缓解了对干预外国可能给国内带来有害影响的恐惧。反过来说，别人革命的挫折，证实了他们种族的低劣或文化上的低劣，因此极需美国给以教导。这些对革命的总的看法、尤其是对布尔什维克这个幽灵的看法，如今已牢牢生根。这些观念深深地扎根在政策制订者的头脑中，形成他们对第四次革命浪潮的反应，这一次浪潮的涌起，是在本世纪的中叶。

五　20世纪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

历史不是你想出来的。你只能记住历史。其他所谓的历史通统靠不住。

——沃尔特·C·塞勒，与罗伯特·J·耶特曼

1066与诸如此类

美国20世纪的外交政策已有许多人思考过，撰写过。描述的措词是：追求海外市场对国内的稳定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它还曾被说成是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与头脑糊涂的道德主义者、悲观主义的政客和反复无常的民众间斗争的延伸。这些探讨各有它的价值，但都不完整，因为他们未能恰当地找到美国政策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这就是植根于18世纪、19世纪的意识形态的深远与广泛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力量与持久性至今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恰好，本章就要强调说明这个问题，并且希望研究这一历史阶段即从1901年至1965年这一时期的人们从此记住，在总的评估中，意识形态至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美国人进入这个外交政策意识形态贯彻始终的20世纪，已为一系列非凡成功证明其正确性。第一代国家领导人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强大、自由，以及种族与革命，他们已领导国家平安地通过了英法敌对的大漩涡，并提出了统治本大陆的问题，短短的时间内便制服了欧洲列强、墨西哥与许多土著民族。世纪之交，目光朝外的美国人回顾这些成就，把它们看做是当代同样激动人心的成就的热身赛。

从美国—西班牙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这段混乱时

期，已经很有成效的传统的意识形态继续给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精英们提供了一副指南针，并受到更大成功的鼓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时期的两位占支配地位的人物：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可以看出他们在掌握上述意识形态方面，因侧重点不同而形成观点分歧。罗斯福（自称是汉密尔顿派）与威尔逊（同杰斐逊有强烈共鸣）在类似问题上的手法也明显不同。[1]

罗斯福出身纽约一个世家，具有无穷的精力、好奇心与自信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把"上升到世界级强国"作为美国政策核心观念的特别鲜明的代表人物。罗斯福狂热地相信美国有她自己的使命。为解决同胞们的疑惑，他有一个典型的有力的直接回答："凡是不相信本国实力的增长对于那些不幸的被剥夺的愚昧民众有好处的人，就不值得称赞。"[2]

走向国家强大的道路要求持续不断的斗争，因此，罗斯福始终在斗争。他年轻时是一个遇到什么就禁不住要给它分个类的分类家，毕生对自然秩序及其竞争特点进行研究，兴趣甚浓。19世纪80年代，他劲头十足地把达尔文主义应用到国际关系上去（对国内事务也一样）。国家间的冲突合乎自然规律。适者生存，弱者被打败、被消灭。他很快得出结论："所有伟大的、好支配人的民族，都是善战的民族。"[3]处在一个充满竞争、有时很凶暴的世界上，美国具有崇高的责任——把挑战找出来，制服它们，使强者愈强，这是生死攸关的关键。罗斯福的这些达尔文主义理论同理想化的加尔文主义掺和到了一起，但他也忧虑可能出现道德堕落。在一一历数不断出现的谋求私利与腐败行为后，他大声疾呼公众拿出责任心与自我牺牲的精神。道德松弛使一个个人的前途黯淡，一个国家亦复如此。对美国来说，商业与工业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人们的基本追求应当适应国际间的自我牺牲与不自私的原则。只有果断地抗击对手，承担起拯救停滞的、走下坡路的民众的责任，美国才能保持他们生气勃勃的性格，向强大的目标前进。

罗斯福有关国家强大的"狂热的"概念恰好同他有关种族的

成见相吻合。罗斯福在这个题目上曾经贪婪地研读了许多书籍，自己也写了大量文章；为表达他的意思，他既可以熟练地运用拘谨刻板的貌似科学的语言，也能运用老百姓交谈中常用的粗俗词汇。他把世界看做是种族竞争以及国家竞争的舞台。文明种族与野蛮种族间的冲撞是无可避免的；进步只能来自文明人“制服他们的野蛮邻居”。毫不奇怪，罗斯福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后来他喜欢用“讲英语的人民”这个词）是最先进的种族。1881 年，他第一次出击（当时是一名作家），形容盎格鲁—撒克逊人“大胆又刚毅，冷静又聪慧”。美国人这个盎格鲁—撒克逊的分支，通过边疆的经历变得更强大，而较小的民族只能成为“天然的牺牲品”。边疆问题解决后，美国人该同他们的表兄弟英国人一起加入海外领土的角逐，并在“摇篮战事”中对付众多的低等级的民族，主要是东欧人、拉丁美洲人与黑人。[5]

对于那些“低等级”，罗斯福看不出有什么长处可言。他发现中国人一味忍受，服从，懦弱，无纪律（被贬称为“chinks”）①不值一顾；菲律宾人比野蛮人好不了多少，他们自己只懂得“野蛮状态，原始风尚，漆黑一片地混乱”。在东方人中，只有日本人逸出了他的苛评。确实，日本人 1894～1895 年打败中国，十年后又打败俄国所显示的勇猛，逐渐赢得了罗斯福的称赞。拉丁美洲人（“dagoes”）②则是——听熟了的陈词滥调——热情然而懦弱，政治上不够格，令人吃惊地人种混杂。印第安人给罗斯福的印象是“肮脏邋遢的野蛮人”，他们将无可避免地成为被文明吞没的落后民族。只有他们的男子气概与嗜好战争才使他们免受彻底轻视。罗斯福在他的种族等级表中，把最低的一级留给了黑人，说他们才智低下、道德低下，“脱离最粗野的野蛮人时代还只有几代人的时间”。同他的上一代人一样，罗斯福把海地的“半野蛮的黑人”称

---

① 从 Chinese 转化而来；chink 的意思是弱点、裂缝等等。——译者

② dagoes 是蔑称，指肤色浅黑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译者

作“darkeys”①——这便是政治上无能的主要依据。

罗斯福对革命的态度，也同社会上的意识形态主流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他的种族观念生发出来的，并同他的阶级地位有关的保守主义完全契合一致(西奥多·罗斯福生长在一个古老、富有的家庭，在私立中学与哈佛大学接受教育，曾旅行各地，同波士顿最显赫的家族联姻)。[6]落后民族的革命，无论是针对控制他们的先进民族，还是为了急于加快社会与经济的前进步伐，都是禁忌的，只能以一场灾难告终。换言之，像他所支持的殖民者在菲律宾的那种统治，比民族自决要好得多；靠普及教育与温和的政治改革项目来推进的改良运动，最有利于推动进步。如要找一个反面的例子，1905 年的俄国革命最能说明问题。激烈的变动注定要使社会崩裂、后退。要是说阶级利益与阶级冲突在人们当中产生了敌对的话，那么，种族是造成人们分裂的根本原因，种族冲突是对国家存亡的根本挑战。这种看法有效地缩小了可接受的革命的范围，只有那些优秀人抗争劣等人统治的革命，才算是可接受的革命。这样，对罗斯福来说，革命（美国的情况当然也在其内），如果用上述单一的条件来衡量，总有些反常。

罗斯福的观点引导这位即将登台的纽约政治家在 19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支持一种扩张的外交政策。德国人找借口控制萨摩亚，吵吵嚷嚷地凌辱智利人；道德上不负责任的人反对兼并夏威夷；英国人干预美洲；……为对付所有这些挑衅，罗斯福号召国人担当起警察与殖民地主人的角色。美国应当同欧洲强国平起平坐，帮助“恢复秩序”，并须建设一支海军方能承担起那些新的国家重任。当 1899 年有关菲律宾的辩论甚嚣尘上之时，罗斯福一再重复大家听熟了的有关在世界事务中“全力以赴”的号召，认为这才符合美国人民的卓越品质。“我们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满足于自己的国土被不体面的疾病一寸一寸地腐烂掉。”一个“不好

① darkeys 系对黑人的蔑称。——译者

战的、孤立的”美国，“最终注定要落在别的那些未丧失男子气概、具有冒险精神的国家的后面。如果我们打算成为一个伟大民族，我们必须信心百倍地力争在世界上发挥重大作用”。[7]

同罗斯福一样，威尔逊也赞同那种既定的意识形态，但有他自己鲜明的南方人的理解。威尔逊在美国内战以前在南方出生、长大，他的家庭同当地有特权的长老会派教会有密切关系，他由此获得社会地位。求学使他从南方转到中部大西洋沿岸各州，他在那里完成学业，在教师与学者职务上发挥他的才能。他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这使他有机会参与本州与全国的政治活动，1913年他将近 60 岁时当选为总统。

威尔逊同罗斯福大不一样，他像家乡的许多人一样，很晚才认识到扩张的外交政策对国家的强大至关重要。直到发生美西战争前，威尔逊对外交事务一直是漫不经心的。最初，他同许多南方人一样，对兼并菲律宾表示怀疑。然而，到 1898 年 11 月，他勉强得出结论，与其让德国或俄国去取代西班牙，不如美国去接替西班牙。美国代表“白天的光亮，而他们则是黑夜里的光亮”。[8]

1899 年参议院赞同了麦金莱的合并政策，而麦金莱于次年得以连任总统，更消除了威尔逊曾有过的怀疑——国内至少曾有过一些不一致的评论。威尔逊接受了新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说美国已越过一个分水岭，古老的孤立主义已遗留在后面，开始了一项世界事务中的新的“大事业”。他形容这个转变是“不可避免的”与“自然的”。已不存在西部边疆的美国人需要新的市场，不管怎么说，他们居住的世界已经变小了。威尔逊在逐步警告人们警惕扩张性外交政策的同时，有时却用了近似罗斯福的语言。往后就该“使劲”了，因为美国已成为一个“大国”，命定要伴同英国充当“还在政治幼年时期的不发达国家”的耐心的教师。威尔逊在 1904 年宣称，盎格鲁—撒克逊人已承当起责任，要按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同时，他还警告：“把他们的手抽回来无异于羞辱他们。”[9]

但是，威尔逊并不认同罗斯福有关大国必然相互敌对的看法，以及罗斯福对种族斗争的固定看法。从他自己的传统来说，他比较注重道德影响，通过和缓地帮助弱者与受难者，来净化美国人的灵魂。海外良好的工作可以考验"我们的政治品质，我们的政治能力，我们的政治原则，甚至我们的政治组织"。威尔逊首先选择在躁动中的亚洲来开展他的活动。他坚决认为美国有责任"在东方的开放与转变中担当一个角色、一个引路的角色"。例如，菲律宾是吸引他去注意太平洋的第一个场所，这个地方需要美国去学会殖民地管理方法，引进秩序，指导"土著人"通过"长期学徒生涯"去学会自治，以此来表明"我们心中所有的只是他们的福利"。[10]

威尔逊在争取自由与自由制度方面与杰斐逊观点相近，这可从他对革命的态度看出来。这些观点使他成为一名对革命饶有兴味的观察者，有时甚至成为革命的朋友，这是西奥多·罗斯福所不可能做到的。作为一名自豪的南方人，在南北战争与"重建运动"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威尔逊，可以一眼看穿那些否定自决权的人。他确信人是生而平等的。人们争取自由就像一团火焰，正在燃烧得"越来越炽热"。此处熄灭了，彼处又燃起。他确信英裔美国人的自由思想与自由制度是普遍适用的。作为一个研究政治学的学者，威尔逊长期以来把自由看做是英裔美国人传统的精髓，自由的推广提高了人类进步的水准，自由制度是人类的伟大成就之一。英国的议会制度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制度，美国独立革命对他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促使"世界其余各地从内心渴望自由"。[11]

另一方面，依威尔逊看来（罗斯福也作如是观），法国革命只能使人想起革命的危险——企图在太快的时间内获得太多的自由以致出现恐怖的后果。他 23 岁时，对巴黎公社仍记忆犹新，他曾探索法国革命出岔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法国人的本质"与生俱来并长期受着准奴隶状态的熏陶"，为此"只懂得不是服从就是推

翻”。15 年后（1894 年），在埃德蒙·伯克的著作的影响下，威尔逊曾谴责法国革命是“极端邪恶与堕落”观念的源泉。法国革命确凿无疑地证明，没有了秩序，既不能有自由，也不能有进步。经过更成熟的思考，威尔逊也同前辈杰斐逊一样，终于认识到法国革命尽管有过所有的过失，但至少推翻了旧政权，并为全欧洲最终创立新的自由制度清出了道路。

所有的民族大概都想要自由，但他们能否取得并保住自由，要看他们属于何种种族，这正是威尔逊的意识形态行囊中的第三要素。在这个问题上，地方的影响，杰斐逊观点的影响，仍在起作用。威尔逊从在大学任教到最后进入白宫，始终带着白人的优越感与对黑人的恩赐观点。对于一个从蓄奴家庭中成长起来、以后又衷心接受吉姆·克罗法律①的人，还能有什么别的指望呢？自由这一衡量进步的主要标准似乎同黑人无缘。威尔逊认为黑人不是这方面低劣就是那方面低劣，因此把他们降到种族等级的最低级（他在讲得很拿手的“黑家伙”故事中总把他们当做耻笑的目标）。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盎格鲁—撒克逊人当然属于最高级。特别是，对于黑人在发展自由事业上、在生殖方面的“贡献”，他尤其不敢恭维。他的强烈的亲英情绪（来自他家乡的又一贡献）以及很重的英国种族气质，反映在他的学术论文中，他称赞英国的政治制度比本国的政治制度更优越。他喜爱英国的事物一直扩展到礼貌举止与文学、哲学。[13]

对那些列在种族阶梯中间几级的民族，威尔逊根据它们争取自由观念与自由制度的能力——或耐心接受教导，或小心地模仿

① 吉姆·克罗是从一首黑人民歌中借来的名字。吉姆·克罗法律即指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的法律。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美国南方各州（市）纷纷通过立法，把种族隔离合法化。1896 年最高法院的裁决更肯定了种族歧视，使黑人在南北战争后的“重建运动”中获得的成果丧失殆尽。直到 1944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吉姆·克罗法律”才开始受到责难。经过二十余年的斗争，种族隔离范围逐步收缩，直到 1968 年通过公平住房法案，才最终结束了种族歧视的“吉姆·克罗法律。”——译者

外国的榜样——给以不同的对待。印第安人在这些方面是全然失败的，因此被认为是平凡庸碌之辈，偶尔还成了被自认为行为正当的渴望土地的白人手下可悲的牺牲品。对中国人，他是从传教士的写作中了解的，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但过着陷于静止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健康的。但他也看到中国人是“可塑的”，可容许有生气的西方人来对他们加以改造。日本人是学习西方的好学生，引起威尔逊的尊敬。他们显示出“非凡的精明，非凡的观察与学习的能力”。拉丁美洲人似乎没有引起威尔逊的兴趣（即使有一些兴趣，拉丁美洲人种族间的通婚现象给这位南方之子的震动无疑也甚于罗斯福）。[14]

一旦进入白宫，罗斯福与威尔逊先后都遇上了同美国有关的三个关键地区（拉美、东亚、欧洲）的政策，既有坚持老观念的问题，又有新老观念的不同结合与不同应用的问题。美国政府装备着一支世界级的海军，一支适于在新边疆巡逻的远征军，一套专业化的外交事务官僚机构，遂以前所未有的生气与胆略开始办理世界大事了。

罗斯福与威尔逊两人对待拉丁美洲的政策非常接近，尽管也有些不同之处。他们的前任已做了大量工作，指明了方向，现在，他们受到那些我们已熟悉的因素——国家强大，种族优越，防范政治动乱——的推动，开始要求地区性的支配地位。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于1895年开了第一炮，警告英国与其他大国都不得干涉美洲事务。奥尔尼后来说，这正是时候，该让美国“实现它在世界列强中的重要位置”，并且“接受本属于它的指挥地位，一只手掌握全部好处，另一只手抓起所有的负担”。[15]干预古巴内部冲突，以及占领古巴与波多黎各，便是美洲战役的几个大步骤。

罗斯福继续主张美国对拉丁美洲承担指导与监督作用。他不能听凭拉美人的社会堕落下去，阻碍“新世界”文明的前进，并因道德崩溃引来境外大国的干涉。罗斯福把古巴降为保护国，这是他撤退美国军队的补偿品。哥伦比亚的领导人妨碍他开凿穿越

巴拿马地峡运河的计划，他便又增加了一个保护国。罗斯福把那些“波哥大的愚蠢、嗜血的腐败分子”拉到一边（他还把他们称做“卑鄙小人”、“低能强盗”），他要让巴拿马人起来搞一场革命，通过这一过程，达到他自己的目的。1904年，纽约的前警察局长①把整个半球都当做了他的巡逻区。门罗主义给了美国人权力去迫使放纵的拉美人“服从文明社会的主要法律”。罗斯福决心使这一地区“稳定，有序，并且繁荣”。[16]

威尔逊进一步加强了对拉美半球的影响。他认为他的做法与罗斯福的“大棒”模式或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金元外交”相比，更利他主义一些。他经常说要为拉美人民尽邻居的义务，要教他们学会选举出好人。但是，由于他好自以为是，再加他始终担心狂暴的墨西哥革命党人与不服管束的海地黑人在政治上无能，因此他的政策极具进攻性。他曾17次派遣军队去驱除当地的不稳定妖魔与愚昧妖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出于恐惧，他又占领了丹麦的维尔京群岛，使那些旧世界的恶魔——德国人无法作祟。

东亚虽遥远，但却是帝国间争夺的热点。19世纪90年代晚期，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迫不及待地策划了一系列行动。他们吞并了夏威夷，占领了菲律宾，对中国则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东亚刮过了这一阵疾风，接着又让位于一个不确定的时期。罗斯福入主白宫，宣布太平洋是美国的内湖，东亚是美国的新边疆。美国人要在这些地方受到考验，正如他们从前在大陆边疆受过考验。“我们或是取得伟大的成功，或是遭受伟大的失败。”[17]但罗斯福很快认识到这一壮观的景象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决定转而承认日本的支配地位，让日本起到一个先进的州或地区强国的作用。那就意味着日本，而不是美国，要承担起主要责任去监督中国，教导中国。这样，事实上门户开放的意义已被缩小到最低程度，他

① 指西奥多·罗斯福，他曾于1895～1897年担任纽约警察局长。——译者

已没有兴趣去对一个积弱已久的中国去实行什么家长式的统治了。后来，罗斯福又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因此撤销了这一政策，好在此时日本已保证可在战略上控制住羸弱的菲律宾人。

罗斯福的东亚"现实政治"有它的局限。他作为一个决策者同意了日本利益在中国的优先地位，但他不能公开抛弃美国是中国的保护人以及至少从长远看中国是一个重要市场的理论。他也不能不理会菲律宾人，即使他已发现菲律宾人是"我们的阿基里斯脚跟"。①放弃菲律宾群岛，将损害美国的强大，并迫使菲律宾人"完成他们最不可能完成的拯救自己的任务"。当地政府总是"在专制主义与无政府状态之间"摆来摆去。因此，罗斯福认为美国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照这样子再过 20 至 40 年，才能使菲律宾群岛文明起来；同时，在太平洋常驻一支海军，足以使日本俯首贴耳。[18]

对威尔逊来说，美国在太平洋占优势的概念，远比一项姑息日本的不体面政策更吸引人。威尔逊感到有义务帮助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实行民主政治，保护他们免受日本欺凌。尽管欧洲发生了危机，但这没有转移他的注意力，减弱他往中国派遣传教士的努力。但是，在战略上如何加以拘束的问题上，威尔逊无计可施，而罗斯福却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威尔逊在执政时期虽一再声称维护在中国的敏感利益，却未采取多少实际行动。

美国领导人在世纪之交时，在他们对全球的先入之见中，把欧洲看做是遥远的第三位。然而，15 年后，英德交恶使欧洲一下子就上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前线。这一戏剧性发展的关键，即在于美国制定政策的精英们由于强烈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产生的对英国由来已久的友好关系。英国人是美国人的近亲，两国共同

---

① 据希腊神话，阿基里斯（或译阿喀琉斯）出生后被其母倒提着在冥河水中浸泡过，因此浑身刀枪不入，惟独脚跟是一致命弱点。——译者

献身于有序的自由社会、自由贸易以及国际关系的稳定与进步。两国深信一个好斗的、专制的暴发户德国，是他们的共同敌人，因此给上述感情色彩颇浓的理论又添加了强烈的战略意义。德国在萨摩亚的阴谋（真实的或想象的），以及中国、菲律宾、拉丁美洲，都给美国官员带来了麻烦，只有英国人激起了美国人友好的情感。[19]

西奥多·罗斯福开始把英美之间的"缠结关系"转化为一种持久的英美友好的外交关系。在他任总统的最初几年内，英国从美洲作战略撤退，使美国大受其益；为了回报，1905年罗斯福在摩洛哥危机中倾其全力对付德国，助英国一臂之力。罗斯福以调停者的身份小心翼翼地然而是明确无误地支持英法联合，以挫败好捣乱的威廉大帝。

西奥多·罗斯福对欧洲政局的袭击，证明只不过是同样亲英的伍德罗·威尔逊更戏剧性的行动的序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威尔逊在他的主要顾问爱德华·豪斯、罗伯特、兰辛等人的鼓动下，把他的中立政策弯向有利于英国一边，给柏林找了点麻烦——在海战标准上，限制德国比限制英国更严。他承认，他的指导思想"不是法律的技术原则，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正义与博爱的重大原则"。他认为伦敦比柏林正确。威尔逊友好地默许英国使用实际上违反美国中立原则的经济战争手段，而对德国潜水艇的攻击则发出警告要他们"严格说明"，并且几乎公开以战争相威胁。[20]威尔逊的姿态恰好符合英国的战略，从而激怒了德国人（英国实行海军封锁使德国人伤亡惨重），并受到了政府成员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抵制，布赖恩代表少数派的意见，反对陷入欧洲冲突。

1917年1月，德国决定动用潜艇，此举倒还没有迫使威尔逊迅速表态。威尔逊仍在犹豫、琢磨美国参加杀气腾腾的欧洲冲突的前景。最后，到了4月，他认为美国确实"应该贡献她的鲜血与力量"同欧洲的民主力量并肩作战，反对一个野蛮的威廉大帝的德国了，于是便要求国会批准宣战。[21]对威尔逊来说，只打倒德

国是不够的。他还要打败德国所代表的人类社会祸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独裁专制。对他来说，打胜这场战争只是全球改革的序幕。争取到前途光明的和平，并打破“怀疑——仇根——冲突”的恶性循环，流血牺牲也是值得的。

1918～1919年战后协商期间，威尔逊力促通过他为改善国际关系拟订的“十四点纲领”。那个尽善尽美的意识形态文件把美国人的承诺推进到新的边缘——在国家强大与解放全人类的名义下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国际政策。可以期望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占统治地位与英美外交合作时代的到来。威尔逊所设计的国际秩序包括：自由贸易，停止军备竞赛，禁止同盟国之间的秘密外交，禁止大屠杀，废除帝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全欧洲实行民族自决。德国、俄国以及刚从奥匈帝国解放出来的一些国家，都将实行温和的、民主的、符合宪法的革命。这些国家，以及其他民主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国际联盟”，将使世上的恐怖、专制与侵略活动从此绝迹，并使各个民族的“普遍动荡”合理地平静下来。[22]

威尔逊的新秩序并没有实现。盟国在媾和活动中显得目光短浅、分崩离析。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匈牙利传播，提醒威尔逊注意到“预订自由”的困难。当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流行时，所有的美国人面对着一场令人烦恼的、同他们自己的观念全然对立的革命。除了这些困难之外，威尔逊在国内赢得必要支持的机会告吹了。在没有达成必要的两党协议的情况下，他生硬地坚持在巴黎协商谈判的条件。有疑虑的参议院拒绝了他的和约，威尔逊于1919年秋天直接向“人民”呼吁，仍无结果。甚至在他孤单地躺在病床上时，他仍在编造能挽救他的梦想的计划，直到最后，1921年3月，作为一个心力交瘁的失败者离开白宫。

威尔逊曾两次成为批评者的牺牲品。有一次，一小群受到早年杰斐逊观点影响的人士，从意识形态角度非难威尔逊。其中有

些人1917年时就曾采取这种立场反对总统的宣战请求（参议院有6票反对，众议院有50票反对）。反对派中的一位领导人乔治·W·诺里斯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人，他所反映出来的美国19世纪末人民党主义的观点，在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非英裔的社群中仍有深刻影响，他们指责有一个亲英的精英集团正在把美国“推进一场由财富指挥的战争”。[23]银行家把大笔贷款贷给同盟国，军火商从战争中获益，宣传家被雇佣来用利他主义的名词掩饰自私的动机，以此来鼓动普通老百姓，让他们去打仗，去死亡，去付出代价。少数未受战争热感染的知识分子代表之一伦道夫·伯恩警告说，威尔逊所说的所有有关民主的神圣战争的伪善话，只意味着美国人在无效地乱管别人闲事的时候，耽误了自己的民主。

在对威尔逊的和约进行辩论的过程中，人们可以看到，诺里斯、罗伯特·拉·福利特爵士（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人）以及其他想法相同的参议员们，仍在追随早年杰斐逊的观念。到海外去追求国家的强大将扼杀国内的改革，限制国内的自由。艾伯特·J·贝弗里奇曾是竭力鼓吹通过海外活动以求国家强大的国会议员，现在也支持上述观点。他赞成改革，但战争势必强化亲英倾向；他发现商业与金融利益对改革会起到障碍作用；他还发现外交政策背后有一只隐秘的手；这些发现使他的想法发生了剧烈转变。他说，美国人最好把精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要过好生活，一个面积广袤的大陆要发展”，所提出的挑战已经够多的了。他一再强调说，美国的使命是“向人类提供一个榜样：快乐与富裕来自渐进的、自我约束的自由”。贝弗里奇拒绝威尔逊的“混血的国际主义”，他号召美国撤出欧洲，远离欧洲，最好是给世界起个示范作用。[24]

1920年的总统选举，虽然很难看做是对威尔逊所想要的国际联盟的“伟大庄严的公民投票”，但确也说明了全体选民对评论界曾表示过的异议有了几分认同。威尔逊匆忙倒向英法阵营得罪了1/7的国人，因为大约有一千三百万同胞出身德国或爱尔兰，或者

父母是那两个国家的人。这场战争给全体美国人带来了牺牲，并把严密的组织强加在美国人身上，而在复员遣散时，又带来了经济衰退与更多的困难，尤其使工人与农民的生活大为艰难。大家都怀疑威尔逊的行动主义是否明智，这种怀疑在有关国际联盟的辩论中已有反映，后来当欧洲又回到战前的堕落道路上去时，这一怀疑加深了。1920年不同意的意见已普遍传开，这可以从共和党人沃伦·G·哈丁的一边倒的胜利（获61%的选票）反映出来。20世纪30年代，欧洲又告分裂，越来越多的公众接受了新杰斐逊派的论点，批评威尔逊的欧洲十字军运动代价太高——花费1000亿美元，牺牲10万余人的生命——而除了使金融业与工业精英获利外，并无其他结果。1937年初的一次民意调查证明，人们对又要重复上一次战争的反感并未减退。70%的美国人把威尔逊介入欧洲冲突视为一项错误。[25]

批评派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支持之后，更加坚持同扩张的外交政策作斗争。最初，他们的主要发言人是威廉·E·博拉，来自爱达荷州的共和党人参议员，1925至1933年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在博拉看来，美国应是一个道德方面的样板，维护它的利益的最好办法就是同世界保持一种超然关系。介入外国的纷争，参与军备竞赛，只能鼓励国内的专制倾向与军国化倾向。美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促进贸易、促进控制军备，让别人——甚至拉丁美洲人与俄国人——去走他们自己的路好了，美国不必去判断他们的爱国主义或革命方式究竟属于哪种牌号。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杰拉尔德·奈起了明显的领导作用。这位来自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人以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调查了银行与军火工业，使广大民众确信“死亡商人”的确正在引导一个懵懵懂懂的国家走向战争。

受到欧洲正在迅速构筑另一场冲突的警告的震动，奈与其他几位国会议员、和平团体、进步人士、农业地区激进分子以及中西部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组成松散联盟，着力于防疫性的宣传活动，

激励公众抵制亲英派的精英，并限制总统的决断权限。他们决心防止出现另一位使国家介入旧世界争吵的伍德罗·威尔逊，他们成功地推进了强制中立的立法，有人甚至提议：今后总统决定参战必须先进行公民投票。到1937年，后一做法受到70%的美国人的支持，国会里的比例也相仿佛。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国家已无心去追求另一场世界战争的荣耀了。

然而，主张实行扩张的外交政策的人仍在继续发挥影响。其中最出名的是一群有影响的共和党人，包括：伊莱休·鲁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菲兰德·C·诺克斯，亨利·卡伯特·洛奇，查尔斯·埃文思·休斯，弗兰克·B·凯洛格以及亨利·L·斯廷森。他们都具有150年来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典型特征。他们都是白种男子，出身名门，生活优裕，受过良好教育，交往都是上层。他们在种族取向上都是自觉地亲英，并且无一例外地都是清教徒(通常是英国国教或长老会派)。20世纪出现的变化一般是加进来一两个北方人或东部人，来自东北地区各城市的越来越多。这些人接受正式教育都在私立学校与常春藤大学①以及法律学校，然后又学习外交事务作为补充性的非正式教育，然后再去英国与欧洲大陆游历、进修。他们首先在法人团体中充任律师，然后获得一份律师公职，通常是通过政府部门指定。他们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声音，因在社会精英圈、高等学校和在接近官方的俱乐部与团体(其中最重要的是1921年创立的外交关系协会)内一再对人们灌输而影响剧增。[26]

这一群著名共和党人在有关国际联盟问题上，再次对威尔逊开展了批评。但是，他们同总统的争吵，至少在意识形态方面来说，有点像是家庭内部争论：如何才能最好地承担使国家强大的

---

① 一般说来，美国的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教育质地高，富裕家庭子女一般都进私立学校。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指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等几所东部第一流名牌大学。——译者

责任。他们决不是提倡孤立主义，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同意威尔逊的想法：美国已在世界事务中获得显著地位，它有责任去促成一个更有秩序、更加公平、更加自由的世界体系。他们只是在某些特定方面不同意威尔逊的政策。他们无法接受国联盟约第十款所说的意义含糊、不符合美国宪法的义务——该款要求所有会员国都参加对任何侵略行为的抵抗。同时，他们无疑也在策划别的国际契约。洛奇、鲁特、诺克斯提出同法国成立防御同盟，筑起“我们的篱笆与前哨基地”以对付一个正在恢复活力的德国。[27]

洛奇是一位资深政治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他于1919年站出来作为发言人说出了他们的不同意见。他不能接受一个将分割美国主权与国会权威并可能迫使美国做它所不愿做的事的国际联盟。但他也格外强调同意国家应追求强大，其用词非常接近于威尔逊的语言。不久前的两次战争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同西班牙的战争“标志着美国进入世界事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战争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无法挽回的……”参预欧洲冲突后，美国人认识到他们新的“世界性责任”。如今，紧接着战争的结束，美国人必须为他们自己决定用什么方式去“为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作出最大的服务”。[28]

这些共和党人挫败了威尔逊中意的干预方案，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计划。在1920年总统选举过程中，他们督促哈丁①向欧洲明确表态，并同国际联盟及其附属机构世界法庭建立某些联系。这些努力收效甚微。然而，随着哈丁获胜，他们的党又重新掌权，于是在1921～1933年间便有了第二次机会。休斯、凯洛格、斯廷森三人在此期间先后担任国务卿，在政府中享有很高权力，而总统对外交政策既无兴趣更无经验。这三人都连续主张同这个新的国际组织建立某些正式联系，而同大西洋对岸的同种人则保持密切的外交接触。他们避开威尔逊的大话与高调，却蛮有信心地把注

① 美国第29任总统（1921～1923年），共和党人。——译者

意力转向其他一系列问题，诸如军备控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恢复经济，政治稳定等。在空前强大的工业与金融力量的支持下，美国在欧洲的影响超出了世界大战前的任何高度。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策制定人——先是共和党人后是继承他们位置的民主党人——都从相似的知识包裹中拾取观点，不仅在国家强大方面，而且也在有关革命的方面。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人们来说，社会革命总是该诅咒的。"夏天的雷雨不可能澄清天空。"——赫伯特·胡佛①对俄国革命如此断言："它是一阵龙卷风，一路上留下来的是被毁的房屋与数百万妇孺的尸体。"小阿道夫·A·伯利对20世纪30年代拉丁美洲的情况印象极深，他干脆下结论说："我从原则上就不喜欢革命。"[29]

共和党人继续执行威尔逊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合法性的政策，期望孤立政策或许可以加速那个违反常规的政府的垮台，或至少可以阻止它输送出可恨的宣传与阴谋。卡尔文·柯立芝②率直宣称他不会同苏维埃打交道，除非它显示愿意"同我们一道承担起文明的责任"，这个声明反映了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后16年之久的美国官方态度。[30]

虽然富兰克林·罗斯福最终于1933年对一个被他视为美国商品的重要市场并且又可以制衡日本的国家给以外交承认，但是他的外交政策并未勾销掌管外交政策的部门原有的、敏感的忧虑。不仅苏联维持下来了，布尔什维主义还传播到一些"落后的"地区，激荡起危险的革命狂热。布尔什维主义在幕后操纵中国人去攻击外国人，这是凯洛格在中国传教得出的黯淡观点。那些献身于"苏维埃式颠覆"的势力，20年代与30年代在美洲高视阔步，尤其是古巴与墨西哥，激荡起政治动乱与反美国佬情绪，并以在它的后院实行"共产党夺权"来威胁美国。

---

① 美国第31任总统（1929～1933年），共和党人。——译者
② 美国第30任总统（1923～1929年），共和党人。——译者

无论布尔什维克鼓动家在什么地方利用不发达国家人民的愚昧与盲从，美国人爱用的回应一概是去物色一名强人。凯洛格担心意大利与中国的左翼活动，因此便欢迎墨索里尼与蒋介石掌权。为了制止共产主义向尼加拉瓜渗透，凯洛格派遣斯廷森去为索摩查家族掌权铺平道路，维持了40年政治稳定，但是没有普及教育也没有社会正义。这个模型又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务院的代表在古巴使1933年的左倾革命流产，扶植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上台，一直维持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害怕共产国际颠覆西班牙与希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便支持那里的军事强人——马德里的佛朗哥与雅典的梅塔萨斯。

旧有的种族观念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内沿袭下来，很少变化。国内20世纪20年代盛行排外主义，它本身就是超爱国主义的同声；归化后已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受到攻击，成为战争年代的污点。由于外国出生的公民及其子女在全体人口中达到惊人的比例（超过1/5），纯血统的人、老脑筋的人，起来行动了。国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法律限制不受欢迎的移民——日本人、菲律宾人与东欧人、南欧人。在南方，在中西部，在西南部与西部地方，加入三K党的美国人多达500万，他们相信白人优越，攻击天主教徒、犹太人以及其他外来者。当时的种族仇恨促使一些人猛烈地反对黑人，私刑只不过是人们所能记忆起来的各种野蛮行为中的一种。

毫不奇怪，人们不得不承认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观仍是种族等级观念。盎格鲁—撒克逊人仍处于等级的顶尖，西欧民族紧随其后，欧洲的其他民族往下排。再往下是拉丁美洲人与亚洲人，他们的民族形象依然故我，丝毫未变。电影始终是美国人心目中外国人形象的重要源泉，这些形象把那些民族特性精心敷演得十分逼真，而这正是公开的政治讽刺画中所缺少的。银幕上的拉丁美洲人容易激动、性情暴躁、无法预言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当然会有男女不同的描绘，男人是令人厌恶的“行贿者”，女人是

易激起对方性欲的荡妇，盎格鲁男子无法加以拒绝。20 世纪 20 年代电影银幕上的亚洲人，总的说来都是些明显地对犯罪、邪恶(大多数人经常吸食鸦片)与白种女人感兴趣的野蛮家伙。下一个十年有所变化，贯穿了整个太平洋战争时期。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日本人被拿来当做东方人性格中堕落与野蛮的代表，而中国人则被描绘为呆头呆脑，1937 年摄制的电影《大地》以及后来同样知名的《查利·张》系列片中开始出现稍予肯定的形象。[32]

种族观念的引人注目的后果便是政策制定者偶尔流露出来的轻视与恩赐态度。提倡对拉丁美洲采取“好邻居”政策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他恭维“这些南美洲的家伙”时，正好不经意地流露出了他的种族优越感。他还说：“他们以为他们同我们一样好，”接着宽宏大量地说：“他们当中许多人是这样的。”1933 年他在古巴宣称，防止“古巴人民中间出现饥饿与混乱”是“我们的责任”，因此采取了行动以充分显示他这个家长的力量。从首都华盛顿及其亚洲问题专家们看来，中国人——如公认的观念所指出的，是驯服的、可塑的，亟需美国人的帮助。日本人被认为是患了精神分裂症，用洛奇的话来说，他们是“东方的普鲁士人”，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东方的最好的学生。说他们精神分裂，一方面是说日本人的性格反映出一种土生土长的武士道传统。用现代武器装备起来的奸诈的军事领导人，控制着他们自己的“易动感情的人民”，追求一种实行恐怖与征服的外交政策。日本人性格的另一面则是：朝前看，向往西方文明，渴求改善国际间的合作。[33]

1931 年日本占领中国满洲，六年后侵略中国，使捍卫东方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人士感到尴尬。斯廷森以及后来的罗斯福总统及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都担心军国主义分子会占上风。但是，美国领导人相信日本公民在外国告诫下，必要的话在美国摆出强硬姿态的情况下，仍有机会重新控制局面，扭转侵略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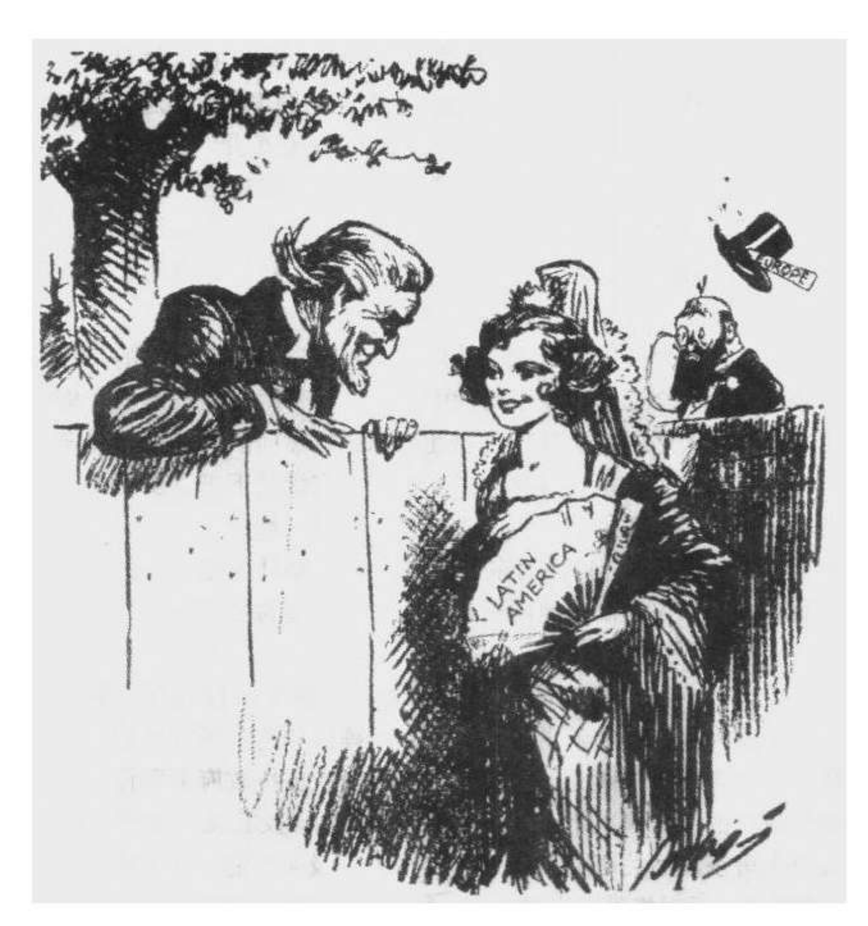
斯廷森自以为在菲律宾任职的经历使他对“东方人的想法”具有洞察力，他决心捍卫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在中国推行一条



要听他的话

图中代表美国的老者说:"嘘!你们这两个孩子真闹!"两个顽皮孩子一人身上注明"海地",另一人注明"墨西哥"。

附注:30年代,给孩子们看的漫画上展现出大家熟悉的种族画面。拉丁美洲人仍被绘成黑皮肤的闲荡孩子(图29)或浅肤色的标致小妞(图30)。山姆大叔懂得怎样去区别对待。



噢，你长这么大了！

图中标致小姐的扇面上的文字为“拉丁美洲”，较远处一老者飞到空中去的帽子上标着“欧洲”。

“真正高尚”的美国外交政策。美国与中国都受到“疯狗”的威胁，而这些“疯狗”已在日本掌权。公众对日本表示了不满，斯廷森私下里会见日本使节，向他咆哮一通。赫尔在20世纪30年代形容日本是一批野蛮人正在大门口打算伙同希特勒把世界拉回到

"黑暗世纪"去。①罗斯福率直地对日本外交官说，日本的政策践踏了"关于和平与秩序的基本准则"。在他的同事面前，他甚至说得更露骨。日本的确是"东方的普鲁士人"；他们是"公开地、无耻地掠夺成性的国家，从根本上同美国的理念相对立"；他们"沉醉在他们统治天下的梦想之中"。罗斯福很清楚日本在尖锐化的全球斗争中站在哪一边，这场斗争是"人类受奴役与人类得解放的斗争——异教暴行与基督教理念的斗争"。[35]

罗斯福政府加大了给东方的压力，相信这些臭名昭著的崇拜武力的东方人会让步。为了帮助中国，实行了对日经济制裁，集结海军并使太平洋舰队处于进攻性的态势；然而，这些措施并未产生应有的震慑作用，日本的进攻非但没有缓减下来，反而出人意料地袭击了珍珠港。对美国人来说，这次"偷袭"是极反常的暴行(尽管完全符合狡猾的东方性格)。一个被认为是劣等的民族竟敢直接地、先发制人地向一个优秀的并自命为文明行为仲裁者的民族挑战。

美国人对同时发生的欧洲危机的反应也受到种族理论的影响。美国人越来越显示出他们对正在严阵以待的英国表兄弟的同情。1941 年较晚些时候，2/3 以上的美国人支持政府采取任何能缩短战争的步骤来援救英国。[36]在这一时期，反犹太主义使美国人对大屠杀漠不关心。国会，劳工组织，以及 4/5 的公众(据 1938 年的观察)反对接纳犹太逃亡者。参战后也未能改变这一态度。在限制性的移民规则和有偏见的外事机构的解释下，欧洲犹太移民潮被缩减为一条细流。在英国人请求援助之后，罗斯福政府轻而易举地排除了立法与行政方面的障碍，全力以赴地去援救这个弱小民族。[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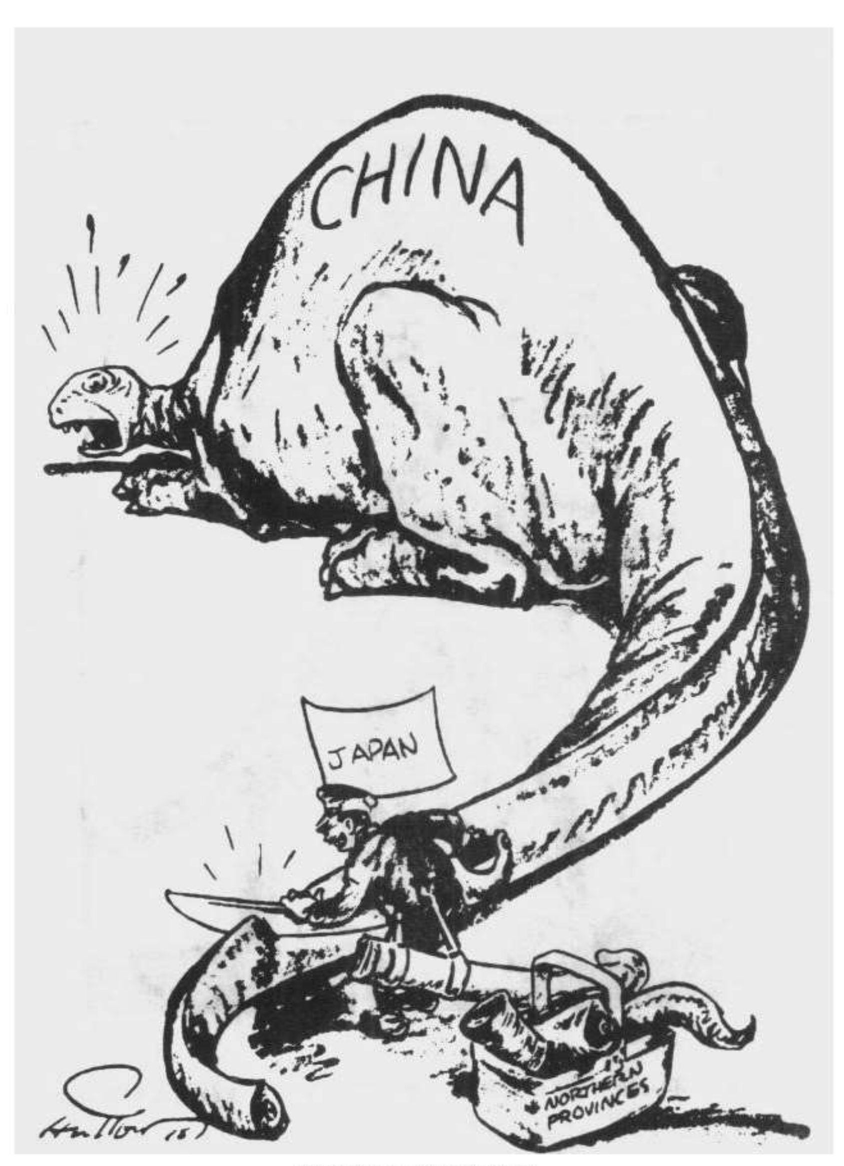
在世界危机激增的背景下，积极争取国家强大的概念终于重

① "黑暗世纪"亦称"中世纪"，即西欧历史上公元 4 世纪、5 世纪西罗马帝国解体后到 15 世纪文艺复兴。——译者



图中军人注明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脚下踩着的两人分别是“日本”与“中国”。

附注：亚洲人也被看作是平庸之辈。30 年代，如图 31～32 所示，中国人被描绘为可怜、迟钝的形象（此处被军用主义分子踩在脚下，并被绘成呆笨的恐龙），日本人被描绘为疯狂、残酷的狂热分子。[34]



酣睡的巨人开始苏醒了

图中的恐龙为“中国”;正在锯它的尾巴的是“日本”。已锯断的尾巴装在一只标有“东北数省”字样的篮子里。

新主宰外交政策。这一思想曾因威尔逊的十字军运动受到动摇，但为战后的共和党人所挽救，到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手里，便得到了新的有力的支持。罗斯福的许多看法同威尔逊类似，民主党人在世界上是一支和平力量，因为他们是遵循人类爱和平的本能行动的。国家间之所以发生重大麻烦，都可以追踪到军国主义与专制主义，一小撮人总想搞侵略与征服，无视广大人民的意愿。民主党人必须团结起来反对这种威胁，不容许侵略行为通行无阻。在争取和平与自由的斗争中，美国必须站在前列。但富兰克林·D·罗斯福不是威尔逊的复制副本。他显示出对权力与政治谋略具有一种当仁不让、毫不掩饰的喜爱。再者，他也不是那种对前辈不移愚悃、死守框框的人。罗斯福在制定政策时，可以是异想天开的，不拘一格的，有时甚至是模模糊糊，前后不一，使人恼火。

罗斯福初任总统时，并无一项扩张性的外交政策成竹在胸。相反，他最初是不让亚洲与欧洲的外交问题靠近自己身边。经济衰退迫使他集中精力于复苏经济及缓和国内局势。同时，战争的悲惨回忆也在影响着他。

我见到过伤者在流血。我见到过人们中了毒气不断咳嗽。我见到过泥淖中的死人。我见到过一座座城市被摧毁。我见到过大约 200 名精疲力竭、一瘸一拐地从队列里出来的人——48 小时前还是 1000 人的一个团的生还者。我见到过孩子在挨饿。我见到过母亲们与妻子们的极度痛苦。我痛恨战争。

同上述 1936 年 8 月对战争充满感情的斥责相契合，同年罗斯福宣称：美国人虽然是自由的保护人，但也应当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本半球。

民主仍是这个世界的希望。如果我们在我们这一代能继续在美洲成功地实行民主，民主必将传播开去，取代其他统治人民的方法。[38]

从 1937 年到 1941 年间，罗斯福开始把谨慎放置一边。他发动了一场援助英国反对德国的运动，并拒绝容忍日本在东亚称霸。

此时，他的老观念与他深深的偏爱就浮到表面上来了。他宣称，国际间不讲法律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无论其是针对东欧、中欧的弱小国家，西方的民主国家，欧洲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还是针对古老的、无防御能力的中国。罗斯福很快认识到，美国干预20世纪第二次国际大危机也许要付出重大代价，但是，它也提供了第二次机会去完成威尔逊未能完成的事业——对一个有缺陷的国际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1941年8月，罗斯福与温斯顿·丘吉尔签订的大西洋宪章，阐明了英美两国的共同目标：公正的和平，所有国家都有自决权，自由贸易，一个能制止再次爆发侵略活动的新的国际联盟。

罗斯福转到威尔逊这条路上来并不容易。其中包括先失去信心，后恢复信心，那正是他的部分经历。他出身于纽约一个无党派的、古老、富裕家族，曾在格鲁敦与哈佛上学，游历丰富，依靠广泛的上层社会关系获得公职。他非常崇拜堂兄西奥多，他同西奥多一样，也是一个极其自信的政治家，对贵族阶层的道义十分敏感。他赞成门罗主义，又是马汉的门徒，一个热心的海军派，一度曾任助理海军部长（西奥多·罗斯福也曾任此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威尔逊政府中担任此职时，曾持强烈的干预观点。后来，1920年被提名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后，他又接过了威尔逊为建立国际联盟而进行的充满艰辛的斗争。他在竞选中的失败，向任何一个想当总统的人说明，海外的冒险是不可取的。与此同时他还逐步认识到，欧洲战争付出了很高代价只换来了有缺陷的和平，这就给他的积极主动的外交意识敲起了警钟。

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三国侵略行动的加剧，把罗斯福带回到正统的外交政策。1937年10月，他发表演说号召远离“践踏法律的世界时疫”，这使他走上了1941年签订大西洋宪章之路。他的这条道路还可以追溯到他曾很响亮地公开谴责企图征服巴黎的野蛮势力，曾很鲜明地号召以人类文明的名义进行抵制。罗斯福的政策反映在他的言论之中。1941年秋天，用罗斯福的话来说，

美国已成为“民主的弹药库”，美国供给英国人战争装备，向德国展开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海战，对日本实行足以削弱其战斗力的石油禁运。

罗斯福回到威尔逊的想法上来后，又面临第二场斗争，即同强大的来自“孤立主义者”的反对力量的斗争。他的主要对手是一个名叫“美国第一”的组织，它的最著名的发言人正是有名的航空家、不喜欢处处伸手的查尔斯·A·林德伯格。1941年秋天，“美国第一”动员起来反对卷入战争，他们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中西部的北部数州，以及全国各地非英裔的少数民族。林德伯格的根就在这些地方。他的父亲出生于瑞典，后来成为明尼苏达州的农业激进分子，曾追随诺里斯与拉福莱特反对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林德伯格同父辈一样反对美国人进军血迹斑斑的欧洲，而鼓吹朴素的、农业美国的价值观，这同大城市和东部国际派的价值观相左，后者是强烈地主张干涉的典型。

林德伯格反对十字军型的外交政策，其思想基本上源自杰斐逊传统，又受到种族偏见与对革命的偏见的强烈影响，而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偏见也正是从占支配地位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中引申出来的。林德伯格在1936年至1938年间连续两次访问欧洲，给他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他不满于欧洲大陆天生喜欢自我毁灭，欧洲还没有认识到“亚洲百万之众”的威胁。这一威胁明显地来自苏联，林德伯格说，苏联的“记录充满残忍、流血与野蛮行为”，“现代历史上无可比拟”。尽管背负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制度，俄罗斯人实际上用他们的半亚洲文化来统治一个分裂的欧洲，摧毁“那个无价之宝——我们的欧洲的宝贵传统”。林德伯格谴责英国人分裂了欧洲，搞乱了欧洲的人心。英国人不甘心于本帝国的衰落，又不愿意同德国合作，德国在亚洲正在起着缓冲作用，并且是欧洲避免“种族自杀”的保证人。[40]

如果美国要在这场危机面前尽自己的责任的话，那就应当同“非常勤奋能干”的德国人合作，来抵制布尔什维克的杀戮，并纠

正战后安排中的不公正。鼓励英国人反对德国，是一项十分错误的政策。“现在是让我们停止争吵、重新建筑我们的白人壁垒的时候了。”然而，如果欧洲自甘自我毁灭，那么美国别无选择，只好站到一旁，避而远之。如果野蛮人入侵，把欧洲带回“黑暗世纪”的话，美国应该成为西方文化的贮藏所，美国人应成为本半球的保卫者，幸赖有了空军，保卫本半球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了。大西洋将成为保卫西方文明残迹的护城河。[41]

林德伯格从1939年9月开始公开他的这些看法，他认为美国应当在一个被战争撕碎的世界上起示范作用，给受到专制政权迫害的人士以政治避难权。美国人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他们自己的自由制度。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证明，只有靠改革才能使国家繁荣，而不是去参加别国的战争。林德伯格要求他的同代人致力于他们面临的社会、种族、工业诸问题，以便赠给下一代人“一个强大的、没有债务的、具有坚实的美国性格、不受旧世界约束的国家”。“一个国家，如果人民坚强，制度健全，就无需害怕敌人入侵。公众为什么要追随罗斯福政府以及其他爱好干涉的盟国（他们只会把欧洲的战争与仇恨注射到我们身上）制造分裂的愚蠢政策呢?”他警告说，那些把公众的感情煽动起来的人——绝望地挣扎想把已失去的优越地位找回来的英国人，爱英国成癖的美国人，以及受犹太人操纵的传媒——完全是出于狭隘的自私的理由。[42]

林德伯格指责罗斯福借助“耍花招、搞宣传”的手段来推进干涉，这些做法有害于美国的民主比外来威胁更甚。总统的政策表面上是要挽救民主，也许正好是摧毁民主。战争不仅要夺去数百万美国人的生命，而且还将在国内引起从严管制，丧失经济与政治自由，并且债台高筑，贻害后代子孙。1940年8月林德伯格悲伤地思忖：“我们的自负，我们的盲目，以及我们的空想主义会不会也把我们抛进未来无尽无休的冲突之中?”[43]

为回答林德伯格及类似的批评，罗斯福在一批与他观点相同、

有影响力、敢直言的人士的支持下，强调世界危机日益加剧，号召美国人回到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上来。1940年5月在罗斯福鼓励下成立了“援助盟国保卫美国委员会”，其成员遍及全美，东部的律师，大学教授，名声赫赫，都在其内。另一个干涉派组织“世纪集团”是组织严密的幕后团体，于1940年6月开始活动。它的核心也来自美国东岸精英，长期以来就是占支配地位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思想的培养基地。“世纪集团”希望立即宣战，但对他们能推动罗斯福逐步增加对英国的援助也就算满意了。

这些主张干涉的群体所鼓吹的政策，深深植根于意识形态世界观。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强调了危机的安全范围。他们认为，大西洋已不再是缓冲地带，而只是一条四通八达的公路。因此，美国的安全依赖英国舰队本身的保全，以及在欧洲维持均势。由于德国破坏了均势，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同英国一道去恢复均势。当然，老观念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这种老观念便是：美国同英国的感情联系，他们拥有建设一个国际法得到尊重、民主制度得以繁荣的更美好的世界的共同看法，他们都相信美国在英国的帮助下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将实现威尔逊的梦想——在一个自由国家的群体内和平相处，共同遵守开明的国际秩序。

干涉派信心十足，决心按他们的意愿来制定政策，他们对反对派已感到忍无可忍。罗斯福政府对1940年诞生的“美国第一”这个组织十分关注。为了降低反对派的影响，贬低它的领导成员，干涉派发动了一场诽谤运动，把反对派搞得几乎等于叛徒。反对派被说成是偏激的恐英分子，纳粹同情者，共产分子，懦夫，反犹分子，在国内制造分裂而此时此刻国家正需要团结一致……罗斯福的内政部长哈罗德·L·伊基斯公然把林德伯格称为美国的“第一号纳粹推销员”。罗斯福“绝对相信林德伯格是纳粹分子”。总统下令调查他的这个批评对手，1940年12月公开宣布他们是代表“邪恶势力”的颠覆分子。[44]

到了1941年秋天，罗斯福及其同情者已把反对派推到一边。他的援助英国、援助中国的政策已无人反对，他已站到了战争的悬崖上。但是，何时采取最后一步尚不清楚。公众甚至也许包括罗斯福本人的迟疑不决，最终于1941年12月在珍珠港彻底解决了。这次袭击清除了复活威尔逊十字军的最后障碍。罗斯福正告受震惊的国人："国际间无信义的十年"已发展到顶峰。是时候了，美国将献身于一劳永逸地铲除"国际间野蛮行为的源泉"。[45]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一个史无前例地全面动员与重新部署国家资源的崭新时期，长达十年之久。美国领导人刚刚战胜了轴心国，就立即着手稳定与改革战后的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同时也看到了时过不久便可做出的结论：存在着严重的苏联威胁。到1950年底，冷战的模式表现为生产武器的费用迅速增长，援助计划与结盟关系成倍增加。美国军队在朝鲜打了第一场有限战争，华盛顿作出的这个最初的承诺将导致第二场战争：印度支那战争。

20世纪40年代新的扩张性政策的确改变了美国在全球的形象，传统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基本上没有变。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其背景主要仍是社会精英、东部地区、城市、清教徒——那种意识形态是生来正确的，就像公用设施生来就是为人服务的。这一精英集团在某些方面显示出具有亲如一家的特点。他们主要麇集在纽约、波士顿、华盛顿。鲁特与斯廷森是其中最受尊敬的前辈，W·埃夫里尔·哈里曼，迪安·艾奇逊，洛克菲勒兄弟，杜勒斯兄弟，邦迪兄弟，是新一代的佼佼者。他们都曾在罗斯福这位干涉主义者与世界改造者的旗帜下共同奋斗过；其中有人甚至还在最初的威尔逊式的十字军中服务过。这个精英集团在一些重要基金会与大学中，在外交外事部门，均有据点，并雇用一些有天才的圈外人物如肯尼迪兄弟，罗斯托兄弟与迪安·腊斯克，他们曾同"孤立主义"的邪说作斗争，尽管这种思想在一部分愚昧的民众中至今仍有一定影响。他们也曾向哈里·S·杜鲁门与林

登・B・约翰逊等人诘难，这些人只靠了机缘，靠了选举过程急转弯才上升到政界巅峰。

对这一代政策制定者来说，老的意识形态由于两个新的公式得到了加强。其中之一是强调历史的经验证实了老意识形态眼光的正确。那些历史经验指导着 20 世纪 40 年代及其后的政策制定者，它们源自某种历史的神秘——人们称之为大周期理论。主张此说的人们以怀旧的心情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崇高承诺，当时美国采取了成熟的、扩张的外交政策，以保持国家的理念以及逐渐强大起来的国家威力。可悲的是，一个较美好的有序世界已经在望，而美国人却辜负了早先的承诺。威尔逊在战后的笨拙表现（尤其是他在付出高昂代价后仍未使各国在政治上达成一致），应当受到部分责备。那些起障碍作用的投机分子，思想狭隘的知名人士，也应当受到部分责备。美国公众消息不灵通，不坚定，容易在洛奇、博拉、林德伯格之流的影响下摇摆不定，也应当受到部分责备。这样，国家从战时承担责任的高峰滑进了幼稚、胆怯、最终付出高昂代价的孤立主义的泥淖。

大周期理论在美国政策刚刚经过战争的高潮后盛行起来，其意图是警示再次松懈的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果退回到孤立主义，势必突然陷入另一场全球冲突。希特勒埋伏在慕尼黑的鬼魂，以及东京策划攻击珍珠港的影子，一直萦绕在冷战勇士的头脑里，提醒人们姑息与无准备的危险。向这些侵略者的野心让步，只能鼓励他们犯下更大的罪行。富兰克林・罗斯福最初面对逐渐增长的世界危机时特别胆怯，最终还是找到了真理，把美国人引上了威尔逊最早照亮过的道路。现在，该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继任者去把国家引上既定的轨道了。

在大周期这个说法之中，有一种假设是直接从威尔逊传下来的，也是从在他以前就有的意识形态公式中引申出来的。和平、自由的国际关系能否出现，要看世界各国采用何种政体。一方面，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一贯热爱和平，有时甚至过了头。他们强调

的假设前提是——用哈里·杜鲁门的话来说:"国家政策的形成过程中，人民的声音越强，侵略的危险越小。"另一方面，非民主国家，不论是共产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或纳粹国家，都被认为是在海外搞敌对与扩张的，正如他们在国内执行的政策都是压制性的。杜鲁门的有影响的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1948年宣称:"专制主义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无一例外地具有厚颜无耻的侵略性。"创造一个和平的、安全的世界，最主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实行自决与自由的国家群体。国内改革是惟一的确定的与持久的解决办法，是把那些总向邻居耀武扬威的压制性国家约束住。[46]

另一个支持与加强了老的意识形态的新公式是地缘政治。对于合众国初创时期的第一代外交事务专家、大学社会科学家，以及后来著名的威尔逊派来说，地缘政治从一个强调实际、然而并不科学的词汇，成为了一个叫得很响亮的、敏感的、能辨别是非的词汇，补充进意识形态之中。地缘政治的概念经常被干涉派使用，开始时他们用以说明新技术使国家之间的距离变得极其狭小，半个地球以外的新发明就有可能致命地危及本国的安全，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迪安·腊斯克曾对此作过根本性的阐述:"如果你不去注意周围，周围就要变。而你之所以了解周围，是因为首先你了解有一个圆心。"腊斯克还就地缘政治的实际应用讲道:"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不会不影响到另一个地方。"或者，用林登·约翰逊的话来说:"我们如今已知晓，任何地方出现了投降，都会造成全线崩溃。"地缘政治的世界，就像一个棋盘。每一个主要的棋子都想控制住最大的地盘。控制的领土越多，人口与自然资源越多，它的力量也越强大，越有力量去获取新的领土，并且增强它在圈子内的力量，把孱弱的对手排除在外。在这个纯粹强权政治的世界上，征服全球看来最终有了真正的可能性。[47]

这些地缘政治学家认为最近的事件正好补足了大周期理论。他们认为，美国曾经有过的孤立与无安全保障的时期，今后不会再有了。越来越灵巧的武器把大西洋与太平洋缩小成为两个池塘，

要攻击美国本土很容易。西奥多·罗斯福与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进攻性海军的倡导者）成为地缘政治学这一新战略时代的美国先知。威尔逊派被认为是后知后觉者，较迟才发觉凯泽对于大西洋集团的危险，才按地缘政治学说提出集体安全的思路。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按几位先知的观点去寻求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安定，挫败轴心国从两翼进攻欧亚大陆的企图，复活了集体安全的理论。两次世界大战比起今后的大搏斗还只能算是小冲突。苏联以欧亚大陆为依托，已经把周界突伸开去，形成巨大的战略威胁，只有在“地缘政治现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美国才能避免被包围，才能为一个自由世界保存希望。

于是，老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双倍的加强，便形成了冷战政策，并由此产生了该项政策最重要的表述语——遏制理论。意识形态解释了采取遏制政策的根据乃是全世界的自由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之中。这一意识形态还界定：苏维埃共产主义是自由的主要威胁，美国具有无可争辩的责任去同它斗争。重要的冷战勇士的头脑里显然存在着遏制理论的意识形态脉络，其中最著名的战士便是乔治·凯南，人称遏制学说之父。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早期，凯南在柏林与波罗的海港口城市里加从事外交工作，这些地方是当年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温床，他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尖锐批评，以及他对苏联政权的压制本质的深深厌恶，正是从这里孕育起来的，这些后来在早期冷战年代成为他十分突出的思想。

1946年2月，凯南从驻苏使馆发回一封详细分析苏联状况的电报，使他声誉鹊起。他获得国内的一张选票，以及华盛顿驻苏联专家的显赫地位。这封电报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充满了一针见血的、看似很权威的概括，为已被反对共产主义的观念牢牢攫住的华盛顿提供了知识的深度与表露机会。凯南怀着对自由的热中与对美国的特殊感情，着手分析世界各国的共同点，哪些是愚昧无知的领导人与被误导的人民；哪些是邪恶的统治者与无辜的人民。苏联领导人是冷酷无情的，是不道德的，不能代表“俄罗

斯人民的本来面貌”，——凯南的说法和当年威尔逊的说法如出一辙。理解这些领导人，除了革命的意识形态外，还要考虑到他们“对世界事务神经过敏的观念”以及斯拉夫人所具有的“东方人不坦率、搞阴谋”的传统。就像他们的沙皇前辈，克里姆林宫人士对于西方在经济与政治上的优越地位是极其敏感的，他们受“传统的、本能的俄罗斯不安全感”的驱使，在国家关系中只懂得“武力的逻辑”。苏联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危险，向它呼吁理智或试图与它妥协，都无济于事。但是，苏联人又不大像要同西方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莫斯科看来是在发动一场平静的、非直接的战争，这使得国际共产主义网络中的大多数国家能够吹嘘“在地下工作方面取得了历史上无可比拟的经验与技巧”。这个网络在什么地方安置下“带病组织”，这个地方就会生长起“毒瘤”。[48]

1947 年 7 月，凯南受权写了一篇关于遏制理论的文章，当然，文章发表在“对外关系协会”的会刊《外交季刊》上，他的名声从外交部门传到了有知识的公众。凯南用了一个简单的笔名“X”，以干净利落的、典型的地缘政治词汇描写了一个新的外交政策目标：“在一系列不断变换的地缘的与政治的热点上，针对苏联政策谋略的变换，采取灵巧的、警觉的反措施。”[49]

这篇著名论文还充满着道德的惯用语句，这久已为凯南所想施加影响的有权势的读者所熟悉。按凯南的观点，“苏联对西方世界自由体制所施加的压力，是“对美国作为众多国家中的一员的全部价值的考验”。面对这样的考验，他的同胞应当“感激上帝”。美国人一次次迎接“不能宽容的挑战”，将证明他们的确能“肩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道德上的与政治上的领导责任”。届时，他们将获得奖酬——“或是苏联的崩溃，或是苏联的威力逐渐变得柔和”。凯南很清楚，同任何否认渴望自由具有普遍性质的政权一样，苏联的体制已经“在体内孕育着自我衰败的种子”。凯南坚决认为，“这些种子将会很好地发芽成长”，这种说法恰好是1917 年反布尔什维主义者曾表达过的愿望。一旦垮台来临，苏联将在“一夜之

间由一个最强的国家变为一个最弱的国家，在国家群体中一个最可怜的国家”。[50]

凯南思想中的意识形态特点，也正是1945年后华盛顿一直在逐步宣扬的特点。4月初罗斯福的去世，使所有反对苏联的水流都释放了出来，过去这些力量因前总统实行同俄国人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而受到约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战争期间逐步从两个层面行动：表面上仍是威尔逊的做法，而实际上承认美国力量的局限性，承认苏联、英国甚至遥远的中国的利益。这位聪明的国际关系课学生懂得：美国既不能让每一个国家都成为民主国家，也不能到处充当国际警察。我们无法知晓罗斯福是如何解决他的公开言论同他的私下计算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但清楚的是，他的继任者信奉威尔逊政策而无须执行罗斯福所作的保留。

杜鲁门总统与他的顾问们开了几次会以后，总统的倾向明确起来了。哈里曼大使获知罗斯福逝世立即从莫斯科赶回华盛顿，他把红军进入德国形容为“对欧洲的野蛮入侵”。哈里曼与詹姆斯·福莱斯特（当时任海军部长）、国务卿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以及杜鲁门的海军总参谋长威廉·莱希海军上将等人认为，波兰的状况已经证明苏联违反民族自决的原则与国际合作的理念。在多次讨论中，杜鲁门反复表示他要同苏联力争，“决不会为了让美国人赢得好处而放弃原则与传统”。罗斯福的亲密友人企图限制他但未成功。陆军部长史汀生与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警告说，摊牌并不能使苏联放弃他们在东欧的“生死攸关的”利益，而且也许还将使美国付出巨大代价。但这批“老卫兵”在杜鲁门的顾问圈中已成为少数派，不久便纷纷退休，其中某些人的出名事件可以说实际是被逐出了华盛顿。[51]

即使这样，杜鲁门也还不能把他的感觉立刻变成一项连贯的政策。勾画欧洲的蓝图，军队复员，要求减税的压力等使他分心，使他受到限制。尽管如此，杜鲁门政府的警觉意识日益加强，政策制定者已在草拟反对苏联的诉状，这将涉及到未来的几十年。他

们之中的某些人认为，莫斯科是极端革命学说的源泉；克里姆林宫人士，一如布尔什维克的一贯表现，都是些守口如瓶、阴险毒辣的家伙，他们精通恐怖、宣传与颠覆。外国的左翼政党听命于他们，这些政党都是——正如马歇尔将军1947年回华盛顿任国务卿时所说——由"不忠诚的、受污染的、政治上不成熟的分子"组成的。杜鲁门政府的司法部长J·霍华德·麦格拉斯于1945年、1950年曾警告说，每个共产党信徒都使人联想到一个红疱，"身上带着可使社会死亡的病菌"。[52]

有些人认为俄国是一个可怕的专制国家，它所掌握的庞大军事机器威胁着西方文明。斯大林是一个新的希特勒，红军进入东欧正是德军进入莱茵兰的重演。苏联因其有利的地缘政治位置无疑将追求世界支配地位，正如德国同日本当年在国际联盟中的所作所为。迪安·艾奇逊后来回忆道，苏联的"意识形态热忱与战斗力"相结合的潜在能量威胁着西欧，足可与"数百年前穆斯林的作为"相比。[53]

在各种各样的意见交换中，杜鲁门的观点最重要，因为他的观点决定他去选择什么人来做他的顾问，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杜鲁门是一个随和无定见的外省人，总认为自己才智不逮，本来就没有准备当总统。他根本没有外交经验，干脆躲进朴实的威尔逊主义，按历史教训办事。照他看来，威尔逊的战争使欧洲免遭野蛮人的蹂躏，他本人在西线当过一名炮兵军官，他为自己作出过微小贡献感到自豪。他还记得当年威尔逊号召参军的演说使他"心情激动"。他为美国在战后"把时钟拨回来"感到遗憾。杜鲁门作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干涉政策的支持者，早在1939年就把德国、意大利看做是同俄国一样的"同原始人差不多的野蛮人"。他表示不同意林德伯格的观点，忧虑孤立主义重来，不让国家去承担"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美国加入战争后，他在参议院支持成立一个新的国际联盟，它在强权政治体系破产后，能使民主国家相互合作。[54]

杜鲁门对苏联具有深刻的偏见。1941年12月，他把苏联说成是“同希特勒与阿尔·卡彭一样不讲信义”。①在此以前，同年6月，德军开始侵入苏联，他在一次著名的谈话中，建议推行一项政策使苏德双方互相残杀，“让他们互相砍杀，越多越好”！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一个暴君推翻另一个暴君，爱好和平的俄罗斯人民像从前一样受压迫。沙皇、贵族被打倒了，可是俄罗斯又有了一个“纯粹的警察政府”和一个“特权温床”。杜鲁门在1945年掌了一段权后，曾以为同斯大林艰苦地讨价还价也许能达成某种协议。到了1946年初，东欧丢掉了，苏联人到处威胁，此时的杜鲁门已“对调教苏联人感到厌倦”。他原有的反感一时俱来，排除了外交活动与妥协。“他们只懂一种语言——‘你们有多少师’？”如今他深信，苏联政权与希特勒政权“没有区别”，都是“集权国家——警察政府”。到1948年，他将这个对比又朝前发展了一步，认为克里姆林宫的“弗兰肯斯坦独裁政府”②“比任何其他的独裁政权更坏”，包括（杜鲁门明确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55]

杜鲁门在白宫的这几年，常拿历史上的伟人与伟大帝国来照鉴自己与同代人。他深信，苏联的挑战正是帝国冲动的复发，这种冲动曾一再产生东方专制政权。斯大林不仅是马克思与列宁的继承人，而且还是成吉思汗、铁木真、伊凡雷帝、彼得大帝的继承人。“东方游牧民族”——如今由苏联作代表——又来威胁世界和平、基督教以及一切荣耀与道德的力量。拥有一个被赞颂为“人类从未想到过的最伟大的政府”的美国应当领导这场抵制运动。杜鲁门看到这场即将来临的冲突很像他曾读到过的那些国际间的伟大斗争，也将获得前所未有的辉煌战果。“我们面临着任何

① 阿尔·卡彭（1899～1947年），出生意大利，在纽约长大，成为帮派头目，在芝加哥横行一时，臭名远扬。——译者

② 英国作家玛丽·W·谢利于1818年所著小说中的生理学研究者名叫弗兰肯斯坦，他创造了一个怪物，最后自己被这个怪物毁灭。——译者

国家都未遇到过的最可怕的责任。从大流士一世的波斯，亚历山大的希腊，哈德里安的罗马，①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曾经肩负过像我们这样的责任。”现在是美国人的任务了，他们已经成为伟大的民族，放弃了自我扩张，去“把世界从集权主义中解救出来”。[56]

杜鲁门意识到，作为总统，自己的任务是力争跟上共和国万神殿中的英雄所树立的崇高榜样：阿里斯蒂德斯②，辛辛纳特斯③，年轻的卡托④以及华盛顿。他同他们一样，受命于危难之秋。他也必须同腐败势力作斗争，这些腐败势力毁掉了希腊诸城邦与罗马共和国。目前最紧迫的事情是“把信奉一个道德世界、反对布尔什维克唯物主义的人们动员起来”。他也害怕美国人的观点会“因贪婪、因自私、因渴望权力而黯淡下来”。他还听到了烦人的“绥靖主义言论”。杜鲁门认识到他和国人一同站到了重大历史关头——民族的意志与权力的成功伸张，将促进国外的自由事业，同时也将使国内的自由精神重放光芒。失败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57]

1947年的3月至6月，鉴于英国政府已抑制不了左翼分子在希腊的反叛，杜鲁门政府最终决定动用武力。由杜鲁门提出、马歇尔与艾奇逊支持的这项呼吁处处反映出上述杜鲁门本人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杜鲁门向他的政府郑重宣告，他面临的“局势比过去任何一位总统所遇到过的局势都更加严重”。艾奇逊在一次国会领导人集会上警告说，克里姆林宫已经处在地缘政治的边缘，“将有三个大陆被打开供苏联渗透”，正如希腊已经失去，南亚也将失去，北非也将如此，西欧也将如此。此言一出，与会人

---

① 哈德里安（或：阿德里安），公元76～138年，罗马皇帝。——译者
② 阿里斯蒂特斯，公元前5世纪人，雅典政治家、将领。——译者
③ 辛辛纳特斯，公元前5世纪人，罗马爱国者。——译者
④ 年轻的卡托，公元前95～公元前46年，罗马政治家，年长的卡托的曾孙。——译者

士大惊失色。[58]

杜鲁门最终请求国会同意援助希腊与土耳其，并请求美国人民肩负起“伟大的责任”，向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共产主义作斗争。从地缘政治观念（现已为国家安全顾问们所普遍接受）出发，杜鲁门乞灵于从前威尔逊的集体安全信念。和平是不可分割的，无论何地出现侵略都将危害美国的安全。杜鲁门甚至还乞灵于过去的教训。他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强加给人们的牺牲提醒大家，和平是不会轻易获得的。杜鲁门在演说中一再强调的主要观点是：美国必须为了自由的利益参加进去，以反对极权主义。美国人有责任维持一个国际环境，使其适宜于“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人身自由、言论与宗教信仰自由、免受政府压制的自由”。尽管目前政府的措施也许不能充分达到杜鲁门提出的要求，但对杜鲁门及其同事们来说，重要的是必须把这种崇高又激动人心的国家使命作为自己的目标。[59]

杜鲁门在个人思考与公开声明中的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侧重点，在随后三年内由他批准的极端机密的国家安全报告中随处可见。它们表达得清清楚楚，用词很绝，通常是十字军征伐才用得上的。早在1948年11月，杜鲁门接受了凯南起草的一份声明，最终明确了他的政策目标在于“缩小苏联的力量与影响”，直到苏联“不再成为对和平、民族独立、与世界各国大家庭稳定相处的威胁”，并且去真正鼓励卫星国家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朝鲜战争爆发前所拟订的最后一份重大政策声明，是一系列声明中最突出意识形态的。它对已往的历史教训以及地缘政治的战略迫切性顶礼膜拜，并将这种信仰变成了一个信条，宣称这是“一场法制政府下的自由观念同克里姆林宫残忍的寡头统治下的奴役观念的根本性冲突”。这场反对共产党人“新的狂热信仰”及其征服全世界的野心的斗争，“不仅决定本国的而且也是世界文明本身”的命运。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作者们断言：实实在在地显示“我们体制的完善与生命力“加上三倍国防费用所能换到的力量，将意味着拯救。它将“挫败苏

联的计划，加速苏联体制的崩塌”。[60]

经过五年酝酿，一项适合崇高目的、反对革命的政策成型了。在欧洲实行这一政策迅速证明是成功的。马歇尔计划这项战后最大的援助项目拯救了欧洲大陆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由美国支持的基督教民主党把庞大的法国共产党与意大利共产党逐出政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不啻是抵制红军的一面盾牌。具有可贵的人力与资源的西德没有“田园化”(战时制定的计划曾有此惩罚性打算)，而是加入了西方盟国。在美国支持下，希腊的造反被制止了，土耳其也经受住了苏联的压力。这些成功翻回来又增加了最终解放东欧的信心。

沿着从中东到东北亚这条遏制线，美国人到处都遇上了大麻烦。的确，不仅这一地区，整个“第三世界”(或者说，美国人所不熟悉的地方，甚至是那些制定外交政策的精英也不熟悉的地方）所遇到的都是些复杂的、众说纷纭的、难以处理的军事与政治问题，经过分析，也难以模仿欧洲经验找到一项明确肯定的遏制政策。与欧洲相比，那里的农业经济因穷困贫乏而受到更大的限制，领导人还在为结束殖民统治、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而斗争；绝大多数人民根本不了解美国的政治价值与主张。总之，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正处于躁动之中。美国冷战勇士始终在担心这些大陆陷入混乱。局势不稳定，不仅使同盟关系不牢靠，而且更麻烦的是，将导致共产主义颠覆或入侵。

认识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保卫第三世界的先决条件，华盛顿便制定了一项发展政策。发展是遏制的小兄弟。遏制的焦点在于眼前急迫之事：不让苏联以及左翼盟友接近；发展则是提供对共产主义病毒的长期免疫力。同遏制政策一样，发展政策也是从由来已久的意识形态启发得来的。遏制强调一个伟大国家捍卫自由的责任，发展则是从老的美国观念而来——采取适宜的、合法的步骤进行社会改革，以及面对深色皮肤的第三世界永久性的优越

感。社会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常常用抽象的、中性的字眼来描述发展的目的。他们谈到传统社会与国家建设的现代化，谈到刺激长期停滞的自给经济。实际上，这些动听的新说法，加起来也不过就是"社会进步"、"再生更新"等一套老的种族优越感的旧调重弹，从前早在菲律宾、中国、墨西哥就已用过了。

按照发展的"福音"，仍在传统方式下劳动与生活的人民将获得现代化的体制与视野，使稳定而又自由的社会获得最可靠的保证。教育将推进人民的智力，以取代迷信。国家观念成为普遍意识，将出现一个以广泛参与为标志的政治制度，以解决公众消极与狭隘的家庭观念、部落与种族观念等等缺陷。精巧的科学技术将把原始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推向一边，创造出新的富裕与繁荣。闭关自守、分裂、停滞的经济将在外国资本与市场的影响下兴旺起来。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各种机构将提供模式，美国的经验将给人启示，由于美国的智慧与慷慨，由于操纵、管理的奇迹，这些新国家的人民在数年之内获得的成功，发达国家却用了几十年时间才获得这一成就。

发展政策在冷战早期尚属孩提阶段，提供资金的优先选择只限于欧洲复兴。但是，基本的思想业已存在。杜鲁门在 1947 年 3 月的一次著名演说中指出："极权主义政权的种子是靠悲惨与匮乏来滋养的。""这些种子是在贫穷与争吵的罪恶土壤上发芽壮大的。"后来，他形容他的被称为"四点计划"的援助项目是"一个根据我们自己的卓越资源开发经验提供解决办法的计划"。[61]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在约翰·F·肯尼迪的特殊关怀下，发展政策进入黄金时代，当时，美国正遇到苏联支持的几场国内解放战争的挑战。实际上，所有的外援都贡献给了这个新战场，像沃尔特·W·罗斯托这样的社会科学家(他来自麻省理工学院，信奉经济增长阶段普遍论①)也参加进这场斗争中来。他们带到华盛

① 即各国都要经过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译者

顿来的专家意见是展开一场"现代化的战争"，把第三世界的人心与头脑争取过来。共产党人这种"现代化进程的清道夫"，自然要试图利用"转型过程"内在的极度紧张。这就要靠美国来完善反暴动的技术，并随时准备利用这些技术为人民同颠覆作斗争，去建立一个"民主的、开放的社会"。

发展政策可看做是美国对它们遇到的第四次革命浪潮的回应。这场最近发生的激进浪潮从拉丁美洲、非洲与亚洲掠过，美国领导人面前浮现出的是苏联的幽灵，它四处作祟，直接向美国的价值观挑战。恐怖行动，任意施暴，阶级斗争，破坏私有财产——这些革命活动再次破坏了进行适当政治与社会改革的规则，再次促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去寻找秩序的保障者。这也许需要同一些独裁者讨价还价，让这些独裁者控制住已经倾斜的国家，向人民提供开明的指导，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还没有条件管理自己的事情。在动荡时期，最好是支持一个右翼的强人，这总比让左翼分子接管要好，否则，自由的前景将永远断送。美国也许要同殖民大国共同工作，以赢得时间，把共产党人压制下去，直到"当地人"有了独立条件。一旦关上大门，断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继承人的路，这些新国家就可以以更确定、更安全的步伐去创造条件达到"有序的自由"——约翰·亚当斯和他的所有的继承人都曾对此赞美不已。

发展政策具有恩赐的味道，带着以优越感表示关心的味道，因此也带去了美国人由来已久的种族观念。然而，国内的现实与国际的条件都有了变化，种族等级表已不能再用明显的字眼讲出来。20世纪40年代，吉姆·克罗法在越来越多的攻击下垮台；50年代后期、60年代早期，民权运动高涨。与此同时，一场反对纳粹狂人的热战与一场为自由、为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冷战，使国内的种族隔离以及在公共场合用轻蔑词句讲到种族，成为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再者，科学家们对种族理论也表示了厌恶，从而进一步削弱了种族思想的合法性。政策制定者对世界虽然仍有种族等

级的看法，但他们在政治上必须谨慎；他们发现，与其重铸老的种族等级的束缚，不如利用发展理论的文明词语，这才是新的出路。领导人不敢再对野蛮的或落后的民族大讲他们的种族观点、种族特性与皮肤颜色。如今替代这些名词的是适合一个民族或国家在种族等级上的位置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品质。

毫不奇怪，排列的结果同 200 年前有种族意识的祖先们所做的排列非常接近。美国人完全可以留在自已族类的优越地位上心安理得。英裔美国人仍在顶端，接下来是各个欧洲民族。然后是“第三世界”。这一名词盛行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与 60 年代，是指民主的“第一世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即“第二世界”之间的争夺地。冷战把“第三世界”看做一个冲突地带，是基于美国人牢固的种族观念，既然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四分五裂，想为“第三世界”建立政治灵魂的斗争也就不了了之。但是，“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实体的观念保存了下来，美国人把它同“落后”联系了起来并在潜意识中仍记住他们的肤色。黑非洲处于最低一层，正如黑人聚居区在美国社会代表着低等区域。往上去，是亚洲人与拉丁美洲人，仍然具有异己味道，仍然是难以识别的，因为据说在他们身上，吸引人的个性与令人厌恶的个性不稳定地混合在一起。在美国社会，一个人的肤色仍有效地决定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前途，无法超越政策中隐含着的、长期形成的有关种族区别的种种假设。词汇的改动并未改变种族等级思想，只是使否认它同过时的种族主义世界观有任何联系的辩护显得更虚伪了。

美国领导人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的个人言论，那种老的定型看法与恩赐态度似乎已附着在新的社会发展的等级表上。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说，“世界上各个民族中，有许多小孩子需要托付给管理人”，其中最靠前的是“东方的棕色人种”。他想把朝鲜从日本占领中解放出来，把法国的印度支那半岛、英国的印度与马来西亚、德国的东印度群岛等从殖民镣链中解脱出来，他

坚持认为，这些地方还需要几十年的指导，才能学会走路。罗斯福在国务院内的一位密友萨姆纳·韦尔斯认为，非洲的解放还是更遥远的事情，因为他们“是在人类的最低一级”。整个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仍是美国的特殊朋友与受赡养者。但是，朝鲜战争又复活了从前的理论：东方人冷酷，狂暴，不可理解。[62]

乔治·凯南这位外交政策专家中的完美人物，曾透露自己的“现实主义”是如何深深地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使命感结合在一起。1949年，他曾力促美国人“走向前去看看为了使非共产主义世界得到稳定，我们还能做些什么”。1949年，他把中国共产党人看做是“令人痛心地被人误导的受迷惑的人们”（尽管有时他也说他们是一种“易变的、难以捉摸的东方式运动”）。他理所当然地对中国人参与朝鲜战争表示十分愤怒，说这是“极其严重地有意冒犯美国”。中国人已变得“粗鲁与傲慢”，应当给他们“一个教训”。凯南从拉丁美洲旅行回来，建议保持原来的政策。他说他见到了“困惑的不幸的社会”，但他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不快活、更无希望的人类生活”。拉丁美洲人已经后退到“极端个性化，无法无天，表里不一”，进步的前景受到障碍，包括：过热的气候，乱七八糟的种族混杂婚姻，西班牙传统留下来的“宗教狂热、精神不振，以及酷爱最无情的残忍行为”。阿拉伯人也不比拉丁美洲人强。1944年凯南对伊拉克的一次简要描述，表明了他对这个民族的厌恶，他认为伊拉克人不仅愚昧、肮脏，而且“各个方面都显示出宗教的偏执与狂热”。[63]

杜鲁门政府中最典型的种族主义者也许就是总统本人。他的早期言论充满了种族观念。墨西哥人“满身油”，斯拉夫人“放荡不羁”，比之更差的是“黑鬼”、“支那人”。年轻的杜鲁门认为，这些人同美国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服役期间来到纽约，使他得了个犹太人贪得无厌的定型看法，并扩大了他的种族参照系，包括：“食蛙者”——法国人；“呆哥”——肤色浅黑的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受战争的刺激，他还仇恨德

国人，1918年他给家里写信说："他们都是没有心肠、没有灵魂的。"下一场世界大战又把"杰普"（"Jap"——对日本人的蔑称）引入他的词汇，1945年他在波茨坦写信说，他深信日本人是"粗野、冷酷、无情、狂热的"。杜鲁门迟至1946年，还在沿习独立战争时期南方的传统，称黑人为"nigs"或"niggers"（黑鬼）。作为一名总统，他还继续对"混血儿"表示厌恶，不能容忍那些拒绝进入文化熔炉的外国血统美国人。他对英国则是大肆吹捧，说英国是美国法律的源泉，是美国的紧密盟友，他用对任何外国人都没有用过的赞美词说："最根本的是……我们的基本观念相距不远……"[64]

艾森豪威尔政府也追随同样的思想模式。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驻联合国大使卡伯特·洛奇用"非白种人"称呼"第三世界"已经算是屈尊俯就了。艾森豪威尔的一位顾问C·D·杰克森是发展政策的倡议者之一，有时还充当联合国的代表，他否认自己是一个"有色彩的势利人"，但接着又讲了一个事实证明恰恰相反的观点："比起那些感情特别冲动、事情搞得一团糟而人数比我们多得多的非洲人、亚洲人与阿拉伯人，西方世界在宣战、媾和及国会议事程序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艾森豪威尔本人的心目中，希腊人是"倔犟的人民"；印度人是"可笑的人民"，不值得信任；越南人"落后"；中国人"什么事情都满不在乎，愚昧无知……对人命损失毫不动心"。在所有这些人之上的，则是"全世界讲英语的人"，他们具有特殊责任去"为自由民族之间必要的合作树立榜样"。甚至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艾森豪威尔仍保留着同"那些英国人"团结一致的意识——"他们仍是我的右臂"。[65]

这种腐朽不堪的观点在第三世界将产生什么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总统认为"有依赖性的民族"应当再有几十年来接受西方的训育。否则，早熟的自由国家很容易受莫斯科操纵，最终导致"奴役"。那些国家的领导人中一些野心勃勃的人，如埃及的加麦

尔·阿布杜尔·纳赛尔，应当被放回原来的位置。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同样不愿接受纳赛尔（“一个极端危险的狂热分子”）以及其他难以驾驭的第三世界领导人。杜勒斯坚持他们应有耐心，应守规矩，系源自他对西方殖民主义的高度好评。在他看来，殖民主义的兴起并不“仅仅是力量引起的”，而是出于西方观念的吁求。它的效果是良好的，并将证明能起到独特的“自我清理”的作用，因为“西方的政治统治”可以使坏东西“和平地消亡”。[66]

长期的发展战略与遏制的压力相结合，形成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在各个地区，冷战勇士按当地情况调整自己的做法。非洲要求帮助发展最强烈，西方对他们的援助实际上是不充分的，并且还染上了浓重的种族色彩。非洲政策的特点是渴望在“最适宜发展共产主义的土地”上能保持稳定。华盛顿私下承认，欧洲殖民当局的压制，或白人（只占少数）统治的政权，从长时间来说，只能产生不稳定、种族斗争、共产党支持的造反，这些正是政策制定者最怕见到的事情。但是，他们认为“质朴的不发达民族的早熟独立”更加危险。50年代后期，所有的黑非洲国家，除了葡萄牙殖民地、罗得西亚、南非，都在开展独立运动，纷纷从白人少数政府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华盛顿却在为“白人过早地从执政地位撤退”以及黑人“极端分子”的行动烦恼、焦虑。虽然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发表声明对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表示同情，他也很快受到渴望迅速非殖民化、过分热中于解放运动以及黑人统治者不称职等问题的折磨。[67]

那些强调捍卫苏联支配下的东欧国家的人权的政策制定者，对非洲却令人注目地噤口不言了。再也没有比南非更能说明问题的了。尽管有20世纪40年代晚期建立的种族隔离制度的麻烦，并担心它会驱使“土著人奔向共产主义”，杜鲁门政府及其继任者仍沾沾自喜于这个国家是稳定之岛，美国在该地的战略利益与经济利益确有保障，而且还避开了民族自决。美国国内批评这项政策的人累累发出抱怨但无结果。例如，1960年发生的夏普维尔大屠

杀，白人警察杀死 69 名黑人示威者，伤者超达 200 人，艾森豪威尔除了说种族隔离是“爆炸性的”以外，未采取任何行动。这位总统私下里说，隔离主义者（“不是坏人”）只是关心“他们的可爱的小姑娘不必在学校里同一些大个儿的、长得过大的黑人坐在一起”。他宣称他认为南非有和平改革与“人民互谅”的希望。肯尼迪政府也同样不愿意否定种族隔离。“我们不是自命的宪兵去处理其他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问题。”迪安·腊斯克讲得很漂亮，但未解释为什么把南非作为例外，不实行通常模式的美国政策。[68]

事实上，就在这个时期，腊斯克在说到美国的刚果政策时与他过去的讲话自相矛盾。比利时结束了直接控制刚果的做法，华盛顿反而担心非殖民化“突然结束”有可能（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话来说）“比现在不独立的状况糟得多”。刚果内战爆发，白人修女被强暴，传教士被肢解，召来了美国人想象中古老的种族幽灵。政策制定者毫不费力地作出了严厉的判断。美国大使报告说：刚果人是“原始的民族”，只能对“简单的刺激”作出反应。艾森豪威尔对那个“即使以非洲标准来说，也是完全无知的国家的焦躁好斗的人民”表示忧虑。他不希望“混乱不可收拾”导致共产党插手。结果是，在联合国干预的支持下，美国在刚果重建秩序，让中央情报局在当地的机构策划了暗杀帕特里夏·卢蒙巴——一位有魅力的民族主义者，艾森豪威尔的助手们却认为他是一个受了共产主义欺骗的人。肯尼迪与约翰逊当政时期，刚果情况毫无变化。卢蒙巴被暗杀后，刚果依旧是一个“什么事情都乱七八糟的地方”（肯尼迪语）。肯尼迪及其继任者企图选择亲美的温和分子来收拾局面，同时让中央情报局培养出来的一些右翼分子做羽翼。在紧急情况下，甚至出动了白人雇佣军，以对付那些政府仍称之为“原始”的人民，国会则称之为“几乎还没有跃出森林的人”。[69]

在拉丁美洲的冷战政策方面，对革命的担心超过了种族问题。为避免出现不稳，华盛顿把这个地区作为连续不断实施发展项目

的对象。杜鲁门政府的“四点计划”，艾森豪威尔的方便外资流动计划，以及肯尼迪与约翰逊推行的“进步同盟”，都以各自的办法推进这一主要的政策目标，这一政策目标在1952年就被确定为：“一种有序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使拉丁美洲各国抵制共产主义势力在国内的增长和苏联的政治攻势。”为了抵消古巴革命成功的影响并阻止其在该地区的蔓延，政策制定者在60年代提高了援助水平。虽然肯尼迪起初讲过，要为“绝望的人民”进行改革，实际上从美国的援助项目中获益最大的是军事强人。这些强人被华盛顿赞许为目前状况下最坚定的卫兵。[70]

无论是倡言经济增长、政治改革也好，还是提高统治的权威性也好，美国人始终认为他们的洞察力高于那些拉丁美洲的当权者。发展，换句话说，就是在门罗主义的名义下去实行支配与教导。国务卿斯退丁纽斯1945年颐指气使地说，美国“决不要受一大群美洲小国家的纠缠，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要依赖我们”。在这些共和国，政治不能靠搞群众运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警告说，不能相信“下等阶级”会去建设“我们所说的民主”。他的主管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说，拉丁美洲的“抗体”太弱，无法“经常抵制共产主义病毒的侵入”。杜勒斯的继任者克里斯蒂安·赫脱国务卿1959年4月曾会晤菲德尔·卡斯特罗，回来后忧心忡忡地说，他“在许多方面非常像是个孩子”，“对政府面临的各种问题毫无主见”。林登·约翰逊的主要顾问、得克萨斯同乡托马斯·C·曼认为强硬路线最适合拉丁美洲。“我知道我那些拉美人。他们只懂两件事：一块钱进口袋，一只脚踢屁股”。迟至1969年，经常关注这一地区的纳尔逊·洛克菲勒还说，对拉丁美洲人来说，“民主是非常困难且难以捉摸的事情”。他们最好是在强有力的政府的统治下，这样的政府才能对付那些专门从事“无政府、恐怖与颠覆活动的力量”。[71]

发展政策与独裁政权未能使拉丁美洲获得预期的稳定，华盛顿毫不犹豫地回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受冷落的干预战略。在

"大棒"年代，干预不被看做是对邻国主权的侵犯。政策制定者认为共产主义是外来势力，不是美洲土生土长的东西，因此把他们反对革命运动的做法同承认民族自决调和到了一起。当他们看到倾向左翼的危险信号时——无论是反映在外交事务中的中立主义，或反映在经济中的民主主义与劳工纠纷，或反映在土地改革上——美国领导人一概拧紧经济与政治的螺丝，最后一着就是派遣军队，或松开中央情报局的锁链。

在美洲国家的几次重大冷战干预中，危地马拉成为头一个目标。1954 年 4 月，艾森豪威尔得出结论："赤色分子已取得控制"，便打定主意进入相邻的萨尔瓦多。国务院、国会、报刊都一致认为共产党人已渗入阿奇兹政府，需要立即行动。一场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成功地清除了美洲的头一个共产主义滩头阵地，诱使政策制定者去第二个滩头阵地试试运气，那便是 1961 年的古巴猪湾。再一次，共产主义影响的警告信号把中央情报局的行动计划送到了制图室。可是这一次，肯尼迪批准他们开始行动后，革命党人已从危地马拉接受教训，因此已严阵以待。失败是一杯苦酒，但肯尼迪心犹未甘。他在当总统的最后一周内在迈阿密发表了演说，说"一小撮阴谋分子剥夺了古巴人民的自由"，把古巴人民交给了"本半球以外的势力"。古巴的阴影笼罩在林登·约翰逊的头上，1965 年他决定派遣军队进入多米尼加共和国。他不能允许"一小撮共产党阴谋分子"再次成功地控制"一场得人心的民主革命"。[72]

在东亚，发展政策同遏制政策如此接近以至二者难以区分。战胜日本使美国人把太平洋作为内湖的梦想完全成为可能；冷战的算计也使此事成为绝对必要。杜鲁门于 1946 年 1 月宣布，他只需要"保持对日本与太平洋的完全控制"，并"恢复"中国与朝鲜的地位，使这两个国家各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到了 1949 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正式向这一地区发出信号，要他们"消除苏联占优势的力量的影响"。要达到这一目标，部分地要依赖结束贫困

与苦痛。促进贸易、社会安定、行政效率和教育，建设公路，发展农业与工业等项目被认为是在该地区获得长时期成功的关键。目前急需的是帮助亚洲人民推开共产主义——50年代早期迪安·艾奇逊把它形容为："苏联外交政策发明出来的空前狡猾的工具。"只要苏联的代理人敢于侵犯，美国将给该地区以巨大的军事援助甚至派出军队。[73]

亚洲前线成为美国冷战几次重大成功的演出舞台。日本，正如西德一样，在占领当局控制下，成为一个冷战的堡垒，1947～1948年成为美国控制东亚海域基地锁链中的一个北方港口。1951年，日本成为美国的盟国，成为美国的太平洋共管领土上的一个稳定的小伙伴。菲律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仍是美国的殖民地，是另一个非凡成功的舞台。正式批准独立是在1946年，于是菲律宾群岛正好成为美国在亚洲惯用的仁慈形象的象征。然而，菲律宾的经济只是美国经济的延伸；寡头统治集团曾同美国长期合作，保留了自己的特权，继续对他们的太上皇惟命是从；而美国仍在菲律宾保有军事基地，以适应亚洲冷战的需要。

南朝鲜也可以算是一个成功，如果不把美国付出高昂代价的"警察行动"计算在内的话。1945年占领半岛南部之后，美国官方推荐了（一如在日本与菲律宾所做的那样）思想保守、坚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人。李承晚受到美国的提名以统治南方（尽管他并不特别合作）。到了1950年6月，李承晚不仅面临国内的严重压力，而且遭到受苏联支持的北方对手金日成的攻击，亟待拯救。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领导的军队击退了金日成的军队，然后在企图解放北方的错误估计下，把中国拉进了冲突。一位被认为是"东方心理"专家的战地指挥官根本无视中国的重大战略利益，一位国务卿认为在中国人眼里，朝鲜无足轻重，只不过是"一条通往别处的路"，铸成这场大错有他们两人的份。[74]经过长期的战斗，南朝鲜于1953年成为一个稳定的、亲美的驻军国家。

美国在亚洲虽然实现了它的目标，但所得到的惩罚是那些国

家仍以农业为主，人民仍在不满，局势未得到改观。即使是美国获得成功的地方，农业问题仍须十分注意。在日本，解救之法是美国推动的土地改革；在菲律宾，是美国倡议的反对胡克游击队的错误领导、防止造反的计划；在南朝鲜，则是由美国占领当局授权给当地的强人使用铁腕进行统治。而在中国与越南，意志坚定、经验丰富的民族主义精英分子将其纲领与农民的愿望结合起来，使美国人失去了控制，并使美国遭受到两次丢脸的失败，计划落空。

华盛顿发现，在这两个国家，即使很慷慨地支持代理人也是不行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接受了超过 30 亿美元的援助，仍然败给了毛的共产党。遭此突变，杜鲁门政府决定拯救台湾，这是锁链中的另一个基地海岛，从大陆逃亡出去的人可以依靠美国海军屏障在岛上养精蓄锐。另一方面，华盛顿必须制定一项孤立那个杜鲁门所说的“一帮杀人犯”的政府，后来作为国务卿的杜勒斯则描绘他们是“文明国家”中决找不出来的亡命徒。[75]

在越南，美国于 1950 年开始向法国提供大量援助。在法国为保持其殖民地进行挣扎的最后几年内，美国人替他们清偿了 3/4 的账单。1954 年法国经协商最后同意撤出印度支那，艾森豪威尔政府负责寻找另一个代理人。他们找到了一个吴庭艳——一个坚决反共的保守分子，让他在越南南部建立一个国家。为了增加他战胜胡志明以及那些从属于莫斯科的“职业鼓动家”的机会，华盛顿向吴庭艳的初生国家倾注了大量援助并提出了许多建议，在周围建立起一个地区性的保卫同盟。吴庭艳证明同法国人一样控制不了农村，在同美国的合作方面也许还不如南朝鲜的李承晚。1963 年肯尼迪的助手给南越的军队发出信号把吴庭艳赶下了台。继任的将军们倒是更顺从了，但效果仍然不佳。[76]

越南不可抗拒地成了一场美国的战争。连续几届政府都宣称如果决定撤退或承认失败，代价太高，因此，在所有的代理人都

失败之后，美国人只有踏了进去。杜鲁门的班子认为，失去印度支那将危及相邻的国家，并使东南亚的平衡处于“严重危急之中”。艾森豪威尔用“多米诺骨牌”理论来重新强调地缘政治的利害关系，并警告说：“如果一个越南人或中国人被剥夺了自由，我想我们的自由也就失去了一点。”[77]

肯尼迪政府与约翰逊政府继续坚持上述理由，因为他们同意那些理由的前提，并且他们不想在越南问题上也受到致命的政治创伤，类似失去中国给杜鲁门政府的影响。肯尼迪 1956 年认为在吴庭艳执政的条件下有机会由美国进行指导、援助与投资，建立起一个比共产党“和平得多、民主得多、地方化得多”的革命政权。在猪湾事件之后，他承认听到了“正在亚洲、拉丁美洲升起的共产主义喧闹声”，为此认为越南对美国是一个挑战，决不能等闲视之。他增派美国军队，总数达到 16000 人，证明这还不够时，约翰逊不但扩大了美军陆战队的规模，而且还展开了空战。如此显示美国的威力与意愿，多少是想迫使河内的东方人接受他们国家的永久分裂。[78]

越南战争是美国在亚洲的冷战斗争的顶点，也是将那种老式的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外交政策模式强加给世界并使之达到了极致。约翰逊在 1965 年 4 月有关越南战争的演说中提出一个浅显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国家必须牺牲它的安逸、利益与力量，仅仅为了这么一个遥远的民族？”[79]问题的答案对他是显而易见的，对我们来说也是很熟悉的，因为他的那些前任早已回答过了。

革命仍像 18 世纪 90 年代以来那样，给人的印象是恐怖统治，是野蛮屠杀，是国际间反对秩序、反对理智的各种阴谋诡计。革命力量在美国人不理解的农业社会中的活动，激起了他们敌对的“急速反应”。再者，长期以来的种族等级观念一直期望引导一个虽然落后然而知足的民族过上更好的、“现代化”的生活。教育已取得成效，美国的发展经验教训有助于提高贫弱民族的社会地位。最后，美国已经“自愿承担起了走向人类最佳前景的重负与光

荣”。美国人献身于自由与“民主个人主义”，必须为之不断奋斗，以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把受到“专制政府”压迫的人民以及深受“外国支配”之苦的人民解救出来。因此，这个特殊的国家也许可以“拯救世界”，不让世界成为“人类自由的巨大墓地”。过去的历史与地缘政治规律告诉他们，美国如果放弃它的自由捍卫者的角色，就意味着听凭海外侵略活动肆虐，意味着鼓励国内孤立主义抬头，长长的遏制防线的多米诺骨牌便将一一倒下。[80]

截至 1967 年，受美梦与恐惧驱使去越南打仗的美国人共计 50 万人。那些美梦与恐惧与他们的国家同龄，既已古老又像昨天那样新鲜。

六　当前的两难困境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不能由自己选择一个环境来创造历史，而只能在直接遇上的、特定的、从过去演变而来的环境中创造历史。

卡尔·马克思（1852 年）

对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首先应理解它们——它们是什么，怎样起作用，怎样产生的——第二才是评论它们，迫使它们同现实妥协（不一定要投降）。

克利福德·格尔茨

我们应当好好接受年轻时的马克思的箴言。外交政策同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一样，研究过去对于了解现在非常重要，形式不同，精神则一。历史用特殊的方式教导我们，我们与之妥协的环境不是由我们制造出来的，而我们必须从这个环境走过来。熟悉了引导美国人进入国际政治“丛林”的那些思想，也许正如格尔茨所说的那样，将有利于我们穿越横在前头的危险。

前面几章已经说明了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之由来。最初的来源是同这个美洲国家的诞生紧紧绑在一起，牢不可分的。从一开始，它的主要特点就反映在阶级与种族的偏爱上，这些问题同外交政策的关系十分密切。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美国的决策者按照种族等级来衡量其他民族与其他国家的价值。他们对不同于美国标准的革命，尤其是左翼的革命，显示出敌对态度。最后，他们深信，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首先捍卫全世界的自由。

美国政策的总倾向，是很难说清楚的，也许是不可理解的，这还未把灿如群星的那些思想观念的影响包括在内。美国并非不可避免地要在美洲占统治地位，在中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居霸主地位。在美国同中国与日本两国的又爱又恨的矛盾关系上，某种神奇的命运并不注定美国要同一个国家敌对 30 年之久，尔后，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又同另一个国家敌对 30 年之久。美国也不是注定要在欧洲的势力均衡中起关键性作用，为此两次投入欧洲大陆的血腥战争，最后在 1945 年几个欧洲帝国崩溃后又由美国去填补真空。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些态势的发展毫不奇怪，均非偶然。意识形态已经经过考验、精炼，混织在国民意识的纤维内部，把美国 20 世纪外交政策更深地推入国际政治“丛林”与战争之中。

指导决策者走向世界的那些纠缠不清的观念，不应被看作是孤立事件，也不应被看作是政策的决定因素。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经济利益，的确可以被认为是比此处强调的思想观念更大的认知范畴内的重要因素。各人的个性，官僚机构的压力，既定的民族习性，以及国际环境，都有潜在的影响，都会在由观念变为行动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是，最终，这些因素毕竟还是第二位的，意识形态仍明显是解释美国人在世界事务中的看法与行动的出发点。

意识形态虽然是持续的，但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或者在抵销压力方面无能为力的。我们已经指出，国家强大的概念经过整整一个世纪才完全树立起来，甚至在本世纪的前 40 年内，它还偶尔受到攻击。我们已经看到种族等级观念在 20 世纪中叶曾用文绉绉的词句包装起来，尽管根本性的东西未变。同时，地缘政治的观念被广泛吸收，历史的教训也对传统的意识形态作了补充与强化（仅对待革命的态度并无重大改变，也未受到重大挑战）。归结起来，今天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规则与将近二百年前的规则不尽相同，但是很容易看出同一家庭成员那样的相似之处，因此不同之处可以略而不计。

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完全超越个人的偏见，他们只能依靠约束那些偏见来成功地阐明过去。但是，当提出一个题目（正如此处），作为思想观念与假设的活体，置于精微的观察之下时，也有必要具有某种程度智力与感情的超然态度——就是说，隔一段距离——来看待这些意识形态问题。然而，历史学家的叙述总不可避免地"染有"个人的经历与信念的色彩。当然，有理由认为，专业性的超然态度与个人信念的混合，也还算是合宜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公民，因此他负有特殊责任去反映过去同现在的关系，并且直截了当地指出历史经验对目前有什么实际意义，民族的未来具有何种前景。这不是什么新颖的学说。凯南与威廉斯两人都为从理解过去入手来阐明公众关心的问题提供了恰当的、有价值的例子。我们并不希望读者未经思考就接受此处提供的结论性判断，对他们的观点也应当仔细地加以衡量。

我从上述历史中所得出的关键性结论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一种强有力的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已经产生不幸后果，如果我们想要使那种意识形态"与现实相妥协"，就必须承认这一点。越南战争提供了最近的、最明显的、令人不安的例证。这场十字军式的征伐也许注定要让 56000 名美国人死在那里，另有 25 万人受伤；它还耗费了超过 1000 亿的美元。[1]战争机器年复一年地转动，使美国的领导人及其体制疏远了美国老百姓，使神圣的民族神话受到质疑，并使国内也感染到同样非正规的暴力行动，这在那个遥远的战场上已成为经常模式。拖延很久的、高技术化的印度支那冲突使生活其间的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单单越南也许就有 200 万人丧失生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密集轰炸这种有组织的暴力，破坏了整个国家。越南南方，战争毁坏了脆弱的热带环境，将产生无法计算的长期后果；广大农村降下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摧毁性大破坏，出外逃亡的难民超过 600 万，无情地把社会结构撕得粉碎。战争扩大到柬埔寨，使那里的局势也动荡起来。从诺罗敦·西哈努克的中立主义到美国支持的朗诺军政府，柬埔寨人民

跌跌跘跘地落进嗜血成性的红色高棉之手，饥荒，社会崩溃，最终被越南占领。

越南战争提出一个浅显的问题：美国为什么要在一个很小、很远的国度里打这么一场费用惊人、破坏严重的战争，而美国与这个国家并无利害冲突，干预的主要理由，最后只有归结到"信念"二字。这个问题及其答案使我们想到一系列其他问题，追溯到意识形态的作用及其能量，联想到令人生畏的威力，联想到导致巨大牺牲、高昂代价、强加来的沉重痛苦。美国人从那场战争的废墟中出逃时，他们开始怀疑是否是占支配地位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导致了错误的估计与重大的代价。

意识形态使美国人对传统强权政治的估计发生了争执。沃尔特·李普曼曾说："外交的历史就是敌对强国关系的历史，其中并无政治上的亲密无间的乐趣，同回应共同目的的吁求也毫无关系。"[2]然而，美国人的确把那种全世界各族人民间的亲密与友谊看作是自己追求的目的，而把滥用威力、追逐私利、与美国愿望相左的行为，看作是罪恶的意图。美国人厌恶传统的强国争夺模式的核心，就在于反对强国划分势力范围。尽管划分势力范围是由来已久的从安全考虑的产物，但美国领导人除了很少例外，都曾谴责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是对自由与自决原则的违反。

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越是主动献身于摧毁势力范围，他们在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方面就走得越远。尽管世界已不那么轻信，美国人仍一再声明自己对中美洲、加勒比及太平洋国家的仁慈关怀与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完全不同于那种扩张势力的传统做法。人们辩称：别的人是为了剥削与压制，美国人只是去保护与指导。

美国人在势力范围问题上的立场——反对别人划分势力范围而自己却也在划定势力范围——从外交视角来看，似乎是虚伪、放肆，而不是开明进步、热爱和平。这样，毫不奇怪，这种立场便成为国际间误解与冲突的主要源泉。20 世纪 30 年代同日本在东

北亚的碰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苏联在东欧的碰撞，以及1950年同中国在北朝鲜的碰撞，都鲜明地说明一个讲原则的美国如何不顾国际关系的常理，终于出乎意料地遇到对方加倍的抵制。

意识形态还使美国人无法理解革命的本质与力量。凡是不符合美国自己的温和的、自上而下的标准的革命，便会引起敌意，并且，频率越来越高地引出实际的反对行动。越南可以作为回溯到18世纪晚期的部分模式。这一模式又为美国对20世纪两大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回应所证实；现在又发展到尼加拉瓜、萨尔瓦多与伊朗。

20世纪美国在适应革命方面若有什么与过去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变得更加困难了。一些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商品化的问题与土地租佃关系有利于酝酿成最剧烈的社会革命，而当代的美国人对此毫无体验。华盛顿的领导人用发展政策来回应，这样一种种族中心的做法，用于一个形形色色的世界，系完全出于美国强求一致的历史经验。这些领导人期望在同美国模式毫无相像之处的国家中找到一些整齐的、直线发展的方法来解决从传统进入现代的问题。另外，每一处爆发混乱，美国都倾向于认为是苏联与共产国际的阴谋，更加强化了对革命从前就有的过敏反应。否认社会根源，否认激进的革命活动有它的历史传统，美国把自己置于不得人心、经常压制他人的状态（如在中国），或把自己置于反对近年来席卷大半个地球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地位（如在越南），并在每一次反对革命的行动失败后，使自己蒙受挫折与羞辱（如在古巴）。

我们的无能还表现在无法修改我们对待革命活动的应予反省的僵硬态度，以致令情况变得更糟。这种不灵活性使得华盛顿对于新上台的革命政权渴望美国采取中立态度、避免代价高昂的长期对抗的提议不能正确回应。革命领导人本来就怀疑美国的敌对态度是不可改变的，现在得到了证实，便转向反美阵营中去寻找朋友。毛泽东的中国，正是在1949年被美国断然拒绝后，才深深

投入苏联的怀抱。这是一个特别鲜明的例子，说明这样一个平凡的道理已证明美国在战略上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说来似非而是，美国反对革命的行动即使看起来成功，也必须看作是失败。美国的每一次胜利等于向革命领导人发出通知，告诉他们在战略上必须预见到美国的敌对政策并须为此做好准备。像菲德尔·卡斯特罗这样的领导人，最终成为更加坚决、更加难以对付的敌人，他将动员起民众、军事以及国际的支持力量，来牵制从过去历史来看美国必将发动的反革命进攻。

对付右翼的成功战役，也只不过是在重复地制造定时炸弹。受美国宠爱的、压制性的右翼政权，完全忽略甚或是加剧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为再次爆发反对现秩序、反对暗地里扶植现秩序的美国人的斗争准备了条件。反对革命的行动胜利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便是更大的失败，这是美国在尼加拉瓜、古巴、南越与伊朗的历史经验。制造一个有秩序的假象，似乎值得去同索摩查家族合作长达 50 年，同巴蒂斯塔合作 25 年，同吴庭艳合作近 10 年，同伊朗国王合作 1/4 世纪，但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最终付出的代价超乎想象。如果继续这种做法，美国人还有更多得多的钱要付给那类国家。

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无能，还表现在它令美国无法理解、更不必说去同情那些同我们在文化上差异很大的国家了。在意识形态中占中心地位的民族优越感产生了死板的观点，夸大其他民族看起来是负面的生活面貌，贬低他们的技能、成就与情感，贬低其价值。把其他民族的文化贬低为落后或顺从，使美国人心目中形成僵化的假象，认为诱导这些民族进行政治改革与发展经济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在遇到顽固不化，或抗拒、抵制时，美国人自然就感到受挫与遗憾，更极端些也许会沉溺于把对方看作是非人性，有可能求助于强迫或暴力手段。这种模式，首先用于同黑人与土著美洲人的关系上，后来便用到了“第三世界”各民族的身上。

美国人倾向于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的、柔顺的世界，这种

倾向又因地缘政治把全球看作是一个棋盘的概念而得以加强——这个棋盘是划得整整齐齐的，任何人只要掌握着一些强子，并有适当的战略，便很容易控制全局。但是，世界是复杂的，变化是缓慢的，它拒绝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他们。我们懂得棋坛名将的困惑正在于他发现事实上没有一个方格是相同的，小卒常常出乎意料地闯出自己的路子，而打成和局的棋赛是极少出现的。

美国在越南的经验为这种不幸的倾向提供了充分的例证，它是我们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反映在我们的思想模式中。我们每日每时都在用难听的语言贬低越南人，称他们"gooks"或"slopes"(正如我们早先曾嘲弄其他不听管教的民族为"gu-gus"与"niggers"),* 由于我们把他们的人道精神贬得很低，因此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量使用火力与化学剂，既杀死战士也杀死非战士，并毒化了土地。同时，我们推广一种从美国经验中得来的国家发展模式，教导越南人如何打仗、如何管理，必要时，为他们去打仗，代替他们去管理。以破坏、混乱、归顺告终，这便是越南人付出的代价，而其起因则是我们自作主张搞了一场阻止共产主义的十字军活动，去拯救一个我们认为是落后的民族，并去复活一种过了时的文化。

越南"冒险"中明显存在着恩赐与轻视观点，证实了基于文化背景、肤色意识的世界观仍在用种族等级的眼光来排列国家与民族的位置，队列的两个极端分别是：文明与野蛮，现代与传统。它使我们同大部分欧洲人一样，同情目光远大的以色列人，而不同情黑皮肤、蓄胡须、多妻制、好狂热的阿拉伯笨伯。同情有文化的南非白人，而不同情刚刚从"原始"部落走出来的处于底层的黑人。苏联支配下的东欧人民受压制，我们为之伤心扼腕，而

---

* "gooks"系美国军队俚语，是对菲宾人、日本人、朝鲜人等东方人的蔑称。"Slopes"是美军在二战期间对中国人的蔑称，意思是"斜眼看人"。——译者

美国国内土著民——黑皮肤，有怪癖——的困境仍在继续，这本应受到美国的高度重视，而美国人却把它当作是某个尚未发现的行星上的问题。

美国拒绝接受势力范围的传统，不能容忍社会革命，不肯尊重与我们根本不同的文化模式，这已成为美国的价目标签。美国的账单上必定有一项是改革运动的失败。在一场有限的国家资源与心理承受力的竞争中，提倡美国要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人们，允诺全球将更有秩序、更加自由、因此也更加安全，这些主张一再重复，压倒了那些主张面向国内事务的反对派。无论进步主义被说成是什么，一种政治观点、一场国民运动、或是一项政治计划，美国一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主义便立即黯然失色。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新政先生"为"打赢战争先生"让路．因国防危机而逐渐形成的偏见决定了罗斯福已摇摇晃晃的改革计划的命运。林登·约翰逊为回应被抑制的改革要求，1946 年发动了名为"伟大社会"的改革计划，结果是让越南把钱偷走，令公众与国会支持改革的努力消蚀殆尽。

教训很清楚：为了把世界表面上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赋以崇高的地位，我们实行了一项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外交政策，但它却缩小了我们更新国内事务的能力。这样的外交政策使我们从迅速发展的技术、经济与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切身问题转移开去。它还吞没了改善我们生活质量必需的资金，无论是在健康、教育、环境还是在艺术方面。近来，一半以上的联邦预算用于国际项目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军事行动。反映在统计数字上的追求强大地位的政策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的国内事务，而强加于我们头上的费用从社会角度说是不公正的，从政治角度说是不负责任的。为了服务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看法，生活优裕、舒舒服服的政策制订者把国家财源输出国外，不惜损害那些不富裕、不舒服的同胞及其后代子孙。外交政策不应当用来当作经济再分配的工具。也不能允许政策制订者缩小费用，留待未来的纳税人去偿付账单。我

们应当认真听从托马斯·杰斐逊的告诫:"每一代人应当义不容辞地偿清自己的债。"他还敏锐地补充说：这条原则"如能实行，世界上一半的战争都可避免"。[4]

反对由意识形态来决定外交政策，还必须看到这些政策对我们现有的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的伤害。换句话说，一种献身于自由的外交政策可能在国内产生一些恰恰有害于自由原则的条件。其中部分损害可以从那种偏狭氛围与压制氛围看出来，这些都是外交十字军运动的国内副产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时期内，美国发生过对不同政见者的压制以及对少数民族的迫害。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对日本裔美国公民不符合宪法的拘留。冷战与朝鲜冲突结合，产生了一种抓女巫式的反共运动——名为麦卡锡主义。越南在理查德·尼克松的白宫孕育了一座精神堡垒，导致了违反法律、滥用权力的"水门事件"。

外交政策进一步削弱国内的自由，还在于它越来越倾向于把权力集中到总统手里，曾有一位喜欢吹嘘的高级官员承认现在已变成"帝王总统制"。[5]虽然20世纪的外交活动使政府部门扩大了财源，提高了专业水平与判断力，但国会却被乌云笼罩，公众被冷落在黑暗之中，而一小群狂热崇拜国家安全的官员炙手可热。这些倾向破坏了宪法原则下的制约与平衡，限制了信息的流通，阻碍了学术讨论，减轻了决策者对选民解释政策的责任。所有这些，对于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都是严重的打击。

经济自由也同政治自由一样受到侵害。20世纪外交政策所承担的义务，尤其是它们所引起的四次大战，令华盛顿显著地提高了收税人、花钱者与经济调节者的地位。强调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家抱怨，经济权力集中到如此程度，导致财政不负责任现象（最明显的是巨额预算赤字），导致工业畸形发展，经济发展速度放慢。越来越多的教训证明，经济活动以军事需要为中心的国家安全计划，必将使经济总水平下降，竞争力降低。庞大的防务预算极易引起通货膨胀，至少，在当前建立在不断"增加费用"基础上的

军需采购体系下是如此。军事合同签约人缺乏降低费用的积极性，他们只会抬高稀少资源的价格，其后果影响经济全局。再者，庞大的防务预算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研究与发展”，科学与工程方面的基金和人才不得不转向军事研究与宇航计划，明显的或直接的民用份额减少了。[6]

这些后果证明既困扰战略家又困扰市场经济学家。今天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经济提出的要求将会显著地损害商业与服务能力，而国家未来的防务要由它们提供资金。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颠峰剧烈地跌落下来之后，这种前景就更加咄咄逼人了。美国的商业与服务份额以及通货储备下降后，战略家不得不在国际经济方面采取明显收缩的方针。[7]

外交事务中的行动主义将付出多大的经济与政治代价，20 世纪的政策制订者在预见上表现出明显的无能。在这方面，他们是自己的无知与“想当然”的受害者，还有他们生来不善于预测（更不必说控制）外交政策对国内事务的复杂影响。领导人也显示出感觉极其迟钝，当代价已很明显时，甚至有些领导人还浑然不觉。在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下，这些领导人还深信为捍卫重大原则付出代价是值得的——无论多大的代价。

最近数十年来，这种感觉迟钝模式的惟一惊人的例外，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及其百万富翁内阁成员。这些财政保守分子担心，长时间的、沉重的防务负担将使预算不能平衡，其结果或是扩大税收或是由通货膨胀引起赤字开支。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将损害长期安全所依赖的经济力量。艾森豪威尔改变了防务政策，主要依靠非常规军事力量（由秘密行动补充的核武器），以便减轻防务需求以及自由市场上的紧张状态。艾森豪威尔坚持自己的观点，发出警告，警惕防务预算中孕育着的“一个庞大的军事机构与一个巨大的军事工业”对政府的影响力。他看出，在军事—工业复合体中，存在着对自由、对民主进程的潜在危险。[8]

比起前几位民主党总统的恣意挥霍（他们是 1945～1968 年冷

战时期的决策人)，艾森豪威尔任职八年奉行的财政节俭政策使国家轻松了许多。哈里·S·杜鲁门1950年决定把防务费用增至三倍。[9]他的助手们保证说，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将是有利的。约翰·F·肯尼迪号召“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宣布了他的共和党前任的灰色警告的终结，预示常规军事力量与战术军事力量都要有一个大发展。林登·B·约翰逊错误地判断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以为足够支持他在越南的“讨厌的战争”以及他真正喜爱的“伟大社会”计划。[10]但他失去了他心爱的计划，不得不在通货膨胀的赤字开支的情况下去满足战争无休止的要求。

在民主国家里，公众是外交政策特殊费用的最终仲裁者。然而，公众对于如何履行仲裁者的角色似乎缺少门径。民意测验长期以来都说明广大公众对国际事务知之甚少。某些事例重复了多次，才突出了它们的意义。美国同苏联进行了近十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最终达成两项重大协议之后，1978年晚些时候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只有34%的美国人能正确答出参加这项谈判的两个国家的名字。[11]民意测验显示，同这种对外交事务漠然无知状态相一致的是，公众不愿理会含意还不很明确的政策，对需要长期谈判的复杂的外交难题很不耐烦，在碰到严重的未预料到的困难时在主要问题上意见极其分歧。

正是因为这些传统，以及人们怀疑许多美国人内心是孤立主义者，所以政策制订者不大情愿让公众成为制订政策的真正参与者，也不想冒险去发动公开、广泛的辩论。迪安·艾奇逊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些有影响力的人士心底的怀疑，他听到有人用直率的语言说：“如果你们是真的民主，按人民所要的去做，那么你们每次都要出错。”[12]政策制订者当然不愿这样做，他们情愿迎合大选反映出来的倾向，采纳世界舞台上官方估计的表面价值，拒绝多半会在公众中激发孤立主义的信息，拒绝那些不利于他们按照他们自己对国家安全的看法来分配国家资源的信息。

政策制订者剥夺了公众早些表达同自己生命攸关的有识之见

的机会。去帮助一个外国朋友或抵制一个外国敌人所采取的行动，通常会立即赢得公众的支持，并多半会持续下去，直到朝着某种明确界定的、容易理解的目标已有了稳定的、实质性的进展。另一方面，如果某项计划（即使是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导致未预料到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公众便会谴责这项政策以及政策制订者本人。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最明显地反映了公众对外交政策的接受力，他们对外事方面的承诺作出了批评性的（虽然是粗鲁的）但已为时过晚的评价（公众对占领菲律宾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有同样反应）。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同样说明：外交政策舆论看起来很坚实，但当战争费用超过公众容忍程度时，舆论立刻变软了。朝鲜战争无结果地拖了三年，公众的不满情绪堆积起来，其结果是留下来一串令人沮丧的伤亡名单。使人进一步清醒过来的是时间更长、代价更高的越南战争。人们认为，公众的信任已被滥用，因此在这两起事件中公众都撤回了他们的支持。

如果领导人因坚持承诺而出了差错，公众早已准备好把他们的不悦转为政治行动，令这项政策不能实行，或者把政策设计人驱赶出他们的办公室。一场信任危机如果延续下去，将摧毁一个民主国家持久的外交政策所必须依赖的舆论基础。公众的反对，在极端情况下，会迸发出政治煽动，剧烈的谴责与反谴责，粗暴的抗议，以及来自官方的压制，将使政治局势紧张起来。所有这些公众的反对以及他们与政府的疏远表现，都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期间明显地反映出来，早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19世纪对西班牙与墨西哥的战争中，也都有此类反应。例如，腐蚀性的越南战争同水门事件结合在一起，深深地侵蚀掉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公众对干涉主义（连同冷战政策）的支持，尤其在有知识、有影响的美国人中，引起的批评最尖锐。[13]

公众，即使你把他们看作是无知、多变，也应得到承认与尊重，在现行的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搞过头的时候，他们有权刹车。尽管公众这种作用会令政策制订者手足无措、充满风险，至

少对那些过分急切而又不那么坦率的领导人来说，公众显示出他们具有可贵的、通情达理的能力去评估政策，并且防止政策失控。尤其当国会在平时让出某些宪法权力、在战时放弃某些宪法权力时，公众的作用更是无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也是极其适宜的，因为（用一位贤明的政治观察家的语言来说）“外交政策的结果，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财产与荣誉；一个自由的民族不能也不应该被要求为一个他们并不认为是急迫的、不言自明的目的去战斗与流血，去工作与出汗”。[14]政策制订者应当很好地、更敏感地对待公众意见，应当充分地让公众了解有关信息，让公众说明他们的忍耐限度，这比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或置之不理的态度要好得多。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冷战政策的代价，这就为试验时期的到来准备了条件。理查德·尼克松在幕后待机而动。他在 60 年代“在野”期间曾经勤奋地研究国际事务，如今，他像艾森豪威尔在 50 年代那样，反复思考当前的教训。他接受了艾森豪威尔的观点，认为美国的力量是有限的，认为世界比以前更多变了，威胁减少了。与其领导一场追求全球自由、结束共产主义的十字军运动（此人曾是典型的冷战勇士），不如把“势力均衡”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来寻求同苏联与中国的稳定关系。把苏联与中国作为具有国际合法权益的强国来对待，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威胁或罪恶的化身、或革命的妖魔来对待。这样一来，外交工作变得好办了：去寻找涉及共同利益又可以妥协与和解的地方就是。

尼克松当选总统后，挑选亨利·基辛格做他的主要顾问，以此来推动冷战政策破产后的新转变。基辛格的崇拜对象不是威尔逊与杜鲁门，而是梅特涅与俾斯麦——用自己的力量与权势来维持均势的政治家。基辛格使用的是现实政治的语言，他又有欧洲国务活动家的才能，很快便成为一名能言善道、与尼克松志趣相投的人。他运用他的才智与能力为尼克松重新筹划了外交政策的

侧重面。事实很快证明他在推动政策实施方面同他的上级一样地狡猾——善于遮人耳目。他们两人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结束越南战争，这场战争已使约翰逊丢了总统职位，尼克松也可能遭到同样下场。尼克松与基辛格想找出一种能保全面子的解决办法，也就是约翰逊在白宫最后一年内已经勉强接受过的办法。这样的解决办法于1973年1月才来到，已是在尼克松宣布有一个结束战争的秘密办法四年之后，四年中又有许多美国人丧生。武器控制也成为新政府的首项议程。尼克松拒绝了约翰逊政府所抱有的幻想——认为核优势意味着国家安全。相反，他寻求停止核武器竞赛，保持苏美双方的均势。1972年出现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代表着朝向这些目标的重要一步，并为缓和时期的来到，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扩大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最后，尼克松决定同北京对话，从而甩掉了无意义的反共主义，这个主义已经支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20年之久。在外交方面进行的三年耐心的艰苦的准备，为总统1972年的旅行铺了路，这次旅行确定了中美恢复邦交的新关系，最重要的是为美国找到了一个在全球势力均衡中更好的战略地位。

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在老的意识形态面前改弦更张的时候，他们对"现实主义"力量的考虑并未把所有敏感的传统观点驱逐出脑外。的确，基辛格，且不说他的欧洲背景，似乎是带着一套未经过检验的假设来实现他的抱负，他把美国的特殊角色看作是反对两个侵略成性的极权主义双胞胎的"各民族的自由堡垒"与"人类希望的寄托"，看作是受到共产主义威胁、受传统观念束缚的"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代理人，看作是对红了眼的、狂傲的革命党的一个克星。[15]

尼克松与基辛格关于保持美国的威望与信用的成见（在他们企图撤出越南泥潭时特别明显地显示出来），有时会令他们重新使用冷战的与老式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僵硬公式。尼克松本人1970年为他的越南政策辩护时（经常被人引用）说："如果……世界上最

强大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像一个可怜的、绝望的巨人那样行动，极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势力就将威胁到全世界所有的自由国家与自由制度。"六年后，基辛格又刻意渲染这个已过时的题目："美国无法忠实于它的传统，除非它同那些为争取自由与人类尊严而斗争的人们始终并肩战斗。"[16]

尼克松政府对待"第三世界"的态度沿循着一条破敝的通道，这条通道受到双方面的限制：一边是漠不关心，一边是屈尊俯就。华盛顿仍旧把"第三世界"看成是一堆落后的国家，动荡骚乱不已，领导者都是些顽固、执拗、难以对付的人，这些人特别难以驾驭。

政府担心共产党人在非洲利用殖民主义与种族压迫这些题目以取得权力。尼克松本人早先认为，独立"对非洲或非洲人并不是最迫切需要的东西"。一份 1969 年国家安全会议的研究报告称："(民族主义集团的) 力量并非给南部非洲带来建设性变化的适当手段"；它很有信心地预言 (即使不全对)，无论葡萄牙统治的安哥拉与莫桑比克或是白人统治的罗得西亚，"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被解放运动所推翻或受到严重威胁"。[17]

同样的偏见扭曲了华盛顿对第三世界其他部分的看法。北越的领导人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永不让步的。基辛格有一次大发脾气，骂他们是"一堆狗屎。花哨、污秽的狗屎"。基辛格与尼克松都把他们写成"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阿连德在智利的"接管"引起严重不满。尼克松为了把这个南方邻居的"一帮狂人"彻底扫下台去，搞了一些秘密行动去反对那个民选政府。基辛格此时正在绞尽脑汁制造理论基础。"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只因为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就得让它倒向马克思主义。"他宣称，"规定行动限度的"应该是美国的领导人，而不是拉丁美洲的选民。[18]

尼克松 1974 年辞职后，基辛格作为杰拉尔德·福特的国务卿保持了部分脱离冷战的想法。有些人督促美国作出新的牺牲去挽

救正在沉没的南越，基辛格对他们说，美国已经为那个国家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他为缓和政策辩护。两个超级大国拥有结束地球上的生命的能力，因此必须使他们“把冷战转变为一种较为合作的关系”，不要在彼此之间进行“男子气概的测试”。[29]最后，从新近与中国的联系中，他使美国得到了自然而来的战略好处与经济好处。

此后，从1977年到1981年，维持抵制冷战设想的责任落在了吉米·卡特身上。他继续限制武器的努力，并对中国维持开放政策。但是，他的观点来自他的浸礼会信仰与南方小镇的价值观，这使他同另两位南方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与哈里·杜鲁门很相像，而与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同。

卡特一进入白宫，如同很久以前的杰斐逊那样，立即承诺要采取一种克制的、正义的、类似平民化的外交政策，相信世界比从前更乐于接受美国的价值观。他认为“一个政治觉醒的世界已成为新的现实”，为此要求“一种新型的美国外交政策——永远坚持我们的价值观与传统的乐观主义基础上的政策”。他的政策将是“为全人类的利益设想的”，并将令他的国人“以作为美国人而自豪”。这意味着他拒绝采用秘密谈判与隐蔽行动，近年来这些行动已经玷污了国家的尊严，不符合人权原则。他宣称，他的承诺是“绝对的”；他将庇护“个人不受国家专制的损害”，并暗示，他不考虑国家的疆界。卡特希望这种新的做法能使美国外交政策重新获得国内的广泛拥护，擦亮美国在海外已失去光泽的威望，使美国同世界各地坚持自由进步的力量结成同盟。[20]

大家很快就知道，卡特对他的抱负所反映出来的外交政策并无充分思想准备。他对所遇到的问题的看法是浅显的、不系统的，也同别人的看法差不多，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色。举例来说，他本能地谴责伊朗、中美洲与非洲发生的革命骚乱，认为是殖民主义与苏联插手的结果。他在这些地方寻求稳定的办法仍是纠集旧盟友或者鼓动当地军队。在伊朗，这两种计谋都试过了，他还一直

坚持说华盛顿对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并未干预。对于这位思想仍跳不出传统与现代框框的总统及其顾问们来说，这场革命斗争中的胜利者。看来是在令人费解地“决定在政治上与经济上自杀”。霍梅尼尤其令卡特感到意外，卡特认为霍梅尼这位有超凡魅力的宗教领袖只不过是一个“疯子”。再举中国为例，他对中国的想象大概来自传教士的热忱在他孩提时代留下来的深刻印象。在他同邓小平的交往中，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他自认为给中国人提供了崇拜与阅读圣经的自由。[21]

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同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两个人互相冲突的建议使卡特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万斯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取得成功，他把这项活动置于外交工作最优先的地位，催促卡特作出建设性的选择。另一方面，布热津斯基从本土波兰带来植根很深的反苏意识，把总统推向对抗并巧妙地玩弄民族自决与人权的题目，从而推进他自己的反对克里姆林宫对外扩张对内镇压的十字军运动。卡特的这两名顾问在非洲与伊朗事件中的互相抵触以及对中国政策的不同观点，使裂痕更加加深，并令总统的座位更加不稳。卡特企图把两种对立的观点调和到一起，遂使自己的看法也显得模糊不清，政策摇摆不定，引发出社会上要求加强领导的呼声，终于回到了外交政策的老路上来。

1979 年冷战重新开始，爆发了一系列事件，令世界再一次出现两极对立，反共运动再次大大复活起来。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它的越南盟友则加紧了对柬埔寨的控制。在布热津斯基的复杂的俄罗斯头脑（它“倾向于尊重强者轻视弱者”）的建议下，卡特放弃了使参议院批准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协议的努力，增加了国防预算，宣布对苏谷物禁运。[22]缓和与军备控制竟走到了这一步。

在此期间，一连串的革命活动激起了美国人对动荡以及落后国家中发生共产党颠覆的老的恐惧。安哥拉与埃塞俄比亚的左翼政府请进来古巴军队（被华盛顿看作是苏联的代理人），以巩固其政权。离家门不远，尼加拉瓜的索摩查被推翻；萨尔瓦多同样专

制的政权也随后覆灭。另一个美国支持的强人在伊朗下了台。伊朗革命尽管毫无马克思主义色彩，但它的极端的特点与民族主义狂热对美国来说同样的可怕与不可理解。德黑兰大使馆被执为人质的事件提醒人们想到任何革命运动中都有的恐怖行为。[23]这些事件的发展令卡特把不干涉主义打上了句号，接着把人权斗争转为集体的反共叫嚣。

选民期望一种明确、有力、使人消除疑虑、为大家所熟悉的美国意图，使全世界都能听到。罗纳德·里根渴望来担此重任。无论在选举期间还是成为政府首脑之后，里根一再歌颂美国"当仁不让"的熟悉概念，接近伍德罗·威尔逊的调门，恰好吻合托马斯·潘恩的观点，要国家强大到足以"重塑世界"。同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前辈一样，里根认为自己这个国家属于特殊的例外。这个国家是从"人类历史上惟一真正的革命"中诞生的（所有其他的革命都"只是简单地由一帮统治者换成另一帮统治者"）。这个国家已成为"自由之岛"，"上天"指派它担当起全世界的和平与自由的捍卫者的角色。同道德高尚、慈悲为怀的美国相对立的是苏联这个"现代世界最具侵略性的帝国"。里根一再把苏联说成是恶魔。他们是"人类由蒙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中所遇到的最凶恶的敌人"；他们是"一种罪恶的力量，这种力量将熄灭我们已经呵护了 6000 年的光明"；他们是"现代世界的罪恶的焦点"。里根断言克里姆林宫像任何"独裁的""中央集权的"或"极权的"政府一样（沿用威尔逊的词汇），必然是好战的，不可避免地敌视自由。[24]

里根要复活这一套理论，卡特便成为他显而易见的、政治上的攻击靶子。卡特放弃了巴拿马运河，里根认为这个地区就像得克萨斯或阿拉斯加那样隶属美国。卡特同"罪恶的帝国"达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协议，令美国在安全上作出了让步。然而，里根的真正对手，是理查德·尼克松。里根曾从心底里反对同克里姆林宫搞缓和，反对同中国恢复邦交，他曾认为中国政府

“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是以摧毁我们这样的政府为目的的”，并认为中国政府曾骗得美国不义地出卖台湾岛上热爱自由的老盟友。为了彻底遗弃尼克松的传统，里根歌颂起越南战争来。他以自己的方式去称颂这场战争的“高贵的动机”，称颂它是“抗击共产党人征服全世界的重大计划”的正当行动。[25]

里根及其同事召号恢复美国的力量与威望，号召国民满怀信心地抗击共产党对手。通过大规模重新武装，利用经济与外交压力，以及果断的干预，来帮助世界各地的“自由战士”，美国便可使一个不稳定的、颟顸不灵的、天生孱弱的共产主义体系最终崩溃。它将解放俄罗斯与东欧的人民，挫败世界各地的革命计划，并最终“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历史的灰渣”。[26]里根的这种外交政策观念，同此前的冷战勇士的观念一样，是接受慕尼黑教训的结果。这种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年代里因所谓美国无所不能的神话而得以加强，现在正好用它来对付越南战争后全国性的不良感觉。

作为总统，里根忠实于他的竞选诺言。他首先把尼克松与卡特的那些被动应付、优柔寡断、吝啬小气的做法抛到一边。他大肆扩张军备，大大提高了联邦预算（吓坏了财政保守分子，预算赤字也直线上升）。他发动了一场同苏联的经济战，限制双方的科学与技术交流，逼迫笨重的苏联体系在高科技武器方面同优越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展竞赛。他派遣美国远征军进入黎巴嫩与格林纳达，逐步强化卡特在萨尔瓦多反对革命活动的项目，并设法颠覆尼加拉瓜政权。为了防止误导公众舆论，他设法不让局外人窥探政府事务，也不让局内人到处乱说政府的事情。他认为记者们报道越南战争不得人心，有消极作用。因此不让记者过问军事活动。他认为学者们也属不满与怀疑之列，因此不让他们多接近官员与官方记录。只有在中国政策上，里根虽不情愿但不得不作出让步——那也是因为他开始认识到，即使是共产党，也可以箝制一部分红军，以减轻西欧前线的压力。

这种冷战正统复归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尼克松与基辛格企图把他们发明的大国格局永久化的失败。他们喜欢单干，把政府机构、国会、知识界拒之门外。这样一种做法易于灵活的外交，但它未对美国政界仍很强大的反共潮流提出挑战。

越南战争结束后不久，焦虑不安的冷战勇士已经在组织诸如“当前危险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来开发尼克松与基辛格留下来的空间，支持这类组织的学者与社会人士开始赞扬美国在越南所做的努力，声称美国及时果断地使用武力已带来了胜利。他们准备了有关苏联军备与世界各地左翼革命活动的危言耸听的研究报告。这些冷战勇士最主要的目标是重建旧舆论，并且，用诺曼·波德霍雷茨的话来说，向国家提供一阵“自信力的巨浪”。大西洋会议的“培养继承代”计划开始执行于1981年，说明了这场意识形态复活运动所感兴趣的广泛而熟悉的题目。大西洋会议称颂所谓“西方文明的精神”，坚持说西方的世俗与宗教的价值观（其实他们所指的是英裔美国人的价值观）代表了“全人类共同的渴望”，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童子军同一个19世纪的帝国创造者进行杂交那么不伦不类。它宣称美国人民“研究并传播这些价值观并不是要培育沙文主义，而是要进一步肯定它们具有活力，能指导全人类各种社会，使其得到满足”。它还警告说，“不去努力这样做，将招致不团结以及向一个贬低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价值的世界秩序投降的灾难”。[27]

回到冷战精神状态还有其他根源——70年代后期公众渴望恢复民族自豪感、重振国威、重新肯定令人鼓舞的古老真理，不管它们是多么地简单化。历时长久、大失面子的伊朗人质事件就像是在尚未收口的越南创伤上又抹上了盐粒。美国人民渴望重新得到良好感觉，能使人愉快地沉溺于对早些时期的怀念，据说那个时期的特点是国家有无限威力，道德问题一清二楚，并且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全国范围的民意测验清楚地说明公众支持由里根梯队发起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大合唱。1981年年中，有4/5的

美国人深信美国在世界上应起“特殊”作用，半数以上的人认为国家的“最佳时期”将要来到。愿意承担国际义务的人数在上升，重整军备风行一时，孤立主义这个老妖怪则不受欢迎，其比例为二比一。[28]美国公众正在欣赏重新点燃的意识形态之火发出来的民族主义光辉，目前至少还能承受它的代价以及危险的后果。

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表述，不时地受到质疑、轻视或扭曲，但从未被抛弃。艾森豪威尔对控制冷战代价的关注；富兰克林·罗斯福偏爱的四强合作的概念；西奥多·罗斯福偏爱的遏制亚洲的政策；所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动力。但是，没有一种政策被下一届政府继续执行。即使今日，要甩掉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是很不容易的，尼克松政府受到部分影响，卡特政府与里根政府要使之复活，便是明证。老观念的力量把华盛顿又带回到冷战年代，公众兴高采烈地在后面跟随，不顾干涉越南的代价，不顾核战争的恐怖前景，不顾预算赤字或对国内项目的影响。

这次复活并未脱离旧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由于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连接在一起的特殊情况，但决不能理解为同昔日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无关。那些意识形态还在继续影响着决策精英以及社会公众。这种状况由一代代人继承下去，仍然是我们智识武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试图管理一个复杂而又经常不顺从的世界、面临窘困的时候，就需要用到它们了。对复活冷战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看清了冷战的后果，但低估了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政治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与持久性。只有认识到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与生命力，才能去克服重重困难，实现批评者所提出的政策改革。

外交政策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巨大力量——改革者在与其斗争时所遇到的困难也同样巨大——可追溯到意识形态与美国民族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外交政策核心观念的出现并取得中心地位，系

源自美国人经过长期斗争才认同的美国的意志与性格这样一种简单明了的理念。从这一角度就可以明白，那些观念反映了美国公民的信念——就是要把一个种族与民族各不相同、地方利益相互抵触、宗教信仰存在差异的国家团结到一起。

一些特殊的信条加入到民族主义信念中去，其中不难看出有一只自命不凡的高级教士之手。一个基础狭窄的精英集团，主要来自有财产的白种男子，他们有权投票、有权当官，不断用自己的形象并在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来塑造美国的民族主义。白人将统治那些深色皮肤的人；政权将推进经济增长并保证财产安全；盎格鲁民族的价值观将超越其他各个民族的优点。这些占支配地位的前提，把互相斗争的不同观念与不同宗教信仰的矛盾尽可能驱赶到国民生活的边缘去。小心翼翼地设法使平均主义思想失效。经常发生的赤色恐怖反倒孤立了左翼。排外运动用来驱赶“不受欢迎的”移民；而公立学校则使那些留下来的外国人改变宗教信仰。印第安人被迁移进保留地；黑人则受到种种限制的束缚。

随着时间推移，外交政策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同民族主义已成为相辅相成的关系。外交政策的核心观念原本出自占优势的民族主义，当美国变得日益强大后，这些观念的实施又反过来使早先就有的国家观念进一步巩固。20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很大部分是由此形成的。美国外交政策已不再是围绕民族主义诸问题展开争吵的舞台，在美国已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情况下，外交政策主要起到弘扬民族主义精神、制服国内分歧、宣扬美国的美德与使命的作用。

上一世纪的国内思潮已强调了外交政策的这一作用。与国内问题（带有与生俱来的分歧）相反，外交政策具有促使国人在面临共同的外部问题或外部危险时团结一致的潜能。当国内政坛日益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争吵的可鄙场所时，外交事务仍具有高贵、庄严的气质，适于反映国家的意图。因此，一种真心诚意的外交政策成为了国内多元政治体系具有象征意义的平衡物，而用最近一

位总统的气恼话来说，外交只不过是“交出去许多好东西”。[29]再者，对一个处于不断变动中的国家来说，外交政策提供了某种连续性的感觉；它也为国内民族主义者处心积虑地寻找一种坚固的、不变的、鼓舞人心的美国精神的核心提供了一组可供参考的观点。毫不奇怪，对于那些希望让选民振作起来并同时表示自己“高于政治”的领导人来说，阐明一项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便是不可抗拒的了。

外交政策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共生现象并非美国所特有。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一个民族的自我认识包含了它对人与社会极为广泛的看法，这种自我认识构成了这一民族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起主导作用的前提和关注的重点——它在一些关键的方面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概念本身界定了国家是什么以及它同世界的关系，并调整了人们的思想方法，规定了概念范围，以便使某些问题解决得更明快，一般说来它还使人们易于从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找出排难解纷的办法。因此，国家概念本身起到了一种不可替代的防护器作用，以对付政策制订者常遇到的两大威胁：一成不变与优柔寡断。

外交政策倾向于吸收民族主义思想，然后以这些思想去同世界打交道，这也决不是美国的专利。的确，它在国际关系中带有普遍性，也许甚至是全球性的现象。19 世纪晚期，英国的帝国使命的概念，与美国在这方面的观点十分类似，事实俱在，无须赘述。一些通常与美国无法类比的的国家也赞成民族主义观点的外交政策，其中一些基本的考虑包括：国家的命运、种族立场，以及革命性变动等美国的民族主义者常用的那些概念。德国的国家社会党宣扬一种特殊的国家命运概念，同种族纯洁的偏见与革命危险的偏见掺合在一起。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奉行的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也正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体现了这种同样的似乎是无处不在的关注点。

否认我们自己植根很深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甚或见不到我

们同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有相似之处，可以追溯到美国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一个显著特点：强烈的千年盛世情结。这一情结铸就了这个国家，使它向全人类承担特殊责任，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托马斯·潘恩把重建世界的前景交到了美国人的掌握之中；而约翰·亚当斯则要使美国成为"注定要在未来历史中填写最光辉的或最黑暗的一页"，而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家；他们的观念对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影响极深。[31]

美国人逐渐认识到，应当主动地、像传教士那样地去发挥他们的救世主作用，而不是被动地、仅仅用榜样示范的方法去影响别人。他们是救星，有责任向受奴役的、落后的民族伸出手去。20世纪初，不是仅仅威尔逊一个人看到了国家有责任去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比起将被取代的腐朽体系来，面目全新，道德高尚得多。全球鼎新的美梦，受到了经过时间考验的预言者的支持，还偶尔用潘恩的语言来装饰，始终感动着20世纪的美国人。他们的责任是很明确的。人类在困苦中呻吟，渴望得到解放。罪恶的力量已在行动。世界和平千钧一发。行动已是迫在眉睫。

一种代价虽高但其指导思想同美国民族主义密不可分的外交政策使我们面临当代的两难问题，批评派对这种政策早就十分鄙视。我们如何使国家的使命感同一种开明的外交政策协调一致？如果我们认为把民族主义作为首要原则是不适宜的，那么我们就将钻进两难问题的一只牛角尖中去。这样的看法将导致认为它的实行效果对人类有害，健全的外交政策必须摆脱它的影响。索尔斯坦·维布伦就曾鼓动他的如簧之舌说："民族主义精神生于邪恶、育于罪恶，从未停止将人类成就化为纠纷与悲痛。从物质效果说，它也完全是旧秩序遗留下来的最险恶、最无用的累赘。"[32]一种外交政策不再受时下那些误解的束缚，也许突出野心反倒好些？然而——这是最关键的——它将是失去任何意识形态基础支持的政策。这样一种政策易于出现道义上的不连贯，在政治上是脆弱的。

如果对民族主义的称赞较肯定一些，那将会使我们走进改革者两难问题的另一只牛角尖。如果我们同意对民族主义应当宽容一些（因为如果说民族主义没有起到有益作用的话，至少它随处可见，我们不能盼望在考虑政策时不受其影响），那么，我们就可决定让外交政策同民族主义的共生关系维持下去。但是——从这方面来思考最难办的是——我们在同世界打交道时仍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将不得不容忍与苏联漫无止境的竞争，这似乎将关系到人类的最终命运；我们同那些与我们自己显著不同的诸文化之间的关系仍将是令人忧虑不安的（即使不说是无法沟通的）；我们对革命性的变革仍将是无名地恐惧，接近于偏执狂。

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带来的两难问题也许有条出路，虽然也不得不付出昂贵代价，然而却能做到具备必不可少的道义上的连贯性并且符合公众情绪。那样的出路，也许把第一章讨论过的批评派的偏见翻转过来就可以找到。批评派提倡一种经过改革后较有限制的政策，并减少政策中的民族主义因素。这样做，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做法也许具有良好的战术意义，但从长远来看，也许会自我击败，因为它将使鼓舞并支持旧政策的潜在力量迸发出来，很容易给死硬的冷战勇士以可乘之机。为什么不用翻转批评派强调的重点的办法来走出死胡同？换句话说，为什么不首先研究出一个处理外交政策中的民族主义根子的新鲜办法，让政策不受注意地悄悄改变？尽管困难重重，至少值得考虑。

给民族主义基础赋以新的定义，令其支持一种新的、较谨慎、较克制的美国外交政策，需要作出双重努力。另一半较为轻松的努力，涉及到进行交叉文化教育。要让美国人知道，我们自己的民族经历与理想同地球上其他大多数居民之间存在着鸿沟，我们也许应当遏制外交事务中显然是长期存在的无知与种族优越论的观点。必须承认，其他文化露出真面目，也许会刺激出丑恶的、不能容忍的感情，而不是更同情、更理解的感情。但这种冒险值得一试，否则的话，便只有默认目前公众对世界一无所知的这种状

况。一种更加全球化的观点也许有助于抑制我们的民族主义激情，使我们较能容忍那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美国如果能充分认识到世界对共存与安全的普遍要求及其意义，同时又充分认识到其他各国为达此目的可能采取种种不同的道路，也许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感到轻松一些，自我解脱一些。[33]

因此，教育将提供一种强效解毒药，来医治美国外交政策中长期存在的核心观念。美国的价值观，尤其是美国人对自由的概念，并不如我们设想的那样可以顺利输出。现在是时候了，美国人应发现与认识到：我们为别人塑造社会制度的能力是有限的；美国应对我们长期以来为了把我们自己的民族自决与发展的概念强加给志向与我们全然不同的民族从而引起矛盾进行深思。再者，更深入地准确评价其他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及其各自的价值，将有助于取代美国人的自命优越以及对文化传统的等级观念，无论这种优越感与等级观念是隐藏在种族歧视时的用语中，还是在较温和的有关进步与发展的语言中。对我们的优越性不要那么自信，我们就可以较有效地不再把解决问题的方案强加于人，甚至自以为我们有把握去替他们解决问题。少承诺一些注定要失败的海外计划，我们就可以少一点用找替罪羊的办法来发泄我们因受挫与蒙羞而来的怒气，少一点在我们自己人当中疑神疑鬼，或少一点策划国际间的阴谋。最后，既对发生革命的原因有较好的理解，又对革命反映出来的主要目标有较好的理解，也许就能去掉我们的恐惧。在我们对革命贴紧观察之后，就可以知晓革命的性质是极为复杂的，其威力往往是巨大的，以致局外人既难以去进行指导也难以去阻止。有谁想试试的话，就要冒风险。

更加国际化的教育也许还可以溶解 20 世纪中叶掺进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那些理论。地缘政治，发展理论，“历史教训”，以各自的不同方式体现了一个过分简单化的设想，这一设想强调并合成了旧的核心观念的缺点。对国际关系的历史做过仔细观察，将显示出历史的教训已被冷战勇士们搞得面目全非。冷战勇士所玩

弄的地缘政治，提供了一种对世界的看法，这种看法概念粗糙，没有文化的洞察力，因此对政策只能产生恶劣的影响。明白事理的公众也许已经认识到，这两匹可怜的驽马应该被立刻送回到牧场去，它们在冷战政策的挽具下长年过度役使，已经疲劳不堪。

即使教育能对旧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及其新近的连生物（共和主义产生一种为他人着想的精神）起扼制作用，它也难以创造出一个支持外交政策新方向的基础。此处关键的步骤涉及一连串共和主义思想的复兴，它们在美国历史早期有强大影响，但到19世纪晚期有所衰微，竟忽视或拒绝继续把美国的强大首先理解为在国内完善自由制度而不是去海外促进自由。

新共和主义的中心理论是美国的强大应当以国内状况来衡量。人们总是在问：美国人有多少自由？他们能有多大的财富？在国际关系方面，共和主义让美国起模范作用，而不是制模工的作用。我们自己的事情安排好一些，美国人就会起到激励作用，鼓舞他人去赢得并保持自由。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作出反应；有些国家即使这样跟进了，但缺乏决心或缺少成功的内部条件。美国人不会对海外自由的命运漠不关心，但当我们把自由强加于人时必然会使我们自己受到损害，使他人作出选择的权利受到损害，无论他们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任何倡导新共和主义的人都应当以早年共和主义的批评派为榜样，十分警惕国际间的政治纠纷。同一些强国作对，对小国又去处处管束，对海外的事情任意指挥，结果损害了国内的生活，招致军国主义的腐朽力量、集权倾向与追求自我的派别活动。共和国一旦被国外协定卡住，便不可避免地蜕化为帝国，失去他们曾引为骄傲的自由。约翰·昆西·亚当斯曾雄辩地强调历史经验对一个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虽然，人们会向争得自由的勇士们雀跃欢呼，但美国不应当为此去闯荡海外“去寻找该摧毁的妖魔”。他警告美国不得违反至今仍值得洗耳恭听的禁令：

一旦人们在别的旗帜（即使是外国独立运动的旗帜）而不是本国的旗帜下排列成队，美国就应避免加入所有那些争权夺利与阴谋诡计的战争，出于个人贪婪、嫉妒与野心的战争，这些战争只能僭取自由的色彩，践踏自由的标准。那样，美国的政策的基本准则将不知不觉地由自由变为威力……她也许将成为世界的独裁者。她将不再是自己的精神的主宰者。[34]

近期以来的许多经验，证实了早年共和主义者的洞察力，重复了他们的追随者们同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外交政策斗争无效后发出的警告。在海外，美国采取了帝国的立场。再也没有别的形容词适用这样一个国家，她居然已实际上把相当多的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同任何帝国相比，我们的目的是仁慈的；我们对利益是置之不顾的或是主张相互依存的；我们的控制机制同我们所控制的国家的状况也各不相同。一位研究罗马帝国的学者曾这样写道：

已知的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不被说成是其利益岌岌可危或已受到攻击。即使这些利益不属于罗马，也说成是罗马盟友的利益；如果罗马没有盟友，那么就会虚构出几个盟友。直到最后实在无法捏造出这样的利益时——那有什么关系，那就说国家的荣誉受到了侮辱……罗马总是受到思想邪恶的邻居们的攻击……[35]

从这幅肖像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们不仅仅是有一点像。

美国人长期以来想象自己在这一点上是独一无二的：别的国家、不太开明的国家也许会有帝国的目的与帝国的做法，可是美国不会。接受共和主义的论点（我们曾经演变为它的对立面），可以用某种程度的历史性观点武装我们自己。只有如此武装起来，我

们才有希望把我们早年的国家观念翻转过来，并在这一过程中扫清我们沉溺已久的严重的自我欺骗。

佩里克莱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对灰心丧气的雅典人说："你们不能推卸国家的责任却又期望分享帝国的荣耀。"[36]美国人仍在大谈特谈国家的伟大，他们最好反过来想想：随着帝国光荣而来的是它的代价。共和主义者预言过的那些可悲的帝国象征，随着帝王总统制的兴起已变得很明显：经济走上歧路，财力耗竭，长期欠债，随之而来的是准备打仗；官僚主义抬头，工业贵族拒绝改变政策、拒绝损害他们的控制权；公民自由权利受到侵犯；政府的秘密性增大。尽管意识形态的强硬派坚持认为自由与他们倡导的"国家安全政策"可以和谐共存，但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批评家们已被证明是更好的预言家。争取自由的实验，同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帝国性质的外交政策的确是相抵触的。我们可以选择完善国内的自由而以放弃海外支配为代价；或者去追求海外支配而以不断侵蚀国内的自由基础为代价。二者必择其一。[37]

共和主义很容易被当作老古董丢弃。它在政治上过于不合时宜，不能成为政策革新的意识形态基础。可以肯定，因经济与技术力量而产生的威力强大的庞大机构，尤其是现代化的公司与联邦政府机构，已使共和主义的理念残缺不全。这些机构无疑将保持强大力量，随之而来的个人渺小化、丧失个性、产生彼此疏远感等等同共和主义精神不谐调的各种影响将继续盛行于世。然而，共和主义还远没有死去。它的主题仍在美国政治领域发出它们的各种声音。

如果以共和主义支撑新的外交政策，那么，那些还留有魅力的主题就必须合起来组成社会计划与政治计划，以便创造初步的社会平等与政治一致的条件——杰斐逊式的共和党人长期以来始终把它们同自由联系在一起。共和主义的理想是要造就一种公民，

---

* 佩里克莱斯（公元前 495~429），雅典政治家。——译者

他们了解情况而又关心公众事务，能对国家命运与自己的生活发挥重要影响。但是，不论以美国的过去还是其他工业民主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当前美国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都已落入低谷，只有把它从这深深的低谷中拯救出来，这一理想才能实现。朝向这一目标的重大步骤可能包括：公民尽义务方面的新的压力，为缺少个人财产或竞选资金的人们获得高位开辟更开放的道路，强调政府应日益增加透明度及公开性，没有这些，公众的辩论将沦为放空炮，政策制订仍将由精英们单独把持。

共和主义的复活将缩小美国已很明显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的因素——同我们的霍雷肖·阿尔杰*的理想相反——并非只是由运气好坏、能力大小、勤奋与否决定的，而是包括了出身的偶然性。那些行使行政权力，拥有财富、闲暇、良好教育与高级医疗的人，他们的父母也都有权势、有金钱、有闲暇、受过良好教育、身体健康，这种情况占了很大比例。[39]采取若干步骤使个人的机会与幸福更加平等，对于塑造一个新的美利坚合众国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样一个共和国里，生活的机会以及与之相随的政治进程，不应将穷人与无权无势的人（今天仍与过去一样，主要是有色人种、妇女与儿童）拒之门外，只有利于富人与有权势的人（现在也同从前一样，主要是有“良好”背景的白种男子）。

受共和主义价值观鼓舞的外交政策，将不再是一个在海外追求强国地位的载体，而是一个在国内追求强大遇到外面的震动与威胁时的减震器。其最高的指导原则是，承认美国人惟有抑制那种去世界各地推进改革的冲动，才能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一个抵制我们协助的世界也是一个能无限消耗我们国内极需的资源的世界。

重新制订一项新的政策，是一桩极为艰巨的任务。它将意味

---

* 霍雷肖·阿尔杰（1834～1899年），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为儿童撰写了100本书。——译者

着删削地方性的各项承诺与各州的奢华要求，以适应可论证的安全费用。[40]它意味着承认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要想把一个易于发生暴力、混乱、压制、剥夺与野蛮行为的世界通统转变过来，是力所不及的。它意味着挣脱疑惧苏联的恶性循环，并在双方同归于尽的威胁下寻找相互宽容的余地。也许最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为美国外交政策设计出一种新的基本概念、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既能为公众所接受，也能为所有的盟国所理解。它并不意味着（此处必须强调指出）孤立主义的胜利，如果孤立主义这个名词是指对广阔世界的所作所为不感兴趣的话。即使在国际上以更加谨慎的态度行事，美国仍将有政治上的朋友与敌人，仍将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仍将是国际间技术、观念、人员大交流中的主流。

赞成这种第三种的、共和主义的替代办法的人，将开始一场试验，这场试验能否取胜还远远不能肯定，并且其后果——必须坦率承认——还不能全部地、清楚地预见到。我们必须再一次倾听佩里克莱斯的教诲，当国人在从帝国立场撤退这个问题上仍在摇摆不定时，他警告说："后退已不可能。……直率地说，你们所支持的，是一个暴虐的政权；接受它也许是错误的，但抛弃它又不安全。"[41]退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对美国外交政策与目标作狭义的解释，也会留下足够的空间，不时地招来不同意见，尽管这些行动都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新的做法可以提供一种倾向于适度克制的总的政策，但它不可能提供（任何老的做法同样也不能提供）能对付随时都会产生的各种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意见的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在制订政策过程出现，由于（至少在最初）需要重新评价承继下来的各项承诺而更加复杂化。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解脱某种危害而不得不采取的平衡措施，有可能将不必要的或不公正的责任加在国内舆论身上或加到有直接关连的那些国家身上。

新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所提出来的也许最麻烦的问题是，它

要求美国人在国内事务与国外事务上实行双重标准，或双重观点。虽然它没有逼迫我们重新宣布自由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将限制我们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去推进本半球的自由，并限制我们将自由视作某些（也许是大多数）组织原则同我们大相径庭的国家的同样标准。美国人在国内对自由坚信不疑，那么，他们能在国外装作是不可知论者吗？把我们对世界各民族的自由事业的承诺暂搁一旁，我们在国内会不会减弱对自由的信心，并感到国家缩小了、孤立了呢？

削弱美国的民族主义，对鼓励民族主义的例外论意识甚至哪怕是稍加非难，也将带来真正的危险。调整的过程无疑将证明是长期的、复杂的。朝向新的、较温和的民族自我重塑的每一步，都将遇上大量的辩论，偶尔还会令人困惑。但是，这一事业的拥护者也许会受到这样一种认识的支持与鼓励，即：他们将使美国的目标同美国的财力更加契合，将获得更坚实的公众支持的基础，并由此为建造一个更民主、更人道的美国社会作出非凡的贡献。我们不再追求全球性的优势，但是我们可以使我们自己的人民生活更加优越。

关 于 历 史 文 献

本书注释所引用的著作，以及书中论及的著作，均系最近数十年来涌现的大量有关外交关系的精华之作。应感谢一批新的出版社，任何人想要参考那些文献时，如今已有了一套出版物，于指导编史工作、文献工作极有帮助。三项最重要的贡献均于1983年出现，使得这一年成为丰收年。它们就是：理查德·D·伯恩斯编的《Guide to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00》；杰拉尔德·A·库姆斯的《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Two Centuries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沃伦·I·科恩编的《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Essays Presented to Dorothy Borg》。杰拉尔德·K·海恩斯与J·萨缪尔·沃克合编的《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1981年出版)，可看作是科恩上述著作的补充。科恩把欧内斯特·R·梅与詹姆斯·C·汤姆森合编的《American—East Asia Relations：A Survey》(1972年出版)最初提出的观点，作了极有创意性的展开。最后，亚历山大·德孔特编的《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第3卷，1978年出版)，应当说，为本书关键性的题目、概念与争论点提供了有用的介绍。

第一章　正确理解意识形态

乔治·坎南的《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1951年出版)与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的《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1959年出版)，今日仍在主宰着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诠

释——因怠忽而失误，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如果请外交史学家们介绍一本对美国外交政策作一简明扼要地综述的书，大多数专家会感到很难再找出除这两本书以外的另一本更合适的书。任何著作的作者都有他自己对历史图景的大胆看法；同样地，每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崇拜者、模仿者，乃至贬损者。

在历史学界，坎南的主要拥护者是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加迪斯有关冷战的专著与论文（最主要的是《Foreign Affairs》杂志1977年7月号上刊载的那篇）称颂了坎南在外交政策研究领域中的“现实的”观点。坎南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影响，尽管其重大意义受到广泛的承认，然而还需要谨慎地衡量。一整代外交史学者——其作品支配了50年代与60年代——都从坎南及其追随者汉斯·J·摩根索的著作中汲取过教益。而下一代则相反，总的来说对“现实主义”不大感兴趣。在弗兰克·默里与西奥多·威尔逊合编的《The Makers of American Diplomacy》（第2卷，1974年出版）中，汤姆斯·佩特森曾对坎南有一篇评略；《Western Political Qarterly》第20期（1967年3月出版）中有一篇乔纳森·奈特写的“George Frost Kennan and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ey”；巴顿·格尔曼的《Contending with Kennan：Toward a Philosophy of American Power》（1984年出版），都反映了后来的倾向——对坎南（无论是作为政策制订者、历史学家或政治哲学家）的敏锐、明晰与前后一贯性提出了质疑。所有感兴趣的读者最好去读一读坎南的两卷本回忆录《American Diplomacy》（分别在1967年与1972年出版），此书显示出他作为一名敏锐的观察者的才能，以及他在《The Cloud of Dañger》（1977年出版）与《The Nuclear Delusion》（1982年出版）两书中有关他早年曾参与提倡的冷战政策的有关评论，这样，读者对他才有最后的发言权。

最近出现的大量的评论与诠释出自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的笔下，主要是：《The Roots of Modern American Empire》（1969

年出版)，《History as a Way of Learning》(1973 年出版)，以及《Empire as a Way of Life》(1980 年出版)。然而，《Tragedy》仍是他有创意的作品。此书是威廉斯后来研究工作的知识资本；同他的思路相近的历史学家们后来也常常从此书中摘引他的观点，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正是威廉斯及其门徒弗雷德·哈维·哈林顿在威斯康辛大学教出来的学生。这一集团包括沃尔特·拉夫伯、劳埃德·加德纳、罗伯特·弗里曼·史密斯，他们被人称作"新左翼革新者"、"新经济决定论"或干脆就是"威斯康辛学派"。他们不再像现实主义者那样"铁板一块"，集团的各个成员主要的共识仅仅是：世界事务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外交政策也概莫能外。

学院历史学家中的主流，基本上坚定不移地遵循威廉斯的主张、评论、逻辑与举证，有时太过分——如罗伯特·J·马多克斯的《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73 年出版)。给威廉斯以热烈的全面赞扬的有：罗伯特·塔克的《The Radical Lef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71 年出版)；J·A·汤姆森的"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and the 'American Empire'"，载于《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第 7 期 (1973 年 4 月出版)；以及布拉德福德·珀金斯的"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Twenty－five Years After"载于《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第 12 期 (1984 年 3 月出版)。左翼历史学家们，如尤金·吉诺维斯在"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on Marx and America" (载《Studies on the Left》第 6 期，1966 年 1—2 月) 一文中，对威廉斯有所不满，因他认为威廉斯缺乏运用马克思主义者的专门术语与理论学说的勇气。

我对意识形态的兴趣，使我超越了现实主义以及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诠释，它至少部分地引导我登上大多笼罩在抽象迷雾之中的文献大山。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下列文献所作的思考非同寻常地明智且具有启发性：克利福德·格尔茨的"Ideology as a Culture System"(载于戴维·E·阿普特编的《Ideology and

Discontent》，1964 年出版）；悉尼·维伯有关"Comparative Political Culture"的论述收入卢西恩·W·派伊与维伯合编的《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1965 年出版)，特别是其中的 512—517 页；还有威拉德·A·马林斯在一篇论文中所作的定义，此文题为："On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Political Science"，载于《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 66 期(1972 年 6 月出版)；还有雷蒙德·威廉斯对"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的精妙的再诠释，此文收在他 1980 年出版的《Problems in Materalism and Culture》一书中；以及 T·J·杰克逊·李尔在"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gemony: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一文中有创见性的探索，此文载于《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 90 期(1985 年 6 月出版)。

意识形态植根于文化，这对历史学家来说并不新鲜，一些著作对此已讲述得十分明白，如：罗纳德·G·沃尔特斯的"Signs of the Times: Clifford Geertz and the Historians"，此文载于《Social Research》第 47 期（1980 年 8 月出版）；小罗伯特·F·伯克霍弗的"Clio and the Culture Concept: Some Impressions of a Changing Relationship in American Historiography"，载于《Social Science Quarterly》第 53 期（1972 年 9 月出版）。罗伯特·凯利的《The Culture Pattern in American Politics: The First Century》(1979 年出版）以及他的"Ideology and Political Culture from Jefferson to Nixon"，载于《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 82 期（1977 年 6 月出版），都冒险地运用了从文化角度看意识形态的观点，这些外交历史学者的文章都值得一读。

探究对外政策意识形态中的国家意识，有大量文献足供引证。杰夫·埃利的"Nationalism and Social History"载于《Social History》第 6 期（1981 年 1 月），特别有助于分析两种经典的方法——一种是汉斯·霍恩与已故伊利·基多利赞成的方法，强调国家主义观念的发展与扩散；另一种是卡尔·多伊奇倡导的，强

调经济发展对国家意识的影响。其他一些有用的参考书如：约翰·布罗伊利的《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1982年出版)，特别是“The Sources and Forms of Nationalist Ideology”这一章；还有安东尼·D·史密斯的《Theories of Nationalism》第2版(1983年出版)；史密斯的《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979年出版)；以及K·R·米诺格的《Nationalism》(1967年出版)。

第二章 对国家强大的不同看法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争端，开创了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争论。这一争议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现实主义历史学家，有些人拥护其中一方的卓越观点，另一些人则拥护对方的观点。在这方面的论述，最近的著作有：杰拉尔德·库姆斯的《The Jay Treaty: Political Battleground of the Founding Fathers》(1970年出版)。他站在汉密尔顿与联邦党这一边。塞西莉亚·M·凯尼恩的“Alexander Hamilton : Rousseau of the Right”一文，载于《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73期(1958年6月出版)，以及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的《To the Farewell Address: Idea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61年出版)都是重要的早期著作，也用我们熟悉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等名词来评价早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新左翼”著作强调的不是两种观点的冲突，他们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扩张的基本共识，所不同的是，汉密尔顿专注于海洋，而杰斐逊专注于大陆。这方面的例子见于下列论文：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在《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第3辑第15卷(1958年10月出版)；沃尔特·拉夫伯在威廉斯编辑的《From Colony to Empire》(1972年出版)一书中的有关论文；以及理查德·W·范阿尔斯泰因在《The Rising American Empire》(1960年出版)中的总的诠释。

没有一种诠释能恰如其分地说明共和主义者的设想如何影响到政策。一小批理智的历史学家受到伯纳德·贝林的《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67年出版)一书的启发，作者竭力把美国政策的失误归罪于共和主义，对此作了深入的质疑。罗伯特·E·沙霍普在《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第3辑第29卷（1972年1月出版）与第39卷（1982年4月出版）中，两次作了概括性的评述，提出了卓越的指导性见解。迄今为止，把共和主义同外交政策联系起来，给人印象最深的阐述可见于杰拉尔德·斯托尔茨的《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Idea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1970年出版）第3章、第5章；德鲁·R·麦科伊的《The Elusive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1980年出版)；兰斯·班宁的《The Jeffersonian Persuasion：Evolution of a Party Ideology》（1978年出版）；以及罗杰·H·布朗的《The Republic in Peril：1812》（1964年出版）。

对19世纪40年代即美国外交政策第二次意见大冲突时期的研究，是弗雷德里克·默克毕生的事业。他的主要研究成果《Mission and Manifest Destiny》(1963年出版)，把良好的国家使命感同具有侵略扩张性的有害影响区别开来，而后者先在1846年、后又在1899年两次把国家引入歧途。默克的看法实际上是对阿尔伯特·K·温伯格的大部头简编《Manifest Destiny》(1935年出版）的含糊的攻击，这部书坚持认为更好战的扩张主义形式就是真正的(可能是不幸的)美国国家主义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本书有它的重要性。默克似乎还赞同乔治·坎南的观点，认为情绪化的公众对于制订一项良好的美国外交政策实在是一种主要的威胁。毫不奇怪，默克在他参与写作的《Dissent in Three American Wars》（1970年出版）一书中，把波尔克的批评置于显著地位。

默克对南北战争以前的扩张主义者的看法，受到《Empire on the Pacific：A Study in American Continental Expansion》（1955

年出版）一书的补充，作者诺曼·格雷伯纳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对扩张主义的诠释不适当地抢在了“新左翼”的前面。起补充作用的著作还有1957年出版的查尔斯·赛勒的多卷本《波尔克传》（范围包括波尔克总统任期期满后的岁月）；还有罗伯特·V·雷米尼的三卷本《安德鲁·杰克逊传》（1977年～1984年出版）；还有戴维·M·普莱彻的《The Diplomacy of Annexation：Texas，Oregon，and the Mexican War》（1973年出版）；还有托马斯·R·希他拉的《Manifest Design：Anxious Aggrandizement in Late Jacksonian America》（1985年出版），此书在扩张主义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方面有新的观点；还有罗伯特·E·梅的《The Southern Dream of a Caribbean Empire，1854—1861》（1973年出版）。约翰·H·施罗德的最新研究成果《Mr. Polk's War：American Oppsition and Dissent，1846—1848》（1973年出版），则把扩张主义淡化为局部性的冲突。这一时期的国家主义思想被广泛描绘，可见于弗雷德·斯莫金的《Unquiet Eagle：Memory and Desire in the Idea of American Freedom，1815—1860》（1967年出版）；梅杰·L·威尔逊的《Space，Time and Freedom：The Quest for Nationality and 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1815—1861》（1974年出版）；以及拉什·韦尔特的《The Mind of America，1820—1860》（1975年出版）。

19世纪90年代成为研究的重点，长期以来，这个时期被广泛地看作是分水岭。麦金莱及其追随者们都被置于不搞阿谀奉承的现实主义者的透视之下，如欧内斯特·梅的《Imperial Democracy：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1961年出版）；以及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其《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1966年出版）一书中的论文“Manifest Destiny and the Philippines”。霍夫施塔特并不常常同意现实主义学派，他在这篇知名论文中（最初发表于1952年），把机会主义的政客及情绪化的公众都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心。沃尔特·拉夫伯的《The New

Empire：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1860—1898》(1963 年出版)，以及较浅显一点的戴维·希利的《US Expansion：The Imperialist Urge in the 1890s》(1970 年出版)，代表修正了的观点。最后这两位作者对扩张主义者的赞扬比贬损现实主义的学者更深刻、更灵巧。拉夫伯的《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可看作是对威廉斯的论点的进一步发挥，是对朱利叶斯·W·普拉特的《Expansionists of 1898：The Acquisition of Hawaii and the Spanish Islands》(1936 年出版）的反驳，此书是反对从经济角度来解释的。罗伯特·L·贝斯纳的《From the Old Diplomacy to the New，1865—1900》第二次修订版（1986 年出版）对这一时期不同学派的争议作了很有益的深入浅出的介绍。

批评麦金莱政策的人在辩论中输掉了，但历史学家们并未输掉他们的兴趣。弗雷德·哈维·哈林顿早期的短文“The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1898—1900”，载于《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第 22 期（1935 年 9 月出版），仍不失为一个可用的导论。然而，它被夸大利用来作为有用的历史经验来开脱越南战争。罗伯特·L·贝斯纳的《Twelve Against Empire：The Anti-Imperialists，1898—1900》(1968 年出版)，是一系列出版物中的第一本（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其他的著作包括弗兰克·弗赖德尔在《Dissent in Three American Wars》中的论文；E·伯克利·汤普金斯的《Anti-Imper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Great Debate，1890—1920》(1970 年出版)；丹尼尔·B·希尔默的《Republic or Empire ：American Resistence to the Phillippine War》(1972 年出版)；小理查德·E·韦尔奇的《Response to Imperialis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lippine-American War，1898—1902》(1979 年出版)；以及托马斯·J·奥斯本的《Empire can Wait ：American Opposition to Hawaiian Annexation，1893—1898》（1981 年出版)。约翰·W·罗林斯的“The Anti-Imperialists and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载于《Studies on the Left》第3期（1962年出版），是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子，它反映了“新左翼”历史学家的一种倾向，即寻求对19世纪90年代扩张主义的共识，尽力缩小当时有关夏威夷与菲律宾问题的辩论的重要意义。

第三章　种族等级观念

也许近几十年来，没有什么题目比种族与少数民族这个题目更能吸引美国的历史学家了。各种现象已经曝光，但对这些现象的看法则众说纷纭，令人眼花缭乱。对研究这个问题的目的，鲁思·米勒·埃文森在《Guardians of Tradition：American Schoolbook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64年出版)一书中曾作过极好的综述，此书的基础是正规学校教育建立以来头8年中成千本最通用的教科书。尽管此书并未反映出普通人对种族的看法，但它却说明了在他形成性格的年龄阶段所受到的教育，如今他加以引述，以补充他自己的回忆。其他广泛的研究成果包括：托马斯·F·戈塞特的《Race：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1963年出版)；盖雷·B·纳什与理查德·韦斯合编的《The Great Fear：Race in the American Mind》(1970年出版)；乔治·辛克勒的《The Racial Attitudes of American Presidents from Abrahan Lincoln to Theodore Roosevelt》(1971年出版)；鲁宾·F·韦斯顿的《Racism in U.S. Imperialism：The Influence of Racial Assumption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893—1946》(1972年出版)；罗纳德·T·高木(晴)的《Iron Cages ：Race and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1979年出版)；以及罗伯特·W·赖戴尔的《All the World's a Fair：Vissions of Empire at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1876—1916》(1984年出版)。戴维·B·戴维斯的《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1966年出版)的第2章、第15章，激起了广泛的讨论，有助于把美国的情

况置于大众的关注之下；彼埃尔·范·登·伯格的《Race and Racism :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67 年出版)；以及丹蒂·A·普佐的"Racism and the Western Tradition"，载于《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第 25 期(1964 年 10—11 月)。

黑人与印第安人这两种有色人种深深地融进美国人的生活与神话，他们的显著特色吸引着最大的注意力。温思罗普·D·乔丹的《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50—1812》(1968 年出版)一书开了一个好头，他使读者了解到：人们的种族观念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一条中心线索；起到同样作用的著作还有：乔治·M·弗雷德里克森的《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 The Debate o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1817—1914》(1971 年出版)；以及迈克尔·麦卡锡的《Dark Continent : Africa as Seen by Americans》(1983 年出版)。有关印第安人地位下降的可悲历史可见于亨利·F·多宾斯的《Native America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A Critical Bibliography》(1976 年出版)；还有罗伊·哈维·皮尔斯的《The Savages of America : A Study of the Indian and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1953 年出版，1965 年修订再版)；弗朗西斯·詹宁斯的《The Invasion of America: Indians, Colonialism, and the Cant of Conquest》(1975 年出版)；雷金纳德·霍斯曼的《Expansion and American Indian Policy, 1783—1812》(1967 年出版)；霍斯曼的："American India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Manifest Destiny"，载于《University of Birminghan Historical Journal》第 11 卷第 2 期(1968 年出版)；伯纳德·W·希恩的《Seeds of Extinction : Jeffersonian Philanthropy and the American Indian》(1973 年出版)；罗伯特·V·雷米尼的《Andrew Jackson and the Course of American Empire, 1767—1821》(1977 年出版)；雷米尼的《Andrew Jackson and the Course of American Freedom, 1822—1832》(1981 年出版)第 15 章；雷米尼的《Andrew Jackson

and 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1833—1845》(1984 年出版)第 20 章;拉尔夫·K·安德里斯特的《The Long Death: The Last Days of the Plains Indians》(1964 年出版);以及罗伯特·M·厄尔特利的《The Indian Frontier of the American West, 1846—1890》(1984 年出版)。小罗伯特·K·伯克霍弗的《The White Man's Indian: Images of the American Indian from Columbus to the Present》(1978 年出版);以及布赖恩·W·迪庞的《The Vanishing American : White Attitudes and the U.S. Indian Policy》(1982 年出版),是日益增多的有关美洲土著的文献中最近出版的两本入门书。

研究拉丁美洲人在美国的地位问题,下列书籍将使读者受益:阿瑟·P·惠特克的《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Latin America, 1800—1830》(1941 年出版);戴维·J·韦伯的"'Scarce more than apes' Historical Roots of Anglo American Stereotypes of Mexicans in the Border Region",载于韦伯所编的《New Spain's Far Northern Frontier: Essays on Spain in the American War, 1540—1821》(1979 年出版);雷蒙德·A·帕雷德斯的"The Origins of Anti-Mexican Senti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载于里卡多·罗莫与帕雷德斯合编的《New Directions in Chicano Scholarship》(1978 年出版);帕雷德斯的"The Mexican Image in American Travel Literature, 1831—1869"载于《New Mexico Historical Review》第 52 期(1977 年 1 月出版);阿诺多·德·里翁的《They Called Them Greasers: Anglo Attitudes toward Mexicans in Texas, 1821—1900》(1983 年出版);罗伯特·W·约翰森的《To the Halls of the Montezumas ; The Mexican War in the American Imagination》(1985 年出版);以及杰拉尔德·F·林德曼的《The Mirror of War ;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1974 年出版),尤其是其中的第 5 章,专门述及古巴人与西班牙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东亚移民所带来的形象与政策问题受到系统地、深入地研究。尤需参考斯图尔特·C·米勒的《The Unwelcome Immigrant: The America Image of the Chinese, 1785—1882》(1969年出版);迈克尔·H·Hunt的《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1983年出版);以及罗杰·丹尼斯的:《The Politics of Prejudice: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and the Struggle for Japanese Exclusion》(1962年出版)。

19世纪90年代受盎格罗—撒克逊主义与种族观念支配,发生了几场争夺领土的战争,它们在下列著作中得到评述:里奇纳德·霍斯曼的《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al Anglo-Saxonism》(1981年出版);斯图尔特·安德森的《Race and Rapprochement: Anglo-Saxonism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895—1904》(1981年出版);斯图尔特·C·米勒的"Benevolent Assimilation"载于《The American Conquest of the Phillippines, 1899—1903》(1982年出版);詹姆斯·P·申顿的"Imperialism and Racism"载于唐纳德·希恩与哈罗德·C·赛雷特合编的《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iography》(1960年出版);以及克里斯托弗·拉希的"The Anti-Imperialists, the Phillippines and the Inequality of Man",载于《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第24期(1958年8月出版)。前述19世纪90年代有关自由与国家强大的辩论的著作也应作为补充读物。

第四章 革命的危险

有关美国对革命的反应的历史文献,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很有影响的一部分著作可回溯到40年前或者更早;还有大量著作则在20世纪70年代涌现。有些迄今仍有参考作用的著作主要是讲述人们的态度;另有一些着重讲政策;还有一些则把各种因素结

合起来。

有关美国对早期革命的反应，已呈现出态度分歧。查尔斯·D·黑曾的《Contemporary American Opin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1897年出版)，是一份重要的研究成果，公然以新联邦党的立场出现，引出了政界精英人士的许多议论；而盖雷·B·纳什较近的著作"The American Clerg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载于《William and Mary Quaterly》第3辑第22卷(1965年7月出版)，则把教堂中的布道词 来当作公众观点的晴雨计。与此相类似，查尔斯·C·格里芬的《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ruption of the Spanish Empire，1810—1822》(1937年出版)及阿瑟·P·惠特克的《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Latin America，1800—1830》(1941年出版)，都是以各种期刊、国会记录与特殊利益集团的著作为依据撰写的政治评论；可与之对比的是温思罗普·D·乔丹的《White Over Black：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1550—1812》第10章，这是1968年出版的研究因海地共和国诞生而引起忧虑的著作。

许多有关美国对19世纪中叶几场革命的态度的著作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当时，刚刚发生的欧洲革命引起的震动波浪涉及战争与外交，促使一批历史学家去探究美国意外地纠缠于旧世界事务的根源。最优秀的较早一代学者有：爱德华·米德·厄尔，他的"American Interest in the Greek Cause，1821—1827"载于《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33期(1927年10月出版)；约翰·G·盖兹利的《American Opinion of German Unification，1848—1871》(1926年出版)，其中记载了在德国、法国与匈牙利发生的大量动乱；尤金·N·柯蒂斯的"American Opinion of the French Nineteenth-Century Revolutions"，载于《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29期(1924年1月出版)；伊丽莎白·布赖特·怀特的《American Opinion of France：From Lafayette to Poincare'》(1927年出版)；以及霍华德·R·马雷罗

的《American Opinion of the Unification of Italy，1846—1861》(1932年出版)。有关法国革命的问题，尚需补充参考：乔治·L·查里的“American Metropolitan Press Reaction to the Paris Coummune of 1871”，载于《Mid-America》第32期(1950年1月出版)。保罗·康斯坦丁·帕帕斯的《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ek War for Independence，1821—1828》(1985年出版)，有一些新的分析，进一步确定了早期叙述的主线。

默尔·柯蒂值得特别注意，他为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对第二次革命的态度，写过两篇重要文章：一是：“Young America”，载于《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32期(1926年出版)；一是“The Impact of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on American Thought”，载于《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第93期(1949年6月出版)。柯蒂在“Young America”一文以及1926年载于《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History》第11卷中的一篇研究传统外交的文章中，讲述了匈牙利革命，但这两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被唐纳德·S·斯潘塞的《Louis Kossuth and Young America：A Study of Sec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1848—1852》(1977年出版)所超越，斯潘塞的书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

有关20世纪早期几场革命的历史文献总的来说都有新近的材料来源，但也同其他文献一样，在如何对待公众意见与政府的政策上，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新左翼”派的历史学家热中于把美国的立场诠释为有意识的、顽强的反对革命的立场。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的《America Confronts a Revolutionary World，1776～1976》(1976年出版)，是一本论文集，文章的主题与他的其他作品大同小异，接近于一般性的论述。这一时期“新左翼”的著名作品包括：杰里·伊斯雷尔的《Progressivism and the Open Door：America and China，1905—1921》(1971年出版)；小戈登·莱伦的《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America's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1968年出版)；劳埃德·C·

加德纳的《Wilson and Revolutions：1913—1921》（1976 年出版）；以及加德纳的完整的研究成果《Safe for Democracy：The Anglo-American Response to Revolution，1913—1923》(1984 年出版)。

在读"新左翼"学派的著作时，应同时参读林克的多卷本《威尔逊传》（1947 年出版第 1 卷），以及詹姆斯·里德的《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n Policy，1911—1915》（1983 年出版）第 4 章。关于俄国，有用的研究成果包括阿瑟·W·汤姆森与罗伯特·A·哈特合著的《The Uncertain Crusade：America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1970 年出版)，并可补充参阅菲丽亚·霍茨曼的"A Mission That Failed：Gor'kij in America，"载于《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第 6 期（1962 年秋季出版）；彼得·G·法林的《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Experiment，1917—1933》(1967 年）第 1 章、第 2 章；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1978 年出版）第 3 章；以及罗伯特·K·默里的《Red Scare：A Study of National Hysteria，1919—1920》（1955 年出版）。尤金·P·特拉尼的"Woodrow Wilson and the Decision to Intervene in Russia：A Reconsideration"，载于《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第 48 期（1976 年 9 月出版），此书对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历史事件作出了审慎的、材料翔实的介绍。

第五章 20 世纪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

为数众多的研究 20 世纪外交政策的历史学家，为持有不同观点的学生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有些人沿着坎南与威廉斯已经清理出来的路子走，因此不免有些雷同。另一些人则走自己的路，钻研特定的政策制订人或各种专题，常常提出新的结论，且有助于同较老的思想模式建立起联系。

威尔逊—罗斯福时代培养出来的学生开创了一条寻找外交政策思想根源的道路，这种外交政策在某些方面被看作是同特定的进步的崇高精神联系在一起。在这类著作中，最重要的有：小戈登·莱文的研究成果（如上述）以及威廉·E·洛伊希滕贝格的"Progressivism and Imperialism: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898—1916"，载于《Mississippi Valey Historical Review》第39期（1952年12月出版）。洛伊希滕贝格的论文造就了一种学术上的家庭手工业——检验国内需求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与该论文中两个极端含糊不清的概念进行较量。约瑟夫·M·西拉库萨的"Progressivism, Imperialism, and the Leuchtenburg Thesis, 1952—1974"载于《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第20期（1974年12月出版），对开展这一讨论颇有指导作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孤立主义"的荒芜时代——在"各阶级合作主义"的历史学家手中经历了实质性的修正，这些历史学家或在这一方面或在那一方面都受到过威廉斯的影响。迈克尔·J·霍根（1977）、伯顿·I·考夫曼（1974）、梅尔文·P·莱弗勒（1979）、卡尔·P·帕里尼（1969），以及琼·霍夫·威尔逊（1971）等人的作品都论证了各种强大的利益集团（并非不重要地包括公司与银行），协同政府把美国干预国际事务维持在一个高得多的水平上，而这是从前的现实主义者的良心所不允许的。这种新的思路受到托马斯·J·麦考密克的赞扬，他写了一篇论文"Drift or Mastery? A Corporatist for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载于《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第10期（1982年12月出版），而约翰·布雷曼则以他的论文"The New Lef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Age of Normalcy ; A Reexamination"，载于《Business History Review》第62期（1983年春季），提出了批评性的观点。

一些有关两次大战期间领导人物的传记强调了社会背景与基

本价值观，认为政策有连续性的观点因而得以加强。传主有：亨利·卡博特·洛奇（威廉·C·怀德纳写传，1980年出版）、查尔斯·伊文斯·休斯(默洛·J·普西写传，1951年出版)、弗兰克·B·凯洛格（L·伊桑·埃利斯写传，1962年出版）、加尔文·柯立芝（唐纳德·R·麦科伊写传，1967年出版）、赫伯特·胡佛(琼·霍夫·威尔逊写传，1975年出版)、亨利·L·斯廷森(埃尔廷·E·莫里森写传，1960年出版)、富兰克林·D·罗斯福（罗伯特·达莱克写传，1979年出版），另一本由罗伯特·迪万写传，1969年出版)。还有一些专著也强调了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包括：道格拉斯·利特尔的“Antibolshev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19—1939”，载于《American Quarterly》第35期（1983年秋季出版）；休·德·桑蒂斯的《The Diplomacy of Silence：The American Foreign Service，The Soviet Union，and the Cold War，1933—1947》（1981年出版）；马克·L·查德温的《The Hawks of World War Ⅱ》(1968年出版)；以及罗伯特·L·迪万的《Second Chance：The Triumph of Internationalism in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Ⅱ》（1967年出版）。小菲利普·H·伯奇的《Elites in American History》(1980年—1981年出版)第2—3卷；G·威廉·多姆霍夫的《Who Rules America?》(1967年出版)，以及罗伯特·D·舒尔金格的《The Wise Men of Foreign Affairs：The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84年出版)，都同样地突出了社会精英分子在对外事务中的主宰地位，不仅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如此，此后也是如此。

要想寻找活跃的外交政策的踪迹，可参考下列人物传记：威廉·E·博拉（罗伯特·J·马多克斯写传，1969年出版）、查尔斯·A·林德伯格(韦恩·S·科尔写传，1974年出版）以及杰拉尔德·P·奈(科尔写传，1962年出版)。还应补充参考下列著作：小约翰·米尔顿·库珀的《The Vanity of Power：American Isolationism and the First World War，1914—1917》(1969年出

版）；亚历山大·德孔特的“The South and Isolationism”，载于《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第24期（1958年出版）；托马斯·N·金斯伯格的《The Pursuit of Isolatio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from Versailles to Pearl Harbor》（1982年出版）；曼弗雷德·乔纳斯的《Isolationism in America，1935—1941》（1966年出版）；科尔的《America First：The Battle against Intervention，1940—1941》（1953年出版）；罗伯特·格里菲思的“Old Progressives and the Cold War”，载于《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66期（1979年9月出版）；以及贾斯特斯·D·多伊奈克的《Not to the Swift：The Old Isolationists in the Cold War Era》（1979年出版）。

近几十年来，众多的历史学家竭力想找出仍在进行中的冷战的讲得通的理由，出版了大量著作（任何人研读一下伯恩斯《Guide to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00》一书中的有关章节，即可很快明白）。下列所选的书目，对我们理解外交政策指导思想颇有贡献。

遏制，自然是研究得最多、见解最分歧的政策思想，可见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现实主义的纲领性著作《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1982年出版）；加布里埃尔·科尔科的《The Limits of Power：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5—1954》（1972年出版）。这两本书的视野很开阔，都用“新左翼”的语汇来解释遏制政策。

其他同遏制思想联系紧密的有影响的概念，可见于下列著作：欧内斯特·R·梅的《“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73年出版）；莱斯·K·阿德勒与托马斯·G·佩特森合写的“Red Fascism：The Merger of Nazi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in the American Image of Totalitarianism，1930’ s—1950’ s”，载于《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75期(1970年4月出版);以及丹尼尔·M·史密斯的"Authoritarianism and American Policy Makers in Two World Wars",载于《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43期(1974年8月出版)。地缘政治还有待于彻底地研究,概略地了解可参读约瑟夫·S·鲁塞克的"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Geo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载于《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第3期(1958年5月出版);乔弗里·J·马丁的《The Life and Thought of Isaiah Bowman》(1980年出版);以及艾伦·亨里克森的"The Map as an 'Idea': The Role of Cartographic Imager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载于《American Cartographer》第2期(1975年4月出版)。

最初把"发展"理解为一种理论和一种政策的是罗伯特·A·帕肯厄姆,他撰写了《Liberal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deas in Foreign Aid and Social Science》(1973年出版)。还应补充参读罗伯特·A·尼斯比特的《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 Aspects of the Western Theory of Development》(1969年出版);约瑟夫·R·格斯菲尔德的"Tradition and Modernity: Misplaced Polariti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载于《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第72期(1967年1月);迪安·C·蒂普斯的"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i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载于《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第15期(1973年出版);以及艾丹·福斯特—卡特的"From Rostow to Gunder Frank: Conflicting Paradigms in the Analysis of Underdevelopment",载于《World Development》第4期(1976年3月出版)。

第六章 当前的两难困境

近十年来,一股暴风雨吹向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各种

类型的观察家匆忙奔向他们的打字机。总结越南战争的教训提供了一个便当的用以测量暴风雨本质、密度与风向的晴雨计。虽然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已在着手进行总结教训的工作，但直到1976年，才出现了头一份全面的总结。这就是《The Vietnam Legacy：The War，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是由安东尼·莱克编辑、由外交关系委员会赞助的。次年，又出版了W·斯科特·汤普森与唐纳森·D·弗里泽尔合编的《The Lessons of Vietnam》。早期流行的观点是对越南的经验感到幻灭，而对此持明显反对观点的有根特·莱维的《America in Vietnam》（1978年出版），以及小哈里·G·萨默斯的《On Strategy：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Vietnam War》（1982年出版）。最新的力作有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编辑的《Vietnam Reconsidered：Lessons from a War》（1984年出版）；加布里埃尔·科尔科编辑的《Anatomy of a War：Vietnam，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1985年出版)；洛伦·巴里兹的《Backfire：A History of How American Culture Led US into Vietnam and Made US Fight the Way We Did》（1985年出版）；以及约翰·海尔曼的《American Myth and the Legacy of Vietnam》（1986年出版）。

在有关越南的文献中，值得一提的是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改革派所写的多方面的、有见解的作品。其中著名的有：理查德·J·巴尼特、梅尔文·格托夫、理查德·E·范伯格、罗伯特·A·帕肯厄姆、厄尔·C·拉夫纳尔、戴维·P·卡洛、I·M·戴斯特勒、莱斯利·盖尔布以及安东尼·莱克（他们的作品曾在本书第一章的注释中引述。

政策掌管人在最近的风暴时期赶紧从办公室出来洗清自己。继尼克松与基辛格的回忆录（分别于1978年和1979—1982年出版）之后，又有福特的回忆录（1979年出版）、卡特回忆录（1982年出版）、万斯回忆录(1983年出版)以及布热津斯基回忆录(1983

年出版)。黑格已经对里根的总统任期投下一瞥(1984年),无疑,其他的人在里根的第一个任期结束后,都将说出自己的故事。这些回忆录具有固有的隐瞒、巧辩等危险,尽管如此,在获得更加全面的历史纪录之前,它们以及政策制定者的公开声明都将是供人们研究的重要材料。

最近出现的外交政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冷战的共同舆论的瓦解以及对革命性变化的错误看法被摒弃造成的。在前一问题上,较出色的有E・米勒的《War, Presidents and Public Opinion》(1973年出版),它检讨了越南战争与朝鲜战争;以及奥利・R・霍尔斯蒂与詹姆斯・N・罗森诺合写的《American Leadership in World Affairs: Vietnam and the Breakdown of Consensus》(1984年出版)。关于后者,文献为数甚多。我认为最有教益的有布鲁斯・卡明斯的"American Policy and Korean Liberation",载于弗兰克・鲍德温编辑的《Without Parallel: The American-Korean Relationship Since 1945》(1974年出版);詹姆斯・帕克的"The Roots of Rhetoric: 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America's China Watchers",载于埃德・弗里德曼与马克・谢尔顿合编的《America's Asia》(1971年出版);戴维・麦克莱恩的"American Nationalism, the China Myth, and the Truman Doctrine: The Question of Accommodation with Peking, 1949—1950",载于《Diplomatic History》第10期(1986年冬季);杰弗里・雷斯的《War Comes to long An: Revolutionary Conflict in a Vietnamese Province》(1972年出版);小理查德・E・韦尔奇的《Response to Rev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ban Revolution, 1959—1961》(1985年出版);沃尔特・拉夫伯的《Inevitable Revolutions: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 America》(1983年出版);以及巴里・鲁宾的《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The American Experince and Iran》(1980年出版)。

注　释

Preface

1. Gordon Craig,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History," in Felix Gilbert and Stephen R. Graubard, eds.,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 (New York, 1972), p. 362.
2. Michael H.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 1983), p. 302. Dorothy Borg has made this same point somewhat more straightforwardly: "The motives underlying our policy in Eastern Asia may more often than not have been the same as those which formed the basis of our policies toward the rest of the world." Borg,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 2d ed. (New York, 1968), p. xiv.

Chapter 1: *Coming to Terms with Ideology*

Epigraph. Walter Lippmann, *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Boston, 1943), p. 138; and Henry Kissing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1979), p. 54.

1. Graham T. Allison, "Cool It: The Foreign Policy of Young America," *Foreign Policy*, no. 1 (Winter 1970—71), p. 144; Michael Roskin,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Shifting Generational Paradigm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89 (Fall 1974): 563.
2. Richard J. Barnet, *Intervention and Revolution: America's*

Confrontation with Insurgent Movements Around the World (Now York, 1968), which he subsequently supplemented with a more urgent but less compelling attack, *Roots of War: The Men and Institutions Behi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72), and more recently with *Real Security: Restoring American Power in a Dangerous Decade* (New York, 1981).

3. Melvin Gurtov,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the Third World: Antinationalism and Intervention* (New York, 1974); Richard E. Feinberg, *The Intemperate Zone: The Third World Challenge to U. 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83); Robert A. Packenham, *Liberal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deas in Foreign Aid and Social Science* (Princeton, 1973).
4. Earl C. Ravenal, *Never Again: Learning from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Failures* (Philadelphia, 1978); Ravenal, *Strategic Disengagement and World Peace: Toward a Noninterventionist American Policy* (San Francisco, 1979); David P. Calleo, *The Imperious Economy* (Cambridge, Mass., 1982). See also the indictment of an increasingly erratic, ideological, and partisan policy process presented by insiders I. M. Destler, Leslie Gelb, and Anthony Lake in *Our Own Worst Enemy: The Un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84).
5. Ravenal, *Never Again*, P. 15.
6. The earlier works by Barnet, Gurtov, and Packenham embody roughly the same set of insights and weaknesses evident in Ravenal and Feinberg. See Barnet, *Intervention*, p. 78; Gurtov, *The United States*, pp. 2—9, 204, 213; Packenham,

Liberal America, especially chaps. 3 and 4 and pp. 350, 357.

7. Ravenal, *Never Again*, pp. 51, 108, 129, 137; Ravenal, *Strategic Disengagement*, p. 5.
8. Feinberg, *The Intemperate Zone*, pp. 25, 191—92, 234, 257.
9. Chicago, 1951.
10.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pp. 22, 36; Kennan, *Memoirs* (Boston, 1967, 1972), 2:71—73.
11.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p. 79; Kennan, *Memoirs*, 2: 322.
12. Kennan, *Memoirs*, 1 : 69, 246, 261, 511, 549, 551, 2: 171—72, 252. Kennan joined Cold War liberals in campaigning for an "end of ideology." This movement, whose inception coincided roughly with Kennan's 1950 Chicago lectures, gathered momentu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through the decade. Prominent social scientist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Edward Shils, Daniel Bell,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Raymond Aron, among others—sought to popularize the notion that ideology was an encumbrance that complex modern societies, faced with essentially technical problems, could not afford. Job L. Dittberner, *The End of Ideology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Ann Arbor, Mich., 1979), is a helpful introduction.
13. Kennan's views on the tendency of democracy to distort foreign policy were of long standing. He had observed in frustration in 1944, "Our actions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affairs are the convulsive reactions of politicians to an internal political life dominated by vocal minorities." Four years later, looking out from his State Department office on

the American scene, he flatly pronounced, "Great democracies are apparently incapable of dealing with the subtleties and contradictions of power relationships." The rise of McCarthyism and the "who lost China?" controversy were soon—at the very time he was writing *American Diplomacy*—to strengthen his concern with the disruptive impact of democracy on foreign policy.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pp. 36, 56; Kennan, *Memoirs*, 1 : 185, 239, 351, 495, 2 : 221—23, 319—21, 323.

14. Kennan, *Memoirs*, 1 : 53—54, 2 : 87. Walter Lippmann anticipated Kennan's views on the problems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early 1910s, developed his position in books published in 1922 and 1925, and restated it in a widely read 1943 study. There is, however, no evidence of personal contact between Kennan and Lippmann, though the former was surely familiar with the latter's regular newspaper column. 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oston, 1980), pp. 43, 180—83, 211—13; Lippmann, *U. S. Foreign Policy*.
15. Kennan, *Memoirs*, 2 : 86. Kennan, a complex and even paradoxical figure, is more of a Christian moralist than any reader of that realist treatise, *American Diplomacy*, would guess. It is, however, less the complex person than the influential book that is of concern here. Chapter 5 below emphasizes the ideological dimension of Kennan's moralism.
16. Clifford Geertz, "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David E. Apter, 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London, 1964), p. 52.
17. The 1959 edition of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published in Cleveland, is the basis for the comments that follow. Substantially revised editions appeared in 1962 and 1972. Joseph M. Siracusa, *New Left Diplomatic Historians and Histories: The American Revisionists* (Port Washington, N.Y., 1973), pp. 24—26, offers a sketch of Williams'background.

18. Williams, *Tragedy*, p. 16.
19. *Ibid.*, pp. 34, 43, 118.
20. *Ibid.*, p. 200.
21. Charles Beard, the most outstanding of a previous generation of progressive historians and a fierce opponent of Franklin Roosevelt's foreign policy, was one of Williams' heroes. In 1956 and 1957 Williams had praised Beard for stressing economic conflict and the ties betwee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Williams was also impressed by Beard's moral concern with preserving democracy at home against the machinations of policymakers intent on promoting narrow economic interest abroad. Williams' essays on Beard appear in *History as a Way of Learning* (New York, 1973).
22. Williams, *Tragedy*, p. 210. Only in subsequent works did Williams suggest what fundamental structural changes he had in mi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ave to set aside the dominant capitalist ethos beneficial only to a "class-conscious industrial gentry." Only then would Americans cease to stand in a predatory and hostile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 and be able to set to building at home a democratic socialism where community might again flourish as it had in a precapitalist age. Williams, *History as a Way of Learning*, p. 17.
23. Williams, *Tragedy*, pp. 13—15, 53—59 (for references to

noneconomic ideas); Williams, *History as a Way of Learning*, p. 9.

24. Clifford Geertz,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h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1973), p. 12.
25. Eric H. Erikson, *Young Man Luther* (New York, 1958), p. 22.
26. Geoff Eley, "Nationalism and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6 (Jan. 1981): 92, 104.

Chapter 2: Visions of National Greatness

Epigraph. Those portions of "Common Sense" from which this and the quotes that follow in the text are drawn appear in Philip S. Foner, ed.,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New York, 1945), 1: 19, 23, 44, 45. On Paine's early Years and authorship of "Common Sense," see David Freeman Hawke, *Paine* (New York, 1974), chaps. 1—3, and Eric Foner,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New York, 1976), introduction and chaps. 1—3.

1. Foner,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2: 1480.
2. Jefferson to Bellini, 30 Sept. 1785, in Julian P.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Princeton, 1950—), 8: 568; Jefferson, *Notes on Virginia*, in Andrew A. Lipscomb and Albert E. Bergh, eds.,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Washington, 1903—07), 2: 241. More than one historian has noted the paradox that Jefferson, the champion of liberty, held slaves and that the yeomanry he idealized often drew on slave labor.
3. Lipscomb and Bergh,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2: 241,

242.

4. Jefferson, Dec. 1793 report on commerce, in Lipscomb and Bergh,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3 : 277, 281.
5. Adams quoted in John C. Miller, *Alexander Hamilton: Portrait in Paradox* (New York, 1959), p. 523. Jacob E. Cooke, *Alexander Hamilton* (New York, 1982), is especially penetrating on personality and motive.
6. Hamilton, "The Federalist No. 6," Nov. 1787, in Harold C. Syrett, ed.,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Now York, 1961—79), 4 : 310, 316.
7. Hamilton, "The Federalist No. 11," Nov. 1787, in *ibid.*, 4 : 342, 345—46; Jerald A. Combs, *The Jay Treaty: Political Battleground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Berkeley, Calif., 1970), p. 35.
8. Madison quoted in Drew R. McCoy, "Republican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James Madis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ercial Discrimination, 1789 to 1794,"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ies, vol. 31 (Oct. 1974), p. 635n.
9. Jefferson quoted in Merrill D.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New Nation* (New York, 1970), pp. 64—65; Foner,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2 : 722; doggerel quoted in Donald H. Stewart, *The Opposition press of the Federalist Period* (Albany, N. Y., 1969), p. 220.
10. Jefferson to Madison, 21 Sept. 1795, in Lipscomb and Bergh,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9 : 309; Syrett,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18 : 480, 495, 496.
11. Quotes in this and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come from Washington to Hamilton, 29 July 1795, in Syrett,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18 : 525, "Farewell Address," in John C. Fitzpatrick, ed.,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Washington, 1938—44); 35 : 214—38.

12. Adams quoted in Cooke, *Alexander Hamilton*, p. 195.
13. Jefferson to Thomas Lomax, 12 March 1799, in Lipscomb and Bergh,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10 : 24; Jefferson, inaugural address, 4 March 1801, in James D. Richard-son,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789—1897* (Washington, 1896—1900), 1 : 323.
14. Alexander DeConde, *This Affair of Louisiana* (New York, 1976), is the latest account of Jefferson's signal foreign-policy achievement.
15. Jefferson to A. Stewart, 25 Jan. 1786, in Lipscomb and Bergh,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5 : 260.
16. John L. O'Sullivan, "Annexation," *Democratic Review*, 17 (July—Aug. 1845) : 9.
17. Quote from Robert V. Remini, *Andrew Jackson and 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1833—1845* (New York, 1984), p. 418.
18. O'Sullivan, "The Great Nation of Futurity," *Democratic Review*, 6 (Nov. 1839) : 427; speech by Rep. Frederick P. Stanton (Democrat, Tennessee), 16 Jan. 1846, in Norman A. Graebner, ed., *Manifest Destiny* (Indianapolis, 1968), p. 94.
19. Speeches by Rep. Chesselden Ellis (Democrat, New York), 25 Jan. 1845, Sen. Lewis Cass (Democrat, Michigan), 10 Feb. 1847, and Sen. Sidney Breese (Democrat, Illinois), 14 Feb. 1848, all in Graebner, *Manifest Destiny*, pp. 73, 158,

218.

20. Walter LaFeber, ed., *John Quincy Adams and American Continental Empire* (Chicago, 1965), pp. 37, 130; Madison quoted in Albert K.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Baltimore, 1935), p. 228.
21. Breese speech of 14 Feb. 1848, in Graebner, *Manifest Destiny*, p. 218.
22. Corwin speech of 11 Feb. 1847, in Graebner, *Manifest Destiny*, pp. 165, 166.
23. Greeley in *New York Tribune*, 12 May 1846 and 26 Feb. 1848, quoted in Frederick Merk, "Dissent in the Mexican War," in Samuel Eliot Morison et al., *Dissent in Three American Wars* (Cambridge, Mass., 1970), p. 44, and in John H. Schroeder, *Mr. Polk's War: American Opposition and Dissent, 1846—1848* (Madison, Wis., 1973), p. 159; speech by Sen. John C. Calhoun (Democrat, South Carolina), 4 Jan. 1848, in Graebner, *Manifest Destiny*, p. 227; calhoun speech of 9 Feb. 1847, quoted in Schroeder, *Mr. Polk's War*, p. 70; Albert Gallatin, *Peace with Mexico* (New York, 1847), excerpted in Graebner, *Manifest Destiny*, p. 192.
24. Graebner, *Manifest Destiny*, p. 234; Schroeder, *Mr. Polk's War*, pp. 75—76.
25. Polk quoted in Thomas R. Hietala, *Manifest Design: Anxious Aggrandizement in Late Jacksonian America* (Ithaca, N. Y., 1985), p. 122.
26. George E. Baker, ed., *The Works of William H. Seward* (Boston, 1884—89), 4: 165.
27. *Chicago Tribune* quoted in Donald M. Dozer, "Anti-

Expansionism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2 (Sept. 1943) : 256.

28. Strong, *Our Country* (New York, 1885), pp. 1, 178;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United States Looking Outward" (Aug. 1890), in his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Boston, 1897), p. 18; Henry Cabot Lodge, "Our Blundering Foreign Policy," *Forum*, 19 (March 1895): 16, 17. Strong, Mahan, and Lodge, stock figures in accounts of this era,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debate over whether their rhetoric signifies colonial or imperial ambitions and whether they had any significant influence over policy. For a recent skeptical treatment, see James A. Field, Jr., "American Imperialism: The Worst Chapter in Almost Any Book,"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3 (June 1978): 647—50. The brief treatment here is not meant to join the controversies over specific motivation and practical impact but rather to link all three publie voices to an old and Well-established nationalist intellectual tradition on which-they drew for the terms of their discourse.

29. McKinley quoted in Robert C. Hilderbrand, *Power and the People: Execut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 Foreign Affairs, 1897—1921* (Chapel Hill, N. C. *1981*), p. *40*, and in Ernest May, *Imperial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 (New York, *1961*), p. *251*; McKinley speech of *16* Feb. *1899*, in *Speeches and Addresses of William McKinley from March 1, 1897 to May 30, 1900* (New York, 1900), pp. 186—87, 192.

30. Speech by Sen. Albert Beveridge, 9 Jan. 1900, in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33, 56th Cong., 1st sess., p.

704; Beveridge, "The March of the Flag," in his *The Meaning of the Times* (Indianapolis, 1908), p. 47.

31. Schurz and Cleveland quoted in Fred Harvey Harrington, "The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8—1900,"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22 (Sept. 1935): 212, 213; Sumner, "The Conqu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Spain," *Yale Law Journal*, 8 (Jan. 1899): 192—93.
32. Merrill D. Peterson, *The Jeffersonian Image in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1960), p. 270; Beveridge, "The March of the Flag," pp. 49—50; Walter L. Williams,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and the Debate over Philippine Annex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6 (March 1980): 811—14, 818—22.
33. On these adverse socioeconomic trends, see Rowland Berthoff, "Independence and Attachment, Virtue and Interest: From Republican Citizen to Free Entrepreneur, 1787—1837," in Richard L. Bush et al., *Uprooted Americans* (Boston, 1979); Berthoff and John M. Murrin, "Feudalism, Communalism, and the Yeoman Freehold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 a Social Accident," in Stephen G. Kurtz and James H. Hutson, eds., *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N. C., 1973); Stephan Thernstrom, "Urbanization, Migr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in Barton J. Bernstein, ed., *Towards a New Past* (New York, 1968); and Robert F. Gallman, "Trends i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Lee Soltow, ed., *Six Papers 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Income* (New

York, 1969).

Chapter 3: The Hierarchy of Race

Epigraph. "Observations on the Increase of Mankind," in Leonard W. Labaree and William B. Willcox, eds.,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Haven, Conn., 1959—), 4:234.

1.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is drawn from *ibid.* On Indians, see 2:411, 4:119, 121, 481—83, 5:458, 6:487, 9:62, 10:296, 342, 402, 408, 409, 11:55. On blacks, see 4:229, 10:396, 11:76, 17:37—44, 19:112—13, 187—88, 269, 20:155—56, 296, 314, 21:151, 22:97, 196, 200, 519. On Germans, see 4:120—21, 234, 483—85, 5:158—60, 20:528. Paul Conner, *Poor Richard's Politicks: Benjamin Franklin and His New American Order* (New York, 1965), pp. 69—87, contains a good discussion of Franklin and race. Gerald Stourzh, *Benjamin Frankli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2d ed. (Chicago, 1969), is essential on his expansionist vision. For a definition of racism as the term is used here, see Pierre L. van den Berghe, *Race and Racis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1967), p. 11.
2. Labaree and Wilcox,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4:231.
3. Quoted in Alden T. Vaughn, "From White Man to Redskin: Changing Anglo-American Perceptions of the American India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7 (Oct. 1982): 920. Winthrop D.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50—1812* (Chapel Hill, N. C., 1968), explores the origins of this color-sensitive moral out-look.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utlook is evident in the claims of a Texas paper in 1865 that "white was the emblem of light, religious purity, innocence, faith, joy and life," while black "expressed the earth, darkness, mourning, wickedness, negation, death, and was appropriate to the Prince of Darkness." *Southern Intelligencer* quoted in Arnoldo De Léon, *They Called Them Greasers: Anglo Attitudes toward Mexicans in Texas, 1821—1900* (Austin, Tex., 1983), p. 20.

4. Illustrations: fig. 1 from A. von Steinwehr and D. G. Brinton, *An Intermediate Geography* (Cincinnati, 1877), p. 13; and fig. 2 from Arnold Guyot, *Physical Geography* (New York, 1873), p. 114.
5. Ruth Miller Elson, *Guardians of Tradition: American Schoolbook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ncoln, Nebr., 1964), pp. 87—88, 97.
6. Albert K.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Nationalist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 (Baltimore, 1935), p. 83.
7. Jackson,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6 Dec. 1830, in James D. Richardson,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789 — 1897* (Washington, 1896—1900), 2: 522.
8. Sherman letter of Sept. 1868, quoted in Ralph K. Andrist, *The Long Death: The Last Days of the Plains Indians* (New York, 1964), p. 154.
9. Elson, *Guardians of Tradition*. p. 81.
10. Illustrations: fig. 3 from *ibid.*, *following p.* 74; *and fig.* 4 *from Robert K. Berkhofer, Jr., The White Man's Indian: Images of the American Indian from Columbu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1978), following p. 138 (original in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Collection).

11. Elson, *Guardians of Tradition*, p. 154.
12. John J. Ingalls, *America's War for Humanity* (New York, 1898), excerpted in Charles Gibson, ed., *The Black Legend: Anti-Spanish Attitudes in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New York, 1971), p. 177; Lodge and Proctor quoted in Gerald F. Linderman, *The Mirror of War: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Ann Arbor, Mich., 1974), pp. 45, 123.
13. Randolph and Jefferson quoted in Arthur P. Whitak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Latin America, 1800—1830* (Baltimore, 1941), pp. 183, 188, Adams in his *Memoirs* (Philadelphia 1874—77), 5 : 325.
14. Stephen Austin quoted in David J. Weber, " 'Scarce more than apes.' Historical Roots of Anglo American Stereotypes of Mexicans in the Border Region," in Weber, ed., *New Spain's Far Northern Frontier* (Albuquerque, N. Mex., 1979), p. 298; Walker and Buchanan quoted in Reginald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al Anglo-Saxonism* (Cambridge, Mass., 1981), pp. 215, 217.
15. Thomas Corwin and Walt Whitman quoted in Norman A. Graebner, ed., *Manifest Destiny* (Indianapolis, 1968), pp. 162, 208; *New York Evening Post* quoted in Julius Pratt, "The Ideology of American Expansion," in Avery Craven, ed.,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E. Dodd* (Chicago, 1935), p. 344; John H. Schroeder, *Mr. Polk's War: American Opposition and Dissent, 1846—1848* (Madison, Wis.,

1973), pp. 76, 129.

16. Quotes from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p. 233, and Robert E. May, *The Southern Dream of a Caribbean Empire, 1854—1861* (Baton Rouge, La., 1973), p. 7.
17. Leonard Wood quoted in Linderman, *The Mirror of War*, p. 138.
18. Elson, *Guardians of Tradition*, p. 161. The Spanish foe rose in American estimation as the Cubans fell. Spanish troops had fought bravely, and their leaders had proven chivalrous in battle and cooperative in defeat.
19. Illustrations: fig. 5 from William Murrell, *A History of American Graphic Humor* (New York, 1933), 1: 191; fig. 6 from *Harper's Weekly*, 35 (7 Nov. 1891): 882 (drawing by Burt Wilder; from Collection of Rare Books, Duke University Library); fig. 7 from *Judge*, 35 (9 July 1898), cover (drawing by Grant Hamilton); fig. 8 from John J. Johnson, *Latin America in Caricature* (Austin, Tex., 1980), p. 81 (drawing by C. Jay Taylor originally in *Puck*, 3 June 1896); fig. 9 from Johnson, *Latin America in Caricature*, p. 89 (in *Chicago Kecord-Heraid*, 1901); fig. lofrom Johnson, *Latin America in Caricature*, p. 127 (in *Chicago Inter Ocean*, 1905).
20. Elson, *Guardians of Tradition*, p. 162.
21. Michael H.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 1983), p. 35.
22. California's anti-Chinese memorial to Congress (1877), in Cheng-Tsu Wu, *"Chin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nti-Chinese Prejudice in America* (New York, 1972), p. 115;

Elson, *Guardians of Tradition*, *p*. 164.

23.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pp. 92, 93.
24. Illustrations: fig. 11 from *san Francisco Illustrated Wasp*, 1 (8 Dec. 1877): 1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California State Library); fig. 12 from Morton Keller,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Thomas Nast* (New York, 1968), #65 following p. 111 (originally in *Harper's Weekly*, 7 Aug. 1869); fig. 13 from Richard Van Alstyn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 Asia* (New York, 1973), p. 77 (ascribed to *Life*, 1900); fig. 14 from *Harper's Weekly*, 44 (28 July 1900), cover (drawing by William A. Rogers; in the Collection of Rare Books, Duke University Library); fig. 15 from *Literary Digest*, 32 (10 March 1906): 357 (drawing by Fred Morgan originally in *Philadelphia Inquirer*).
25. Roger Daniels, *The Politics of Prejudice*: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and the Struggle for Japanese Exclusiòn* (Berkeley, Calif., 1962), pp. 28, 47.
26. Elson, *Guardians of Tradition*, p. 122; Horace Bushnell oration of 1837, quoted in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p. 209.
27. Beveridge speech of 17 Sept. 1898 entitled "The March of the Flag," in his *The Meaning of the Times* (Indianapolis, 1908), p. 47.
28. See Michael McCarthy, *Dark Continent*: *Africa as Seen by Americans* (Westport, Conn., 1983), chaps. 6—7 on late nineteenth-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missionary testimony, travel accounts,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school texts. The quoted phrase is McCarthy's from p. xvi.
29. Robert Seager II and Doris D. Maguire, eds., *Letters and*

Papers of Alfred Thayer Mahan (Annapolis, Md., 1975), 1 : 593, 2 : 84, 92, 167, 529, 557—58, 569, 605, 620, 627, 693; Seager,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Man and His Letters* (Annapolis, Md., 1977), pp. 29, 37, 96, 142, 464—65.

30. Beveridge speech of 9 Jan. 1900, in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33, 56th Cong., lst sess., p. 708; McKinley speech of 16 Feb. 1899, in *Speeches and Addresses of William McKinley from March 1, 1897 to May 30, 1900* (New York, 1900), p. 193; Taft quoted in Stuart C. Miller, *"Benevolent Assimilation": The American Conquest of the Philippines, 1899—1903* (New Haven, Conn., 1982), p. 134.

31. Illustrations: fig. 16 from *Literary Digest*, 17 (16 July 1898): 67 (drawing by Charles Nelan originally in *New York World*, 1898); fig. 17 from *Judge*, 39 (11 Aug. 1900), cover (drawing by Victor Gilliam; in the General Research Division,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fig. 18 from Johnson, *Latin America in Caricature*, p. 217 (drawing by William A. Rogers originally in *Harper's Weekly*, 27 Aug. 1898); fig. 19 from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Service (photo No. 111—RB—1169); fig. 20 from *Bee*, 1 (25 May 1898): 8 (drawing by J. Campbell Cory; in the General Research Division,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fig. 21 from *Literary Digest*, 22 (30 March 1901): 372 (drawing by R. C. Bowman originally in *Minneapolis Tribune*); fig. 22 from Johnson, *Latin America in Caricature*, p. 131 (drawing by Thomas May originally in *Detroit Journal*, 1907;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Detroit*

News, a division of Evening News Association, copyright 1907); fig. 23 from *Literary Digest*, 18 (18 Feb. 1899): 180 (drawing by Thomas May originally in *Detroit Journal*).

Chapter 4: The Perils of Revolution

Epigraph. Charles Francis Adams, ed.,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Boston, 1850—56), 10 : 397; and Andrew A. Lipscomb and Albert E. Bergh, eds.,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Washington, 1903—07), 15 : 491.

1. Lester J. Cappon, ed., *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 (Chapel Hill, N. C., 1959), pp. 358, 391. My treatment here of Adam's and Jefferson's views has particularly benefited from a reading of John R. Howe, Jr., *The Changing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Adams* (Princeton, 1966); Joyce Appleby, "The New Republican Synthesis and the Changing Political Ideas of John Adams," *American Quarterly*, 25 (Dec. 1973); Peter Shaw, *The Character of John Adams* (Chapel Hill, N. C., 1976); Robert R. Palmer, "The Dubious Democrat: Thomas Jefferson in Bourbon Franc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72 (Sept. 1957); and Lawrence S. Kaplan, *Jefferson and France: An Essay on Politics and Political Ideas* (New Haven, Conn., 1967). Merrill D. Peterson, *Adams and Jefferson: A Revolutionary Dialogue* (Athens, Ga., 1976), is a deftly drawn portrait of a fascinating relationship.
2. Clinton Rossiter, "The Legacy of John Adams," *Yale Review*, new series, 46 (June 1957): 532.
3. Known collectively as "Discourses on Davila," these essays were written in response to the initial stages of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and the continuing process of political consolid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quotes that follow can be found in order of appearance in C. F. Adams,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6 : 279, 280, 396, 252.

4. *Ibid.*, 4 : 358.
5. *Ibid.*, 4 : 57, 7 : 151, 9 : 567—68.
6. Julian P.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Princeton, 1950—), 16 : 293.
7. *Ibid.*, 11 : 93; Lipscomb and Bergh,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10 : 341—42.
8. Cappon, *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 p. 347; C. F. Adams,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10 : 155.
9. C. F. Adams,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10 : 283; Cappon, *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 pp. 574—75, 596—97.
10. Lipscomb and Bergh,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14 : 246.
11. Boy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11 : 485—86; C. F. Adams,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10 : 397.
12. Boy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15 : 326; Lipscomb and Bergh,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9 : 9.
13. Harold C. Syrett, ed.,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New York, 1961—79), 15 : 670—71; John C. Fitzpatrick, ed.,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Washington, 1931—44), 30 : 497—98, 31 : 324—25, 32 : 54; Gouverneur Morris quoted in Charles D. Hazen, *Contemporary American Opin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altimore, Md., 1897), pp. 57—58, 110.
14. C. F. Adams,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9 : 570; Charles Francis Adams, ed., *Letters of John Adams, Addressed to His Wife* (Boston, 1841), 2 : 120.

15. Paul L. Ford, e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892—99), 8 : 179; Lipscomb and Bergh,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13 : 36, 130, 14 : 247, 15 : 129—30, 19 : 163.
16. Lipscomb and Bergh,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6 : 373, 9 : 164—65.
17. *Winthrop D.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00—1812*(Chapel Hill, N. C., 1968), p. 385.
18. For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9 : 435; Lipscomb and Bergh,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13 : 43, 15 : 117. See by way of comparison C. F. Adams,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10 : 144.
19. Charles C. Griff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ruption of the Spanish Empire, 1810—1822* (New York, 1937), p. 250; James F. Hopkins and Mary W. M. Hargreaves, eds., *The Papers of Henry Clay* (Lexington, Ky., 1959—), 2 : 517; Arnoldo De Léon, *They Called Them Greasers: Anglo Attitudes toward Mexicans in Texas, 1821—1900* (Austin, Tex., 1983), p. 3.
20. Rush Welter, *The Mind of America, 1820—1860* (New York, 1975), pp. 3, 60; James A. Field, Jr., *America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1776—1882* (Princeton, 1969), p. 122.
21. Edward Mead Earle, "American Interest in the Greek Cause, 1821—1827,"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3 (Oct. 1927): 28—29; Cappon, *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 p. 602.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extend diplomatic recognition to Greece until 1837.

22. Jerzy Jan Lerski, *A Polish Chapter in Jacksonian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olish Exiles of 1831* (Madison, Wis., 1958), p. 37.
23. Elizabeth Brett White, *American Opinion of France: From Lafayette to Poincaré* (New York, 1927), p. 87.
24. *Ibid.*, p. 131.
25. *Ibid.*, p. 209; George L. Cherry, "American Metropolitan Press Reaction to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Mid-America*, 32 (Jan. 1950): 4, 5.
26. Cherry, "American Metropolitan Press Reaction," p. 7.
27. Michael H.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 1983), p. 293.
28. *Ibid.*, p. 218.
29. American control extended to three-quarters of Mexico's mining enterprise, more than one-half of her oil production, and cattle ranches and sugar plantations totaling one-seventh of her land area.
30. Arthur S. Link, *Wilson: The New Freedom* (Princeton, 1956), pp. 360, 379; Link, *Wilson: The Struggle for Neutrality* (Princeton, 1960), p. 239; Arthur S. Link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Princeton, 1966—), 29: 521—22.
31. Link, *Wilson: The New Freedom*, p. 350; Robert E. Quirk, *An Affair of Honor: Woodrow Wilson and the Occupation of Vera Cruz* (Lexington, Ky., 1962), p. 77.
32. *Los Angeles Times* quoted in Link, *Wilson: Confusions and Crises*, 1915—1916 (Princeton, 1964), p. 202.
33. Marc Raeff, "An American View of the Decembrist Revolt,"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5 (Sept. 1953): 290, 292; John Lewis Gaddis,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78), pp. 12, 13.

34. Arthur W. Thompson and Robert A. Hart, *The Uncertain Crusade: America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Amherst, Mass., 1970), p. 30.
35. Elting E. Morison et al., eds., *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Cambridge, Mass., 1951—54), 5: 22, 101, 178—79, 345.
36. *Macon Telegraph* quoted in Meno Lovenstein, *American Opinion of Soviet Russia* (Washington, 1941), p. 42.
37. *Ibid.*, p. 33; Leonid I. Strakhovsky, *American Opinion about Russia, 1917—1920* (Toronto, 1961), pp. 40, 52.
38.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41: 524.
39. Eugene P. Trani, "Woodrow Wilson and the Decision to Intervene in Russia: A Re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8 (Sept. 1976): 460.
40. Ray Stannard Baker and William E. Dodd, eds., *The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New York, 1925—27), 6: 85.
41. Gaddis,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 106; Lovenstein, *American Opinion of Soviet Russia*, pp. 48—49.
42. Lovenstein, *American Opinion of Soviet Russia*, p. 39; Strakhovsky, *American Opinion about Russia*, p. 95; Gaddis,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p. 105, 106.
43. Peter G. Filene,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Experiment, 1917—1933* (Cambridge, Mass., 1967), p. 59. Theda Skocpol's account of the forces at work in three major

revolutions,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1979), highlights the shallow and procrustean nature of American understanding.

44. Illustrations: fig. 24 from William Murrell, *A History of American Graphic Humor* (New York, 1933), 1: 47; fig. 25 from Morton Keller,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Thomas Nast* (New York, 1968), # 74 following p. 111 (originally in *Harper's Weekly*, 7 Feb. 1874); fig. 26 from Robert K. Murray, *Red Scare: A Study in National Hysteria, 1919—1920* (Minneapolis, Minn., 1955), p. 34 (drawing by Rehse originally in *New York World*); fig. 27 from *Literary Digest*, 67 (25 Dec. 1920): 17 (drawing by Gale originally in *Los Angeles Times*, Dec. 1920; copyright 1920, *Los Angeles Times*;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fig. 28 from *Literary Digest*, 63 (25 Oct. 1919): 12 (drawing by Morgan originally in *Philadelphia Inquirer*, 1919;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hiladelphia Inquirer*).
45. Gaddis,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p. 105—06; Baker and Dodd, *The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5: 301.
46. Lansing quoted in Lloyd C. Gardner, *Wilson and Revolutions: 1913—1921* (Philadelphia, 1976), p. 22.
47. The following generalizations on the role of the elite were suggested by a reading of Donald R. Mathews,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Political Decision-Makers* (Garden City, N. Y., 1954), pp. 23—33; Ernest R. May, *American Imperialism: A Speculative Essay* (New York, 1968), chap. 2; Kenneth Prewitt and Alan Stone, *The Ruling Elites*:

Elite Theory, Power,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1973), chap. 6; Edward Pessen,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s in Americ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7 (Dec. 1982); and Ruth Miller Elson, *Guardians of Tradition: American Schoolbook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ncoln, Nebr. 1964), pp. 136—43, 280—81, 340—41.

48.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ited and abridged by Richard D. Heffner (New York, 1956), p. 267.

Chapter 5: Ideology in Twentieth—Century Foreign Policy

Epigraph. Walter C. Sellar and Robert J. Yeatman, 1066 *and All That* (New York, 1931), p. vii.

1. For the era of "dollar diplomacy," that strange interlude between Roosevelt and Wilson, foreign-policy ideology receded in importance. Neither President William Howard Taft nor his secretary of state Philander C. Knox had given foreign affairs serious thought before coming into office, and their four years there did little to deepen or clarify their views. The result was a policy that was intellectually muddled, procedurally ad hoc and ill coordinated, and rendered incoherent by a shifting set of rationales.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iar core ideas are, to be sure, evident in the Taft administration's professed belief in the exceptional role of the American nation; in its tutelary ambitions in Latin America,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and in its tense reaction to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China and Mexico. Mixed in with these conventional concerns, however, was a keen interest in securing and protecting export markets, a heavy reliance on capital investment as a tool of policy, a guarded trial at cooperating with the other

major powers in Chinese affairs (while eschewing any involvement in European political affairs), and an indifference to strategic calculations that shocked Roosevelt.

2. Lo Hui-min,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 (Cambridge, U. K., 1976—78), 1:285.
3. Roosevelt quoted in 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Baltimore, 1956), p. 40.
4. Hermann Hagedorn, ed., *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 (New York, 1923—26), 15: 286, 338—39; Thomas G. Dyer,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dea of Race* (Baton Rouge, La., 1980), pp. 49, 52, 149.
5. Dyer, *Theodore Roosevelt*, pp. 30, 54, 100, 109; Stuart C. Miller, *"Benevolent Assimilation": The American Conquest of the Philippines, 1899—1903* (New Haven, Conn., 1982), p. 251; Walter L. Williams,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and the Debate over Philippine Annex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6 (March 1980): 816, 826.
6. Edmund Morris, *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 (New York, 1979), chaps. 1 — 5, sensitively evokes the young TR's family and social milieu.
7. Roosevelt speech of 10 April 1899, in his *The Strenuous Life* (New York, 1900), pp. 6, 7.
8. Arthur S. Link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Princeton, 1966—), 11:66.
9. *Ibid.*, 11:93, 12:19, 216, 14:433, 15:149.
10. *Ibid.*, 11:440, 12:18, 14:433, 18:104.
11. *Ibid.*, 18:93, 23:435.
12. *Ibid.*, 1:518, 8:317.

13. John M. Mulder, *Woodrow Wilson: The Years of Preparation* (Princeton, 1978), pp. 69, 137, 153, 175. Arthur S. Link, *Wilson: The Road to the White House* (Princeton, 1947), chap. 1, and Harley Notter, *The Origins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Woodrow Wilson* (Baltimore, 1937), Part I, are particularly suggestive on this multifaceted Anglophilia.
14.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6:172, 22:159.
15. Richard Olney (May 1898) quoted in Ernest R. May, *American Imperialism: A Speculative Essay* (New York, 1968), p. 184.
16. Henry F. Pringle, *Theodore Roosevelt*, rev. ed. (New York, 1956), pp. 219, 220; Roosevelt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6 Dec. 1904, in Hagedorn, *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 15:257.
17. Roosevelt speech of 13 May 1903, in his *California Addresses* (San Francisco, 1903). p. 98.
18. Elting E. Morison et al., eds., *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Cambridge, Mass., 1951—54), 4:768, 770, 5:762.
19. Charles S. Campbell, Jr., *Anglo-American Understanding, 1898—1903* (Baltimore, 1957), and Bradford Perkins, *The Great Rapprochement: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95—1914* (New York, 1968), develop these points in depth.
20.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36:67; John W. Coogan, *The End of Neutrality: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Maritime Rights, 1899—1915* (Ithaca, N. Y., 1981), chap. 11.
21.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41:527.

22. Ray Stannard Baker and William E. Dodd, eds., *The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War and Peace* (New York, 1927), 2:305.
23. George Norris speech of 4 April 1917, in *Congressional Record*, 65th Cong., 1st sess., vol. 55, pt. 1, p. 214.
24. Albert J. Beveridge, "The Pitfalls of a 'League of Nations,'" *North American Review*, 209 (March 1919): 314; John Braeman, *Albert J. Beveridge: American Nationalist* (Chicago, 1971), p. 260.
25. George Gallup,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35—1971* (New York, 1972), 1:54. The polls cited in this section provide only a rough gauge of national sentiment because the polling techniques then in use were crude.
26. A striking number of leading twentieth-century policymakers issued from the less affluent households of ministers where any deficiency in social contacts and wealth was offset by a dedication to hard work and good works. Foremost among this group would be Woodrow Wilson, Charles Evans Hughes, Dean Acheson, the Dulles brothers, and Dean Rusk.
27. Lodge quoted in Lloyd E. Ambrosius, "Wilson, the Republicans, and French Security after World War I,"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9 (Sept. 1972): 344.
28. Henry Cabot Lodge speech of 12 Aug. 1919, in *Congressional Record*, 66th Cong., 1st sess., vol 58, pt. 4, pp. 3783, 3784.
29. Hoover and Berle quoted in Walter LaFeber, *Inevitable Revolutions: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 America* (New York, 1983), pp. 63, 81.
30. Howard H. Quint and Robert H. Ferrell, eds., *The*

Talkative President: The Off-the-Record Press Conferences of Calvin Coolidge (Amherst, Mass., 1964), p. 257.

31. Douglas Little, "Antibolshev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19 — 1939: The Diplomacy of Self-Delusion," *American Quarterly*, 35 (Fall 1983): 381, 383.
32. See Allen Woll's treatment of Hispanics and Richard A. Oehling on Asians, in Randall M. Miller, ed., *The Kaleidoscopic Lens: How Hollywood Views Ethnic Groups* (Englewood, N. J., 1980), and Sue Fawn Chung, "From Fu Manchu, Evil Genius, to James Lee Wong, Popular Hero: A Study of the Chinese-American in Popular Periodical Fiction from 1920 to 1940,"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10 (Winter 1976).
33. Quotes from Samuel L. Bai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 America* (New York, 1976), p. 35 (FDR); Robert Dallek, *Franklin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New York, 1979), p. 61 (FDR); John A. Garraty, *Henry Cabot Lodge* (New York, 1952), p. 374; Henry L. Stimson, letter to *New York Times*, 7 Oct. 1937, p. 12.
34. Illustrations: fig. 29 from John J. Johnson, *Latin America in Caricature* (Austin, Tex., 1980), p. 145 (drawing by King originally in *Chicago Tribune*, 1915; copyright 1915, Chicago Tribune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used with permission); fig. 30 from Johnson, *Latin America in Caricature*, p. 103 (drawing by Sykes originally in *Philadelphia Evening Public Ledger*, 1923;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hiladelphia Inquirer*); fig. 31 from David F. Long, *The Outward View: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

eign Relations (Chicago, 1963), p. 303 (drawing by Page originally in Louisville *Courier Journal*;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Courier-Journal*); fig. 32 from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A Carto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776—1976* (New York, 1975), p. 69 (drawing by Hugh Hutton originally in *Philadelphia Inquirer*, 18 July 1937;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hiladelphia Inquirer*).

35. Stimson quoted in Christopher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 (New York, 1973), pp. 56, 57, 19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1931—1941*, 2:227 (Hull), 771(FDR); FDR quoted in Daniel M. Smith, "Authoritarianism and American Policy Makers in Two World War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3 (Aug. 1974): 314, 316. The wartime decision to intern all 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Japanese descent (whether citizens or not), the unusually brutal treatment of Japanese soldiers, and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indictment of Japan's leaders for "moral blindness" and "mental deficiency" all had their roots in the same racial views that had informed prewar American policy.
36. At the same time and by the same margin Americans indicated they were willing to accept war with Japan. Gallup, *The Gallup Poll*, 1:304, 306, 307.
37. Roosevelt did not act until 1944, when he finally created a government board with limited power to aid Jewish refugees. David S. Wyman, *The Abandonment of the Jews: 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 1941—1945* (New York, 1984), pp. 5—15, 285—87, 311—27.

38. Robert A. Divine, *Roosevelt and World War II* (Baltimore, 1969), p. 9; Edgar B. Nixon, ed.,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 (Cambridge, Mass., 1969), 3: 520 (speech of 1 Dec. 1936).
39. Samuel I. Rosenman, comp.,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New York, 1938—50), 6:410 (speech of 5 Oct. 1937).
40. Charles A. Lindbergh, *The Wartime Journals of Charles A. Lindbergh* (New York, 1970), pp. 110, 401; Lindbergh, "Aviation, Geography, and Race," *Reader's Digest*, 35 (Nov. 1939): 64, 66—67; Wayne S. Cole, *Charles A. Lindbergh and the Battle against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74). p. 97.
41. Lindbergh, "Aviation," 66; Cole, *Charles A. Lindbergh*, p. 38.
42. Lindbergh's Madison Square Garden speech (23 May 1941), in *Vital Speeches*, 7 (1 June 1941): 483; Cole, *Charles A. Lindbergh*, p. 91.
43. Cole, *Charles A. Lindbergh*, p. 9; Lindbergh, *The Wartime Journals*, pp. 379, 404.
44. Cole, *Charles A. Lindbergh*, pp. 128, 130; Rosenman,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9: 638 (speech of 29 Dec. 1940).
45. Rosenman,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10: 522, 528 (speech of 9 Dec. 1941).
46.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ry S. Truman, 1947*, p. 324 (speech of 4 July 1947); Walter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New York 1951), p. 400.

47. Dean Rusk news conference of 4 May 1961, i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44 (22 May 1961): 763; Lyndon Johnson speech of 20 April 1964,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Lyndon B. Johnson, 1963—1964*, 1: 494.
48.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6: 698, 699, 701, 706—08.
49. "X" [George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25 (July 1947): 576.
50. *Ibid.*, 580—82.
51.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5: 232, 253.
52. Marshall quoted in Lawrence S. Wittner,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Greece, 1943—1949* (New York, 1983), pp. 46—47; McGrath quoted in Athan Theoharis, "The Politics of Scholarship: Liberalism, Anti-Communism, and McCarthyism," in Robert Griffiths and Theoharis, eds., *The Spector: Original Essays on the Cold War and the Origins of McCarthyism* (New York, 1974), p. 279.
53.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1969), p. 490.
54. Robert H. Ferrell, ed., *The Autobiography of Harry S. Truman* (Boulder, Colo., 1980), p. 41; Ferrell, ed., *Off the Record: The Private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1980), P. 98; Ferrell, ed., *Dear Bess: The Letters from Harry to Bess Truman, 1910—1959* (New York, 1983), pp. 419, 474; Wilson D. Miscamble, "The Evolution of an Internationalist: Harry S. Truma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23 (Aug. 1977), 270, 271. For Truman commentary on Wilson that appeared between 1952 and 1962, see Ferrell, *Off the Record*, pp. 238, 307, 387, 388, 404, and Harry S. Truman, *Mr. Citizen* (New York, 1960), pp. 217—18.

55. Ferrell, *Dear Bess*, p. 471; Truman quoted in *New York Times*, 24 June 1941, p. 7; Ferrell, *Off the Record*, pp. 44, 56—57; Monte M. Poen, ed., *Strictly Personal and Confidential: The Letters Harry Truman Never Mailed* (Boston, 1982), pp. 40, 41; Margaret Truman,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1973), pp. 323, 360.
56. Poen, *Strictly Personal*, p. 145; Ferrell, *Off the Record*, pp. 101—02, 118, 218—19; Millis, *Forrestal Diaries*, p. 281; J. Garry Clifford, "President Truman and Peter the Great's Will," *Diplomatic History*, 4 (Fall 1980).
57. Ferrell, *Dear Bess*, p. 551; Ferrell, *Off the Record*, pp. 99, 101—02
58. Joseph M. Jones, *The Fifteen Weeks* (New York, 1955), pp. 141, 167, 247—48, 269—86;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p. 293.
59.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ry S. Truman, 1947*, pp. 178, 180 (Truman doctrine speech of 12 March 1947).
60. NSC 20/4 of 23 Nov. 1948,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1:667; NSC 68 of 7 April 1950, in *ibid.*, *1950*, 1: 237, 239, 242, 244. Truman at once accepted the fervent policy premises articulated by his aides in NSC 68;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a few months later enabled him to put their spending recommendations into effect.

61. Quotes in this and the next paragraph come from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ry S. Truman, 1947*, p. 180; Ferrell, *The Autobiography of Harry S. Truman*, p. 102; W. W. Rostow speech (Spring 1961), in T. N. Greene, ed., *The Guerilla—and How to Fight Him* (New York, 1962), pp. 55, 56.

62. Robert J. McMahon, *Colonialism and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1945—49* (Ithaca, N. Y., 1981), p. 61 (FDR);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New York, 1978), p. 594 (FDR); Wm. Roger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1941—1945* (New York, 1978), p. 170 (Welles).

63.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1982), pp. 36, 43, 47n; David McLean, "American Nationalism, the China Myth, and the Truman Doctrine: The Question of Accommodation with Peking, 1949—50," *Diplomatic History*, 10 (Winter 1986): 4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2: 600—02, 618, 7: 1385; George F. Kennan, *Memoirs* (Boston, 1967, 1972), 1: 184.

64. Ferrell, *Dear Bess*, pp. 34, 39, 52, 158, 242, 254, 293, 298, 341, 366, 416, 417, 464, 471, 520, 527, 565; Ferrell, *Off the Record*, pp. 45, 55, 140, 165.

65. Warren I. Cohen, *Dean Rusk* (Totowa, N. J., 1980), p. 83; LaFeber, *Inevitable Revolutions*, p. 14; Blanche Wiesen Cook, *The Declassified Eisenhower: A Divided Legacy* (Garden City, N. Y., 1981), p. 366n; Robert H. Ferrell,

ed., *The Diary of James C. Hagerty: Eisenhower in Mid—Course, 1954—1955* (Bloomington, Ind., 1983), pp. 35, 210; Ferrell, ed., *The Eisenhower Diaries* (New York, 1981), pp. 232, 296; Donald Neff, *Warriors at Suez: Eisenhower Takes America into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1981), p. 387.

66. Ferrell, *The Eisenhower Diaries*, p. 223; Neff, *Warriors at Suez*, pp. 293, 301; John Foster Dulles, *War or Peace* (New York, 1950), pp. 74—75, 87.
67. Thomas J. Noer, "Truman, Eisenhower, and South Africa: The 'Middle Road' and Apartheid,"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11 (Spring 1983): 85, 99.
68. *Ibid.*, 83, 96; Cook, *The Declassified Eisenhower*, p. 173; Richard D. Mahoney, *JFK: Ordeal in Africa* (New York, 1983), p. 242.
69. Melvin Gurtov,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the Third World: Antinationalism and Intervention* (New York, 1974), pp. 44, 51; Mahoney, *JFK*, pp. 51, 109, 118, 143.
70. Richard H. Immerman, *The CIA in Guatemala: The Foreign Policy of Intervention* (Austin, Tex., 1982), p. 11; Gurtov,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the Third World*, p. 89.
71. Bai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 America*, pp. 58, 118—19, 215—16; LaFeber, *Inevitable Revolutions*, p. 137; Immerman, *The CIA in Guatemala*, p. 132; Richard E. Welch, Jr., *Response to Rev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ban Revolution, 1959—1961* (Chapel Hill, N. C., 1985), p. 35.
72. Ferrell, *The Diary of James C. Hagerty*, p. 48;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3, p. 876 (18 Nov. 1963); *ibid*: *Lyndon B Johnson, 1965*, 1: 471 (2 May 1965).

73. Ferrell, *Off The Record*, p. 80; NSC 48/2 of 30 Dec. 1949, in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7:1215; NSC 48/4 of 4 May 1951, in *ibid.*, *1951*, 6:34—35; Dean Acheson, National Press Club speech of 12 Jan. 1950, i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22 (23 Jan. 1950): 114.
74.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p. 603.
75. Ferrell, *Off the Record*, pp. 217—18; Dulles speech of 28 June 1957, i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37 (15 July 1957): 94.
76. *The Pentagon Papers: The Defense Departmen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Decisionmaking on Vietnam*, Senator Gravel ed. (Boston, 1971—72), 1: 594.
77. *Ibid.*, 1: 362, 597, 606.
78. John F. Kennedy, *The Strategy of Peace* (New York, 1960), p. 64;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 p. 306.
79. Lyndon Johnson, Johns Hopkins speech of 7 April *1965*,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Lyndon B. Johnson, 1965*, 1: 394.
80. Kennedy, *The Strategy of Peace*, p. 8; Dean Acheson letter of 30 July 1949, in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1949), p. xvi; Dulles quoted in Ronald 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The Road to Power* (New York, 1982), p. 292; John Foster Dulles, "A Policy of Boldness," *Life*, 32 (19 May 1952): 148.

Chapter 6: The Contemporary Dilemma

Epigraph.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Lewis S. Feuer, ed., *Marx and Engels: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Garden City, N. Y., 1959), p. 320; and Clifford Geertz, "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David E. Apter, 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London, 1964), p. 72.

1. Robert W. Stevens, *Vain Hopes, Grim Realiti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1976), preface and chapter 14, sets outlay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war between 1950 and 1974 in the $128—172 billion range and estimates veterans' benefits of about $233 billion.
2. Walter Lippmann, *The Cold War: A Study in U. 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72), p. 50.
3. Gallup polls asking for approval ratings of various countries, attitudes toward marriage between whites and nonwhites, and even the nationality of the most beautiful women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hardihood of the old racial hierarchy from the late 1930s down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See George H. Gallup,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35—1971* (New York, 1972), 1: 54, 126, 167, 2: 1464—65, 3: 2168, 2304; Gallup,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72—1977* (Wilmington, Del., 1978), 1: 39—40, 128—29; Gallup,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Wilmington, Del., 1979)*, p. 218; Gallup,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80* (Wilmington, Del., 1981), pp. 47—49.
4. Paul L. Ford, e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892—99), 10: 175 (letter of 26 Dec. 1820). While

this study was in proqess, defense spending grew to $228 billion (27. 1 percent of the fiscal 1984 federal budget) and interest on the national debt to $111 billion (13.2 percent). At the same time, means-tested programs targeted primarily at the 35 million Americans below the poverty line took successive cuts that brought assistance down to $62 billion (7.4 percent of the 1984 budget). These cuts occurred even as the poor increased from 11.7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in 1979 to 15.2 percent in 1984.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3 January 1985, pp. 3, 5.

5. The phrase is Arthur M. Schlesinger, Jr.'s. His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Boston, 1973), especially chaps. 3—8, traces the drift away from the constitutional scheme of checks and balances.
6. A recent report by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Priorities, reflecting the views of the critics of current arms programs, examined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irteen industrial countries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report concluded that military spending acted as a drag o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capital formation essential to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increases. Of the thirteen countries studie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pent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n defense) ranked at or near the bottom in all three performance categories. This starving of productive investments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 has in turn had harmful consequences fo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merican products on the world marke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5 March 1982, p. 4. See also *ibid.*, 11 Sept. 1984, p. 3; Lioyd J. Dumas, "Military Spending and Economic Decay." in Dumas,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ms Reduction (Boulder, Colo., 1982); and Zvi Griliches, "Returns t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s in the Private Sector," in John W. Kendrick and Beatrice N. Vaccara, eds., *New Developments in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Chicago, 1980), pp. 445—46, and comment by Edwin Mansfield, p. 456.

7. This Relative decline was to a degree inevitable as the other major industrial states rebuilt their economies after World War II and regained their competitive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But the decline has continued. It is reflected in a chronic international trade deficit, evident since 1972 and especially serious since 1977. The deficit, which stood at $25.5 billion in 1980, grew by 1985 to $148.5 billion.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5* (Washington, 1984), pp. 801—02;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31 Jan. 1986, p. 6.
8. NSC 162/2 of 30 Oct. 1953, in *The Pentagon Papers: The Defense Departmen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Decisionmaking on Vietnam*, Senator Gravel ed. (Boston, 1971—72), 1: 412—29; Eisenbower's "Farewell Address" of 17 Jan. 1961,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Dwight D. Eisenhower*, 1960—61, pp. 1038—39.
9.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s 1950 decision increased defense spending from 5 percent of gross national product to 13.5 percent. Eisenhower brought that figure down to the 9 percent range and held it there.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ommon Defense: Strategic Programs in 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1961), pp. 282—83.

10. Doris Kearns, *Lyndon Johns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1976), p. 251.
11. Dayid W. Moore, "The Public Is Uncertain," *Foreign Policy*, no. 35 (Summer 1979), pp. 70—71.
12. Dean Acheson quoted in walter LaFeber, "American Policy-maker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Cold War, 1945—50" in Yōnosuke Nagai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1977), p. 60.
13. William Watts and Lloyd A. Free, "Nationalism, Not Isolationism," *Foreign Policy*, no. 24 (Fall 1976), pp. 16—24; John E. Reilly, "The American Mood: A Foreign Policy of Self—Interest," *ibid.*, no. 34 (Spring 1979), p. 76.
14. Walter Lippmann, *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Boston, 1943), p. 86.
15. Henry Kissing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1979), pp. 54—70, 229, 677, 1014, 1063—64. The odd mix of European realpolitik and American missionary faith that characterized Kissinger's foreign policy views owes much to his deeply unsettling experience as a man between two cultures. Antisemitism had shattered the security of his childhood world and driven him with his family from Germany. The mature Kissinger's admiration for Metternich and Bismarck was an expression of his abiding preoccupation with the fragility of the political order and the wish to master the subterranean forces of chaos and the irrational that had earlier afflicted him. At the same time Kissinger's need for acceptance in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his adopted country led him to embrace the dominant foreignpolicy ideology.
16. Nixon speech of 30 April *1970*,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70, p. 409; Kissinger speech of 22 July 1976, i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75 (Aug. 1976): 217.

17. Richard D. Mahoney, *JFK: Ordeal in Africa* (New York, 1983), pp. 237—38; Mohamed A. El-Khawas and Barry Cohen, *The Kissinger Study on Southern Africa* (Nottingham, U.K., 1975), pp. 60, 94.
18. Richard Nixo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1978), pp. 733, 736; Walter LaFeber, *Inevitable Revolutions: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 America* (New York, 1983), p. 197; Roger Morris, *Uncertain Greatness: 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77), pp. 240—41.
19. Kissinger interview by Pierre Salinger, 12 April 1975, i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72 (12 May 1975): 609.
20. Jimmy Carter, inaugural address and speech at Notre Dame University, 20 Jan. and 22 May 1977,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immy Carter, 1977*, pp. 2, 957, 958, 962.
21.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New York, 1982), pp. 48 and 207 (on China), 234 and 256 (on revolution), 4, 9, 440, 443, 445, 453, 458, and 459 (on Iran).
22.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New York, 1983), p. 436.
23. Nikki R. Keddie, "Iranian Revol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8 (June 1983), and Barry Rubin,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 (New York, 1980), identify some of the long-simmering discontents that brought the Shah down and eluded the intellectual grasp of culture-bound American policymakers.

24. Ronald Reagan, *A Time for Choosing: The Speeches of Ronald Reagan, 1961—1982* (Chicago, 1983), pp. 38 (30 March 1961), 56, 57 (27 Oct. 1964), 148 (7 Dec. 1973), 233—34 (17 July 1980); Reagan speech of 8 March 1983, in *New York Times*, 9 March 1983, p. A18; Reagan speech of 27 May 1981,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agan, 1981*, p. 464; Reagan address to Congress of 27 April 1983, i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83 (June 1983): 4; Ronald Reagan, *Ronald Reagan Talks to America* (Old Greenwich, Conn., 1983), p. 123 (speech of 11 Nov. 1968). Reagan aides have echoed these views. Secretary of State Alexander Haig proclaim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arried a "historic role in defense of freedom, wherever it may b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erving as a model on "how to combine freedom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Haig's successor, George Shultz, declared no less grandly that "the yearning for freedom is the most powerful political force all across the planet" and sets the Soviets "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 of history." Haig speech of 24 April 1981, in *New York Times*, 25 April 1981, p. 4; Shultz speech of 23 Sept. 1985, reported i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4 Sept. 1985, pp. 3, 5.
25. Robert Dallek, *Ronald Reagan: The Politics of Symbolism* (Cambridge, Mass., 1984), p. 58; Reagan interviews in *Time*, 117 (5 Jan. 1981): 32, and in Charles D. Hobbs,

Ronald Reagan's Call to Action (Nashville, Tenn., 1976), p. 42.

26. Reagan, A *Time for Choosing*, p. 335 (speech of 8 June 1982).
27. Norman Podhoretz, *The Present Danger* (New York, 1980), p. 22; Atlantic Council, *The Teaching of Values and the Successor Generation* (Washington, 1983), pp. 14, 18, 23.
28.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9 June 1981, p. 3, and 19 January 1982, p. 4; Bruce Russett and Donald R. Deluca, " 'Don't Tread on Me':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Eightie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6 (Fall 1981).
29. Carter quoted in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 522.
30. The observations in this paragraph are intended as an invitation to consider foreign-policy ideology in comparative terms. Good jumping-off points are A. P. 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A Study in British Power* (London, 1959); Eberhard Jäckel, *Hitler's Weltanschauung: A Blueprint for Power*, trans. Herbert Arnold (Middletown, Conn., 1972); George L. Mosse,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64); and William Taubman, *Stalin's American Policy: From Entente to Détente to Cold War* (New York, 1982).
31. Charles Francis Adams, ed.,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Boston, 1850—56), 10: 417—18. Anthony D. Smith,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2d ed. (London, 1983), pp. xxv—xxviii, makes the case—contrary to my own position here and that of Ernest Lee Tuveson, *Redeemer Nation: The Idea*

of America's Millennial Role (Chicago, 1968), and of Sacvan Bercovitch, *The American Jeremiad* (Madison, Wis., 1978) —that Nationalism and millennialism can be related only incidentally.

32. Thorstein Veblen, *Absentee Ownership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in Recent Times* (New York, 1923), pp. 38—39. Elie Kedourie, *Nationalism* (London, 1960), provides a powerful elaboration of Veblen's indictment.
33. Serious and systematic academic study of foreign cultures developed haltingl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and more vigorously since the 1950s, but specialists have, so Robert A. McCaughey contends in his critic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A Chapter in the Enclosure of American Learning* (New York, 1984), failed to reach the broader public.
34. John Quincy Adams, address of 4 July 1821, in Walter LaFeber, ed., *John Quincy Adams and American Continental Empire* (Chicago, 1965), pp. 44—46.
35. Joseph Shumpeter,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trans. Heinz Norden (Cleveland, 1955), p. 51.
36.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ii. 7. 63.
37. To these already apparent costs must be added another that is only potential yet chilling-nuclear war and the possible obliteration of humankind. Here is a hazard made ever greater by the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armed states, the dizzying multiplication of warhea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ver more complex, hair-trigger systems. We may push the odds against us still higher by persisting in our ideological claims that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feeding the nuclear-arms race.

38. Walter Dean Burnham, *The Current Crisis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1982), pp. 29, 51—52, 152—59, 161n.

39. Jonathan H. Turner and Charles E. Starnes, *Inequality: Privilege and Poverty in America* (Pacific Palisades, Calif., 1976), pp. 19, 22—23, 36, 43, 51; Kenneth Prewitt and Alan Stone, *The Ruling Elites: Elite Theory, Power,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1973), chap. 6. Alan S. Blinder, "The Level and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Well-Being," in Martin Feldstein, e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Chicago, 1980), pp. 415—79,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and Peter H. Lindert, *American Inequality: A Macro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1980), highlight some of the complexities involved in calculating, not to mention explaining or correcting,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40. Earl C. Ravenal has argued that retrenchment of regional commitments offers the greatest potential for savings. Europe, which will chaim $129 billion in the projected 1985 defense budget, can and should do more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conventional attack. The defense of Middle East oil, estimated by Ravenal at $47 billion, is another candidate for cuts, since those outlays exceed the possible cost if that oil, constituting less than 2.5 percent of total U.S. energy needs, were to be lost. Still further cuts might be made on the $47 billion allocated to Asia. Ravenal has estim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1985 budget that $154 billion in savings could be effected chiefly through scaling back our forward defense in these areas. Ravenal, "The Case for a Withdrawal

of Our Force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6 March 1983; Ravenal, "On Scaling Down Defense Ambitions," *New York Times*, 16 Feb. 1984, p. A27.

41.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ii. 7. 63.

索　　引